WISVORA

2025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學報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HKH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第1卷 第1期
2025年2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學報

主办　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编委会　主任委员：陈科存 梅见华 孙文杰
委员：

李兆祺	林鑫	叶明裕	毛雯钰
熊森浩	陈曦	王正威	华蕊
刘宇	李泽宇	吴钰双	苏于皓
崔健	穆尚海	梁馨元	
李明蔚	吕憬岩	叶明裕	
穆艾伟	景瑞宾	程丹丹	
黄少安	刘伟伟	胡朝凯	

版权声明

本期刊采用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授权。
论文稿件版权归作者所有。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www.hks.ac.cn 邮箱：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學報

哲学、文化与社会研究

跨文化背景下汉英禁忌语的对比分析（董玲玲, 郑贤榔） 1-7
“一带一路”倡议下澳门加快建设中葡人才高地的研究（殷知行, 许沈佳艺） 16-23
幸福，细节及伪装：纳博科夫的蝶类学之旅（刘珊） 24-30
基于Citespace的中国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张海麟） 31-38
传教士到外交官：卫三畏对日本开国进程影响探微（叶芷辰） 39-43
文化认同视域下烧麦传说叙事的建构与重塑（王琦） 134-139
诗歌堪舆学：书写天地人之间的关系 — 论赵野的山水美学建构（高若栋） 140-147
用文化综艺讲“新国潮”故事：在年轻化表达中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营, 崔梦远） 148-154

艺术、文学与美学

《彼得罗夫流感》：从文学到电影的空间隐喻重构（吕天威） 8-15
二程体用关系浅析: 北宋儒学中实践与理论之辨（吴描晖, 叶晨曦） 50-54
“托出南洋的多种颜色” ——从老舍《小坡的生日》看新加坡多民族社会（刘梓琳, 徐明月, 罗鸿海） 55-61
子宫的谎言：回归母体的《弃儿汤姆·琼斯史》（钱亮帆, 刘立翔, 赵文浩） 62-69
《情歌》中的疏离与迷惘：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诗意映像（冯子央） 76-81
拉赫玛尼诺夫声乐艺术歌曲作品的风格特点（罗金磊） 82-85
“形残”与“神全”：《红楼梦》僧道形象的宗教象征与三教合流的文化实践（刘卓仁） 177-184
东西方绘画透视法差异及其在插画创作中的融合（蒋礼） 185-193

教育、科技与智能化发展

“共同缔造理念”下的乡村教育发展（张钰杰） 86-90
“以气论艺”：汉魏书法与文学的理论交融（张智涵, 钱亮帆, 王笛） 91-98
AIGC视角下粤绣非遗传承创新研究（黎家良, 张淑敏） 99-104
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的建构与磨合（倪诗云） 125-133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教育与学习中的优势与风险（李展鹏） 168-176
人工智能独立创作主体地位否定的社会分析 ——基于生产、交往和伦理维度（刘雨萌） 194-202
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球发球机使用体验研究（张明阳） 44-49

经济、政策与社会治理

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背景下国家与美政治互信对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影响（黄佳丽） 105-124
新质设计力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张淑敏, 黎家良） 163-167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香港适用的法律问题分析（赵彬希） 70-75
打破完美的枷锁：认知行为疗法对完美主义者社会适应能力的干预效果研究（邵良超, 鞠晓蕾） 155-162

第 1 卷 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14

跨文化背景下汉英禁忌语的对比分析

董玲玲[1] 郑贤榔[1]

（[1]新疆师范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受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汉英禁忌语之间存在着共性和差异。了解和把握汉英禁忌语的差异和共性，能够减少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推进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本文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得出汉英禁忌语在死亡、歧视、身体、亵渎、辱骂和性行为方面具有相似性，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颜色、数字、话题隐私、种族歧视和姓名称谓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禁忌语教学在促进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采用合理的方法本文通过汉英禁忌语的对比分析，希望可以帮助读者对汉英禁忌语有着更直观、更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汉英禁忌语；对比分析；跨文化；教学法

引 言

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等的工具或手段，但是，人们经常会试图避免提到一些令人反感的话题或词语，这些会令人反感的话题或词语就被称为语言禁忌[2]。将跨文化中的汉英禁忌语进行对比分析，了解汉英禁忌语的异同，有利于跨文化交流者在语境中更准确地选择符合语言交际规律的话语进行交流，提高交际的效果，促进交际的顺利进行。

禁忌语在人们的交流中的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国内对禁忌语的研究逐渐增多。如莫媛媛的《汉英禁忌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对比研究》，作者分别从称呼、隐私话题、宗教、亵渎语来论述汉英禁忌语的差异性。李金珠的《中西方禁忌语异同分析》，作者通过研究汉英禁忌语的异同来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汉英语言禁忌的发展。关于跨文化中汉英禁忌语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这里就不每篇进行举例分析了。

本文采取的是文献参照、图表和分类对比方法，从知网、万方等网站，查找其他学者对汉英禁忌语的研究以及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的相关论文、期刊等文章，进行分类比较，总结成图表进行对比汉英禁忌语的异同，从而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

一、汉英禁忌语的相似性

关于禁忌语的分类，由于研究学者分析的角度存在着差异，所以每个学者研究的分类标准也不太一样。本文将从死亡、歧视、身体、亵渎、辱骂和性行为六个方面讨论汉英禁忌语的相似性，[3]选取这几个方面的

[1] 作者简介：1.董玲玲（1998-），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E-mail:1984338134@qq.com。2.郑贤榔（1997-），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E-mail:1057199011@qq.com。

[2]Wardhaugh R.社会语言学引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304.
[3]张雪婷.汉英禁忌语比较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D].天津师范大学，2016.

原因主要是在前人研究汉英禁忌语的分析文章中出现的频率最高。

（一）禁忌直接谈论“死亡”

不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中，“死亡”这个词都是给人们带来恐惧和不详的感觉，每个人都是向往着健康，所以对中西方对“死亡”有着共同的回避，俗话说的说凶即凶、祸从口出。“死亡”类的禁忌语在中西方的语言中都占比很大。

有关学者做出过相关统计，刘彤在《关于汉语死亡类禁忌语的分析》得出，在古典文献中出现“死亡”禁忌语有四十六个，明清小说中出现过三十二个，和宗教相关的有二十四个，与现代汉语有关的有五十八个，共计有一百六十个。除此之外，在《谦词敬词婉词的分析》共收录“死亡”类禁忌语有 481 个。

从美国当代语料库（COCA）检索出与“die”意思的词将近达 100000+，其中关于君王之死的“demise”有 3503 条；“expire”有 1369 条；用“pass out”代替“die”有 8240 条。汉英语言中平常表述“死亡”类禁忌语的方式相同：“逝世”与“go the way of all flesh”、“走了”与“pass away”、“长眠”与“be at rest”等。

（二）禁忌直接谈论侮辱性词语

从检索到的有关汉英禁忌语的文献，将文中内有关侮辱性的禁忌语进行归纳整理发现：汉语与英语在侮辱性方面的禁忌语具有共性。

人们会使用与动物有关的词语来咒骂或者侮辱他人，这类语言在谈话中会使人陷入尴尬或者不堪的感受之中，所以被视为禁忌语。汉语中辱骂人时会经常使用乌龟、王八、猪、狗、狼等词语来侮辱人，英语中也会用 dog; cat; cock; ass; wolf 来对他人进行人生攻击，英语小说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叙述：“There, you dog,”he said, “see if you’ll feel comfortable, after that!” （“哼，你这个狗东西，”格雷里骂道，“看你这下子还痛快不痛快！”）。[4]

（三）禁忌谈论性别歧视相关词语

通过研究还发现，汉英禁忌语部分都与性别歧视有关。这类禁忌语主要是侮辱妇女并带有歧视女性的一种用语。

据有关学者的数据统计显示，《辞海》中出现带有女字旁的字共有 257 个，其中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有 100 个，褒义色彩的有 47 个，贬义色彩的有 35 个，中性色彩的词有 18 个。[5]其中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如“妓女”、“强奸”、“嫖娼”等词如果在人身上使用，会给人带来难堪，所以也属于禁忌语的范畴。

在英语中很多词语的词缀都是 man 而不是 woman，显示出对女性的歧视。根据有关学者做过的统计，英语中与 prostitute（妓女）意思相近大概有 500 个词语。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在英语词语中存在着对女性性别歧视的禁忌语。

（四）禁忌直接谈论“怀孕”

通过统计汉英在在表达“怀孕”的替代词可以发现，汉英语言与“怀孕”有关的话题也属于禁忌语，以前在汉语中对于女性“怀孕”的词语绝对不能提及，也不能直接说“pregnancy”。据统计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能代替“pregnancy”的表达的有 56 个。《现代汉语词典》中代替“怀孕”的词语大概有四十个。统计结果可以在附录表怀孕禁忌语那一类得知。

[4]轩治峰.汉英侮辱性语言对比与翻译[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3, (03): 107-110.
[5]徐佳.汉英语言性别歧视的比较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5): 89-95.

（五）禁忌直接谈论“性行为”词语

汉语和英语当中有关性行为的词语，一般都会选择用其他词语来替换表达。因为，人们在谈话中直接说出来会让对方陷入尴尬和难堪。汉语中有很代替性行为的词语，如：“圆房”、“房事”、“同居”等。英语中也会用“bed”、“be intimate with”、“congress”、“caress”、“business”。

（六）禁忌直接谈论亵渎语

最后一类汉英禁忌语具有相似点的是避讳名讳。在中国古代，百姓是不能与当朝的统治者同名，甚至名字里有一个字与皇帝的名字相同都会被认为是对统治者的不敬或者无视权威。例如：人名不会取与唐朝皇帝李世民相同的字。在使用英语的国家同样有这样的现象，西方人信仰圣人，不会给孩子那个取圣母玛利亚相关的名字，所以“Marry”在英语中属于禁忌语。除此之外，西方人对于皇室十分尊重，所以“princess”也是禁止使用的。

二、汉英禁忌语的差异性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汉英语言中禁忌语存在着差别，本文将从颜色、数字、隐私、种族歧视和姓名称谓来分析汉英禁忌语的差异性，选取这五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查找的文献中总结得出，很多学者都是从这五个方面来研究的，呈现的频率最高，更据有代表性。不同语言之间差异性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汉英禁忌语之间需要规避的语言。

（一）汉有英无

第一种情况，汉语禁忌语中最明显的姓名和称谓禁忌语在英语中并不存在。

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称谓禁忌由此产生了，又长期受儒家文化中“尊卑有序、尊祖敬宗和长幼有别”的影响，提倡“子不名父母”，认为直呼长辈姓名或者和与长辈重名、哪怕是谐音都是不孝顺。例如：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把赵谈改为赵同，来避讳他父亲的名——“谈”，来表示尊重。[6]

在使用英语的国家，社会比较开放，他们讲求自由，认为人生来平等，因此没有像中国那样在称谓姓名方面存在那么多的禁忌，甚至以祖辈和晚辈同名为荣，例如：英国首相的名字是 Churchill，他的父亲叫 Randolph，但是他的儿子也叫 Randolph，爷爷和孙子是同名的，这在中国却被视为大不敬。

（二）汉无英有

第二种情况，在英语中属于禁忌语，在汉语里不属于禁忌语。这主要体现在话题隐私禁忌语方面。

本文结合张爱容（2010）[7]关于对英语“话题禁忌”的问卷调查和滕永青、苏庆伟（2008）[8]关于汉语禁忌语状况调查分析，本文归纳如下表 5：

[6]云中天.永远的风景——中国民俗文化[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126.

[7]张爱容.特定语境中英语禁忌现象调查研究——对“话题禁忌”的问卷调查[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02):44-47.

[8]滕永青,苏庆伟.汉语禁忌语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调查分析[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8,(25):251-252.

表 5 汉英话题禁忌语对照表（√表示禁忌，×表示非禁忌）

汉英隐私对比（禁忌与否）类别	使用汉语国家	使用英语国家
年龄	×	√
个人财产	×	√
体重	×	√
婚姻状况	×	√

英语中话题隐私一直以来禁忌颇多，年龄、个人收入、婚姻状况等属于他们的个人隐私，在交际中不能询问，否则就会造成他们的不悦。例如我们通过一句英语中的一句谚语：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 就可以发现话题隐私在英语国家十分重要。

但这类禁忌在汉语中似乎并不怎么存在，我们在生活经常看到中国人见面的时候就会询问“你多少岁了？”、“结婚了没啊？”等一些说法。

（三）汉英都有，表达方式不同

最后一种情况是，数字和颜色在汉英语言中同属于禁忌语，但是表达方式和象征意义不一样。这主要体现在颜色方面。

汉英禁忌语在颜色方面完全不同，白色在汉语中常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人普遍忌讳白色。例如：春节时中国喜欢的灯笼、中国结、对联和结婚时穿的婚服都是红色的，就可以看出红色在汉语中是吉祥象征。与之不同的是，英语中的红色常常和血和暴力联系在一起，对红色有一定的禁忌，如“血腥复仇”翻译成英语就是“red revenge”。

三、汉英禁忌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文化背景的差异

1、儒家思想与西方个人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注重社会秩序、人际关系和尊卑有序。这种文化背景下，禁忌语多与尊重长辈、权威和宗教有关，如避免直接提及长辈或权威的短处或过失。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其禁忌语多与个人隐私、个人权利和自由有关，如避免询问他人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私人问题。

2、宗教信仰的差异。中国文化中的禁忌语往往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如避免提及与神灵、宗教仪式相关的不敬之词。而西方文化中，虽然也有宗教禁忌，但其表现形式和内容可能与中国文化有所不同，如基督教中的“Jesus”、“God”等词汇在某些场合下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二）社会环境的差异

1、社会价值观。中国社会注重集体主义和和谐，因此在社会交往中，许多与性、死亡、疾病等相关的敏感话题被视为禁忌，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尴尬或冲突。而西方社会则更加注重个人隐私和个体权利，因此在这些话题上的禁忌相对较少，但个人收入、婚姻状况等私人信息则被视为禁忌。

2、历史传统。中国历史悠久，许多传统习俗和观念在禁忌语中得以体现。例如，在中国文化中，数字“四”因与“死”谐音而被视为不吉利的数字，而在西方文化中则没有这样的禁忌。

（三）语言特点的差异

1、表达方式的差异。汉语表达委婉、含蓄，常常采用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来表达禁忌话题，以避免直接触及敏感点。而英语表达则相对直接、坦率，多采用避重就轻、转换话题等方式来避免直接触及禁忌话题。这种语言特点的差异也导致了汉英禁忌语在表达方式和接受度上的差异。

2、语境因素的影响。在跨文化交际中，语境对于禁忌语的使用具有重要影响。不同的语境下，相同的词汇或表达方式可能被视为禁忌或非禁忌。因此，在汉语教学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了解不同语境下的禁忌语使用情况，以避免因误解或误用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禁忌语的教学方法

（一）对比教学法

1、内容对比：对比汉语和英语（或其他学生母语）中的禁忌语，分析它们在内容、使用方法和使用场合上的差异。例如，中国人避免使用与“死”直接相关的词语，而英语中则常用“pass away”、“depart”等委婉语。

2、文化背景：解释禁忌语产生的文化背景，包括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等。这有助于学生理解为什么某些词语会成为禁忌，并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

（二）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通过分析真实的或虚构的交际案例，让学生了解禁忌语在实际交际中的使用情况和影响。实施步骤：1、选择案例：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交际案例，如因使用禁忌语而导致误解或冲突的案例。2、案例呈现：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案例内容，让学生了解案例的背景和细节。3、问题引导：针对案例内容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案例中禁忌语的使用情况和影响。4、讨论与总结：组织学生讨论案例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并总结案例分析的启示和教训。

（三）情景模拟法

情景模拟法是通过模拟真实的交际场景，让学生在模拟的情境中学习和运用禁忌语的处理技巧。实施步骤：1、设定情景：根据教学内容和目标，设定一个包含禁忌语使用情况的交际情景，如家庭聚会、商务洽谈、朋友聚会等。2、角色分配：将学生分为不同角色，分配他们在情景中的任务和对话内容。3、模拟表演：学生在模拟的情境中进行表演，注意避免使用禁忌语或正确处理禁忌语的使用。4、反馈与总结：表演结束后，教师和同学给予反馈，指出在模拟过程中使用禁忌语或处理不当的地方，并总结经验教训。

（四）文化导入法

文化导入法是通过介绍和讲解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帮助学生理解禁忌语产生的根源和文化内涵。实施步骤：1、背景介绍：介绍与禁忌语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如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等。2、文化对比：对比不同文化对禁忌语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方式，让学生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差异。3、实例解析：通过具体实例解析禁忌语在不同文化中的使用情况和含义变化。4、文化融合：引导学生将所学的文化知识融入汉语学习中，提高对禁忌语的敏感性和处理能力。

（五）利用多媒体资源辅助教学

1、视频资料：利用视频资料展示禁忌语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和使用情况。通过视频观看和讨论，学生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禁忌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2、在线资源：引导学生利用在线资源（如语言学习网站、社交媒体等）查找和学习更多关于禁忌语的知识。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在线讨论和交流，提高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五、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禁忌语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深入，跨国贸易、跨国学习等地方都需要注意禁忌语的差别。本文选取汉英禁忌语中比较常见的几个方面进行分类对比，总结出跨文化中汉英禁忌语的差异和共性。希望能够较好的补充了现已有关于汉英禁忌语的研究，使读者对汉英禁忌语的更深的认识，掌握汉英禁忌语的不同，促进双方跨文化交际的进行。通过一系列教学法，如对比教学法、情景模拟法、案例分析法和文化导入法的综合应用，学生不仅能够掌握禁忌语的具体使用规则，还能深刻体会到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综上所述，跨文化背景下禁忌语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任务。它需要我们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法，灵活运用各种教学资源，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也需要我们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跨文化素养和语言能力，以更好地引导学生跨越文化的鸿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既具备扎实语言基础，又具备深厚文化素养的汉语学习者，为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Wardhaugh R.社会语言学引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张雪婷.汉英禁忌语比较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D].天津师范大学, 2016.
[3]轩治峰.汉英侮辱性语言对比与翻译[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3, (03): 107-110.
[4]徐佳.汉英语言性别歧视的比较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5): 89-95.
[5]云中天.永远的风景——中国民俗文化[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6]张爱容.特定语境中英语禁忌现象调查研究——对“话题禁忌”的问卷调查[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2(02):44-47.
[7]滕永青,苏庆伟.汉语禁忌语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调查分析[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8,(25):251-252.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Taboo Words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Dong Lingling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Zheng Xianlang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China)

Abstract: Language serves a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an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re exist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aboo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aboo language can minimize errors in communication and facilitate smooth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this paper identifies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aboo language in areas such as death, discrimination, the body, profanity, insult, and sexual behavior, while difference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areas such as color, numbers, private topics, racial discrimination, names, and titles. The role of taboo language teaching in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further explored, and the adoption of reasonable method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CSL) is advocated.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taboo languag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 more intuitive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Keywords: Chinese and English Taboo Language; Comparative Analysis; Cross-cultural; Pedagogy

第 1 卷 第 1 期
2 0 2 5 年 2 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12

《彼得罗夫流感》：从文学到电影的空间隐喻重构

吕天威[1]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萨利尼科夫小说《彼得罗夫流感》通过多重空间隐喻揭示后苏联社会的个体身份危机和传统文化反思，谢列布连尼科夫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则延续并重构了这一隐喻体系。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分析两种媒介在空间隐喻建构中的延续与变异，探讨其互动关系，可以得知，小说通过语言的抽象性与符号化建构隐喻空间，电影则借助视觉化手段深化和扩展了空间隐喻文化批评的深度与广度。空间作为社会与文化批判的关键载体，在文学与影像的跨媒介对话中彰显了其叙事潜能和批评维度。

关键词： 《彼得罗夫流感》；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空间隐喻；跨媒介改编；电影叙事

当代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鲍里索维奇·萨利尼科夫（Алексей Борисович Сальников）的长篇小说《彼得罗夫流感》是一部以流感疾病为叙事背景的文化反思之作。通过对现实空间与超现实空间的交织描写，小说揭示了后苏联社会的个体身份危机、精神困境以及传统文化反思。流感这一疾病作为隐喻手段，巧妙连接了社会病理与个体心理的失衡，塑造出一个多维交错的空间叙事体系。空间在小说中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所，更是一种多元隐喻工具，用以承载对社会秩序、精神失落与集体焦虑的深刻批评。《彼得罗夫流感》自 2016 年问世以来，已然成为新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2021 年，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谢列布连尼科夫（Кирилл Семёнович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将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电影亮相戛纳电影节后，引发广泛关注，成就“真正的文化事件”[1]。谢列布连尼科夫以其独特的影像语言延续并重构了小说的空间叙事体系，通过现实空间与超现实空间的视觉化呈现，将萨利尼科夫笔下的抽象隐喻具象化，赋予其更直观且生动的表现力。改编后的电影不仅忠实于小说的精神内核，还通过影像媒介对原著的文化批评功能进行了进一步拓展。

空间隐喻是理解小说与电影互动的关键概念。本研究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理论为基础，从小说与电影的媒介转换视角切入，探讨两者在空间隐喻构建中的延续与重构。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形态学”[2]，它既是物质的存在，也是个体体验、社会权力与符号化价值的交汇场域。这一理论为跨媒介空间研究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分析小说与电影空间隐喻的叙事功能及其文化批评意义，旨在揭示空间作为媒介转换中的核心元素如何在不同叙事形式下实现独特的文化表达和社会反思。

一、小说《彼得罗夫流感》的空间隐喻

[1] [作者简介] 吕天威（1994- ），男，河南商丘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万比洛夫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创作的启示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9CWW010）阶段性成果；西安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流感周围的彼得罗夫一家》的后现代性研究”（项目编号：2021BS022）阶段性成果。

在小说《彼得罗夫流感》中，萨利尼科夫以流感疾病作为叙事主线，通过对现实空间与超现实空间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后苏联俄罗斯社会背景下，个体心理同社会秩序之间微妙且充满拉扯感的张力关系。现实空间的冷漠与异化体现了个体在公共社会生活中的孤独，而超现实空间则通过记忆与漫画的符号化呈现，折射了社会价值的崩塌与文化断裂。这些空间不仅是叙事的背景，更是传递社会批评的重要隐喻。

（一）现实空间：个体疏离与社会失序

现实空间构成了小说叙事架构中主要的叙事场域，诸如家庭、电车、街道等具象化的物理空间皆被涵盖其中。萨利尼科夫针对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展开了详尽描写，冷漠与疏离、陌生与异化之感在小说文本中得以有效传递，精准呈现出个体与集体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张力。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无疑映射出后苏联俄罗斯社会秩序的失控状态以及集体焦虑情绪的广泛蔓延。

家庭空间占据着彼得罗夫生活的核心位置，理论上而言，其本应成为个体获取情感支撑与归属感的避风港。然而，在这部小说里，家庭空间却弥漫着浓郁的疏离与冷漠气息。彼得罗夫与彼得罗娃的婚姻状况颇具荒诞性色彩。尽管二人已经离婚，却依旧共同居住并一同照料儿子。这一特殊设定不但有悖于传统婚姻的固有逻辑，亦对现代社会所倡导的规范化关系构成了挑战。小说对此种状态的描述甚至带有调侃意味："当得知彼得罗娃离婚后仍继续与彼得罗夫住在一起时，每个人都惊呆了。彼得罗夫也困惑地僵住了。彼得罗娃本人似乎也愣住了。这是某种奇妙的、令人费解的行为"[3]。这种界限模糊的家庭关系，恰是后苏联社会中传统价值观崩塌之后新秩序尚未构建的生动写照，同时也彰显出人们在情感归属方面所抱有的矛盾心理。

彼得罗夫与彼得罗娃之间的对话显得机械且公式化，全然缺乏情感的交流与互动，而他们的孩子则被塑造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鲜少与父母产生亲密的关联。在小说第二章，彼得罗夫拖着因流感而极度虚弱的身躯回到家中，目睹彼得罗娃正在送别医生："妻子就站在那儿，像个绅士一样，把医生的绿色外套拿了起来。儿子在妻子身后冷漠地看着，看到彼得罗夫，他脸色没有任何变化"[4]。萨利尼科夫借助寥寥数笔的细节勾勒，揭示出彼得罗夫内心的迷茫与惶然不安，暗示他对彼得罗娃与儿子的冷漠表现滋生出强烈的疏离感。

萨利尼科夫凭借对家庭诸多细节的刻画，揭露出家庭生活呈现出的机械化特质以及情感匮乏，这实则映射出后苏联社会所深陷的文化危机以及家庭价值观的式微。后苏联俄罗斯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困境以及政治的不确定性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致使家庭成员之间逐渐丧失了共同的情感基石，家庭由此演变为一个冷漠且充满隔阂的场域，隐喻这一传统价值核心单元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缺失，充分反映出后苏联社会中家庭结构的极度脆弱性。

电车空间构成了小说叙事架构中极为关键的叙事起始点，同时亦成为流感蔓延的隐喻性空间表征。电车作为在小说里反复呈现的重要场景，不仅是彼得罗夫日常主要的交通工具，更是其与"疯癫群体"产生交集的关键场所，甚至扮演着"一种把彼得罗夫运送到另一个世界的媒介"[5]角色。萨利尼科夫多次提及"无轨电车总是满载疯子"，且彼得罗夫在电车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十足的精神病患者"[6]。通过对电车场景的精心雕琢，萨利尼科夫描绘出一个具有高度符号化特征的公共空间：在电车内，社会群体的行为呈现出荒诞且失序的状态，而个体由于身体的虚弱无力与心理的迷失错乱，进一步加剧了其对公共空间所产生的隔离感。

街道空间作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象征着现代社会公共生活所呈现出的单调乏味与失序状态。在小说情节的铺陈中，街道空间被精心刻画为无序、荒凉且冰冷的具象化象征。当彼得罗夫于街道上行走时，他深切地体会到一种"陌生的熟悉感"。一方面，这些场景本就是其日常生活的固有元素；另一方面，却因流感的侵袭作用而发生扭曲变形，进而丧失了原有的真实感。此时的街道已然不再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互动的场所，反而蜕变成为冷漠、封闭以及疏远等特质的象征符号。彼得罗夫在流感影响下对空间所产生的这种模糊感知，巧妙地隐喻了个体在社会环境之中所怀有的陌生感以及处于被疏离境地的状态。

（二）超现实空间：记忆与幻想的隐喻符号

超现实空间凭借记忆与漫画两种主要的符号化表现形式得以呈现，它不仅构成了彼得罗夫潜意识活动

展开的特定场域，同时成为实施社会批评的关键媒介。其中，记忆空间发挥着连接个体与集体理想化过往的重要作用，构建起一种基于过去的情感与价值纽带，而漫画空间则着重反映了彼得罗夫对理想生活所进行的虚构性追求。记忆空间与漫画空间在超现实层面相互补充，共同塑造了小说丰富多元的超现实空间体系，揭示了彼得罗夫对往昔的怀念之情、潜意识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以及对现实的逃避倾向。这些超现实空间类型通过符号隐喻展现了后苏联社会的文化断裂与个体精神危机，共同构成了小说对社会批评的重要表达维度。

记忆空间在小说中以其反复片段化呈现的特性，勾勒出彼得罗夫的心理轨迹与情感世界的轮廓。这些记忆片段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一方面折射出彼得罗夫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与眷恋，另一方面则隐喻性地传达出其对现实的失望情绪与抗拒态度。

彼得罗夫童年新年晚会上牵到“雪姑娘”玛丽娜手的场景，无疑成为记忆空间中极为核心的意象之一。雪姑娘这一深植于俄罗斯民间传说的传统角色，长久以来被视作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化身。彼得罗夫对这一特定记忆的反复回溯，暗示出他对苏联时代集体理想化记忆的依恋。在新年晚会上出现的雪姑娘，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作为童年幸福时光的鲜明象征，更蕴含着一种针对现代生活荒诞与失序状态的隐喻性对抗力量。在这一记忆片段所构建的情境里，彼得罗夫的过去被赋予了童话色彩，然而，这种理想化的景象却又显得极为脆弱，与现实生活的冰冷严酷形成了极为鲜明且强烈的对比，从而凸显出彼得罗夫在记忆与现实的碰撞中所产生的心理落差与情感纠葛。

与之相对应的是，彼得罗夫对帮助好友谢尔盖自杀片段的回忆。谢尔盖在小说的象征体系中，可被视为彼得罗夫潜意识里对创作价值与自我实现不懈追求的一种映射。谢尔盖的自杀事件，绝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悲剧，其背后隐喻着彼得罗夫内心深处对理想化自我的抛弃。在这一记忆场景的构建逻辑中，谢尔盖的死亡实质上是彼得罗夫对自身精神价值的一次极具象征性意义的终结宣告。这种记忆所蕴含的残酷性特质，与童年记忆所散发的温暖光辉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反差，深刻揭示出彼得罗夫内心深处充满矛盾冲突的情感世界架构。

漫画空间构成了彼得罗夫超现实世界的另一关键维度。彼得罗夫作为业余漫画创作者，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将彼得罗娃与儿子塑造为漫画角色，融入虚构故事之中，以一种极具艺术化的手法重新构建起一个与现实相互平行的幻想世界。一方面，这一创作行为深刻地体现了他对家庭关系的深度思考；另一方面，则彰显出他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情绪以及深深的无力感。借助漫画这一艺术形式，他重新界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角色关系，通过创作尝试为自身重新构建起一套意义体系，并且凭借这种幻想式的构建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某种程度的暂时逃避与调和。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意义体系显得颇为脆弱，难以承受现实世界的强烈冲击。这种带有逃避性质的创作行为同时也隐喻性地揭示了彼得罗夫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的疏离状态。漫画空间已然成为他情感得以投射与获得精神慰藉的关键场域，并且也是他拒绝直接面对真实生活的一种隐喻性表达途径。漫画空间进一步鲜明地凸显了小说对现代个体所普遍面临的无根感的深入描写，以及对后苏联社会文化缺失现象的深刻批判。

小说《彼得罗夫流感》通过现实空间与超现实空间的双重隐喻，全面展现了后苏联社会的传统文化断裂与个体身份危机。现实空间中的家庭、电车和街道，构成了社会冷漠与个体孤立的象征场域，而超现实空间中的记忆与漫画，则表现了个体对理想化过去与幻想未来的双重逃避。空间在小说中不仅是叙事背景，更是文化批评的工具，通过符号化的呈现，深刻揭示了社会转型中的个体精神困境。这些空间隐喻为小说的电影改编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后文的讨论奠定了理论与叙事基础。

二、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的空间重构

在电影改编的语境下，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执导的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展现出独特的艺术创造力与诠释力。该影片以其别具一格的视觉语言体系和精妙的叙事手法，针对小说《彼得罗夫流感》里错综复杂的空间隐喻展开了一场全新的影像化重构之旅。

在电影的改编过程中，其通过对现实空间予以强化性的呈现方式，以及针对超现实空间实施具象化的处理策略，有效地深化了小说中原有的关于现代社会疏离感与个体困境的核心主题。在这一改编实践里，

导演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独特优势，运用动态镜头的灵动捕捉、画面构图的精心布局、色彩运用的巧妙调配以及影像叙事的连贯编织等一系列专业技术手段。借助这些技术手法的协同作用，成功地将小说中原本相对抽象的隐喻元素转化为具有强烈情感冲击力的具体视觉体验，从而使观众能够更为直观且深切地感受到空间隐喻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与深刻寓意。

（一）现实空间的视觉强化

在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的艺术呈现中，其现实空间涵盖家庭、电车以及街道等重要元素，借助画面语言的精妙运用，被赋予了极为强烈的情感张力。导演凭借其对构图、色彩与音效等多元元素的娴熟驾驭，成功地将小说中针对这些空间的隐喻性描写转化为直观且富有冲击力的影像体验，从而鲜明地突出了后苏联社会中个体与集体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与疏离隔阂之感。

具体而言，家庭空间在电影里借助冷色调画面的渲染以及静止镜头语言的独特表达，呈现出一种仿若无机质般的冷漠质感。导演特意采用固定镜头与对称构图的手法，有效地强化了空间所蕴含的压抑氛围以及彼得罗夫与家人之间的情感距离。例如，彼得罗夫与彼得罗娃之间的对话场景往往在同一画面中被巧妙地分割处理，这一视觉呈现象征着两人之间情感纽带的断裂。而儿子在家庭空间中的存在更是被进一步弱化，仅仅以模糊的背影形象或者偶尔的静态镜头加以呈现。家庭空间视觉化重构策略，不仅延续了小说对家庭冷漠现象的深刻批评，并且进一步将这种抽象的冷漠具象化为空间中可感可知的情感空洞，使观众能够更为真切地体会到家庭内部关系的疏离与冰冷。

电车空间在电影里则成为对小说现实空间隐喻的有力强化。在电影开场之际，彼得罗夫置身于与人群拥挤在狭窄电车中的情境，导演通过摇晃镜头与长镜头的有机结合，生动地呈现出一种充满动态变化的无序感。狭窄的构图设计以及人物的密集分布状况极大地增强了空间的压迫性感受。车内嘈杂的噪音以及乘客们漠然的神情，与彼得罗夫的病态疲惫形象相互对照，进一步凸显出公共空间中个体所面临的孤立无援状态以及社会关系的冷漠本质。这种处理方式使得电车场景在电影中成功地化身为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疏离感的强烈象征符号，有力地延续了小说中的核心隐喻内涵，使观众能够迅速捕捉到影片所传达的关于社会公共空间中人际隔阂的主题信息。

街道空间作为公共空间的延伸部分，在电影里被塑造得冷酷且空旷寂寥。导演采用冷灰色调与低对比度的画面设计手法，致使街道上的路灯和广告牌等元素显得孤立突兀而生硬呆板。在彼得罗夫流感发作后独自步行的场景中，低角度镜头的运用将他的身影置于空旷无垠的街道背景之中，使其显得格外渺小与无助。这种处理方式显著地强化了街道空间所蕴含的异化感，深刻地表现出彼得罗夫在社会秩序崩塌情境下所体验到的孤独与迷失心境，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角色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内心挣扎与茫然失措，进一步深化了电影对后苏联社会个体困境与社会空间特征的刻画与表达。

（二）超现实空间的影像呈现

在电影对小说的改编进程中，针对小说里的超现实空间实施了创新性的影像化处理，借助独特的视觉体系对记忆与漫画空间予以重构，从而为小说中抽象的符号空间隐喻赋予了更为直观且易于理解的表现形式，极大地增强了超现实空间在电影语境下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具体到彼得罗夫的记忆场景而言，影片通过对画幅进行缩小、施加颗粒化效果、添加画面噪点及采用高饱和度色调等技术手段，营造出一种弥漫着怀旧气息且带有模糊质感的独特影像风格。以回忆童年新年晚会的情节为例，在雪姑娘牵住彼得罗夫手的场景呈现上，影片特意营造出格外温暖的视觉氛围，并且在背景中巧妙地加入了悠远的琴声及模糊的人群嬉笑声等音乐元素，“恰当的音乐呈现对观众理解电影情感有促进作用，深入揭示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7]。这种综合性的处理方式有力地强化了记忆空间所特有的理想化特质与不可靠性。雪姑娘这一人物角色在电影中通过蓝白色调的服饰和温暖的光线加以突出，强化了其作为纯洁与美好的象征。谢列布连尼科夫通过这些记忆片段，不仅传达了彼得罗夫对童年幸福时光的怀念，也间接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冷漠与荒诞的不满。

在彼得罗夫回忆帮助好友谢尔盖自杀的片段里，则采用了更为低沉压抑的暗黄色调，并运用固定镜头的拍摄手法，将谢尔盖的痛苦挣扎以及彼得罗夫内心的矛盾纠结通过人物面部表情的细腻微妙变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样的记忆空间影像化呈现方式，凭借视觉与听觉元素的有机结合，成功地将小说中的碎

片化叙事重新整合为具有连贯情绪表达的叙事单元，使观众能够更为顺畅地深入到彼得罗夫的记忆世界中，体会其情感的起伏与内心的波澜。

而漫画空间在电影里则经历了动态化的创新性处理，转化成为彼得罗夫逃避现实困境与进行自我重塑的超现实场域。导演别出心裁地通过动画化的视觉表现形式，将彼得罗夫创作的漫画片段巧妙地融入影片之中，生动展现了他在幻想世界里重新塑造家庭成员角色的奇妙过程。例如，彼得罗娃在漫画中被塑造成为超级英雄，这与现实中彼得罗夫对她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反差。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彼得罗夫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同时也有力地象征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抗拒心理以及理想化重构尝试的最终失败结局，使观众能够更为清晰地洞察到彼得罗夫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挣扎与徘徊，进一步丰富了电影对人物心理与社会现实批判的深度与广度。

在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的创作实践中，借助对现实空间与超现实空间进行创新性的影像化重构，成功地赋予了小说中原先较为抽象的隐喻更为强劲的视觉冲击力以及情感张力。就现实空间而言，其在电影中的呈现方式显著强化了个体于公共生活及私人生活领域所体验到的孤立无援与疏离隔阂之感。无论是家庭场景里所展现出的情感淡漠与人际隔阂，还是电车、街道等公共空间中呈现出的人群拥挤却又心灵相隔的状态，均通过精心设计的画面构图、色调选择、音效配合等电影语言手段，生动且直观地传达给观众，使观众仿若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个体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的困境与挣扎。而超现实空间在电影里的影像化呈现，则借助对记忆与漫画场景的具象化处理，深入地展现了彼得罗夫内心深处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及蕴含其中的社会批评深度。在记忆场景方面，通过特定的影像风格营造与细节刻画，如怀旧氛围浓厚却又带有虚幻质感的童年回忆片段，以及色调低沉压抑且人物情感冲突强烈的痛苦回忆情节，将彼得罗夫对过去的怀念、对当下现实的不满以及自我精神世界的矛盾挣扎清晰地呈现出来。在漫画场景部分，通过动态化、动画化的独特视觉表现形式，把彼得罗夫在幻想世界里对家庭成员角色的重塑过程以及这种重塑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其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对现实社会秩序与人际关系的潜在批判。通过上述一系列富有创意与深度的手法运用，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不仅忠实地延续了小说中的思想内核，传承了原著对后苏联社会个体精神困境、社会文化危机等问题的深刻洞察与批判精神，而且凭借其独特的影像表达形式，进一步拓展了原著文化批评的维度与视野。

三、小说与电影空间隐喻的互动和差异

在文学与电影跨媒介研究的视域下，小说《彼得罗夫流感》及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在空间隐喻构建层面展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二者既存在显著的延续性特征，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变异性特质。

小说凭借语言所特有的抽象性特质、碎片化的叙事结构编排以及符号化的空间建构策略，深入地揭示了后苏联社会所面临的个体身份危机困境与传统文化断裂现象。其通过文字描述勾勒出的空间意象，以一种相对隐晦却富有深度的方式传达出个体与社会、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微妙关系，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对文字符号的解码与想象构建起对小说所描绘世界的认知与理解。与之相对应，电影则充分发挥影像语言的具象性优势与强大表现力，将小说中的空间隐喻巧妙地转化为直观可视的视觉场景。借助画面构图、色彩运用、镜头运动以及音效配合等多种影像技术手段，电影赋予了这些隐喻更为强烈的情感渗透力。

在从小说到电影的这一媒介转换进程中，电影针对小说中的空间隐喻实施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改造举措。一方面，电影通过先进的影像技术手段深化了小说中原有的核心思想内涵。另一方面，电影还创新性地新增了“枪杀贪官”等场景，这一举措极大地拓展了空间叙事的边界范围，为故事增添了新的情节发展脉络与文化内涵阐释维度。通过这些新增场景的设置，电影赋予了空间隐喻以全新的文化语境，使观众能够从更为多元的角度去理解作品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与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章将从媒介转换的延续性、空间叙事的变异与创新以及空间隐喻的文化批评功能这三个核心方面入手，剖析小说与电影在空间表达层面所呈现出的互动关系与差异特征，以期揭示在跨媒介创作实践中文学作品与电影改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内在规律。

（一）媒介转换中的空间隐喻延续

文学作品向电影的媒介转换进程，为小说中的空间隐喻赋予了崭新的呈现形式。电影以影像语言承继

了小说对于现实空间与超现实空间的隐喻架构，并且凭借直观化的呈现手段，显著增强了这些空间所蕴含的情感冲击力。

小说中的现实空间如电车、家庭和街道，借助文字描绘展现出个体的孤立状态以及社会的冷漠氛围。而电影则运用画面与声音元素，令这些隐喻变得更为具体可感。例如，电车场景中拥挤不堪的乘客与彼得罗夫的病态模样，在电影中借助动态镜头与群像特写，生动地展现为公共空间的无序混乱以及个体的无助境遇。家庭场景通过冷色调的画面与固定镜头的运用，构建起一种冷漠且呈现机械化特征的私人空间情境。街道空间的空旷荒芜之感，在电影里经由低对比度画面与疏离感强烈的背景音乐，进一步突显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地位。这些处理方式强化了小说对社会秩序以及个体关系的批判力度，有效地延续了其核心隐喻内涵。

小说中的记忆与漫画空间所具有的隐喻特质，在电影中得到了视觉层面的强化。记忆场景借助颗粒化影像效果与画幅的缩小处理，凸显出过去记忆的片段化与理想化特性；漫画空间则通过动态化的表现形式，将彼得罗夫对现实的逃避心理以及自我重塑的渴望具象化为富有张力的视觉叙事。电影在延续小说符号隐喻的同时，使得这些空间能够更为直观地传达出彼得罗夫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困境，观众能够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角色的情感纠葛与心理挣扎。

（二）空间叙事的变异和创新

尽管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小说的空间隐喻构建模式，但也通过新增特定场景与重新组织叙事结构，有效地拓展了空间表达的边界范围，并引入了全新的符号体系与叙事功能。

电影中的“枪杀贪官”场景堪称对小说空间叙事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创新举措。该场景发生于电影开头部分，彼得罗夫身处人群之内，被众人推搡拥挤，随后竟持枪对一众贪官展开射杀行动，其场景极具强烈的冲击力与戏剧性效果。这一场景通过色彩鲜艳夺目的服饰、密集的人群聚集以及不协调的背景音乐搭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集体生活的荒诞性与无序性。彼得罗夫置身于这一场景之中，被汹涌的人潮所裹挟，虽奋力试图挣脱却深感无能为力，此情境隐喻个体在公共空间中身份的模糊性以及自主性的丧失殆尽。在电影中，导演运用快速剪辑技巧与夸张的表演方式，将混乱的氛围渲染至极致，此场景被刻画为秩序的全然失控状态。人群的呼喊声与枪声相互交织，画面在彼得罗夫茫然的表情与贪官们惊恐的神态之间快速切换，每一个镜头都仿佛在有力地敲击着观众的神经，使观众瞬间被卷入到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漩涡之中。这种表现手法绝非仅仅为了吸引眼球，更为关键的是它为整个故事奠定了一种荒诞与不安的基调，从故事开篇便打破常规的叙事逻辑，极大地激发了观众对后续情节的好奇与疑惑心理。它暗示着在这个后苏联社会的背景之下，隐匿于平静表象背后的矛盾与冲突已然激化至不可调和的程度，彼得罗夫的这一极端行为或许可视为个体对整个腐败、失序社会体系的一种绝望反抗之举。

电影对漫画空间的动态化处理赋予了其更为鲜明的叙事功能。例如，彼得罗夫将彼得罗娃创作成漫画中的超级英雄形象，这一场景借助动画化的表现方式，生动地展现了彼得罗夫对理想化家庭关系的执着追求。电影在此基础上新增了漫画角色与现实生活相互互动的短暂片段，使得漫画空间不再仅仅局限于幻想的领域，而成为彼得罗夫对现实困境进行短暂调和与自我安慰的独特空间，进一步丰富了故事的叙事层次与角色的心理维度。

（三）空间隐喻的文化批评功能

电影在文化批评功能方面延续了小说对后苏联社会的深刻反思，并通过影像化手段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内涵。

小说中的空间隐喻聚焦于揭示后苏联社会中个体身份认同的困境。家庭空间的冷漠疏离、街道空间的荒凉孤寂，以及记忆空间的片段化特征，均深刻地表现了传统价值观的瓦解崩溃与个体精神世界的崩塌沦陷。电影通过强化视觉化表现，将这一身份危机以更为直观醒目的方式传递给观众。例如，家庭空间的冷色调运用与固定镜头设置凸显了亲密关系的断裂破碎，而新增“枪杀贪官”场景则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秩序的崩塌与个体在混乱洪流中的挣扎与迷失。在这一场景中，彼得罗夫看似是主动的反抗者，实则是被社会乱象裹挟的受害者。他的极端行为是对整个社会环境失望至极后的爆发，反映出个体在面对社会价值体系崩溃时的无所适从。

电影通过新增场景与符号元素，进一步拓展了小说中对现代性焦虑的批判维度。“枪杀贪官”场景中荒诞的群体行为揭示了集体无意识的社会乱象，而漫画空间的动态化表现则暗示了创作者对意义重构的无力感与挫败感。这些空间隐喻不仅延续了小说的思想核心，还借助影像化语言将其文化批评的广度与深度提升至新的层次境界，使观众能够更为全面深入地洞察作品所蕴含的社会批判与文化反思内涵。

小说《彼得罗夫流感》与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在空间隐喻的表达上构建起了深刻的互动关系。小说凭借语言精心构建了多维且抽象的空间体系，而电影则借助影像化手段将这些隐喻具体化，并赋予其全新的文化语境。在媒介转换过程中，电影不仅延续了小说的思想核心，还通过新增场景与符号扩展了空间叙事的边界范围，深化了对后苏联社会个体身份危机与现代性焦虑的批评力度。两者之间的互动充分展现了文学与影像在文化表达与社会反思层面的互补性特征，为跨媒介叙事与文化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重要样本范例。

结语

萨利尼科夫的小说《彼得罗夫流感》与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凭借语言与影像这两种不同的叙事媒介，共同构建起一个充盈着符号隐喻的空间世界体系，精准地反映出后苏联社会所面临的个体身份危机、传统文化断裂现象以及现代性焦虑困境。尽管二者所依托的媒介存在差异，但在空间隐喻的表达维度上，却形成了一种既延续又变异的独特对话关系：小说以语言的抽象性与象征性为依托，构建出多维的心理、社会与文化空间；而电影通过视觉化手段将这些隐喻具象化，使其更具情感渗透力与叙事张力。

电影对小说空间隐喻的延续，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保留原作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影像的独特表现力进一步深化与拓展。这种延续性不仅体现在对小说主要场景与隐喻元素的呈现上，更在于电影以一种更为直观、更易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方式，强化了空间隐喻所传达的主题内涵。两部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彰显了文学与影像在叙事手法与表现形式上的互补特性。文学以其抽象性与深度的思想内涵为影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创作灵感，而影像则以其直观性与强大的传播力，为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受众群体与传播空间。尤为重要的是，跨媒介叙事的互动揭示了在思想表达与文化反思层面的多重可能性。小说通过符号化的语言隐喻对个体在社会转型中的境遇进行深入探索，而电影则利用动态画面与视觉符号进一步延展了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范畴，赋予了空间隐喻以新的社会语境与文化意义，使作品能够更好地与当代社会现象相呼应，引发观众对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关系、价值体系变迁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正如彼得罗夫在小说与电影中游离于现实与超现实空间之间，其身份的模糊性与个体的孤立感不仅仅属于后苏联社会的特定情境，也是现代社会个体普遍境遇的隐喻。小说与电影中的空间隐喻，通过具体而生动的方式揭示了这一现代性困境，同时也为我们反思自我、社会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在文学与电影的交汇点上，空间隐喻作为叙事的桥梁，串联起个人记忆与集体命运、过去与当下，为我们提供了探索现代社会问题的独特切入点，也充分展现了艺术创作中跨媒介表达所蕴含的深远可能性，为跨媒介研究与艺术创作实践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范例与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Подлубнова Ю.С. Алексей Сальник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епутация и персональный бренд. Локальное vs глобальное[J]. Labyrinth.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культуры, 2022 (3): 69-78.

[2]〔法〕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38.

[3] Сальников А.Б. Петровы в гриппе и вокруг него[M]. Москва: Изд. АСТ, 2018:294.

[4] Сальников А.Б. Петровы в гриппе и вокруг него[M]. Москва: Изд. АСТ, 2018:294.

[5] Стрельникова Н.Д. Опыт прочтения романа «Петровы в гриппе и вокруг него» [J]. Мир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 2021 (1): 63-68.

[6] Писатель Алексей Сальников: Любой роман – это химически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 [EB/OL], 27.07.2018, https://vsluh.ru/novosti/obshchestvo/pisatel-aleksey-salnikov-lyuboy-roman-eto-khimicheskiy-eksperiment_318701/ [2024-10-20]

[7] 刘向阳.论电影音乐的审美特征及艺术性表现[J].电影文学,2008(07):36-37.

The Spatial Metaphor Reconstruction from Literature to Film in The Petrovs in and Around the Flu

LV Tianwei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Alexey Salnikov's novel *The Petrovs in and Around the Flu* employs multiple spatial metaphors to reveal the crisis of individual identity in post-Soviet society and critically reflect on traditional culture. Kirill Serebrennikov's film adaptation *Petrov's Flu* extends and reconstructs this metaphorical system. Grounded in Henri Lefebvre's spatial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spatial metaphors across literary and cinematic media, exploring their interrelations.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while the novel constructs metaphorical spaces through linguistic abstraction and semiotic structures, the film expands and deepens the cultural critique of spatial metaphors through visual representation. As a crucial vehicl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critique, space manifests its narrative potential and critical dimension in the cross-media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inema.

Keywords： *The Petrovs in and Around the Flu*, Alexey Salnikov, spatial metaphor, cross-media adaptation, film narrative

第 1 卷 第 1 期
2 0 2 5 年 2 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11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研究

殷知行[1]，許沈佳藝[2]

（[1]澳門城市大學 澳門 999078 [2]中共長興縣委黨校 浙江湖州 313100）

摘要：中央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澳門特區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頂層設計思路，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總體目標。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名城與粵港澳大灣區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之窗”，承擔著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歷史使命。隨著近年來“一帶一路”合作在葡語國家的深入開展，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往來愈加頻繁，雙邊貿易總額不斷攀升，這對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發展都是重大的歷史機遇。然而澳門在參與“一帶一路”中葡經貿合作，打造“中葡平臺”的過程中，正面臨著落後化、邊緣化、虛名化的困境，究其根本原因是其在中葡人才培養方面存在定位不明、資金不足、宣傳不周等缺憾。對於以上問題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建議是：強化“中葡平臺”的發展決心、明確中葡人才的教育定位、創新中葡人才的教育手段、深化與葡語國家的交流合作。緊抓“一帶一路”中葡商貿發展機遇，加快建設中葡人才高地，推動澳門“中葡平臺”建設脫虛向實。

关键词： 一帶一路；澳門；中葡平臺；人才高地

一、引言與綜述

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資訊化、文化多樣化的深入發展，以及全球性問題與挑戰的增加，中央政府於 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在“共商、共建、共用”的基礎上，積極推進與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發展階段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合作，旨在消除意識形態分歧和社會制度差異，推動各國共用機遇、共謀發展、共同繁榮，實現與沿線各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總體目標。

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發展過程中，無論是解決“一帶一路”戰略構思的理論問題，還是推進實施的實踐問題，關鍵因素在於具備專業理論知識且熟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的專業型人才的品質及數量。從“一帶一路”理論和城市經濟發展實踐來看，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由於人口流動和聚集效應等原因，粵港澳大灣區已然成為中國沿海地區“一帶一路”發展的開放的重心與人才高地。

聚焦於人才高地的建設，學者們主要從人才高地建設的動因、重大意義、實現路徑、建設模式、建設內容等方面開展研究。從建設動因上看，認為是改革開放格局推動、區域經濟結構優化與轉型發展的必然結果；從意義上看，建設人才高地可以吸引集聚高層次人才、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從實現路徑上看，應堅持培養為重點、優化高端人才引進獎勵機制和打造新興產業平臺；從建設模式

作者簡介
[1]殷知行（2000-），男，漢族，江西南昌人，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博士生。
[2]許沈佳藝（2000-），女，漢族，浙江湖州人，中共長興縣委黨校助理講師。

上看，包括教育資源密集型、產業發展驅動型、資源要素彙聚型和制度環境優化型；從建設內容上看，有高水準技術人才、高端科研院校、創新創業基地、新興產業鏈、政府服務平臺、物流交通、宜居環境等。

本文從人才高地的內涵、形成機理切入，並以澳門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打造中葡人才高地為例，系統梳理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境況和實踐策略，為粵港澳大灣區及更多地區建設人才高地提供模式參考。

二、人才高地的內涵及理論邏輯

（一）人才高地的內涵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因此也奠定了建設人才高地的作用。同時，由於我國經濟重心及人力資源整體呈現由內陸向沿海、由北方向南方、由中小型城市向中大型城市轉移的特徵，和城市對外交往許可權的擴大，使得具備沿江、沿海等區位地理優勢和具備較高行政級別與較多優勢政策的地區及城市得以快速彙聚並吸收大量資金、勞動力、產業、科研等發展資源，地緣優勢日漸明顯，經濟地位日漸上升，這就構成了城市發展的集聚效應，成為人才高地建設的基礎。隨著現代化都市圈發展理論的提出和現代交通，如高速鐵路網和都市圈城市軌道交通網的發展與完善，區域中心城市作為都市圈內部市場一體化發展的交通樞紐、文化中心與經濟引擎，成為建設人才高地的最優選擇。因此都市圈內的人才高地，既考慮了區域經濟中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規模、政策優勢、行政級別下的資源導向所形成的中心城市優勢，又兼顧了現代都市圈發展理論中，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因要素稟賦和發展定位而形成的產業分工。

綜上所述，人才高地可以定義為在經濟高質量發展背景下，區域或都市圈內的具備較高行政級別、較多優惠政策、較優產業結構和較好居住環境的中心城市通過吸收大量高素質人才長期居留工作生活的方式，形成該區域或都市圈內的智力高勢能區域。它包括以下特徵：首先，人才高地的關鍵在於政府財政對人才的高投入和高優惠，兼具經濟與政策導向；其次，活躍的科技、金融與商貿服務市場以及完善的法律機制是推動人才高地形成的重要支撐與保障；再次，人才高地應具有與人員就業相適應的高新技術產業鏈，以吸引大量具備專業技術的高質量人才集聚；最後，人才高地的形成加快了區域內發展要素的流動和城市間的分工協調發展，促進了區域內教育、產業、資金、服務等發展資源的一體化。

（二）人才高地的理論基礎

從國際形勢看，地緣力量“東盛西衰”日趨明顯，大國戰略博弈不斷加劇，“一帶一路”倡議深化發展，國際秩序出現深刻調整，全球治理處在重大變革的關鍵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處於醞釀之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人才鏈發生重要變革。面對史無前例的歷史變局與全球競爭，創新越來越成為取得全球競爭優勢的關鍵基礎，人才越來越成為引領發展、贏得未來的戰略資源。

從國內發展看，習近平總書記於 2021 年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中強調，要求“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為我國新時期區域人才發展指明了方向。在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背景下，充分發揮區域中心城市的經濟、科技增長極優勢，帶動周邊城市發展，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推動“一帶一路”貿易暢通，需要有充足且高素質的專業人才為中心城市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提供智力支持和創新活力。

國際形勢和國內發展的雙重需求，使得建設人才高地成為區域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實現經濟轉型發展，必須完成的一項戰略任務。然而建設人才高地並非意味著區域或都市圈內的中心城市對人才資源控制的“一家獨大”，也非各地級市以城市本位思想為指導，將本地利益居於區域整體利益之上，進而在人才資源吸引上開展同質化的無序競爭，進而加劇區域內資源分佈不均衡的問題，而是應當通過區域內各城市間的錯位發展，互利共贏彙聚人才，打造協同發展示範區，即雁陣格局。

在雁陣格局中，中心城市作為頭雁區域，依靠對核心產業和尖端人才的掌握，發揮引領作用。周邊城市分別作為強雁區域與尾雁區域，積極開展與頭雁中心城市的產業合作與人才合作。雁陣格局下，區域間互為門戶與腹地，相互合作，相互制約，充分發揮各自高層次人才集聚區域的比較優勢，構成體系相對穩定、功能相對齊全、要素聯繫緊密、對外適應性強的協同式發展路徑。

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不斷變化，原先的單核心驅動、中心城市結構已無法滿足新形勢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因此出現了中心與副中心雙核驅動、雙中心“雙城”聯動，共軛雙核直至被多城市通力合作，協同發展的多核心所替代的現象，這符合雁陣格局下的人才高地建設理論。綜上所述，人才高地的建設要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服務國家區域發展需要和“一帶一路”對外開放大局。

（三）人才高地的模式

在城市群的發展過程中，其地理位置、自然稟賦、政策環境、歷史機遇千差萬別，發展規劃及目標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同區域及城市群吸引和培養人才以建設人才高地的模式亦有所不同。美國波士頓、英國倫敦和北京等城市，憑藉著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帝國理工學院、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世界一流高校與科研院所的集聚，使其具備彙聚並培養大批高層次創新型科技人才的能力，尤其是波士頓，憑藉著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世界頂級科研高校的彙聚，令這座人口不到 70 萬的城市成為紐約灣區中人均生產總值最高的中心城市；21 世紀頭十年，合肥通過極具吸引力和極富遠見的招商引資政策，先後引進海爾、美的、格力、TCL、三洋等十幾家先進製造企業，令其成為與青島、順德齊名的全國三大家電製造基地之一。在隨後的十年間，合肥在保持本地家電製造業穩步提升的同時，進一步引進和培養了京東方、長鑫、蔚來汽車和科大訊飛等高新技術產業，合肥這座原本長期落寞的中部小城，其地區生產總值由 2001 年的 363 億增長為 2021 年的 11413 億，從全國第 82 名增長為全國第 19 名，一躍成為萬眾矚目的“新一線”城市，而膽大心細的“合肥模式”也成為無數城市主政者和相關學者的研究案例；此外，還有紐約和上海憑藉優渥的地理區位以及紐約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上海證券交易所，還有《紐約時報》、時代華納、新浪等產業帶來的交通、金融、資訊、傳播等優勢構建的金融商貿人才高地，新加坡則通過更為開放和優惠的人才引進政策，取代香港成為新的亞洲金融中心。

國內外城市群中的人才高地建設，主要遵循以下幾個模式：一是科教資源密集型模式。該模式通過一流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集聚，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作為人才彙聚和孵化的核心；二是產業發展驅動模式。通過引進成體系、成規模的創新及製造產業鏈，以吸引應用型和商業化人才彙聚；三是資源要素驅動模式。該模式下，城市將更多依靠交通、金融、資訊等優勢吸引跨國企業在當地佈局全球產業鏈和創新鏈，彙集優秀創新型人才；四是制度環境優化模式。城市為高端人才提供豐厚的薪資待遇、舒適的生活環境、便捷的政務服務，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長期居留乃至定居於此。

三、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現實境況

澳門同時是“一帶一路”倡議下，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節點城市和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依其獨特的特區行政與關稅優勢，成為大灣區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之一，發展潛力無限。隨著 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澳門定位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以及中國與葡語國家雙邊貿易和文化外交層面的不斷深入，澳門吸引和培育中葡人才，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目標便具備了充足的政治經濟條件。

（一）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淵源

北宋以來，今澳門所在的十字門地區便憑藉繁榮的海上絲綢之路，迅速崛起為中外貿易的樞紐之地。明清之際，隨著葡萄牙對澳門半島的佔據以及新航路開闢帶來的中西方商品、文化領域交流的繁盛，作為彼時西方（葡萄牙）殖民者在遠東地區最重要的貿易口岸，澳門成為中西文化——尤其是中葡文化碰撞交融的重要載體，著名的聖保祿大教堂（大三巴）便建成於這段時期。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以及清王朝的戰敗，清政府逐漸失去對澳門半島地區的控制，以若昂·亞馬留（Joao Amaral）為代表的歷代葡澳總督開始逐步蠶食澳門半島以外的島嶼及陸地，先後佔據了氹仔與路環兩島並設立與葡占澳門市平級的海島市，大量葡萄牙探險家與商人湧入澳門，客觀上促進了葡萄牙文化及葡語教育在澳門的傳播與發展。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東亞經濟的崛起，澳門地區憑藉成衣製造業與建築產業令其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在吸引了一批較有素質的葡語國家移民定居於此的同時，也與眾多葡語國家建立了較為穩定的商貿聯繫，到 1999 年回歸前夕，澳門地區的人均生產總值已超過 1.5 萬美元。

主權回歸後的澳門積極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2003 年由中央政府發起、商務部主辦、澳門特區政府承辦的以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和促進中國內地、葡語國家和澳門共同發展的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正式成立，為進一步推進澳門同葡語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往，普及葡語教育和推進中國與九個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及文化交流成為澳門特區政府的重要工作內容。從 2003 年至 2022 年，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總額已由 110 億美元增長為 2148 億美元，隨著雙邊貿易的不斷深入，中國與九個葡語國家日漸成為相互間經濟領域不可分離的命運共同體。

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臺，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被賦予了“一中心、一平臺、一基地”的發展定位，“一平臺”即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在國家戰略層面上，成為“一帶一路”倡議對接中國內地與九個葡語國家的開放窗口。這意味著澳門將在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特色金融、葡萄牙語及葡語國家國別教育、葡語國家商品零售、葡語國家法律援助服務以及相關人才引進及培養等方面進一步深化發展。

（二）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表現

澳門憑藉著背靠珠三角和毗鄰港臺的特殊地理位置、中西交融的獨特文化、“一國兩制”和打造中葡商貿服務平臺的特殊政策以及“一帶一路”開放機遇，獲得了發展先機，地區經濟迅速發展，其承載的功能和意義超過了一般意義的城市，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之一和吸引、培養中葡人才的高地，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行政方面，澳門作為“一國兩制”政策下全國僅有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不僅享受著省一級的行政待遇，還擁有作為國際自由港且擁有獨立關稅的權利。除此之外，在中央政府授權下，《澳門基本法》還被賦予了澳門高度的外交自主權，持有澳門特區護照的人員可免簽入境葡萄牙、巴西、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莫三比克和東帝汶等六個葡語國家，這為澳門進一步加深同葡語國家政府及社團組織的交往、吸引更多葡語國家高素質人才前往澳門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制度保障。

經濟方面，澳門地區生產總值由 1999 年回歸之初的 65 億美元上升為 2019 年的 552 億美元，人均生產總值由 1.5 萬美元上升為 8.3 萬美元，人均生產總值一度高居全球前三，這與“一國兩制”和“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發展機遇密不可分。然而新冠疫情對澳門經濟的衝擊，顯示出了澳門經濟結構多年來高度依賴博彩及其延伸產業所造成的脆弱性，其地區生產總值在 2022 年一度腰斬至 219 億美元，且澳門經濟實力至今未能完全從衰退中復蘇。從產業結構上看，澳門 2022 年的產業結構比重分別為為 0：7.7：92.3；行業結構中。澳門作為微型經濟體，其經濟具有特殊性，因此 2020—2022 年的行業結構指標受新冠疫情影響較大，無法較為客觀真實地展現澳門經濟結構單一、中葡商貿服務平臺建設不完善的現實，故本文依舊採用 2019 年及之前的產業數據。2019 年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澳門產業結構 2019》顯示，博彩及博彩仲介業占澳門行業總比重的 50.9%，與打造“中葡平臺”相關的批發及零售業、銀行保險業則分別僅占 5.6%和 6.8%，中葡商貿經濟對澳門整體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較低。

社會方面，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總人口 68 萬的澳門擁有 1 萬餘名土生葡人，擁有葡萄牙國籍的人數為 8991 人；葡語是澳門官方語言之一，因此澳門社會隨處可見中葡文對照的指示牌、標語、語音播報及政府官方檔；葡語教育和針對葡語國家的國別研究更是被作為地區特色學科，聖諾瑟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和澳門大學等高校均開設有葡萄牙語及相關國別研究方面的課程或研究機構，其中澳門科技大學和澳門大學兩所高校的 2024 年 QS 排名分別為 252 和 460，科研能力較強，成果轉化率較高。而澳門城市大學則通過設立葡語國家研究院並開設相關碩士、博士課程的方式，成為澳門乃至全國唯一頒發葡語國家國別研究學位的高校。

交通方面，儘管澳門自身缺乏優良的深水碼頭、國際機場、高鐵等對外交通聯繫通道，但是其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內部交通基礎設施的聯動發展，尤其是港珠澳大橋通車後，訪澳人員可由香港國際機場落地後，可直接乘坐港珠澳大橋擺渡巴士入境澳門，總通勤時長可縮短至 2 小時內。而澳車北上政策更使澳門直接享有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立體化、全方位的海陸空鐵交通網絡。除此之外，澳門特區政府亦積極構建國際交通樞紐，其計畫於 2024 年啟動對澳門國際機場的擴建工程，於 5 年內將機場規模擴大至每年可服務旅客 1300 萬人次。

（三）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進展

把青年人才吸引進來、留下來，是建設人才高地工作推動落實的前提。澳門回歸及“中葡平臺”建立二十餘年，中葡人才高地的建設也由單一的行政部門擴展至文旅、商貿、金融、教育等多元化部門，對中葡人才的吸引與培養對象也由單一語言型人才向多元型、交叉型人才轉變。

1985 年，葡語國家都市聯盟（UCCLA）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成立，該組織旨在加強全球葡語國家及地區城市間的合作交流，澳門作為八個創始成員之一簽署了聯盟創始協議。2001 年第十七屆葡語國家都市聯盟大會在澳門舉行，這是該聯盟會議首次在澳門舉辦；2003 年，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中國商務部與列席的七個葡語國家部長級官員簽署了《經貿合作共同綱領》，綱領強調澳門將加深中國與葡語國家經濟關係發揮平臺作用；2006 年首屆葡語系運動會在澳門舉行；2015 年，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作為人民幣清算行獲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為葡語國家銀行同業提供清算服務，與 17 家葡語國家銀行建立了代理行關係；2017 年，“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在澳門揭幕。在中央政策支持下，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了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葡語國家企業融資平臺、葡語國家融資租賃平臺以及葡語國家貴金屬（黃金）交易平臺，發展人民幣清算、融資租賃、財富管理等特色金融服務；2018 年首屆中國與葡語國家高校校長論壇在澳門大學舉辦，是次論壇參會人員就澳門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的橋樑角色，推動中葡高等教育的合作與發展進行了深入探討；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了澳門建立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定位；202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澳門應經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在國家“十四五”規劃指導下，202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 年）》提出，澳門將進一步深化中葡雙語人才培養，發揮澳門在大灣區葡語教育方面的引領作用，在中葡論壇（澳門）培訓中心框架下，為葡語國家政府官員提供實習培訓機會並推動中葡青年創新創業。同年，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共同出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要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中葡國際貿易中心和數字貿易國際樞紐港，推動傳統貿易數位化轉型，並充分發揮澳門對接葡語國家的窗口作用，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臺。在建設以上高新技術產業鏈的同時，制定吸引和集聚國際高端人才的政策措施，大力吸引國際高端人才，建設國家級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

儘管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為打造“中葡平臺”和建設中葡人才高地推出了多項政策，但實際收效卻不容樂觀，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其一是落後化，“人工智慧+”“大數據+”等以跨界融合為特徵的新產業的快速發展，迫切需要具備跨學科思維與能力、多項技能集於一身的複合型人才。隨著國家“十四五”規劃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對澳門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求的提出及澳門打造中葡特色金融、葡語國家人才培訓、中葡商品跨境貿易等高新技術產業鏈的佈局，澳門所急需的中葡人才也應由單一的語言型人才向複合型人才轉變。然而，澳門特區《2021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依舊將建設中葡人才高地定義為建設“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而由澳門貿促局和中葡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共同建立的旨在為中葡人才和相關企業提供雙向選擇資訊管道的中葡人才資訊網，也將中葡人才狹義地定義為“中葡雙語人才”，將單一的語言能力置於綜合能力之上，這是顯然落後於當前國家所宣導的培養複合型人才理念的。

其二是邊緣化，自 2003 年中葡論壇（澳門）及其部長級會議機制建立以來，儘管中國同葡語國家間的雙邊貿易總額不斷增長，但實際經澳門撮合完成的中葡商品貿易額度卻微乎其微，2021 年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進出口總額高達 2009.48 億美元，而當年澳門與葡語國家之間的進出口總額僅為 7.3 億澳門元，僅占當年澳門對外貿易總額的 0.005%，這體現出澳門所建設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及其相關產業鏈正在被中國內地廣泛參與中葡雙邊貿易的地區所邊緣化。在葡萄牙語語言培訓方面，筆者通過與赴葡語國家工作的十餘名熟練掌握葡語溝通的華人交流所知，中國內地多座城市已建立起了多家成熟的應用型葡萄牙語速成培訓機構。與之相比，澳門的葡萄牙語教學培訓則更多地由高校等科研機構承擔，其絕大多數培訓對象為高校學生和少量葡語國家的政府官員，教學影響力和實際工作運用程度遠不及中國內地的培訓機構，這體現出澳門所建設的“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也處於主流葡語培訓的邊緣。

其三是虛名化，葡語雖作為澳門的官方語言之一，在官方檔與活動中被廣泛運用，但實際將葡語作為日常工作與生活用語的人卻很少。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021 年人口普查情況顯示，在 68 萬澳門常住居民中，以葡語為日常用語的人數僅為 3949 人，占總人口比重僅為 0.005%，這一占比甚至遠小於以英語作為日常工作生活用語人口占比的 3.4%。中葡論壇（澳門）培訓中心自 2011 年成立至今，總計舉辦研修班 54 期。其培訓內容涉及政府管理、金融、產能、酒店、旅遊、會展等多個方面，培訓學員總數 1488 人。但相對於“中葡平臺”與中葡人才高地的實際建設需要而言，這個數字仍舊杯水車薪。

四、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路徑策略

（一）有恆共識

代表社會共識的共同價值是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前提。不論是破解社會治理碎片化難題，還是啟動治理內在動力、優化治理結構，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都有助於實現協同治理的效益倍增。澳門在建設中葡人才高地過程中，需遵循國家發展意志和市場經濟規律，實現從重點行業的人才培育到形成社會全產業鏈的人才佈局，以國家意志和澳門各方利益群體的共同價值為導向，多規劃、多調整，加強與各方利益群體的交流、對話和協商，在交往中協商，在協商達成共識，實現合作共贏。在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社會共識形成過程中，澳門特區政府應發揮協調溝通的首要作用。一是利用好澳門得天獨厚的政策優勢，建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與葡語國家政府的常態互訪，注重互學互鑒；二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強化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及內地兄弟城市的合作交流機制建設；三是在澳門本地社會深入宣傳澳門“中葡平臺”及中葡人才高地打造的重要意義，以發佈重要檔和開展宣傳講座的方式，強化本地民眾及社團對於“中葡平臺”的認知度，凝聚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有恆共識。

（二）有效市場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產業合理佈局、合理分工，城市合理定位，需要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促進要素自由流通，增強區域整體活力。一是粵澳兩地在會議展覽專案、國際聯合合作、商事法律服務、資訊調研交流、國際商會建設、人才培養上積極加強聯動，整合貿促資源。共同在海內外舉辦中葡經貿合作展會與葡語國家商貿推介會，為企業提供更廣闊的海內外市場；二是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依託“一國兩制”和橫琴深合區政策優勢，積極推進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特色金融服務、中葡法律服務、商務葡語教育培訓、中葡青年創新創業中心等新興產業鏈的構建；三是創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澳門擁有 10 所高等院校，其中有諸如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的國際知名與研發能力強的高校，也有如澳門城市大學和澳門旅遊學院的地域特色高校，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領先的高教高地之一。除此之外，亦有如思路智庫、澳門學者聯盟、澳門經濟學會這樣的民間社團智庫組織。如能充分整合澳門高校與民間社團智庫的科研資源，加速科研成果轉化，必能構建澳門科研集群優勢，解決澳門本地原始創新力不足的問題。

（三）有力社會

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使社會組織成為參與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甚至驅動政府職能轉變和治理方式的創新。作為一個典型的社團型社會，澳門要充分發揮民間社團組織和個人在打造“中葡平臺”以及建設中葡人才高地過程中對於融資、科教、宣傳、整合等工作的重要作用。一是推動澳門街坊聯動。重點圍繞街坊宣傳、街坊教育、人才培養、人才服務、營商環境等五個方面，攜手打造中葡人才建設的基層示範；二是推動媒體電視及報刊設立葡語國家資訊及中葡人才培養專欄，宣傳“中葡平臺”及中葡人才相關動態，以實現社會各界緊跟發展潮流。三是積極推動社會組織為澳門建設中葡人才高地建言獻策，充分發揮澳門民間智庫的作用，開辦各類打造“中葡平臺”與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相關的研討會、論壇，邀請海內外及澳門本地專家學者和相關利益群體代表，從政策設計、人才定義、人才培養、產業構建、資源共用等多個維度展開討論，並將相關研究成果出版發行，為澳門“中葡平臺”新興產業鏈建設和中葡人才培養提供智力支撐。

五、結論與展望

人才高地是區域經濟聯動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城市群中發揮著產業引領和綜合服務功能。人才高地具備很強的資源聚集與輻射帶動作用，通過與周邊的區域互動發展，可以帶動區域資源優化配置與產業分工合理化。成熟的人才高地的本質就是以產業聚集吸引和培養相關人才，再以人才的聚集引領和支撐其產業進一步發展，形成“產業聚集人才，人才支撐產業”的良性格局。

本文以澳門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案例探究了人才高地的形成與發展，並演繹出實踐路徑。希望通過微渺的建議為澳門當前打造“中葡平臺”和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現況紓困解難，發揮個人作為社會力量構成之一對澳門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周毅平、闞閱.“一帶一路”戰略的人才支撐與教育路徑[J].教育研究,2015,36（10）,4-9.
[3]冷民、薑涵.構建與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匹配的人才高地[J].中國科技人才,2022,2022(1),24-28.
[4]原梅.“一帶一路”視域下沿線城市對外開放芻議[J].黨史博采（下）, 2019,2019(12),48-49.
[5]中共上海市委.加快建設高水準人才高地[J].求是,2021,2021(24),26-30.
[6]薄貴利.論打造世界級和國家級人才高地[J].中國行政管理,2019,2019(6),6-11.
[7]徐芳.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N].經濟日報,2022-11-30(10).
[8]戚耀琪.人才高地如何建設好，人大代表力量不能少[J].人民之聲, 2023,2023(9),62.
[9]申金升.高水準人才高地建設的若干思考[J].今日科苑,2022,2022(9),26.
[10]胡明遠、龔璞、陳懷錦、楊竺松.“十四五”時期我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培育現代化都市圈[J].行政管理改革,2020,2020(12),19-29.
[11]汪懌.高水準人才高地建設：基本內涵、核心角色與發展對策.中國黨政幹部論壇[J].2021,2021(12),57-61.
[12]李普.加強區域科技人才發展研究，推動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建設[J].中國科技人才,2021,2021(5),3.
[13]劉晗、黃慶華.發揮中心城市引領作用,推動“一帶一路”貿易暢通[J].中國人大,2017,2017(8),32-33.
[14]蕭鳴政.創新建設大灣區高水準人才高地[N].光明日報,2022-8-28.
[15]邵任薇、林姍、林綺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珠三角地區人才政策研究[J].探求,2022,2022(3),55-66.
[16]劉沖.雁陣格局視角下的高層次人才區域佈局和協調發展問題研究[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23,2023(8),12-20.
[17]李曉楠、殷知行.雙迴圈”背景下澳門文旅產業發展機遇與路徑研究[J].中國商論,2023,2023(14),89-92.
[18]黎沛文、關子郢.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的引才制度之維——以“雙區”建設背景下的深圳為例[J].青少年研究與實踐,2023,38(1),39-51.
[19]朱賀玲、郝曉晶.新文科建設背景下的複合型人才培養：新變局、新挑戰與新思路[J].高教探索,2023,2023(4),20-25.
[20]殷知行、楊淇然.粵港澳大灣區視角下澳門城市品牌構建路徑研究[J].國際公關,2023,2023(5),116-118.
[21]黃新華.(2023).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邏輯進路——基於應對突發公共事件視閾的考察[J].國家治理,2023,2023(17),69-73.
[22]毛豔華.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創新研究[J].南方經濟,2018,2018(12),129-139.
[23]陳朋親、毛豔華、榮健欣.城市群“雙城”聯動的理論邏輯與實踐策略——以粵港澳大灣區廣州、深圳為例[J].城市發展研究,2021,28(12),110-117.

[24]李向光.打造產才融合的縣域優勢[J].中國人才,2023,2023(3),75.

Research 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ino-Portuguese talent highland in Macau under 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YIN Zhi-xing[1]，XU Shen-jiayi[2]

[1]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2]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hangxing County Committee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the China central government is the top-level design idea for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Macau to build a "China-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trade cooperation service platform," with the overall goals being "policy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bonds." As a historical city wher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blend, Macau, being the "open window"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s deep involve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the historic mission of building a "China-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trade cooperation service platform." In recent years, as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has been deepened in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the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countries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with the bilateral trade total continually climbing, creating a significant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However, Macau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backwardness, marginalization, and nomin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Sino-Portugues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building the "Sino-Portuguese platform."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include the lack of clear positioning, insufficient funding, and inadequate publicity in the training of Sino-Portuguese talents. This article suggests strengthening the determination to develop the "Sino-Portuguese platform," clarifying the educational positioning of Sino-Portuguese talents, innovating educational methods for Sino-Portuguese talents, and deepen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By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Sino-Portuguese trade develop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ino-Portuguese talent highland should be accelerat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cau's "Sino-Portuguese platform" should be promoted from nominal to substantive.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Forum Macao;Macau;Sino-Portuguese talent highland

第 1 卷 第 1 期
2 0 2 5 年 2 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07

幸福，细节及伪装：纳博科夫的蝶类学之旅

刘珊[1]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纳博科夫的蝶类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交织，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视角。蝴蝶的多样性源于微小细节的差异，这一观察启发了他对文学细节的重视，形成激情与精确相互融合的特点。此外，蝴蝶的伪装与拟态现象启发纳博科夫运用戏仿手法构建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文学世界，展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创作风格。蝴蝶象征着他对幸福的渴望，这种渴望延伸至笔下的人物和读者，形成独特的文学体验，深刻影响了其创作内容。这种跨学科的探讨，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纳博科夫的创作特色与思想深度。

关键词：纳博科夫；蝶类学；幸福；细节；伪装

从蝶类学视角观照纳博科夫的研究状况，西方学界成果斐然，相形之下，中国学界的研究则略显局促[2]。通过探寻纳博科夫对蝴蝶的研究与他个人写作的深层联系，能够揭示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超凡的美学思想及作品中的隐秘联系。这不仅为理解纳博科夫的创作提供了新视角，更从跨学科角度出发，将蝶类学与文学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家创作内容和形式的成因，帮助读者更立体地理解作者其人其作。纳博科夫自离开俄国后，一路颠沛流离，从西欧始至瑞士终，从少年意气到英雄迟暮，从普通的网蝶人到著名的著作家。他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对蝶类学的热爱，他曾戏谑称，“假如俄国不发生革命，也许我会把全部生命献给蝶类学[3]，根本就不会写什么小说”[1]104。对蝴蝶的终身迷恋铸就了纳博科夫在生物学领域的成就，也深刻影响着其美学观念，为纳博科夫小说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力量。纳博科夫从科学视角去切入文学内在，窥见文学的本质，由此形成了独具个人性的意象特征—蝴蝶。在一些诗歌和许多小说中，蝴蝶和飞蛾戏剧性地冲击着文本。即使在似乎没有任何和蝴蝶主题相关的作品中，其意象和捕蝶经历也会从作者头脑中浮现出来，最后创造性地转化为文本内容。

一、蝶类象征幸福渴望

纳博科夫一生中从事过多个职业，但谈及到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时他往往将在哈佛大学博物馆的显微镜前研究蝴蝶的岁月与他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捕捉蝴蝶相并列，蝴蝶就是这两段幸福生活的共同点，也就是幸福的象征，可以说有关蝴蝶的经历在纳博科夫心理世界内化为一种最快乐最刺激的情感体验，蝴蝶于是在其文学世界里往往与幸福勾连，并将其视为审美幸福的自然表达。纳博科夫常常将自己对蝴蝶的情感和

[1] 作者简介：刘珊，(2002-)，女，汉族，湖南衡阳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 金华 321004），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邮箱：liushan200205@163.com

[2] 如西方学者已编写了多本著作：约翰逊（Kui Johnson）和科茨（Steve Coates）的《纳博科夫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布莱克威尔（Stephen H. Blackwell）和约翰逊（Kurt Johnson）的《优雅的线条：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科学艺术》、布莱克威尔（Stephen H. Blackwell）的《笔尖与手术刀：纳博科夫的艺术和科学世界》等等。而中国的研究较少，且多从整体上把握蝶类学对纳博科夫的影响，如刘文飞的《纳博科夫与蝴蝶》没有更加细致地剖析两者关系，马凌的《谈纳博科夫的“蝴蝶美学”》和赵君《蝴蝶研究对纳博科夫小说美学的发生学意义》等人的文章虽关注到了纳博科夫小说创作中的蝴蝶美学，但介绍太过笼统。

[3] 蝶类学是昆虫学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蝴蝶和蛾子（统称为鳞翅目）的科学。

记忆融入作品，将其转化为笔下蝴蝶爱好者深切的渴望，还将他丰富的昆虫学知识融入其中，使作品充满细致的蝴蝶描写。这些独特的元素为蝴蝶爱好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激发了他们的阅读渴望，使他们能够在阅读中享受关于蝴蝶的真实、科学的探索。纳博科夫的蝴蝶经验由此不仅塑造了他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文学世界。蝴蝶所象征的幸福渴望，不仅凝结在纳博科夫本人及其笔下蝴蝶爱好者的形象之中，同时也延展至文本外部，成为众多痴迷于蝴蝶的读者所共鸣的情感向往。

纳博科夫在童年时期就喜欢蝴蝶，他从七岁开始捉蝴蝶，十岁左右广泛阅读俄英关于昆虫的杂志并且自信已经熟悉欧洲分布的蝴蝶种类，但十月革命的发生中断了纳博科夫美妙的蝴蝶梦，使其成为了一个流浪者。流亡西欧的纳博科夫受困于时间和金钱，为了生存辗转在网球教练、俄语家教和文学写作等各个职业之中，但显然他并没有放弃对蝴蝶的迷恋。他仍然渴望过去的快乐的捕蝶时光，怀念曾经单纯的捕蝶人，每每想起蝴蝶，纳博科夫总是想起了儿时家庭的温暖，想起了父亲在监狱时递来的纸条上写的有关硫磺蝶和菜粉蝶的文字，想起了在维拉庄园“捕捉”到的初恋情人，他渴望迷乱的蝴蝶能够穿越严酷的圣彼得堡，奇迹般地带来初恋的信。所有的这一切有关蝴蝶的记忆不仅仅是纳博科夫发现一种新的物种并为其命名的喜悦，还象征着纳博科夫家庭的亲情，寄托着少年的伟大抱负。对于流浪者的纳博科夫而言，蝴蝶宛如暗淡现实中的一缕理想之光，带着幻影般的幸福召唤着他。对他而言，亲赴遥远的国度，亲眼目睹它们在天空中翩然翻飞，亲手捕捉那些美丽的蝴蝶，是一种无法遏制的甚至病态狂热的渴望。这种渴望属于纳博科夫本人，也属于他笔下的蝴蝶梦想家。

在众多纳博科夫创作的以蝶类学爱好者为主人公的作品中，第一本小说是《蝶蛾采集家》，原题为《皮尔格拉姆》，是用俄语创作的，后翻译成英文刊登于《大西洋月刊》。皮尔格拉姆是一个年迈的居住在柏林的蝴蝶标本商店店主，他自幼钻研蝶类学并自学成才，店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蝴蝶标本，然而他一生却从未踏出柏林，捕异域蝴蝶的梦想成为他心中的永恒诱惑。柏林的蝴蝶已激不起他的兴趣，他幻想着登上传说中的幸福岛，穿行于齐腰深的草丛中，挥动捕网，他似乎看见“一只白色的蛾子突然从无边的沉沉夜幕中飞进来，翩翩飞舞，扑棱有声，满天花板找着自己的影子去亲吻。这景象清清楚楚，如同亲身经历的往事一般[2]333。这种狂热的渴望驱使他用一笔不义之财资助自己的远游。然而，命运未允，他最终因过度兴奋摔死了。在这本小说中，纳博科夫不仅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被困于柏林无法捕蝶的苦恼巧妙地融入到皮尔格拉姆对幸福的渴望之中，还在小说中娴熟地融入了蝶类学知识，虚构了一个采蝶人特有的昆虫世界。这些对昆虫学的细致涉猎不仅为故事注入了真实的力量，使作品的环境更显鲜活与具体，还为读者提供了关于蝴蝶的丰富知识，满足了蝴蝶爱好者对科普与文学的双重渴望。如法国的迪涅、伏尔加河畔的萨雷普塔、阿尔卑斯的高山牧场等等，都是捕蝶人的胜地，是早期收集家常常出没的地方。再例如当昆虫界的熟人来拜访皮尔格拉姆时，他们突然谈起艾斯纳的母虫，“此刻要是有人进来买个抄写本或者买一张邮票的话，就会大惑不解，这两个人究竟在说什么呀”[2]332。在这里纳博科夫并没有详细介绍艾斯纳，仅仅是提了点昆虫学知识，恰到好处地止步于点缀。纳博科夫在文学中巧妙运用蝶类时，常以暗示取代精确命名，优雅地描绘特征或习性，这种审美抉择展现了他对科学与艺术界限的尊重，保留了文学的独立性与美感。艾斯纳其实是科特·艾斯纳，欧洲一位著名的绢蝶命名家，绢蝶通体纯白或彩色斑驳，优雅迷人，广布于亚欧山地。纳博科夫笔下的昆虫学知识如一条潜流，悄然滋养着故事的肌理，使作品既超越了幻想又扎根于真实的土壤，同时对蝴蝶爱好者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天赋》也是一本有关蝶类爱好者的长篇小说，其中痴迷蝴蝶的父亲对费奥多尔关于蝴蝶引人入胜的讲解像是纳博科夫自身对异域寻蝶之旅的再创造。纳博科夫在这部作品中尽情展现了他对蝶类学的深厚造诣，从蝴蝶形态的精妙描绘，习性的细致列举到标本制作技艺的讲述，无不显露出他渊博的科学知识，使《天赋》不仅成为一部引人深思的文学作品，也为广大蝴蝶爱好者提供了生动的科普资源，拓展了他们对蝴蝶的理解，可以认为“《天赋》的部分成就是对鳞翅目昆虫学研究黄金时代的一次彻底、广阔及壮丽的再现，这才是纳博科夫更大的艺术目的”[3]。并且在附录《我父亲的蝴蝶》中纳博科夫巧妙地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他对蝴蝶本体论的认识，即熟悉一只蝴蝶就要用语言将其形象化，这种文化模仿行为“模糊了人类文化与蝴蝶本性之间的界限”[4]，可见纳博科夫认为蝶类可以“入文”，没有文字，蝴蝶也就不完整了。再如纳博科夫还将自己写入斯坦利·库布里克邀约的剧本之中，人设也是一个痴迷蝴蝶的人。当时亨伯特和

洛丽塔在峡谷的泥路上迷路，汽车的散热器护栏挂满了被撞死的蝴蝶。他们偶遇一位捕捉蝴蝶的人，这正是纳博科夫本人。他沉浸在蝴蝶的世界里，回应亨伯特时，他表达了对标本的深刻见解：标本的价值不在于稀有或普通，而在于其完美或残缺[5]。这一细节不仅展现了纳博科夫对蝴蝶的迷恋，也象征了他对艺术与生命追求完美的哲思。皮尔格拉姆和切尔登采夫都是纳博科夫笔下的蝴蝶梦想家，连同纳博科夫自身，他们都有着相同的幸福渴望，但是他们和纳博科夫又所不同。纳博科夫很好的将这种渴望与生活实际相平衡起来，他有着幸福的家庭：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孩子。而皮尔格拉姆则显得更加病态，他没有儿女甚至想起他们都心生厌恶，他看见妻子哭泣，竟残忍地想拿斧子砍了她白发苍苍的头。切尔登采夫家庭也是不幸福的，他为了研究蝴蝶，长时间冷落妻子和儿子，最终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失踪了。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捕蝶的幸福不仅仅是与蝴蝶本身有关，还连接着儿时美好的家庭亲情，而对于皮尔格拉姆和切尔登采夫蝴蝶仅仅是蝴蝶，具有强大的魔力。

二、“翅膀”塑造细节追求

纳博科夫通过对蝴蝶翅膀等细微特征的观察，将这种精细性融入小说中。世界上约有 18500 种蝴蝶，它们的种属区别源自翅膀的形状与大小、斑纹、触角的形状、翅膀的鳞片结构等细节。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差异，铸就了蝴蝶的多样性，展现了它们在进化中的独特路径。蝶类身上的细节的魔力深深吸引着纳博科夫，在他看来，正如蝴蝶的美依赖于微小的鳞片，文学作品的成功也在于对细节的把握与雕琢。细节不仅赋予作品以生命力，还决定了其是否能在艺术中获得真正的价值。正如理查德·罗蒂所说：“蝴蝶翅膀上的粉鳞被刮干之后,剩下的是透明,而不是美,是没有感官内容的形式结构。”[6]214因此，科学与文学的另一个契合点在于，二者都依赖于对细节的珍视，“在高雅艺术和纯粹科学中，细节就是一切”[1]163。纳博科夫对细节的极致捕捉，以及细节与场景、人物、主题、情节发生的联系，使一切显得格外鲜明生动，充满了令人眩目的精妙。这种细腻的视角显然源自他在显微镜下细致观察蝴蝶的习惯，敏锐与细心淬炼成他独特的艺术视角。纳博科夫带着自己特异的小说美学思想创作出一部部奇特的艺术品，融合着“诗的激情和纯科学的精确”[1]12。

纳博科夫的作品中，以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和复杂的象征手法著称，作品的每一处细节都充满独特的隐喻和深意，展现了纳博科夫作为蝶类分类学家对细节的关注和判断力[7]。无论是在人物的命名、地点的选择，还是对人物神态的描写都承载了纳博科夫的艺术意图，使文本充满解读的可能性。例如：在《黑暗中的笑声》中，背叛家庭的欧比纳斯每次大笑都暗含独特的象征，预示着他的情感与生活的多重层面，而雷克斯设计的小游戏折射出对“游戏人生”的讽刺与深思。在《洛丽塔》中洛丽塔的名字含义、话剧名称与旅馆名字的相似性、房间号的排序，都嵌入纳博科夫所擅长的语言谜题，有着深刻的寓意。例如布赖恩·博伊德就发现了“着魔的猎人”旅馆及帕沃尔府两个场景上存在大量相似这一细节对《洛丽塔》小说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认为此书是道德的[8]。纳博科夫在小说结尾的两个场景中——“着魔的猎人”早晨的“勾引”和帕沃尔府的谋杀——构建了隐蔽的并列，以突显亨伯特始终不变的自私与控制欲，从未反省过自己。在两场事件之前，亨伯特都在帕金顿旅馆徘徊，两晚都辗转反侧、彻夜未眠，心中充满了对于下一步行动的蓄谋。两场行动之前，他都打去了电话，都准备了药物或子弹，试图操控他人：在洛丽塔那里是一盒紫色的胶囊，试图使她沉睡；在奎尔蒂那里则是那些无力阻止奎尔蒂的子弹，反倒让对方更为疯狂。在追逐洛丽塔和复仇奎尔蒂时，他始终无视他人鲜活的生命。他在“着魔的猎人”中将洛丽塔视为可操控的猎物，毫不在意她的意志；在帕沃尔府中对奎尔蒂更是如此，将对方的生命弃之如敝履。这两个情节中的相似使得亨伯特的所谓“顿悟”显得虚伪。读者常被引导至最后那一幕，在亨伯特俯瞰山谷、聆听孩子们的嬉笑声时，“我站在这高高的斜坡顶上倾听那悦耳的震颤，倾听那矜持的窃窃私语中间迸发出的不相连的喊叫，随后我明白了那令人心酸、 绝望的事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片和声里面”[9]，以为他终得道德升华，认识到对洛丽塔的伤害。然而，纳博科夫似乎暗示，这一“顿悟”并非真正悔悟，而更像是他对自己形象的修饰。将这种悔悟呈现给读者，仿佛企图借此掩盖自己的一切罪行，以示自己的道德复苏，但这种修辞策略只是他进一步自我保护的手段。亨伯特在内心深处明白，他一直在摧毁洛丽塔的童年、精神，将她囚禁于自己的情欲与自私之中，但只要能得到一丝满足，他便继续将这种道德感抛诸

脑后。他在俯视山谷时的悲悔，实则是他对自身情欲无法再得到发泄的遗憾。当洛丽塔已远离他，他才将悔恨延至事后，营造出一种深刻的自我反省的形象，然而真正的悔过应该是在事前克制。尽管亨伯特尽力地为自己辩护，但纳博科夫巧妙地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亨伯特是罪不可恕的，不能得到原谅。再如“纳博科夫对蝴蝶的科学迷恋明确地构成了他激进的字面翻译方法”[10]。例如他在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为达到对原文的严格忠实，采取了英语中极其罕见的词如 familistic、shippon 等。“我的译文是逐字逐句进行的,是直译。为了忠实原文我牺牲了一切典雅、和谐、清澈佳味、现代用语、甚至语法。”[1]42在纳博科夫看来翻译应该像解剖学家对标本的操作一样，要精确地传达表面的语言信息，翻译的过程就是通过语言的准确性和细节的呈现来“揭示”文本的内在构造，进而展现出作品的深度。正如他在《翻译问题：奥涅金的英译》中指出一样，“原始文本将无法翱翔和歌唱，但它可以被非常好地解剖和装裱，并对其所有有机细节进行科学研究”[11]。亦或者是理查德·罗蒂通过对“卡思边的理发师”进行放大镜式的研究，发现了纳博科夫对待“残酷”的态度[6]224，而“卡思边的理发师”在书中只提过一次。还有在科罗拉多州，洛丽塔和亨伯特经常在“雪”和“埃尔芬斯顿”之间徘徊[12]。这些名字其实是蝴蝶的指代，它们是高山峭壁和岩石地带的常客。前者，如同一块炽热的金属锭，纳博科夫在科罗拉多州的特勒德收集。后者，则是一朵可爱的柠檬色硫磺，他希望在阿特拉斯山脉找到。可见纳博科夫小说中的细节不仅包含深意还带着蝴蝶的色彩，给爱好鳞的读者留下了只有他们才懂的礼物。纳博科夫通过对细节的精致设计，不断为现实蒙上一层戏剧性的光辉，将现实转化为一场黑色幽默的戏剧，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体验。在这个他创造的文学世界中，现实与艺术、语言与符号相互交织，勾画出一个令人震撼的、极富美学意味的独特世界。

纳博科夫不仅是一名富于创造性的作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教授，他解读文本的观念与“新批评”不仅高度契合，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仿佛在显微镜下观察蝴蝶，深入挖掘出经典文本中那些往往被读者忽视的细节。例如，在《追忆逝水年华》中，他指出了“比喻中层层套着比喻”的独特特征；在《荒凉山庄》中，他将“浓雾”与主题关联起来；而在《尤利西斯》中，他精确分析了时间与人物动作的同步性。纳博科夫不仅仅是从细节的角度对文本进行形而上的总结，还关注形而下的文本细胞。例如，他还在课堂上为学生绘制《尤利西斯》中的都柏林地形图、《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居住的公寓的平面图以及《安娜·卡列尼娜》中俄国火车包厢的细节图，这种深入的分析和视觉化的呈现效果，使得学生能够在具体的空间与细节中，真正感受到作品的复杂性。在他的课程中，细节并不是附属的装饰，而是理解作品的关键。他通过细致的讨论与引导，让学生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理解，而是深入到作品的内在逻辑和结构中，从而实现对作品“神秘”的探索与总结。例如在《包法利夫人》中，他向学生讲授“农业展览会”章节的“多声部配合法”时，他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对角色的第一眼印象：爱玛的阅读经历、她所使用的阳伞及其造型、她的眼睛与双手的细微特征、她的衣着和鞋子的风格等，这些细节都可能蕴藏着深刻的意义。

三、伪装启发戏仿叙事

纳博科夫深受蝴蝶伪装技巧的启发，他通过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和戏仿手法构建复杂的叙事结构，打造出一个充满欺骗的文学世界，这种设计与欺骗思想的融合也正是纳博科夫艺术创作与科学研究之间最紧密的联系点[13]。蝴蝶的一生中面临许多许多天敌，为了更好地生存，它们通常使用伪装、拟态[4]、保护色等多样化的手段以保护自己。例如柑橘凤蝶幼虫通过拟态环境装成鸟粪来迷惑捕食者。另一种经典的伪装案例是红斑蝶对帝王蝶的“贝氏拟态”，其原理在于，被模仿的物种对捕食者而言不可食，而模仿者则无毒并借此获益。帝王蝶幼虫因食用萝藦草而使成虫体内积累毒性糖苷，能引发捕食者呕吐，从而避险。而“无毒”的红斑蝶凭借与帝王蝶的相似外观得以避敌。《天赋》中关于蝴蝶伪装的奇异描绘也随处可见：“他跟我说起巴西丛林里狡黠的蝴蝶，模仿当地一种鸟儿的嗡嗡声。他跟我说起模拟性伪装的不可思议的艺术智慧，无法用求生的努力加以解释（进化的不熟练力量的冒进），过于精妙，不适于仅仅蒙骗偶然出

[4] 拟态是动植物改变自身形态以适应于环境的一种做法。

现的猎食者。”[14]在这纳博科夫借主人公的口提出了他对蝴蝶模仿的看法，如果蝴蝶的模仿仅仅只是为了躲避天敌的攻击，那么如何解释蓝蝶蝶翼上对露珠的模仿，露珠上甚至还闪烁着阳光。蓝蝶的奢华、细致、繁复的防卫技巧，超越了捕食者的辨识力，而且似乎几乎是由某个爱搞怪的艺术家为人类发现而特意设计的，达尔文的自下而上的自然选择原则似乎无法完全解释[15]。因此纳博科夫认为蝴蝶的模仿远非单纯的生存手段，更是一种无功利的自然之美。“我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快乐。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 两者都是一个奥妙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16]自然与艺术间的奇妙共鸣，影响了纳博科夫的现实观，铸就了纳博科夫深具欺骗意味的文学世界。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的现实，即一般意义上的现实和小说中的现实。小说中的现实是可以用文字创造的、是魔术师的艺术、是蝴蝶般五光十色的现实。现实不是独一无二，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造。

在《看，那些小丑！》有这么一段话，生动地反映了纳博科夫对现实的态度：“草木是小丑，文字是小丑。场景、数字都是小丑。把两件东西放在一起——玩笑、形象——就有了一个三料小丑。来吧！玩吧！虚构世界！虚构现实！”[17] 纳博科夫希望自己的作品如蝴蝶般迷惑人心，而读者则像捕蝶人，透过层层伪装与巧妙诡计，细细解构文本，最终窥见其中隐藏的“骗局”，领悟其精心构建的艺术真相。

在这种思维之下,纳博科夫在创作中娴熟地使用戏仿手法，将他的小说构建为一个充满讽刺、模糊真实与虚假的后现代叙事迷宫。例如《天赋》是对传记的模仿；《艾达》模仿百科全书的体例；《洛丽塔》中又融入日记体、忏悔书等；《黑暗中的笑声》更是借电影艺术的风格进行讽刺。纳博科夫不仅在形式上游刃有余地使用戏仿，还在内容上将这种手法推向深刻，使每部作品看似是对严肃主题的探索，实则透着滑稽与揶揄。《洛丽塔》一书中，纳博科夫借主人公亨伯特讲述其恋童经历，他让亨伯特的种种描述看似正当，读者在阅读时却能感受到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冷嘲热讽。在《微暗的火》中，纳博科夫实现了他最为大胆的文本伪装：他将诗歌与注释这两种表面上看似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被巧妙地嵌套在一起，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讽刺基调和学术结构[18]。小说表面上是学者金伯特为诗人谢德的长诗《微暗的火》所作的注释，然而，金伯特在注释中所详尽描述的，实际上是一段被废黜的赞布拉国王的离奇身世叙述。这种设定不仅令读者对人物关系和故事真相产生了迷惑，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文学解读的界限。谢德的诗歌分为四个章节，从他的少年时期开始，探讨他在成年后对人生意义的深刻体悟，他试图揭示人类生活中微妙的模式，反映出存在的本质。然而，金伯特对这段诗作的注释却显得既琐碎又牵强，极力在细节上展开，偏离了诗歌的主题，甚至达到了一种荒谬的程度。这种脱离使得注释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对原诗的一个解构，迫使读者在诗与注释之间徘徊，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在阅读优雅的诗歌与拗口的注释时，读者往往会感到迷惑与愤懑。注释表面上具有学术的严谨性，金伯特用大量的学术术语和复杂的推理试图阐释诗作的每一个细节，但读者在字里行间逐渐意识到，金伯特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他的学术表达更多地是对知识的炫耀，而非对诗歌内涵的真正理解。进一步细读可以发现，纳博科夫在此刻意地呈现了一种对“学究气”的戏仿。他利用金伯特这一角色，反映了他对某些学者在解读文学时所表现出的过度分析和炫耀知识的讽刺态度。金伯特的注释虽试图赋予诗歌更深的意义，但使得诗歌的某些本质意义被削弱。这种反向的解读不仅让读者在理解上变得更加困惑，也使得诗歌的独特性在金伯特的解读中变得模糊不清。《微暗的火》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戏仿作品，更是纳博科夫对文学边界的大胆挑战，这种独特的文本形式将小说的传统叙事结构解构得支离破碎，超越了传统的文学评注，成为一场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实验。

四、结语

在现代科学史与艺术史中，纳博科夫的案例或许独一无二，其对自然的深入观察和对美的情感，已融入科学与艺术的创作反应中，他的作品巧妙地打破了自然与文学的边界。[19]在纳博科夫的创作中，蝴蝶作为一种深刻的象征，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幸福渴望，还映射出其笔下人物及读者的情感追求，对创作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蝴蝶对纳博科夫创作形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蝴蝶的观察和研究极大地影响了纳博科夫的细节描写，文章中任何细微的细节都可能蕴含深刻的意蕴，他细致的文本解读方法也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内在逻辑。其次，蝴蝶的伪装特性启发了纳博科夫对现实的理解和戏仿手法的运用，从而重构了传统小说文本的表现形式。综上所述，蝴蝶不仅是纳博科夫作品

内容与形式双重影响的载体，更是其艺术追求与美学探索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

[1] [美]纳博科夫.固执己见[M].潘小松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04.

[2] [美]纳博科夫.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M].逄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3] [美]库尔特·约翰逊,史蒂夫·科茨.纳博科夫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M].丁亮,李颖超,王志良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410.

[4] Alec Brookes.“Butterflies in the Chthulucene: Reading Nabokov Geologically”.Russian Literature,2020,Vol.114-115: 85-104

[5] [美]纳博科夫.洛丽塔:电影剧本[M].叶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141.

[6]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 Newman, Daniel Aureliano. “Nabokov’s Gradual and Dual Blues: Taxonomy, Unreliability, and Ethics in ‘Lolita.’”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vol. 48, no. 1, 2018, pp. 53–83.

[8] [新]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1940-1959）[M].刘佳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64.

[9] [美]纳博科夫.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492.

[10] Larson, K. Maya. “Nabokov’s ’Diabolical Task’: Translation as Capture and Becoming-Butterfly”.Deleuze & Guattari Studies,2020,Vol.14(4): 585-603.

[11] Nabokov, Vladimir.“Problems of Translation: Onegin in English”,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3rd edn, ed.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Routledge,2012, pp. 119.

[12] PYLE, ROBERT MICHAEL. “Nabokov’s Butterflies.”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69, no. 1, 2000, pp. 95–110.

[13] De la Durantaye, Leland.“Artistic Selection: Science and Art in Vladimir Nabokov.” Transitional Nabokov, edited by Will Norman and Duncan White, Peter Lang, 2009, pp55-66.

[14] [美]纳博科夫.天赋[M].朱建迅,王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15.

[15] Zimmer, Dieter E.″A Guide to Nabokov’s Butterflies and Moths, 2001″. Stalking Nabokov, New York Chichester, West Sussex: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00-106.

[16] [美]纳博科夫.说吧,记忆[M].陈东飙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112—113.

[17] [美]纳博科夫.看,那些小丑![M].吴其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1.

[18] MEYERS, JEFFREY. “The Bulldog and the Butterfly: The Friendship of Edmund Wilson and Vladimir Nabokov.”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63, no. 3, 1994, pp. 379–99.

[19] Fet, Victor. “Notes on Nabokov’s childhood entomology.” Fine Lines: Nabokov’s Scientific Art, edited by Stephen H. Blackwell and Kurt Johnson, Yale UP, 2016, pp. 216-224.

Happiness, Detail, and Disguise: Nabokov's Lepidopterological Journey

Liu Shan

Abstract: Nabokov's research on lepidopterology intertwines with his literary creation, forming a unique artistic perspective. The diversity of butterflies arises from subtle differences in detail, an observation that inspires his emphasis on literary nuances, resulting in a fusion of passion and precision. Additionally, the phenomena of butterfly camouflage and mimicry inspire Nabokov to employ parody to construct a literary world that is both real and illusory, showcasing a postmodernist style of creation. Butterflies symbolize his longing for happiness, a desire that extends to the characters and readers in his works, creating a distinctive literary experience that profoundly influences his content. This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aids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Nabokov's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llectual depth.

Keywords: Nabokov; Lepidopterology; Happiness; Detail; Disguise

Author biography: Liu Shan (born in 2002), female, of Han ethnicity, from Hengyang, Hunan. She is a master's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with a research focu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liushan200205@163.com

第 1 卷 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03

基于Citespace的中国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张海麟[1]
（南宁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广西 南宁 510300）

摘要：梳理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程度和热点趋势，为后续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的研究提供参考，于2024年10月27日在中国知网检索2014年10月～2024年10月十年间收录的关于“高校羽毛球课程”的338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法等，运用CiteSpace 6.3 R1软件对所选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2019至2023年的发文量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在2023年至今发文量出现了一个的下降趋势，目前在我国对高校羽毛球课程的研究，发文量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研究作者、机构间的联系合作较少，研究机构多为体育院校和师范类院校；研究的热点为教学改革、开展现状、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影响因素等，未来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的热点在创新能力、教学路径、融入课程、数字体育、推广策略上。

关键词：高校；羽毛球课程；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加快建设体育强国[1]。体育强国的重要一步是全民健身，而高校体育是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羽毛球项目作为深受高校学生喜爱的运动，集娱乐性、健身性、休闲性等特征于一体，是高校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随着部分城市中考体育改革，羽毛球成为中考体育的可选择项目，学生们的羽毛球基础将会越来越好，未来高校中的羽毛球课程将会更加火热。对此我们更有必要对现今高校羽毛球课程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和展望，通过研究及自身理性的思考为未来高校羽毛球课程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本文运用CiteSpace 6.3 R1软件，以中国知网2014年10月-2024年10月十年间收录的关于“高校羽毛球课程”的期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可视化分析，为今后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通过中国知网（CNKI）高级检索功能，检索2014年10月~2024年10月十年间关于“高校羽毛球课程”的文献338篇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CNKI）查阅有关“高校羽毛球课程”的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分析和文章撰写提供依据。

2. 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法

[1] 作者简介：张海麟（2001—），男，汉族，广东汕头人，南宁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育与训练。

将检索到的有效文献导出为 Reworks 格式的数据，运用 CiteSpace 6.3 R1 软件对文献数据的发文量、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图的研究，绘制相关知识图谱，从而能够更好更直观地了解到该课程的发展现状，方便进行相关的研究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发文量分析

在 2014-2024 年十年间共发表 338 篇期刊文献，其中 2014 年 10 月 27 日起发表了 2 篇，2015 年发表了 40 篇，2016 年发表了 25 篇，2017 年发表了 33 篇，2018 年发表了 32 篇，2019 年发表了 28 篇，2020 年发表了 46 篇，2021 年发表了 37 篇，2022 年发表了 27 篇，2023 年发表了 48 篇，2024 年至 10 月 27 日发表了 20 篇。由图 1 可知，在 2016-2017 年、2019-2020 年、2022-2023 年出现三次上升趋势，其他年份均为下降趋势，在 2023 年至今也呈现出下降趋势，目前我国对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这一方面的研究的发文量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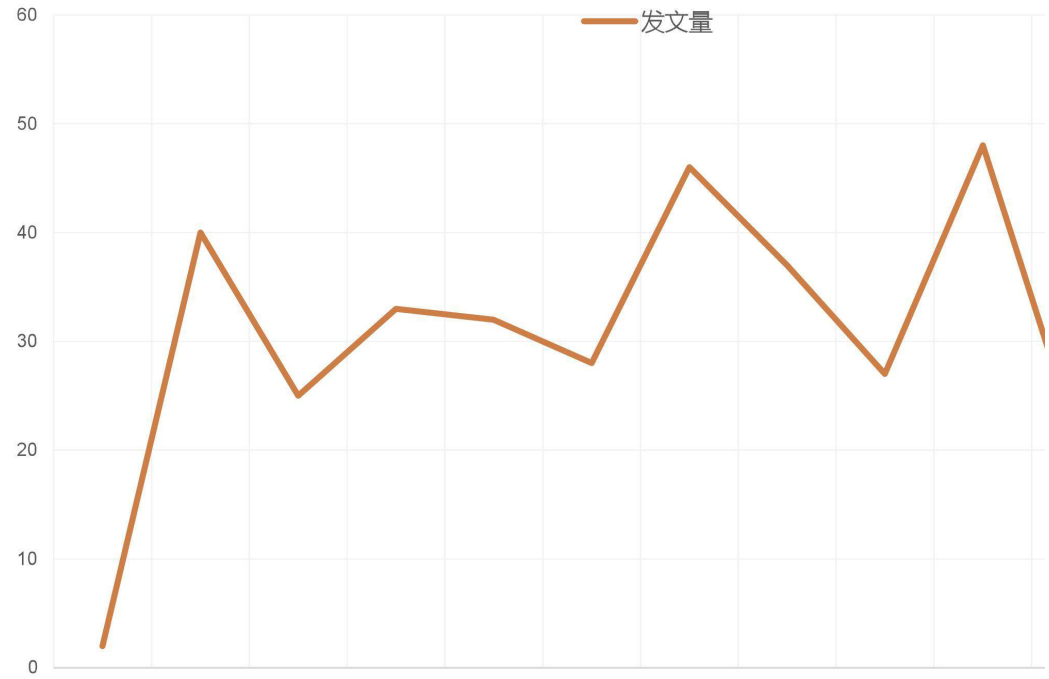


图1　2014年——2024年相关文献年度发表情况

（二）作者分析

表 1 2014-2024 年文献发文量前 20 的作者

排序	发文量	作者	排序	发文量	作者
1	4	王伟	11	2	夏丹
2	2	余乐	12	2	曾海军
3	2	何顺水	13	2	张陈
4	2	孙卫星	14	2	鲁莺
5	2	宣涛	15	2	向振宇
6	2	周德超	16	2	杨文娟
7	2	严叶	17	2	陈雪茹
8	2	李丹	18	2	李利华
9	2	吴海英	19	2	陈文汉

10	2	赵孟君	20	2	樊林华

2014-2024 年间我国在研究高校羽毛球课程的文献发文量前 20 的作者发文篇数都低于 10 篇，其中王伟发文 4 篇独居首位，其余前 20 的作者均发文两篇，如表 1 所示。王伟等人指出，结论游戏性比赛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技战术、比赛能力和专业内容知识水平的提高。与传统教学模型相比，除技战术能力外，对比赛能力和专业内容知识方面有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其发展学生综合能力的独特优势所在，其模式内部的塑造、聚焦和强化三要素是促成本研究效益的关键[3]。余乐指出，采用兴趣驱动的分组教学模式，学生们在羽毛球技能的实践应用上展现出更高的操作性。在当今社会，精通特定技术的专业人才备受青睐。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下的学生对羽毛球技能的掌握更为深入和专业[4]。

将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导入 CiteSpace 进行分析，得到节点（Nodes）为 243，连线（Links）为 59，密度（Density）为 0.002 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如图 2 所示。其中首先是以王伟为核心的研究群体是作者之间合作关系最亲密并且作者群体较为庞大的，王伟在 2023 年与孟露等学者有不同程度的合作，王伟等人指出，运动教育模式可以有效提升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战术素养、专业内容知识和比赛能力，传统教学模式只有在技术掌握方面与运动教育模式贡献相当，整体上运动教育模式对于教学效果的全面性优于传统教学模式，其特征对于发展学生战术意识、教学知识和真实场景下的比赛能力具有高度的指向作用[5]。其次是以杨文娟为核心的研究群体，杨文娟在 2016 年起先后与王润平等学者开展合作，他们认为，开展羽毛球“普修课程+主修课程+副修课程或任选课程”的课程类型结构：一方面，能够实现羽毛球教学内容的递进和衔接,总的授课时数增加，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一专多能的教学理念，满足不同学生对羽毛球课程的需要[6]。再者是陈文汉 2024 年与黄登峰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对高校羽毛球课程的研究，他们指出，聚焦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羽毛球教学设计研究，需进一步挖掘思政元素，以理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以教学为支撑、遵循项目特点，从羽毛球发展历程、比赛、训练等不同角度进行挖掘[7]。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高校羽毛球课程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其中值得我们去继续创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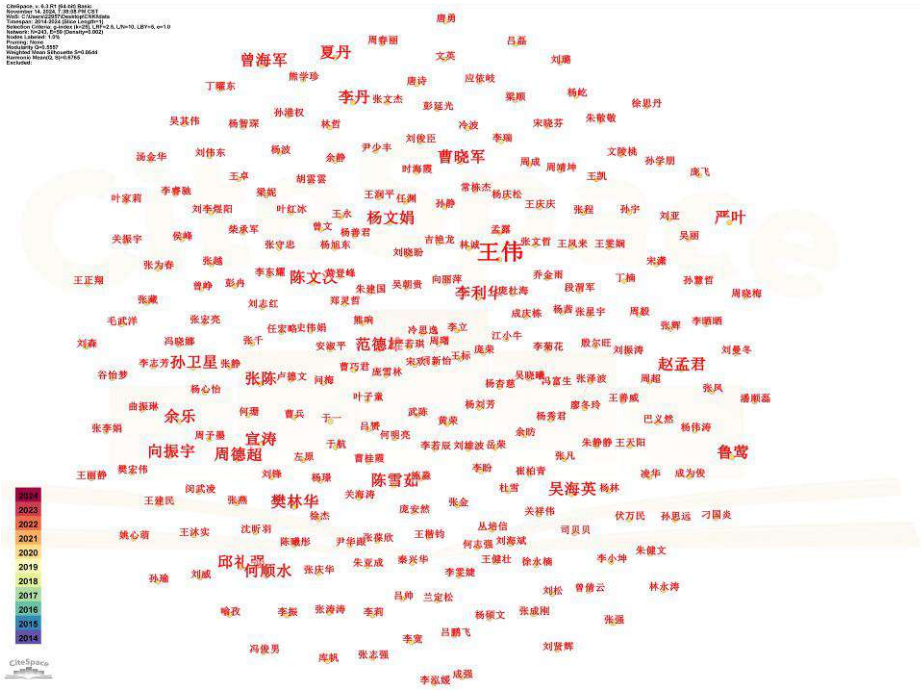


图 2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相关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三）研究机构分析

在发文量前 20 的研究机构中，广州体育学院和吉林体育学院均以 6 篇共居首位，吉林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大学、哈尔滨体育学院以 5 篇次之，北京体育大学、豫章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大学、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以 4 篇紧随其后，其余研究机构均为 3 或 2 篇。在这 20 个研究机构中共有 8 所体育院校，发文排序依次为广州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吉林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大学、哈尔滨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

成都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院；师范院校共 5 所，发文排序为湖北师范大学、豫章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说明以广州体育学院和武汉体育学院为首的体育院校投入最多，为高校羽毛球课程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不仅发文量领先，而且研究机构也相比其他院校偏多，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其次是师范类院校。

表 2 2014-2024 年文献发文量前 20 的研究机构

排序	发文量	研究机构	排序	发文量	作者
1	6	广州体育学院	11	3	上海师范大学
2	6	武汉体育学院	12	3	广西民族大学
3	5	吉林体育学院	13	3	陕西师范大学
4	5	上海体育大学	14	3	成都体育学院
5	5	哈尔滨体育学院	15	3	湖南工业大学
6	4	北京体育大学	16	3	南京体育学院
7	4	湖北师范大学	17	2	黄淮学院
8	4	豫章师范学院	18	3	东北师范大学
9	4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19	2	南京大学
10	3	苏州大学	20	2	广东理工学院

图 3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相关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将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导入 CiteSpace 进行分析，得到节点（Nodes）为 216，连线（Links）为 18，密度（Density）为 0.0008 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如图 3 所示。上海体育学院 2016 年联合上海大学体育学院开展“高校羽毛球课程”相关领域的研究；同年西北师范大学先后联合甘肃政法学院体育教学部和兰州城市学院幼儿师范学院等开展研究，组成当时最大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武汉体育学院 2016 年联合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开展研究；首都体育学院在 2016 年联合江西师范大学开展相关研究；北京体育大学 2021 年联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体育教学部开展相关研究；哈尔滨体育学院在 2022 年联合湖南科技学院开展研究；2023 年湖北师范大学先后联合广东工业大学和长江大学进行相关研究，组成第二大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四）关键词分析

1.关键词共现分析

表 3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出现频次及中心性 Top10

排序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首次出现年份
1	102	0.79	羽毛球	2014
2	80	0.43	高校	2014
3	30	0.10	课程思政	2020
4	17	0.06	现状	2015
5	17	0.03	对策	2015
6	17	0.10	教学模式	2014

7	16	0.05	普通高校	2015
8	13	0.02	教学改革	2015
9	13	0.02	分层教学	2016
10	12	0.06	教学方法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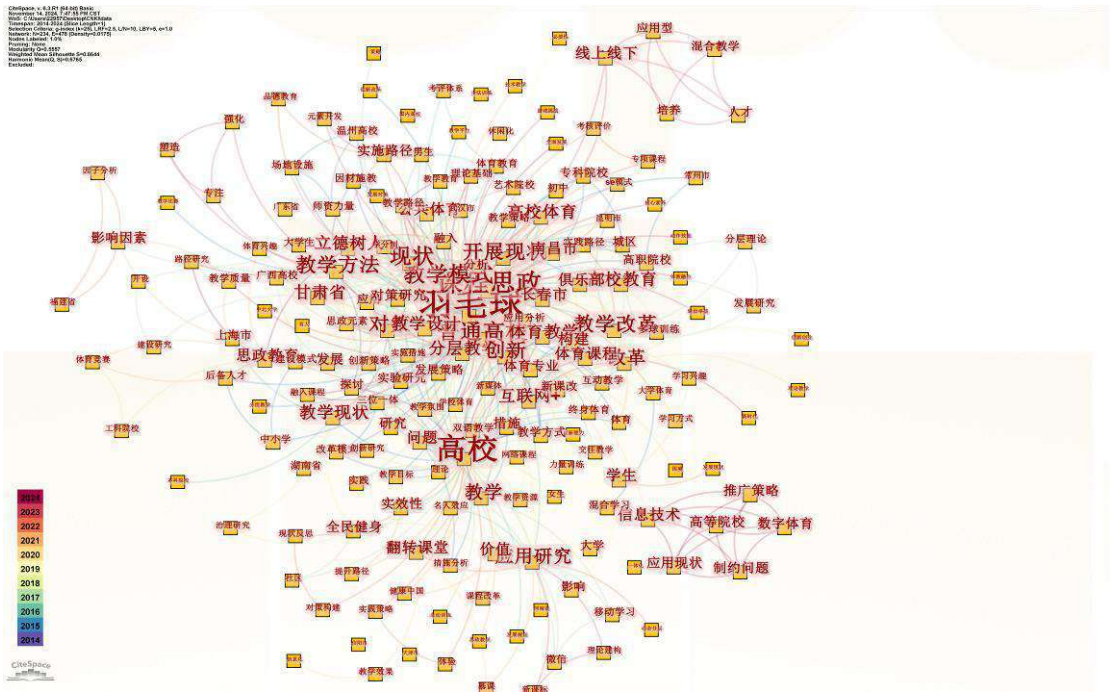


图 4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李小芬等提出，关键词是论文的核心和精髓，表达了论文研究的主题。通过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利用关键词之间的紧密度，可以分析知识图谱中的研究主题[8]。将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导入 CiteSpace 进行分析，得到节点（Nodes）为 234，连线（Links）为 478，密度（Density）为 0.0175 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4 所示。节点中心性的数值越大,说明该节点处于整体网络中的位置越重要,对这个网络的影响越大。一般认为中介中心性大于 0.1 的节点在这个知识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比较重要,通过该点展开的研究较多[9]。文字越大，证明这个时间段内在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领域研究的次数较多，由表 3 可知，以“羽毛球”、“高校”、“课程思政”、“现状”、“对策”、“教学模式”、“普通高校”、“教学改革”、“分层教学”、“教学方法”为关键词展开的研究较多。另外，关键词的出现频次与其中心性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即高频关键词并不一定是高中心性关键词，而出现频次与中心性数值均高的关键词在整个知识网络中的作用更为关键[9]。表 3 中“羽毛球”、“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同时具有高频次和高中心性，能够更好反应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主题。

2.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指某一研究主题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高度关注，是当时正在兴起的并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价值的研究方向。对突现主题词演变路径的探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某一研究领域主题的发展趋势，以此为某领域后续研究挖掘出更多潜在的有价值的科研方向[10]。根据图 5 图谱，得到前 25 个突现词可知，关于高校羽毛球课程的问题和教学现状研究从 2015 年便开始成为热点关键词，且凸显率较高，表明早在 2015 年已有学者关注到高校羽毛球课程并且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分析；从 2020 年起是高校羽毛球课程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研究的突现词是“教学效果”、“体育竞赛”、“慕课”、“思政教育”、“课程思政”，表明学者们不仅仅是针对现状等进行研究分析，也从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从 2022 年开始出现的关键词是“实施路径”、“教学设计”、“实践路径”，表明学者们逐渐从教学方法和路线等方面来研究高校羽毛球课程，未来高校羽毛球课程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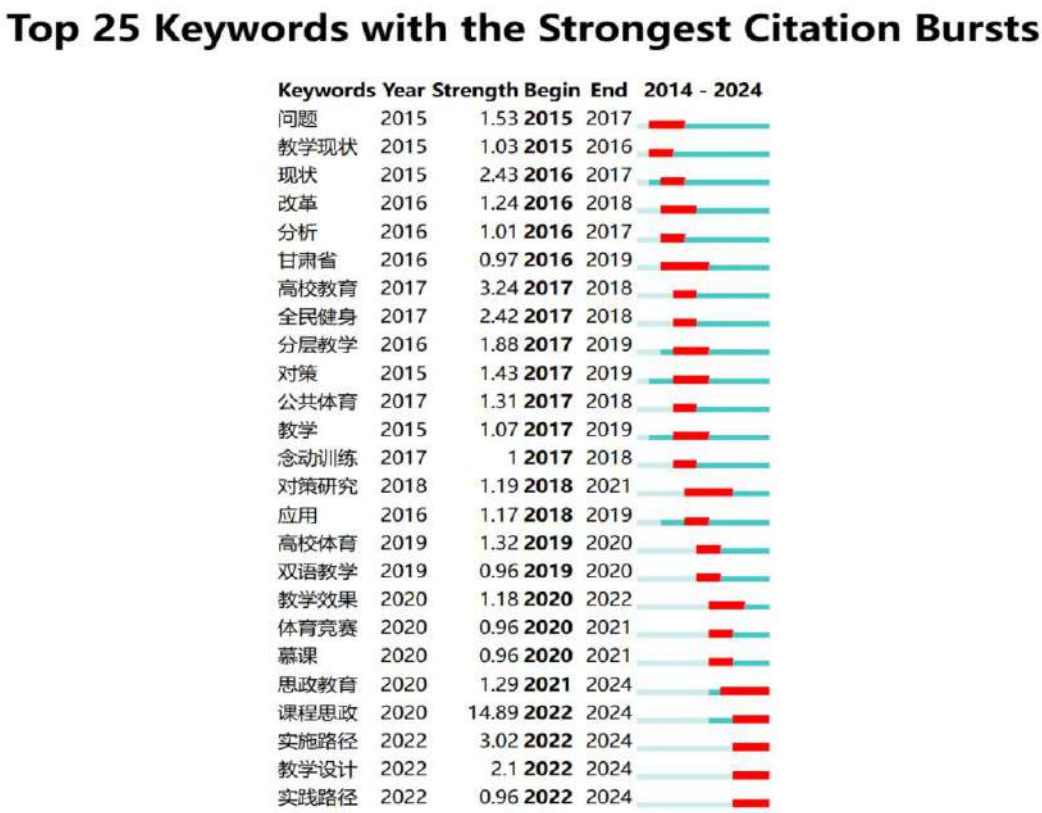


图 5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3. 关键词聚类分析

图 6 的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节点为 234，连线为 478，密度为 0.0175，Q=0.5557，S=0.8644。我们可以看出一共有：#0 教学改革、#1 高校、#2 开展现状、#3 课程思政、#4 应用研究、#5 教学模式、#6 信息技术、#7 影响因素、#8 混合教学共 9 个聚类群。

以教学改革为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羽毛球、实践路径、新课改、高校教育、体育等；以高校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问题、教学现状、价值、全民健身等；以开展现状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对策、普通高校、对策研究、俱乐部等；以课程思政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创新、高校体育、教学设计、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等；以应用研究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移动学习、动态分层、翻转课堂、教学等；以教学模式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创新改革、休闲化、教学氛围、互联网+、混合学习、教学方法等；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高等院校、应用现状、推广策略、数字体育、制约问题等；以影响因素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因子分析、教学质量、大学生等；以混合教学为核心的聚类群主要包括：线上线下、应用型、培养、人才等。

图 6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4.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

图 7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节点为 234，连线 478，密度 0.0175。时间线谱可以清晰地看见在关键词里的各时间段的研究的热点以及发展的情况。在#0 教学改革、#1 高校、#2 开展现状、#3 课程思政、#4 应用研究、#5 教学模式、#6 信息技术、#7 影响因素、#8 混合教学的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中看到，在我国未来高校羽毛球课程这个研究领域内，全面发展、创新能力、教学路径、理论基础、融入课程、路径研究、应用现状、数字体育、推广策略均为未来的研究热点，“混合教学”是最迟出现的研究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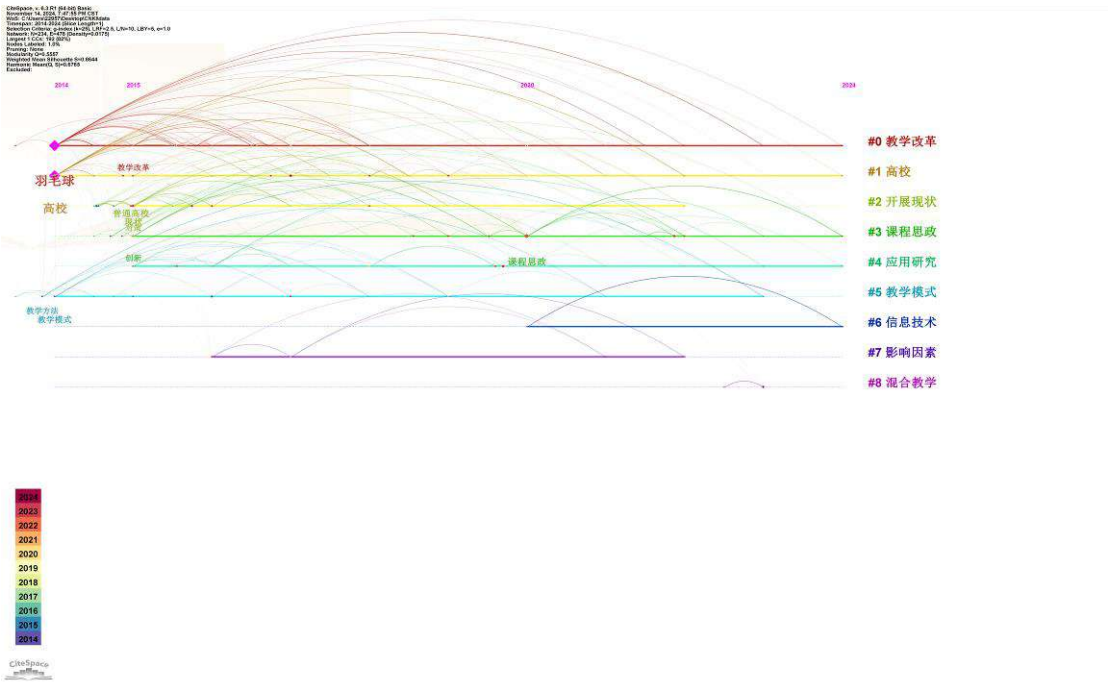


图 7 2014-2024 年“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我国在高校羽毛球课程这一研究领域，目前发文量处于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2019 年至 2020 年，2022 年至 2023 年有好转的现象，但 2023 年之后发文量不容乐观，要提高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这一研究领域的发文量，为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的研究提供参考的价值。从研究作者来看，排列前十的作者发文量均不超过 10 篇，作者们整体之间的合作较少，只有少数作者合作群体为此研究领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应该鼓励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学科的作者们进行交流沟通，创造出更多更好质量更高的文章。在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这一研究领域内，研究机构较多，大多为国内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比较分散，范围比较大，研究相对独立，机构间应该加强合作，互帮互助，完善或增加研究设施设备，进行深入的探索，国家加强对高校的建设，促进这一研究的发展。通过关键词共现、突现、聚类分析发现，在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这一研究领域内，研究的热点为“教学改革”、“高校”、“开展现状”、“课程思政”、“应用研究”、“教学模式”、“信息技术”、“影响因素”、“混合教学”等，可以看到研究的大多是高校羽毛球课程的教学现状、方法与形式，从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看到未来我国高校羽毛球课程研究的热点在“全面发展”、“创新能力”、“教学路径”、“融入课程”、“路径研究”、“数字体育”、“推广策略”上。

（二）启示

在当下“双减政策”和国家大力推行全民健身的背景下，各种运动如三大球和三小球运动逐渐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部分地方在实施体育中考改革中也加入更多的运动项目，羽毛球便是其中的一个项目。高校羽毛球在羽毛球推广和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高校羽毛球课程可能只是羽毛球基本技术的实地实践教学，而现今当下高校羽毛球课程改革势在必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课程思政、技术与战术的综合教学等等各种创新性教学方法与模式将是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的新趋势。

同时，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关键一步是师资队伍的建设，部分高校甚至出现了羽毛球课任课老师本硕专业是民族传统体育等专业的情况，教师对专项的不熟悉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课程的发展和学生们的技能学习情况，在课程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师专业技能的培训发展，吸引招收更多专项对口的教师，定期培训提高教师教学技能也是高校羽毛球课程发展的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1] 黄海燕,胡佳澍,任波,等.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内涵、任务与路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11):1-16+34.

[2] 汤金华.高校羽毛球公共体育课程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J].体育视野,2024,(06):66-68.

[3] 韦海秋,王伟. 游戏性比赛模式对高校羽毛球课程教学效果的影响[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集——专题报告(学校体育分会),2023,1218-1220.

[4] 余乐.兴趣分组教学在高校羽毛球公共体育课程中实施效果分析[J].当代体育科技,2015,5(16):58-59.

[5] 许泽,王伟,孟露. 运动教育模式对高校羽毛球课程教学效果的实验研究[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集——专题报告(学校体育分会),2023,1016-1018.

[6] 杨文娟,任渊,闫随义,等.甘肃省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羽毛球课程开设情况调查分析[J].安徽体育科技,2016,37(05):84-87.

[7] 黄登峰,陈文汉.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羽毛球教学设计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4,14(22):154-157.

[8] 李小芬,许佳慧.国内外体育舞蹈研究进展分析——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04):89-97.

[9] 侯洁,张茂聪.我国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十年总结——基于CNKI学术期刊 2007-2017 年“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和“积极心理品质”主题文献的可视化解读[J].中国特殊教育,2017,(05):36-43.

[10] 宋文君.我国教研员研究领域的热点与趋势——基于关键词共词聚类、突现词共现图谱的计量分析[J].课程.教材.教法,2018,38(10):124-130.

第 1 卷 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04

传教士到外交官：卫三畏对日本开国进程影响探微

叶芷辰[1]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随着 19 世纪中叶全球秩序重构，西方列强加剧了对东亚地区的窥视，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传教士作为非官方群体，自发显现出文化、宗教、科技传播、外交等方面的作用。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凭借其对于东亚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成为日本开国这一历史巨变的亲历者，同时也拓展了西方传教士群体在东亚地区的社会边界，推动日本的开国进程。

关键词：近代东亚；日本开国；传教士外交；卫三畏

卫三畏（Samuel Wills Williams）是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其生活的时代正值日本德川幕府晚期和明治维新时期，这是日本从锁国走向开国的重大历史转折点。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卫三畏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汉学家”身份，而忽视了其代表的“传教士”这一非官方群体在日本开国进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本文以卫三畏 1837 年“马礼逊”号之行及两次随行佩里舰队访日的经历为切入点，探寻传教士卫三畏对日本开国进程的积极影响。

一、 漂流民与卫三畏赴日缘起

1833 年 10 月 25 日，卫三畏受美国公理会派遣，乘坐“马礼逊”号抵达广州黄埔港，与传教士裨治文一起负责《中国丛报》的刊发与印刷，将远东地区的信息翔实、客观地传递回西方世界。在东印度公司撤出中国后，清政府失去了重要的贸易伙伴。由于担心传教士过度传播西方的思想文化，影响清朝的统治秩序，清政府加大了对传教士的限制，卫三畏和他的印刷所迫于形势转移到时属葡萄牙管辖的澳门，这也为他结识 3 名借住在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家中的日本漂流民并习得简单日语结下因果。1837 年 3 月，又有 4 名漂流民被解送至澳门，经过与他们的交谈，卫三畏开始热心关注日本这一“不为外人所知的土地”[1]。在《中国丛报》投资方、同孚洋行商人查尔斯·金的提议下，1837 年 7 月 4 日，“马礼逊”号以交还 7 名漂流民为由，自澳门驶往日本。由于卫三畏在伦塞勒理工学院就读期间曾修习植物学相关知识，被邀请作为自然学家加入此行，同行的还有具有医学背景的传教士伯驾，郭实猎则充当本次行程的翻译。为了向德川幕府示好，“马礼逊”号没有搭载任何武器装备，而是准备了大量的药品及科学仪器[2]。卫三畏在行前写给父亲的信件中提及，此次访日目的是送漂流民回国，同时希望和日本人建立友好往来，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为他们治病，以及做一点生意[1]。因为担心外国船只进入日本，会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威胁日本的安全、传播疾病、扰乱市场等，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签发了《异国船打拂令》，日本水军奉命炮击驱逐所有接近日本沿海的外国船只，“马礼逊”号试图两次登陆都遭到了炮击，吃了闭门羹，也未能在日本得到补给，行程以失败告终。

[1] ［作者简介］叶芷辰（2000—），女，辽宁沈阳人，东北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进行国际视阈下的东亚研究、德川时代日本研究。

［基金项目］2024 年辽宁省科学事业公益研究基金（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时代背景下辽宁国际科技合作问题与对策研究——东亚地区科技合作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4JH4/10600046）阶段性成果。

“马礼逊”号访日之行的失败并未熄灭卫三畏向日本传教的热情，反而激发了卫三畏关注日本、研究日本的热情[1]。同时，卫三畏认识到对日本这个东方岛国了解不深入，对船载药品、满怀善意的“马礼逊”号以岸炮驱离很不理解。其实，早在 1825 年幕府就颁布了《异国船打拂令》，一切非中国、荷兰的船只靠近日本海岸都会被驱逐，但是他作为《中国丛报》这一东亚地区面向西方窗口的主要编辑人员并不知晓这个法令。因此，从记载“马礼逊”号日本之行的 Voyage of the Ship Morrison to Lewchew and Japan[3]一文刊发后，《中国丛报》中有关日本的篇幅逐渐增多，包含查尔斯·金、裨治文、郭实猎等人关于日本航海、外交、宗教政策等方面的论述，其中 Notices of Japan 一文分十次连载，以期让西方世界对日本形成基本完整的认识，截至佩里舰队启航前，有关日本的论述已达到 18 篇之多[4]。在漂流民的教学下，卫三畏的日语能力得以迅速提升，先后将《马太福音》《创世纪》翻译成日文，并吸收发展了至少 2 名漂流民为基督教徒。这也为日后马休·佩里选择卫三畏作为远征舰队首席翻译，使其传教士身份向外交官转换埋下了伏笔。

二、翻译到传教士外交官

1844 年，美国逼迫腐朽的清政府在澳门签订不平等的《望厦条约》，美国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租地盖房，享受特权，其兵船可以在各通商口岸任意出入。顾盛使用裨治文、伯驾、卫三畏等人作为使团成员参与秘书、翻译、帮办有关中文函札等工作，卫三畏也是美国早期在世界东方推行强盗外交的直接参与者，顾盛称赞卫三畏等人“对中国有广博和准确的认识”、在“修约”过程中“功勋卓著，值得称赞”[5]。1848 年美国捕鲸船拉哥达号在太平洋西北海域失事，幕府将 15 名船员扣押在长崎，翌年普雷布尔号不顾幕府警告驶入长崎港，逼迫日方交还了失事船员。1851 年，普雷布尔号的格林舰长向美国政府提出远征日本的建议，他推荐的舰队领航人就是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回顾历史，黑船事件推动日本开国，美国适时扩展了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此后，其将日本作为重要军事战略基地的野心始终未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以第一岛链的强盗逻辑巩固着其全球霸权的重要战略支点。

虽然当时锁国政策已走向穷途末路，但幕府并未打算主动开国，在佩里舰队出发前一年，荷兰政府得知美国政府即将派遣佩里准将敦促日本开国，并多次向幕府发出警告，幕府却置若罔闻。时任荷兰商馆队长库尔丘斯奉国王之命，欲呈上荷属印度总督的文书，却被幕府当局以违背祖法为由拒绝接收，于是在《风说书》中阐明了美国政府将不惜使用武力手段促使日本开国的情报，并愿意亲自向幕府禀明[6]。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已经提前 1 年通过荷兰人告知日本幕府美船来航事宜[7]，但是幕府并未将《风说书》情报当作两国政府间的官方接触。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卫三畏作为曾参与过美国早期东亚外交、对远东地区特别是中日两国都具有较深的认知、且曾参与“马礼逊”号漂流民送还行程的“东亚通”，迅速进入佩里准将的视野，并取代与荷兰联系密切的冯·西博尔德成为远征舰队首席翻译的不二人选。

卫三畏乘坐萨拉托加号在琉球那霸港与佩里舰队会合后，先后参与到舰队在琉球群岛、奄美大岛的外交及自然考察活动中，且作为翻译陪同参与琉球王室的会晤。虽然此前佩里准将邀请卫三畏加入舰队时声明“不含任何战争或侵略动机”，虽然随着舰队启程前往浦贺，卫三畏开始对远征的真实目的产生质疑，从此阶段日记中“真诚地希望所点燃的仅仅是炮火而不是战火”的表述可见卫三畏对佩里准将主张“武力解决问题”的担忧[1]，但是在卫三畏 7 月 16 日写给 W·F·威廉斯牧师的信中“我主基督也希望能通过我们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把他的教诲传给日本民族”的表述可以看到卫三畏为了纠正日本民族当前对基督教“完全歪曲”的认识，认为应该采取强硬的措施迫使日本打开国门，使日本人获得自由[1]，但是这里的强硬措施并非武力手段。从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卫三畏不仅是一位随队翻译，还是一位深受宗教动机影响的外交官身份的传教士。在宗教动机与现实利益相矛盾时，他试图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同时实现对日本政策的影响，但并不完全排斥使用武力。在第一次远征返航途中，卫三畏正式坐上谈判桌，作为谈判代表为美国争取到在琉球获得补给的权利。虽然这一次赴日仅仅驻留了九天，且随船携带的荷兰语翻译作用更甚，但是卫三畏负责了翻译总统信函、检视往来信件等重要工作，为第二次赴日谈判修约做足了准备。

卫三畏回到澳门后重新投入到印刷所的事务中，继续从事他的传教事业。基督徒洪秀全受郭氏译本《圣经》影响，笃定称历代皇帝为“帝”是对上帝的僭越[8]，于 1853 年高举着《圣经》，率领太平军打入南京城。“这场以宗教为武器、奉上帝旨意行事”[1]的太平天国运动让传教士们看到了在东亚地区传教的希望，英国圣经会更是筹集了足以免费在华发放 20 年《圣经》的经费。卫三畏认为太平军的号召力来源于“公平买卖”，即人们对于民主自由的希望，且“上帝征服东方的时刻已到”，随着锁国状态被打破，将有更高的目标、更多的知识和希望光临这片土地。受历史局限，他还看不到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动摇腐朽没落的清政府统治基础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更没办法理解太平天国运动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男女平等的“普世价值”，作为传教士，他更关心如何为上帝传播福音。当佩里舰队第二次启程前往日本时，卫三畏在《神奈川条约》的修约过程中发挥了他的“智库”作用，完成了翻译到传教士外交官的华丽转身。至此，以卫三畏为代表的传教士外交官这一在 19 世纪中美关系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开始参与美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外交进程，为美国获得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利益提供了坚实支撑[9]。

三、 卫三畏对推动日本开国进程的影响

日本开国是一个渐进的、由资本主义国家全球扩张的趋势、幕藩体制的松散性、国内阶级矛盾的升级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因素驱动的复杂过程。自“马礼逊”号送还漂流民事件伊始[10]，佩里舰队的两次叩关、《神奈川条约》的签订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日本开国的进程，而在这些重要节点中，卫三畏始终承担其翻译和传教士外交官身份对应的责任，在推动日本开国过程中发挥了多重关键作用，其影响力贯穿了从“马礼逊”号事件直至佩里舰队成功迫使日本签署《神奈川条约》的整个历程。佩里准将在远征结束后给卫三畏的评价是，“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对你在执行托付给你的重任时所表现的才干、热情和忠诚给予最充分的证明。我只想说，在这一必须审慎对待的事务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你的帮助对我来说几乎不可或缺。[11]

卫三畏对日本开国的影响涵盖了多个层面，从信息的传递、外交策略的制定与执行、谈判桌上的翻译，到个人魅力的展现以及身份的转变，对日本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乃至美日两国长期关系的构建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卫三畏是构筑美国与日本之间信息桥梁的关键人物。作为最早一批将目光投向日本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对日本的深入了解为美国提供了宝贵而及时的战略情报。他参与编辑的《中国丛报》中有关日本的系列文章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提供了关于日本的最早期且较为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为美国决策层制定对日政策提供了依据，也为佩里舰队远征日本提供了必要的情报准备和策略参考。

其次，在制定与实施相对温和的外交策略上，卫三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日本近代的锁国行为是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一种自我封闭，是对于外来文化的主动选择，并非全盘否定[9]，这一点体现在幕府保留了荷兰人的通商权利，并在出岛设立荷兰商馆定期收取《风说书》以了解世界动向。卫三畏深知日本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对外来事物抱有警惕心理，因此在协助佩里制定外交策略时，既坚持美国的经济与战略目标，也充分考虑到日本的国情与文化特性，采用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温和外交策略。展示的是他这个“中国通”的上兵伐谋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展示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逐步引导和胁迫日本接受开放而非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在实际操作中，卫三畏运用娴熟的外交手腕，针对日本民族好奇心强的特点，设计了一些沉浸式新鲜体验。如：在展览舰队赠送的礼物时教会日本工人完成电报机组装，邀请当地官员及民众们一同观看包含英文、荷兰文和日文的信息“瞬间”传递到另一座建筑物的场景，并且铺设了一条时速 20 公里的小型铁路供参观。虽然幕府因舰队和当地人的接触感到紧张，但是日本民众对美国人带进来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小巧的机器、方便的新发明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种自下而上的交往展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锁国体制带来的排外反应，另一方面将美国和日本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以实物方式展现出来。这种方式对于让日本幕府和民众放下戒备心理相当见效，适时结合佩里舰队强大武力震慑的外交策略，在不直接行使武力的条件下即让美国的政治家们心遂所愿。

在谈判桌上，卫三畏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他精通中文，擅讲日语，能够准确传达双方意图，消弭语言障碍。卫三畏站在美国立场上，让日本人感受到的是，美国人充分理解并尊重日本的现实利益，并以灵活的谈判策略协调双方立场，使得看似难以调和的分歧最终在条约中达成共识。在交给特使林复斋的文书中，卫三畏指出，美国送来先进的设备及说明书是为了打消日本人心中“对两国自由交往所存的担忧”，如果日本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机械，并允许国人外出学习，必将大有收获[1]。特别是在《神奈川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卫三畏成功说服日本接受了一些比较隐蔽的“丧权辱国”条款，如第九条中“嗣后日本幕府倘以今不相允于合众国之事、与他海外诸国相允、则亦应同允之于合众国、毋庸迟缓待议也。”的表述体现了美国要求永久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若将其和美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相对比，不难发现以类似诱骗欺诈合同条款的方式攫取诸多非正当权益，是美国外交的一贯伎俩。卫三畏毕竟是一名美国人，他为当时美国疯狂拓展在东亚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神奈川条约》的签订为西方列强开辟了与日本“条约外交”的先河，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开国的进程，进而使日本走上全盘西化的快车道，也沾染了强取豪夺的帝国流氓习气。

卫三畏是出色的外交官，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一定贡献，受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浸染，在华多年的传教士生活和全面而深入的汉学研究使他具备了独特的文化敏感性。他毕生信奉基督教，也喜欢中国的儒家思想，两者的精神内核大致上都是“仁爱”，这也深刻的影响了他的外交思想，形成了相对温和的外交风格。他在传教、外交工作中提倡“孔子+耶稣”[12]的模式，可见卫三畏对儒家学说的高度认可[13]。他的这些思想积淀和性格特质在远征日本的整个过程中得以充分显现，有助于缓和谈判桌上的紧张气氛，增进彼此的理解与信任。如在与日本天皇特使会谈时，日方提前在海滩上搭建围帐包裹谈判地点以示尊重，不了解日本待客之道的佩里对此大为光火，派遣卫三畏和亚当斯上校前往交涉。卫三畏并未传递佩里准将的愤怒，而是以不便舰队登陆为由，建议拆掉了围帐和木桩，可以管窥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响下卫三畏怀柔的行事风格。

此外，卫三畏在佩里黑船远征日本中的“出色”表现，成就了其身份的重大转变。原本身为传教士的他因为在外交方面的杰出表现被美国政府重视，接替伯驾成为美国使团在华的秘书翻译，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对华外交生涯。这种身份的转变，不仅反映了卫三畏个人才能的多元性，也体现了 19 世纪中期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对宗教人士的重视与利用。辞去外交职务后，卫三畏回国在耶鲁大学开设中文课程，成为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客观上，也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过贡献。他注重分析文化对社会带来的具体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学界对汉学及东亚研究的发展进程，也堪称是一位文化使者。

参考文献：

[1] 卫斐列著. 顾钧等译.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7, 44, 113, 118, 136, 140, 142, 219.
[2] 顾钧. 七个日本漂流民的故事 [J]. 博览群书，2012(9)：99.
[3] Williams, S.W., & Bridgman, E.C. The Chinese Repository [J]. vol.6. Maruzen Kabushiki Kaisha, 1837：209.
[4] 顾钧. 《中国丛报》中有关日本的论述 [J]. 东亞文化交涉研究=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2010(3)：219.
[5] Hunt, M.H.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13.
[6] 井野辺茂雄. 幕末史概説 [M]. 中文館書店，1930：38.
[7] 王晓露. 试论“黑船来航”事件与日本开国的必然性 [J].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31(2)：56.
[8] 洪晓纯. 麦都思对 God 之汉语译名的思考历程探微 [J]. 宗教学研究，2022(2)：224.
[9] 黄涛. 卫三畏与近代中美条约外交关系 [J]. 太平天国及晚清社会研究，2021(1)：118.

[10] 郭满. 开国序曲——1837 年美船“马礼逊”号的日本之行 [J]. 海交史研究，2020(1)：82.
[11] Bailey, J.M. Obituary: Samuel Wells William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884, 16：191.
[12]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67.
[13] 刘颖. 卫三畏的中国文化观 [D].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21：43.

From Missionary to Diplomat: Samuel Wills Williams and His Influence on Japan’s Opening

YE Zhi-che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went restructuring, Western powers began to covetously eye East Asia. Against this historical backdrop, missionaries, as an unofficial yet influential group, spontaneously engaged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culture, religion, the dissemi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iplomacy. Among them,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Samuel Wills Williams leveraged his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and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Japan's opening. With his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ion's socio-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Williams became a firsthand witness to this pivotal historical event. His efforts not only expanded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East Asia but also facilitated the process of Japan's opening to the world.

Keywords: modern East Asia; the opening of Japan; missionary diplomacy; Samuel Wills Williams

第 1 卷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25

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球发球机使用体验研究

张明阳[1]

（[1]成都大学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160000）

摘要：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给传统体育教学带来了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如何高效使用人工智能体育器材为理论与实践界的重要研究方向。对此，本文本研究以网球发球机参与经历为基础，分析了使用动机，并试图通过此过程探索将这些动机应用于网球场的可能性。通过与 8 名研究参与者的深入访谈收集了资料，并通过资料分析提炼出四个主要的参与动机：知识的扩展、社会交往、通过经验扩展能力、休息的手段。为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体育器材使用本文提供参考和有益借鉴。

关键词：网球发球机；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意愿

一、前言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数智化是将强大的数字化能力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提升运作效率，其本质是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AI)技术后形成的技术手段和工作系统。在这个背景下,数智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巨大变革的同时”,也与体育教学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作为改善中国国民健康水平，体育教学不仅承载着提升健康指数和塑造健康文化的重任，更应在身体活动、体育参与等方面积极融入人工智能与体育的新合作模式。人工智能网球发球机系统包含大数据分析、区域链数据挖掘、智能语言模型、可穿戴体育设备等多种可在运动训练领域应用的子领域（Menges, T. 2024），在此过程中，AI 技术的应用在丰富大众健身参与和训练效率的同时，更着眼于整个与 AI 技术结合的新生态系统的构建。由于智能算法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体育领域，近年来学者开展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既有研究讨论了 AI 在体育领域起到的作用，但多集中在训练指导、比赛数据分析、提高运动员表现等方面（Avici& Bayrakdar,2023; Düking et al., 2023;Chmait& Westerbeek,2021），针对人工智能网球发球机系统的探讨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主要侧重于技术价值的探讨，包括定制训练计划、实时反馈和运动表现追踪与分析，但这些系统的体育训练原理应用不足，需要进一步高级化发展（Kim & Park, 2023），目前传统教练系统主要采用面对面的形式进行，这种形式能够实时评估受训者的身体功能、技术和策略，并提供直接的反馈，具有显著优势。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接受度变化等因素，使得非面对面训练（教育）的必要性和时效性日益凸显（Brustio et al., 2024）。

二．研究方法

2.1 马克思.范梅南的分析现象学

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词源意思是“展现自己”“让自己看到自己”。所谓现象学是对特定现象如何出现以及这些现象如何自我揭示的研究，现象学考察人类对现象的直接经验和体验，并为个人所经历的世界提供基本要素或结构（叶浩生，2021）。其中，马克思.范梅南现象学是非常经典的流派，其不仅解释了现象的基本主题，而且重视研究人员的经验解释。

[1]张明阳（1990—），男，辽宁大连人，成都大学体育学院讲师。

根据马克思.范梅南现行学的界定 van Manen（2017），本文将同伴关系疏远青年的体育参与体验分为三个个阶段：①关注体验的本质，②存在主义探索，③解释学和现象学反思和写作。

2.2 研究对象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 8 名，皆为具有网球机参与体育经历的青年。并且，本研究提出了以下 3 个现象学问题：

1.“网球发球机使用后，你发生了哪些变化?”

2.“面对面网球教学与发球机网球参与的区别是什么?”

3.“发球机教学的优势是什么?”

为回答研究问题，本文采用观察法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以 1：1 深度访谈的形式对研究参与者进行了约 15 至 20 分钟的试点研究，以定性评估研究中是否有经验以及陈述的意愿。最终选择了 8 名研究参与者，进行 2 次 50 分钟以上的深度访谈。访谈地点位于咖啡厅、公园等。对于个别有所顾虑的访谈对象，采用微信文字进行访谈。并通过软件转化成文字稿，文字稿超过 6 万字。笔者对访谈文字稿进行主题分析，提炼出关系发展不同阶段的主题。研究参与者的网球发球机经历如<表 1>所示。

表 1.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序号	人物	性别	年龄	职业	参与网球形式	打网球年限	访谈时间/次数
1	a	女	23	研究生	发球机、团课	2	65 分/两次
2	b	男	29	创业者	发球机、私教	1	50 分/两次
3	c	女	32	医生	发球机、团课	3	50 分/两次
4	d	男	30	职员	发球机、朋友	2	55 分/两次
5	e	女	28	公务员	发球机、团课	1	60 分/两次
6	f	女	27	老师	发球机、学校社团	2	50 分/两次
7	g	男	26	职员	发球机、公司社团	1	50 分/两次
8	h	女	34	教师	发球机、私教	4	50 分/两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结果

本文本研究以网球发球机参与经历为基础，分析了使用动机，并试图通过此过程探索将这些动机应用于网球场的可能性。通过与 8 名研究参与者的深入访谈收集了资料，并通过资料分析提炼出四个主要的参与动机：知识的扩展、社会交往、通过经验扩展能力、休息的手段。

3.1 知识的扩展

研究参与者通过网球发球机满足了对网球的好奇心，他们为了进一步了解而进行学习，接触到信息获取、发现等认知刺激，追求知识的扩展。网球是在室外进行的真正的网球，而网球发球机器是模仿人类击球，帮助网球训练的一种手段。但通过科技技术的发展，发球机的升级，让发球机训练也能引发面对对手消极思维的能力（Singer，2002） 。网球与心理因素关系密切，如关键球处理，战术焦虑等心理状态的产生与认知方面有关，因此运动的结果可能会根据个人赋予的意义或解释而有所不同，因此扩大认知刺激具有很大的影响（Conroy，2004）。

想在球场上打得更好，为此在场地对打前，会先练习。比起去球场找不到打球的人，和朋友一起玩一场模拟网球训练更有意思，通过练习挥拍速度提高时候，会在球场上打球时更有自信。（访谈 1）

在球场上，首先最困难的部分好像是不同方向来球处理的问题。在发球机练习场只在封闭的场地击球，不担心球乱飞，提高了效率。去到球场的话，对手不同，来球不同，所以只在发球机练习的人没办法马上应对不同球路的情况。不过最近，有很多地方安装了能多角度、变速的发球机，在练习的时候，就会想着到球场上要这样击球。（访谈 2）

打发球机的时候，可以通过遥控器控制速度方向，所以在制定击球策略的时候，会根据设定的球速给与回击，看着球短一点、我也学会短一点回击。然后，根据设定的球路，我有了回球的路线思路。在球场

上，对手会击打不同路线的球，通过发球机做的尝试，正好能对应回击不同路线，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访谈 3）

正如上文所探讨的那样，通过模拟网球来扩充自身知识在多个方面都得到了运用。网球这项运动本身是很有可能因过多的思考、对认知失误以及失败的担忧等负面思维而引发问题的运动（Singh，2002 年）。导致动力下降、抑郁、不安等心理状态是和认知方面相关的，根据个人赋予的意义或解读不同，运动结果也会不同，所以扩大认知刺激有着很大的影响（Martin and Marsh，2003 年）。知识的扩充在体育运动中对自信心在提高运动表现的方法中，提高自信似乎对提 高技能也有积极影响（Ju-yeon Kim，2018）。提供了许多提高网球球此外，发球机还能提供数据，例如发球速度、落点等，让您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基于这些网球发球机程序的数据，帮助校正网球的姿势 。此外，还可以根据数据分析击球图像，弥补不足，并获得击球准确性的反馈，这在心理上带来了安全感。在球场网球中，很难预测球速、旋转、方向等变量，也无法看到自己的实际击球，所以从掌握基本的姿势、方向到设定发球速度等得越来越多的方式。在球场网球中，仅依靠自己的感官和眼睛预判很困难的，因此可以通过发球机练习各种变量。另外， 由于球场网球和网球发球机的基本打球姿势是相同的，因此通过网球发球机的学习可以扩展球场网球中可以直接应用的各种姿势和方法的各种知识。

3.2 斗智斗勇

研究参与者都是因为家人、同事和熟人都参与打网球球而开始打网球，并将打网球作为改善人际关系、友谊、社交等关系和建立亲密感的一种手段。

从以前工作的地方下班后，我会继续打网球发球机，以便与朋友建立更好的关系。我一周打 2-3 场俱乐部组织的畅打比赛。当和球友线下成为朋友后，我们也会私下约去打了网球发球机。通过发球机训练和实战组合我交到了朋友也提高了技术。（访谈 4）

看到闺蜜都在学网球，我开始就像试试看的心态体验下，所以我就跟着去打发球机了。开始我不知道规则，不知道技术，我只是乱打。然后跟着闺蜜打了两三次球，球就开始能打准球，也知道了规则，加上我买了套网球服装，我就对网球产生兴趣了。（访谈 5）

我身边的大多数朋友都在郑钦文奥运夺冠后开始打网球。再就是，我朋友是一个网球 4.0 的业余高手，所以我也跟风的去和和朋友打了发球机，开始打发球机时，没有任何压力，但是到了球场根本打不到球。所以，我就报名了团课，但为了提高，我也会周末自己偷偷因为大家都打网球机。（访谈 7）

从上面可以看出，网球发球机参与者是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 在现代社会，与他人建立关系至关重要，社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Park Chan-jong，2020）。参与日常体育运动对人际关系有积极的影响，其中网球被认为是一项适合少数人结交朋友、形成牢固联系的运动，因此人们参与网球。

Coleman（1988）表示，扩大社会关系是享受网球的重要目的之一，Chmait, N（2021）表示，通过在比赛过程中与同事的互动来提高网球发球机参与者的技能并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据说，这是吸引人们持续参与网球发球机作为健康休闲选择的驱动力。与球场网球一样，参与网球发球机可以对人际关系以及身体和心理稳定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为了通过参与网球发球机和球场网球来促进社会关系的形成，有必要营造一种环境，为积极交流创造机会平台。

3.3 通过经验扩展能力

研究参与者们通过网球体验，对网球有了属于自己的目标意识，怀揣着对个人能力的挑战、成就感、与他人的竞争心，确认自己的水平，并且怀着不断成长、期望能力得到提升的心态。

我打模拟网球的时候自我感觉球技比在球场打球时要好，所以每次打发球机的时候，就会好奇要是去球场的话，我的技术会不会进步，击球或者动作会不会一样。也会有去球场之后，和人打完思考自己的问题，再去打发球机的情况。（访谈 3）

和朋友们打了很多次发球机之后，就开始和球友租发球机去场地打球并全程录像。经常看小红书等媒体上的正确动作，在通过发球机场地实际模拟网球实战。发球机的来球很稳定，人类教练也会有失误或者球路不同的情况，发球机就是固定点位，我根据来球可以设计自己的战术，并把它记忆在脑子里，在实战中具体使用。（访谈 5）

我在球场主要是打平击球，不太擅长把球打月亮球，但是在打发球机的过程中发现可以和发球机对拉高球。在对拉几百个球后，在球场就算对手来了高球，我也能灵活处理，并且根据训练，打到对方反手位置，在根据对方击球情况选择上网主动进攻，这也是我突破 3.0 级别的主要战术，所以通过练习发球机我技术部有了进步。（访谈 3）

正如上文所探讨的那样，发球机参与者们,它既是通过与发球机对战实现了成长，也是提高网球水平的手段，发球机参与者们为了在球场上取得进步，会使用发球机练习自己的技战术，也会租用发球机到真实场地对打。 并通过录像进行修正和完善技战术。而且，借助发球机和摄像机可以省去和教练约球等环节。想打球就去打球，也省去一大笔学习网球的费用。

在通过体育活动能够获得的体验当中，成就目标并非是对运动刺激无意识的反应，而是要经过选择、评估、解读的过程，无论是即时的体验还是非即时的体验，都可以说是记忆中积累的体验所产生的信息组合的结果。参与休闲活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成就目标，并且将展现自身能力的胜任感视为最重要的成就目标。模拟网球参与者所感受到的成就感体现为选择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为实现目标而付出努力以及持续保持兴趣。可以看出，研究参与者们为了向实地网球拓展，正在不断积累模拟网球方面的经验。

3.4 放松的手段

研究参与者们表示会为了休息而参与模拟网球，为了缓解压力、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心理上的安定感而参与其中。

“压力大的时候，把好朋友们叫到一起，点些好吃的一起吃，边聊天边玩游戏，心情就会变得舒服些。（访谈 8）

模拟网球的便利性非常好，想轻松打打网球的时候很合适。以前出去玩的话，就是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吃个饭，然后去网吧或者台球厅之类的地方玩

就像出去玩那样，现在大家会说吃完饭去打一场发球机呀，之后可以约场地真实的来场畅打比赛。喜欢网球的人们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地玩，所以感觉特别好。不所以呀，最近身边的人也经常打网球，能让人愉快玩耍的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了，这挺不错的。（访谈 6）

网球大球机很方便，还能节省时间，真的挺好的。去网球场的话，找不对手，教练课费贵，场地也难约。发球机可以在室内或者室外，室外真实场地可以当我的对手，在室内便利、费用低，对于我这样不爱社交的人，打球就是单纯休息、玩乐，让人感觉很愉快。（访谈 8）

正如上文所探讨的那样，人们在网球场面临的难约伙伴、费用高、场地少等问题，把本身休闲的的体育活动变得复杂，一部分人因为资源问题或者社交问题，把发球机当作休息的手段来加以利用。并且还提到为了避开网球场所具有的外部环境限制因素，人们会为了缓解压力而参与发球机训练。

球场在下雨、夏季酷暑、冬季严寒的时候没办法打球，所以大部分时候就会去打模拟网球了。而且最近场地费用呈现增加趋势，组队打球还得交不少钱，就算去了，球友也是猜盲盒，这些情况事先又没法知道…… 即便如此，花了高价去到很远的地方，如果球场状况一团糟的话，那也太让人失望了。（访谈 2）

虽然想参与网球运动，但由于像在想要的时间预约困难、总的可使用时间、昂贵的使用费、天气等环境限制因素，很多人选择去参加网球机。教练说，如果人都打过发球机再去学打网球的话，进步的速度也会更快。

在休闲动机中，休息性要素有着为了休息和缓解压力，而回避知识、物理性刺激或者人际关系的特性。在 Kim Minkyu（2023）的研究中，越是努力克服参与实地网球时产生的限制因素，精神疲劳和压力恢复的效果就越高，还会引发专注度，带来幸福感等积极的心理状态。是有帮助的。因此可以知道，通过消除模拟网球所感受到的有用之处、不满、压力等环境限制因素，提高休息方面的满意度，就能吸引人们持续参与休闲活动。

四．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以模拟网球参与者的休闲参与体验为基础，具体把握休闲动机，旨在探索模拟网球参与应用到实战网球的可能性。研究结果得出了四个观点，基于本研究结果推导出了以下结论及建议。

第一，研究参与者们将网球发球机作为扩充知识的手段来参与其中。参与者们大多以在网球发球机中体验和练习的内容为基础，应用到实地网球对战中，亲自体验到了自信心和实力的提升。如果以通过网球发球机获得的数据为基础，开发出诸如依据不同网球击球的距离、角度、方向来推荐适合个人的球拍和打法、教练建议类应用等个性化程序，那么将会带来个人能力的提升以及对实际实地网球知识的扩充。

第二，研究发现人们将打网球发球机作为社会交流的手段来参与。研究参与者们在访谈中都有着因同学、熟人、同事等参与而产生的休闲动机。而且，网球参与者们表现出为了与他人进行线上、线下互动，愿意持续参与的意愿。基于此，如果能在网球发球机内容中提供虚拟现实平台，同时在线上、线下提供见面场所、设置论坛、建立球场预订系统、提供线上、线下球场组队程序等，为社会交流创造基础条件，那么模拟网球以及实地网球将会更加活跃。

第三，研究表明参与者们为了通过体验来拓展能力而参与网球发球机。参与者们在网球追求能力提升，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努力着。而且，研究发现他们会将网球大球机作为达成参与网球实战时所设定成就目标的手段来加以利用。由此可以看出，人们把模拟网球当作实地网球的替代物以及练习的一种方法来使用。在前面提到的教练设备开发基础上更进一步，如果能开发出诸如针对不同旋转的球练习程序，那么通过大量的练习体验，有望将能力拓展到可以应用于实地网球的程度。

第四，研究表明人们把网球发球机作为休息的手段来参与。参与网球发球机时，参与者们体验到了缓解日常压力，也获得了积极的心理感受。而且，参与者们表现出想要通过实地的自然环境来缓解压力。因此，如果模拟网球品牌通过开发练习游戏内容、非面对面的线上球场组队等各种各样的内容来探索缓解压力的方法，预计其需求会进一步增加。另外，根据个人喜好调节速度、方位、旋转、声音等，将实战网球的真实比赛特征以 4D（维度）的形式呈现出来，把网球和健身相结合，与此相反，为了引导人们参与实战网球，如果能解决诸如运营问题、保持良好的球场状况等实地网球所面临的环境和经济方面的限制问题，那么作为休闲活动，网球俱乐部，具有的意义将会增大，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些方面进行开发以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在体育模拟器与实际体育项目的比较及质性研究几乎尚未开展的情况下，在网球发球机内容开发方面，不仅探索了与实战网球的共生关系，还从模拟网球的新视角进行了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模拟网球的发球机以网球使用者的体验为基础，通过得出的知识扩充、社会交流、通过体验拓展能力、作为休息的手段四个维度，来解释说明参与网球发球机及实战网球的区别。并且以研究结果为基础，确认了网球发球机的诸多要素对实战网球的发展有着启示作用。

基于本研究的局限性，对后续研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本研究选取了 8 名网球有着一年以上经历的为参与者为研究对象。后续研究中，如果以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性所呈现出的具体特征为对象来开展研究，预计将会成为能够进行更具体分类的研究。并且，本研究针对网球发球机及实战网球项目参与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后续研究中，如果对模拟及 VR 体育等作为数字体育内容被利用的多种体育项目进行比较分析来开展研究，那么有望在以往单一化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与现有体育项目共同发展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van Manen, M.(2017).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New York: Routledge/Taylor and Francis.

[2]Menges, T. (2024). Advancing Endurance Sport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Focused Perspectives. In: Dindorf, C., Bartaguiz, E., Gassmann, F., Fröhlich, M. (e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ports, Movement, and Health. Springer, Cham.

[3]Ariyaratne, M. K. A., & Silva, R. M. (2022). Meta-heuristics meet sports: A systematic review from the viewpoint of nature inspired algorith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in Sport, 21(1), 49–92.

[4]谭冬平,鲁毅.新时期我国大众网球文化传播策略[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9,39(01):70-73.DOI:10.13830/j.cnki.cn44-1129/g8.2019.01.017.

[5]董取胜,柯勇.运动健身参与如何影响社会归属感——基于网球运动健身者的质性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

报,2022,39(04):453-461.DOI:10.16063/j.cnki.issn1001-747x.2022.04.009.

Research on the use experience of tennis service machine enabl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number intelligence

Mingyang Zhang[1]

[1]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Chengdu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age of numeric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 profound and extensive change to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How to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orts equipment efficiently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is regard,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ennis service machine participation, analyzes the use of motivations,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se motivations to tennis courts through this proces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ight study participants, and four main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were extracted through data analysis: knowledge expansion, social interaction, ability expansion through experience, and means of rest.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and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use of sports equipment enabl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multi-intelligence.

Key words: Tennis serving machin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illingness to use

第 1 卷第 1 期
202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02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19

二程体用关系浅析:北宋儒学中实践与理论之辨

吴描晖[1] 叶晨曦[2]
（[1]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2]香港浸会大学，中国 香港 999077）

摘要：宋人在五代十国乱世之后，社会变革促使人们深刻反思时局，试图通过体用关系找到时代的出路。在这一时期，儒释道的合流成为一种趋势，北宋文人因此涉足于多元的思想传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二程的思想突显出其独特性。他们在时代的变革中，通过对体用关系的建构，试图理解时代的思想迭变的根本答案。文章旨在对二程体用认识上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理解北宋儒者有关体用有何所辨。

关键词： 体用关系；二程；张载；朱子；宋学

一、体用关系的哲学意义

“体用”这一概念的辨析是北宋儒学根本，二程对体用的建构成为了北宋哲人必须面对的议题。宋代以前体用思想颇为复杂，亦可反映前代哲学家使用体用之特色。在经历五代十国乱世之后，人们试图通过体用关系找到时代的出路，儒释道三家的合流的体用思想，使得北宋文人涉及佛家道家儒家传统与中国固有之思想传统相结合，由此出发，回到二程思想对体用认识之别，从而得到时代变换所带来的思想迭变关键答案。

（一）体与用的定义与区分

在当今世界主流哲学体系中，“体”这一概念通常被理解为事物之本体、实体或存在形式，它揭示了事物所固有的实质或本质。相对而言，“用”则更多地是指事物的效用、作用和功能，它关注的是实存之物在实际运作中的各种表现。

进一步地，“体”强调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结构，它深化了我们对事物内在本质的理解。而“用”则更加注重事物的外在功能和实际运作，它涉及到事物的实际应用和运作方式。在哲学中，这种体用关系常被用于区分抽象概念与实际经验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深入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之辨时，可以发现各家学说虽然在大体上相似，但在细节上的认识却存在一定的分歧。以程朱理学为例，该学派强调“格物致知”的观念。这一观念最早出现在《礼记·大学》中，其中提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大学》第一章）在这里，“格物”被朱子理解为实际观察和实践，而“致知”则关联到对知识的理论追求。这一理解揭示了体用关系的哲学内涵，并突出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互补关系。

除了程朱理学之外，道家哲学也对体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理念，这一理念强调通过无为的方式达到治理的目的。他写道：“是以圣人之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2]（《道德经》第三章）通过这一理念，我们可以理解到道家通过体察自然人伦、领悟道的原理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治理境界。

总体而言，中国哲学中的体用关系不仅反映了实践与理论、本体与功能之间的深刻思考，而且强调了

[1] [作者简介]吴描晖（2000-），女，汉族，山西侯马人，郑州大学哲学学硕士。
[2] [作者简介]叶晨曦（2001-），男，汉族，浙江衢州人，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硕士。

在追求智慧、道德和社会治理中如何平衡抽象原则与实际应用的重要性。这种平衡使得我们在探索世界和人类存在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功能，从而实现更加和谐和有意义的哲学思考与实践。

（二）体用关系在宋学中的地位

宋学与传统汉学训诂有所区别，其学术重心多置于义理之本。自二程以来，体用关系成为哲学体系核心之一。在理论探讨中，二程对体用关系之贡献颇多，凸显其在宋学中的重要地位。

首先，二程阐述体用关系为知先行后之基石。程颐所言“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3]（《二程遗书·卷第三》），“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4]（《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在其哲学体系中，理论（体）与实践（用）被视为相辅相成，虽不可分割，却有先后之序，引导之功。通过深入领悟天理，即宇宙秩序之法则，个体得以理解道德规范，确立正确之理论认知。朱子亦对此予以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于《朱子语类》卷九中记载：“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5]（《朱子语类》卷九）不仅讨论本体与发用之先后关系，且丰富了知行学说之哲学内涵，强调行上本体为实践之根源，在日常人伦中更应有所践行。此类理论认知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实践中得以验证与实现，使所行之先成为哲学核心原则。

其次，二程在体用关系中强调“体”之重要性。体，即理论性认识，被视为对天理之深刻领悟。通过对天理的体认，个体能从内在出发，不假外物，对“体”作出准确把握。由此，体用关系中之“体”不仅是抽象概念，更是对宇宙秩序之深刻理解，为实践奠定坚实哲学基础。

在宋学中，尤其是程颐理学，体用关系表现为经典深刻理解与实际应用之结合。通过学习经典，个体不仅能够领悟道之真谛，同时在实际应用中，借助器物，道可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此将经典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之思想，强调体用关系在日常实践中之具体体现。

总之，体用关系为二程哲学中宋学体系之支柱。通过对天理之深刻理解，对体之准确把握，以及对经典与实际应用之有机结合，体用关系为宋学哲学奠定深厚理论基础，成为宋代儒学发展之特色。

二、二程对体用关系的阐释

（一）典籍文本分析二程关于体用的基本观点

天理一词最早来源于《庄子》“依乎天理”，而二程却是最早明确使用天理一词作为其哲学根本，程颐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6]（《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这一论断展现了他对天理问题的独立思考和深刻理解。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天”往往被理解为自然秩序的法则体现，是宇宙运行的根本法则。二程以“理”释“天”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中，“天者理也”的论述说明了，明道进一步抽象化“理”为某种存在的宇宙秩序，将“天理”奠基为后继者的哲学基石。这种理念意味着在理学家看来，天理即是维系宇宙秩序的道德法则，是理论与实践、知觉与行为之间的纽带。

二程对“体”的关注则源自对天理的深刻体认。在他的哲学中，体用关系被构建在认识与实践的辨证统一上。体，即理论性认识，被看作是对天理的深入领悟。在这个理念中，理论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实践得以验证和实现。二程将人之心作为最现实的本体，强调通过对天理的体认来把握“体”的确切性。这使得个体能够从内在出发，不假借外物，对“体”进行最为准确的把握。

在宋明理学中，关于发用与事功的讨论往往强调对经典的理解与运用。明道的“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4](《河南程氏遗书》卷六)这显然与汉学家视经典为至尊，经与注不可动摇的观念有了很大差异，经典已被置于器、用的地位，服从于本体之道了体现了对经典和器物的重视。他认识到经典是承载道之体，而器物则是适用之具。通过学习经典，个体可以领悟到道的真谛；而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器物的运用，道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这种将经典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思想，凸显了二程对“用”的关注。此外，程颐在《易传序》中阐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7]此言道出事物中，在隐微之理与显著之象之间，体用二者本于一源。

总体而言，二程通过对天理的深刻理解、对“体”与“用”关系的探讨，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在

这一体系中，个体通过对天理的深刻体认，从而准确把握“体”的实质；同时，通过对经典的理解与事物的运用，实现对“用”的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这种独特的体用关系构建，为宋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

（二）二程体用关系的内在逻辑结构

二程的体用关系是对天理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构建的，后继的哲学体系也多以宇宙秩序的法则为核心。在这个体系中，体用关系得以确立，强调体，即对理论性认识，是对天理的深刻体认。这种对天理的认知成为他们思想的基石，也是理论认知的起点。此外，体用关系还体现了知行哲学的原则。在二程的理学中，理论（体）和实践（用）被视为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通过对天理的深入体认，理论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更是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实现。这种知行互发的思想贯穿于体用关系的内在逻辑之中。

二程对“体”的关注是他们体用关系内在逻辑的关键。体，即对天理的深刻理解，使得个体从内在出发，不倚赖外物，对“体”进行最为确切的把握。这强调了体用关系中“体”作为理论基础的不可或缺性，为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此外，二程在体用关系中将经典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强调了实际行为的伦理基础。通过学习经典，个体能够领悟到道的真谛；而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器物的运用，道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这种将理论与实际行为有机结合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二程哲学体系的丰富性和实践性。

总体而言，二程的体用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在宋学乃至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对天理的深刻认识、知行互发的哲学原则、对“体”的关注以及将经典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策略，冲破了传统经学的桎梏，使得他们的哲学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在逻辑。这一体系对中国哲学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不仅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同时也为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践行道德提供了指导。

三、二程体用观对其他哲学家体用观生发的影响

（一）二程体用论证与对张子的批判

张子与二程关系较为密切，这种密切不仅局限与他们的叔侄关系，更多体现在他们一生的学术追求中。当我们将二程和张子一共讨论时，就不可避免要谈及到关洛学派。关洛学派指的是张载在关中创立的道学学派，洛学则是指程颢、程颐在洛阳创立的道学学派，两者虽共为道学，但细节方面仍然是大同小异。早期二程弟子普遍认为关学出于洛学，一说是自张子京师论易之后有所启发，是否如此也就难以考究了，但对各自为学的根本出路也有了不同的见解。

二程与张子的体用的讨论，主要体现在程颐《答横渠先生书》中讨论太虚即气，张子曰“知太虚即气，则无无”。[8]太虚根据张子的释义指广大空间，具有明显的宇宙论倾向；气则为万物生生之气。张载认为太虚就是气，虚与气为同一物体的两种不同形态，乃是一物两体。张子太虚的提出虽是对抗佛老的虚无观，实质上是解决了自邵雍周敦颐以来的本体论物体，例如邵雍的“数”，周敦颐提出的“无极而太极”[9]，这类论述从本质上看任然是空虚无存的，还是承继了传统道家无中生有的观念，以无释易，这会导致体用不相相贯通的理论困境。因此“太虚即气”这种本为一体的理论根基解决了体用相绝的根本问题，继承了儒学传统天地自然与人身心性命的密切联系的天人理论。

二程认为，尽管张载的太虚及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某些理论困境，但理论本身仍存在一定缺陷。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张载对“太虚”本体的表述不够精确，“气”的化用表述模糊，对体用关系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在二程集中有具体的批评

“子曰:子厚以清虚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7]117（《二程集》第 117 页）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7]118（《二程集》第 118 页）

“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7]66（《二程集》第 66 页）

“或谓许大太虚。先生谓“此语便不是，这里论甚大与小”[7]66（《二程集》第 66 页）

二程的观点显现出他们认为“太虚”一词并不能充分承载天道的内涵。如果将其视为本源之体，那么这一表述过于浅显，无法与生成发用建立明确的联系，也无法很好地阐述体用之间的内在关联。关于本源

与化生的问题，他们的表述并未明确。尽管他们对张子道学的根源表示认可，但由于理论不足，导致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失衡，呈现出头轻足重的状况。不可否认的是，二程通过深入剖析张子的思想根源，揭示了他以天理为道学体系基石的观点。

（二）朱子对二程体用观的继承

朱熹的学说启承与洛学，在继承二程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丰富，为二程学说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正如张子二程的关学洛学有着独特的地域痕迹一样，后世学者将朱子学说称之为“闽学”。

朱子谈体用与二程和张子不同点在于朱子并不满足于仅仅从自然运化的角度去理解体用，也没有将理气关系直接同等与体用关系，而是尝试从更深层次去揭示它们的本质。他明确指出，理气之间的先后关系仅仅是逻辑上的，而非时间上的，理与气是组成一物一事的本质所在。而在朱熹看来，“未有此气，已有此理”[5]（《朱子语类》）这句话是对体用关系的最好诠释。这不仅意味着在事物产生之前，其本质或规律已经存在，而且揭示了体用之间的逻辑先后关系。换句话说，在事物的产生过程中，本质或规律先于实体或现象存在。这种观点与二程和张子的看法有明显不同。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体用是相互依存的，实体或现象是本质或规律的表现。然而，朱熹却强调了体用的逻辑先后关系，认为本质或规律在逻辑上先于实体或现象存在。

此外朱子还提出了“理一分殊”的概念，意在解释人伦中的心性之别，也阐释宇宙间的普遍法则和万物的具体表现形式。语意本质上，它表达的是一种宇宙观，即万物虽各有其独特性，但都根源于同一个普遍的、根本的“理”，亦即“太极”或“天理”，而“分”是万物所特有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有所“分”，这个“分”使得万物相互区别，各具特色。无论是自然生化，还是人伦日用，都各有所“分”。“一”则是“理”和“分”的结合点。朱子认为，虽然万物各有其独特的“分”，但它们都根源于同一个普遍的“理”。这个“理”作为一个统一的纽带，将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观念下，万物虽然各有差异，但内在的本质却是相通的。

朱子对体用的论述其中包括“性情体用”这一重要概念，也是朱子思考一生的重要命题。朱子从性与情的已发与未发之说，到后来意识到二者内在相互关联性，他对此作出了详细的阐述：“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5]。这一观点揭示了人性的本质与情感的外在表现。朱子认为心之体为性。这里的“性”指的是人的本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质。人性是善良的，具备道德意识，使人能够明辨是非、择善而从。人性是一种内在的、不变的本质，它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和价值取向和日用实践。

四、结语

二程对体用关系的辨析是以经典文献的深刻阐释为基础，致力于探讨如何将儒家伦理融入日常生活。他们的后继学者强调理论应当贴近实际，道德不仅仅停留在本体层面，言辞之间，更要在日常实践中得以体现。这种注重实际的理论观念，为儒学注入了更为具体的生命力，使之更能应对北宋社会剧变所带来的的现实挑战。我们不禁要反思二程体用之辨对前代儒学体用关系的继承和对后世儒学根本上的引导的深远影响，他们的思想不仅为儒家传统增添了新的本体意义，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经验。在这场形上之体与形下之用的纷繁交汇中，在乱世之后的宋学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批判吸收了儒释道三家理论，为中国传统体用的丰富多元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朱熹注.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 （春秋）老子著；陈徽译注. 道德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01
[3] （宋）程颢. 二程全书 册3 河南程氏遗书 第19-25、附录[M]
[4] 朱熹编. 河南程氏遗书 一册[M]. 商务印书馆, 1935.04.
[5] （宋）黎靖德编；杨绳其，周娴君校点. 朱子语类[M]. 长沙：岳麓书社, 1997.11.

[6] （宋）程颢，（宋）程颐撰；陈京伟笺证. 河南程氏遗书 河南程氏外书[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10
[7]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8] （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 张载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8.08.
[9] 冯国超主编. 太极图说[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07.
[10]田丰.朱子体用论发微[J].朱子学刊,2018,(01):66-90.
[11]张品端.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J].中国哲学史,2023(05):100-106.
[12]杨立华.用礼成俗与义理养心：论张、程殊途的思理根源[J].船山学刊,2023(03):60-67.

The Substance-Function Relationship in Cheng Brothers' Philosophy: Exploring the Practice-Theory Dialectic in Northern Song Confucianism

WU Miao-hui[1]，YE Chen-xi[2]
[1]Zhengzhou University [2]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tumultuous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the social chang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prompted people to deeply reflect on the state of affairs and seek a way forward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became a prevailing trend. As a result, Northern Song scholars explored various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thought of the Cheng brothers stands out for its uniqueness. Amidst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y constru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to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answers to the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era. This paper aims to deeply explore the Cheng broth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in order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distinctions made by Northern Song Confucian scholars regarding this concept.

Keywords: Ti-Yong (Substance-Function); Cheng brothers; Zhang Zai; Zhu Xi; Song Confucianism

第 1 卷第 1 期
202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02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22

“托出南洋的多种颜色”
——从老舍《小坡的生日》看新加坡多民族社会

刘梓琳[1] 徐明月[2] 罗鸿海[1,*]

（[1]韶关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2]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 530000）

摘要：作为老舍的东南亚主题小说，《小坡的生日》在面世之初就得到较多关注。关于《小坡的生日》中“民族”主题的讨论，自 21 世纪初就有海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其中。《小坡的生日》涉及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与“阿剌伯人”四个族群，折射出近代新加坡的多元民族社群景观。本文结合不同族群相关的研究与基本史实，以此思考中国文学中“文”“史”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老舍；《小坡的生日》；新加坡；多民族社群；中国文学

自 1924 年夏，老舍开启了长达 5 年有余的“留英任教”经历。期间，他写下《二马》等优秀的长篇小说。启程返华时，老舍因故在新加坡滞留。为维持生计，其在新加坡一所华侨学校教授“国文”（中文），历时半年。在短暂的教学阶段中，老舍接触到不同民族的新加坡儿童，以此为题材写下《小坡的生日》。“小坡”在小说中是一名普通儿童，实际指的是新加坡。

《小坡的生日》最初连载于 1931 年的《小说月报》第 1~4 号。至 1934 年 5 月，上海生活书店发行《小坡的生日》合集本，并在同年 6 月于《时事新报》进行报道、宣传，称它“托出南洋的多种颜色”。[1]至 1937 年 5 月，《小坡的生日》已翻印四版。

《小坡的生日》面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一些点评。1935 年，署名“朴园”的时评人在《清华周刊》发表“书报评介”，对《小坡的生日》作四个总结：“字句的灵活”“尽情地採纳方言”“给一个明晰的图画”和“有着轻快讽刺的描写”，认为《小坡的生日》是献给“人”的童话。[2]1946 年，郑家瑗在《申报》撰文《读〈小坡的生日〉》，对小说的结构、内容和相关的读后感进行整理、展示。[3]

随着老舍的其他作品陆续面世并流行，有关《小坡的生日》的讨论暂告一段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儿童文学”意识的兴起，作为中文儿童文学代表作之一的《小坡的生日》也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而新加坡作为一个“多民族社会”，其背后折射的“多民族”元素也备受关注。

一、研究回顾

1985 年，张宗顺撰文《浅谈〈小坡的生日〉的儿童情趣》，不仅梳理了《小坡的生日》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和文本特色，还从“儿童情趣”的视角切入这部小说。在论文结尾，他引用老舍在《谈风》中的文章《有了小孩以后》的片段“小孩是科仑布，把人带到新大陆去。这个新大陆并不很远，就在熟悉的街道上和家里”①，以此总结、论证“儿童情趣”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4](P89)。在过往的“教育”体系中，老一

项目情况：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般项目“《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马来文版）”（项目号：23WZSB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1] 第一作者：刘梓琳（1994—），韶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2] 第二作者：徐明月（1989—），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马来语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3] 通讯作者：罗鸿海（1990—），韶关学院副科级辅导员，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博士。

① 该片段原文来源：老舍，《有了小孩以后》，载《谈风》1936 年第 3 期。

辈教育家虽立足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等苏联教育家的理论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有所思考，但关注儿童自身“情趣”（情感、趣味需求）的意识尚浅。因此，在学术研究初步恢复之际，张宗顺一文可谓是同时恢复学界对“儿童”与“文学”两方面主题相结合的传统。

至千禧年前后，学者对其讨论扩展至儿童文学之外的领域。曾广灿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考察老舍研究在日本和南洋的不同处境。提及“南洋”视角时，他特意提到新加坡学者王润华[5](P 192-194)，因为王润华对《小坡的生日》的一些评述为 21 世纪有关其“后殖民”问题的争论奠定了理论基础。[6](P 37-50)

千禧年前后的研究者对《小坡的生日》的关注重点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是有关“后殖民”问题的争论，第二是老舍文学中的“南洋书写”。第一个问题其实来源于 20 世纪后半叶各国兴起的“反殖民”学术思潮，例如英国南亚裔理论家齐亚乌丁 • 萨达尔曾批判奈保尔、拉什迪等同为外籍南亚裔文学家的“棕色撒哈布”[①]现象，因为后者严重依赖欧美语境中，对“同族”社会评述过于刻薄[7](P 136-144)。这些学者绝大多数既具有“第三世界”背景，同时亦有长期生活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经历，他们对于欧美语境下的“霸权”逐步挤占“第三世界”的舆论空间异常警惕，由此发起“后殖民”（Postcolonialism）讨论，在“舆论不对等”的守势中尽可能坚持为“第三世界”发声。由此可见，这种争论既属于文学论题，也属于历史论题。

朱崇科与罗克凌之间的论争是这一研究热点在中文圈的体现。朱崇科撰文《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以〈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中心》，以老舍海外主题的小说《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主视角，结合诸多海外学者的研究与论述，从“后殖民”的角度既肯定老舍作为“华人”、“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对西方文字霸权的颠覆，又提出老舍作为“他者”对主流“身份认同”的追求很可能也陷入“文化殖民”的陷阱，并阐明他这个观点正是承续东南亚华裔学者王润华早年的分析[8](P 14-15)。对此，罗克凌提出了反驳意见，认为朱崇科的批评受到了“新加坡本位”的学术观点的影响，老舍文本深陷“文化殖民”是一种有待斟酌且偏颇的误读[9](P 143)。

学术界对老舍《小坡的生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表层的“儿童文学”到“异域写作”探微与“后殖民”论争相结合，可见学术界对这部儿童小说的关注深度在增加。《小坡的生日》涉及四个族群：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与“阿剌伯人”（阿拉伯人），笔者认为，虽然后三者着墨看似“寥寥”，却折射出近代新加坡的多元民族社群景观，值得展开分析。

二、老舍笔下的新加坡各族形象

（一）华人：适彼“叻”土的小坡同族

1819 年，新加坡开埠。在英属海峡殖民地秩序下，大量聚居马六甲、槟榔屿等地的华人、印度人劳工来到新加坡。由于华人沿袭马来语“石叻”（Selat）称呼这个新开埠的英属殖民地，因此他们也把“新加坡”称为“叻”，而相应中文语境下的“叻”往往也指代新加坡华人社区[10](P 2)。

历经多年发展，这些具备一定人口规模的新加坡华人涉足社会、经济与教育多方面，成为新加坡第一大族群。虽然新加坡历届领导人都反复强调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社会，并不是某一个民族“一家独大”，李显龙也在讲话中同时切换英语、马来语和华语[②]，但自新加坡开埠以来，华人文化一直是当地的“主流”（或者说在各民族中所占比重最大），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所以叫作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11](P 21)《小坡的生日》展示出小坡的“华人”身份：父亲是一个在新加坡开设“国货店”的华人老板。老舍自己曾在“国文”学校教书，他视野下的“国”显然指的是中国。

虽然家中所有的文化取向都指向“华人”，但新加坡常年以来多民族混合聚居的情况使得小坡对于自己的族属有一定的“疑惑”，见载第二部分“种族问题”：“小坡弄不清楚：他到底是福建人，是广东人，是印度人，是马来人，是白种人，还是日本人。在最近，他从上列的人种表中把日本人钩抹了去，因为近来新加坡人人喊着打倒日本，抵制仇货；父亲——因为开着国货店——喊得特别厉害，一提起日本来，他的脖子便气得比虾蟆的还粗。”[11](P 24)

---

① 笔者注：“撒哈布”一词来源于 Sahib，原是南亚人对贵族的尊称，例如末代马拉塔执政官（佩什瓦）拉纳 •撒哈布（Nana Sahib，1824-1857）。在英属印度时代，这个称谓被南亚本地人用来问候殖民者长官。

② 参见央视频：《新加坡总理喝一口水换一种语言 中英马来语自由切换》，哔哩哔哩，2020 年 4 月 22 日，https://b23.tv/rxmMnII

虽然小坡自己对于“种族问题”的概念颇为模糊，但他的“疑惑”进一步证实他身上的“华人”社群特征：第一，下南洋的东南亚华侨普遍存在以地域划分社群的现象，并以“会馆”作为自己原籍认同的空间，例如“潮州会馆”“南海会馆”“福建会馆”“海南会馆”等等。这些冠以原籍（闽、粤、潮、琼）的团体对新加坡华人社会保持着长时间的影响，处于“求同存异”的状态[12](P 106)。小坡的父母在他面前经常展示对“广东人”的不同评价，导致他自己时而觉得自己可能是“广东人”，时而又觉得不是，时而觉得自己可能是“上海来的马来人”（很显然他对马来人的感知是非常混乱的）。这种混杂的认知，恰恰形成新加坡华人的一个历史结构基础：从“多元”到“一体”，在“一体”中也能映衬“多元”。

第二，小坡一家对日本的敌对态度也很明显地展示出其华人身份。虽然老舍发表《小坡的生日》之初，中日两国尚未全面开战（《小说月报》第四期出版于 1931 年 4 月），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已久，荼毒中国台湾和东三省多年，大多数华人对日寇自然有痛恨之情。作为南洋“国货店”的老板，小坡父亲是众多华人商贾“抵制日货”的一员，可见家国情怀延伸到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方方面面。老舍提笔写《小坡的生日》之时，新加坡已有较为激烈的“抵制日货”活动。单单是 1929 年，从华人社团给白三春茶庄发警告信，到《叻报》报道新加坡的“抵制日货”情绪比中国内地还强烈，皆可看出华人社会的抗日情绪萌芽[13](P 709-710)。

小坡等人就读的“国文”学校，是新加坡华人社群重视教育的一个缩影。华人从运行百年的“萃英书院”（1854~1954），到教授中英文的新式学院，一直很重视社群内部的教育问题，为东南亚华语文史奠定了重要基础。老舍短暂的“南洋经历”能留下《小坡的生日》这样一部能有近 90 年讨论史的“异域想象”著作，可以说华人开设的“国文”学校是很好的平台。

（二）印度人：殖民地秩序下的“劳务工”

“看门守夜的印度有多么尊严好看！头上裹着大白布包头，下面一张黑红的大脸，挂满长长的胡子，高鼻子，深眼睛，看着真是又体面又有福气。”[11](P 23)小坡曾跟他的小伙伴说他想成为两个典型的“非华人”角色：“看门的印度”和“马来巡警”。这就是王润华、朱崇科对老舍文笔肯定之处的来源：老舍试图打破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等级差异”，从“据小坡看”这种“第三方视角”引入到新加坡的多民族社会。

上文小坡看到的印度人形象，是英属海峡殖民地印度裔移民的一个群体——旁遮普锡克教徒（Punjab Sikh），他们在新加坡、马来亚等原海峡殖民地以军警行业为主。

海峡殖民地各地都有不同族裔的印度裔群体，例如南印度移民泰米尔人（Tamil），主业军警的北印度移民旁遮普锡克教徒，来自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商贾（Gujaratis）等等。因此，学者 Vineeta Sinha 对新加坡印度裔移民进行进一步细分，认为不能简单用“印度教”（Hinduism）指代整个“印度裔”（Hindu），因为旁遮普锡克教徒、穆斯林商人和欧亚混血基督徒在其中比重不低[14](P 139-160)。

除了锡克教徒，小坡也提到了印度教活动——他把主持印度教节日的婆罗门僧侣称为“和尚”，也折射出华人对“他者”的认知。《小坡的生日》第八部分“逃学”中，小坡等人看到一群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印度人打着鼓、吹着喇叭聚众游行，里面有带着黑帽和“蓝法衣”的老少“和尚”（婆罗门），架势像“大开路鬼”，最后还有“半死的小男孩”。[15](P 281-284)这个仪式很贴近印度教的“大宝森节”，对于小坡而言，他可能从看似“狰狞”的细节中误以为这是有“和尚”作法的“葬礼”。

（三）马来人：“班达诃罗”的遗民

马来族群与新加坡之间的渊源可追溯到“新加普拉”（Singapura），随着“新加普拉”王公领被满者伯夷帝国（Majapahit）占领，原王公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带着部众来到马六甲，建立马六甲苏丹国[16](P 152-154)。他与他的儿子被一些文献记作“依斯干达沙”（Iskandar Syah）。1699 年开始，随着马六甲苏丹王族嫡系绝嗣，有拜里米苏拉家族女系血统的“班达诃罗”（Bendahara）[①]家族成为新的苏丹家族，他们同时统治马来亚南部、苏门答腊东北部和两地间岛屿，统治版图被称为“柔佛帝国”。但这个“帝国”徒有其名，到后期严重受制于荷、英两大殖民体系。

随着柔佛苏丹家族内讧不断，“班达诃罗”家族庶流分出“天猛公”家族（世袭这一爵位而得名），本

[①] 笔者注：“班达诃罗”（Bendahara）是马来传统官职，意即“首相”，与“沙班达尔”（Shahbandar，又译作“彭古鲁”Penghulu Bendahari）、“天猛公”（Temenggung）、“拉克萨马纳”（Laksamana）并列为马来苏丹体系下的文武重臣。参见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年 6 月，第 54 页。

家也因苏丹王储分别支持英、荷殖民者出现分化。1819 年，“天猛公”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ahman，1775~1825）在英国授意下废黜原苏丹，改立其同父异母兄长侯赛因沙（Hussin Syah，1776~1835），但侯赛因终其一生的居住地就在新加坡[17](P 399)，柔佛的实际控制权落到阿卜杜勒·拉赫曼、敦·易卜拉欣（Tun Ibrahim，1810~1862）和阿布巴克尔（Abu-Bakr，1830~1895）祖孙三代手上。至 1868 年，“班达诃罗”家族领袖把“摩诃罗阇”（Maharaja）这一古老的头衔转交给阿布巴克尔，至此侯赛因沙的子孙彻底失去苏丹头衔和相应的继承权，滞留在新加坡的“甘榜格南”（Kampong Glam）街区，这个社区正是新加坡马来居民聚居的一个核心区域。

马来人在新加坡定居历史颇久，甚至在英国完全控制海峡殖民地之前是这一地区商贸活动的主导力量。但随着侯赛因沙的后人被迫寄寓此处，以及大量华裔和印度裔的劳工随英国殖民体系迁居至此，马来人在新加坡地位大幅度下降，其“文字”书写长期处于“失语”和“边缘化”状态。虽然新加坡马来人出过开国总统尤索夫·宾·伊萨克（Yusof Bin Ishak）、前任总统哈莉玛·雅各布（Halimah Yacob）等政要，但社群整体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偏低。

回归《小坡的生日》正文中。老舍提到关于马来的文字细节有：“马来巡警”[11](P 24)、小坡等人族群认知的独特想法“东街的小孩儿们全有马来父亲，咱们的父亲也一定是马来人”[11](P 27)、跟小坡说“坐过牛车”的两个“马来小妞”[11](P 36)、马来人卖“红毛丹”水果（在此之前小坡听长辈说“马来人是很懒的”）[15](P 288)等。在第六部分“上学”一栏提到小坡作为华人孩子视野下的马来形象：

“两个马来小姑娘的上学方法就又不同了：她们的是个马来学校。她们是每天午前十一点钟总上学，而且到了学校，见过先生便再回家。听说：她们的学校里不是先生教学生，是学生教先生。她们所担任的课程是‘吃饭’。到十一点钟，她们要不到学校去，给先生们去主意吃什么饭，先生们便无论如何想不出主意来，非一直饿到晚上不可！她们到了学校，见了先生，只要说：‘今天是咖喇饭和炒青菜’。说着，便向先生一鞠躬。先生赶紧把这个菜单写到黑板上。等他写完，她们便再一鞠躬，然后手拉手儿回家去。”而当小坡表达想去“马来学校”时，他父亲出于一种偏见“不准小坡去”[11](P 41-42)。

这段文字是全文对“马来人”描述最为详实的部分，里面其实折射出华人儿童视野下的马来日常：马来小姑娘去的“马来学校”很可能是教授马来语和“爪夷文”（Jawi，阿拉伯字母的马来文字）的学校，当时新加坡、槟榔屿和邦咯有这类学校，但主要是马来人学习，少数华人求学者是原籍三亚的回族华侨“广东人”（Orang Kwangtung）.女性学生很可能在学习期间兼职煮食，“咖喇饭”（咖喱饭）和“炒青菜”是马来人最日常的饮食。

通过这段，读者不难看出虽然小坡兄弟曾有把父亲当作“上海来的马来人”的类似想法，但很显然他们的父亲对马来人是有偏见的。对于这一点，结合上部分《小坡的生日》笔下的“小印度”，笔者认为这一“偏见”是新加坡社会在殖民体系下被引导出来的对马来人和印度人等“非中非西”族群的“认知”，但并不是老舍主观意识中的“歧视”，老舍甚至起到第三方“客观展示”的作用。齐亚乌丁·萨达尔非常直接指出，殖民主义不公正舆论系统使得马来人往往被描述为“懒惰的”族群[7](P 100)。

（四）“阿剌伯人”：横跨南洋诸岛的阿拉伯裔商人社群

在老舍 1931 年发表在《小说月报》的版本中，除了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另外一个有一定出现频率的族群便是“阿剌伯人”，包括小坡在街市上所见到的“阿剌伯的买卖人”[11](P 25)、在第十四节“猴王”中提到张秃子的帽子很像“新加坡的阿剌伯人戴的小红盔儿”[18](P 449)。在当代《小坡的生日》版本中，“阿剌伯人”被统一写为“阿拉伯人”[19](P 148)。

这些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做生意的阿拉伯人往往有一个代称——“哈德拉米人”（Hadramis），他们得名于也门南部的哈德拉毛地区（Hadhramaut），自古就有跨域贸易的传统。参与“郑和下西洋”的职官马欢曾对这些阿拉伯商贾的一个据点“阿丹”（今亚丁）有过描述：“（阿丹国）又有市肆、混堂，并熟食、丝帛、书籍、诸色什物铺店皆有。”[20](P 64)由此可见，商业文化一直是也门（或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历史书写的主旋律。

18 世纪初期，也门哈德拉毛本地乌斯马尼部族（Othman）年轻人萨益霍·阿都卡迪尔（Shaikh Abdul Kadir）辞别故乡，前往苏门答腊东部。阿都卡迪尔在此担任老师，与妻子育有四个孩子：长子穆罕默德·易卜拉

欣（Mohammed Ibrahim）定居马六甲，次子穆罕默德·迪沙（Mohammed Desa）定居安汶，三子努尔·穆罕默德（Nur Mohammed）定居实打龙，幼子斋纳·阿比丁（Zain Abdin）定居三宝垄[21](P 3-4)。这段经历被马来亚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阿都拉·蒙西（Abdullah ibn Abdul Kadir Munsyi，1796—1854）记录下来，这位后世被马来西亚誉为“近代马来文学之父”的学者，其血缘跟种族概念上的“马来”几乎没有关系：在苏门答腊担任经师的南也门移民阿都卡迪尔，就是他的曾祖父。

而新加坡也有阿拉伯人贸易的记录，并为此形成一些小型“聚居区”。但他们相较于马来群岛其他区域的影响力明显小很多，没有出现阿都拉·蒙西这类对区域历史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在《小坡的生日》所涉及的四个族群中，阿拉伯人像是“过客”的角色。

有意思的细节是，《小坡的生日》里提到张秃子的“小红盔儿”。这个“小红盔儿”其实并不是阿拉伯人的专属，而是整个中东地区都流行的“菲兹帽”（Fez）。这种帽子随着奥斯曼影响力的推广影响到整个中东，最终一些迁居东南亚的“哈德拉米人”也戴上此帽子以示身份。

三、结语：中国南洋文学中的“文”与“史”

虽然《小坡的生日》从头到尾的主旨都是“童话”，老舍在新加坡暂居的半年也难以让他做到比肩郁达夫、王任叔等常年驻守南洋的文学家对东南亚民族文化的书写深度，甚至“南洋”在老舍一生的书写中占比甚低，但这部以“南洋”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却折射出许多非常有意思的族群议题。在后世的研究、论争中，各学科学者突破其原有的“儿童文学”、“纪实文学”的地位，从其“细枝末节”中探寻老舍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相关话题——“南洋想象”与“民族形象”，可见《小坡的生日》之文本魅力。而笔者则通过结合不同族群相关的研究与基本史实，逐一分析其“形象”与“阶层”背后的历史背景，从而思考中国南洋主题文学中“文”与“史”之间的关系。

（一）以“文”促“史”：作为历史研究启蒙者的文学工作者

老舍本人并没有直接成为“历史学家”这一角色，但与他同为文学工作者的王任叔（巴人）却通过长年累月对马来群岛相关史料的阅读，结合在当地进行“参与式观察”（田野）的经历，为后世中文东南亚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经典著作——《印度尼西亚之歌》、《印尼散记》、《五祖庙》、《印度尼西亚革命观感》、《印尼社会发展概观》、《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和《印度尼西亚近代史》[22](P 52-56)，其中王任叔生前未出版的《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由周南京在 1995 年重新整理并出版。

如果是中文视野下的印度尼西亚研究，学术界通常会关注王任叔与萨努西·巴尼（Sanusi Pane）笔下的“印度尼西亚史”，而萨努西·巴尼的知名身份是印尼左翼文学家。在职业研究东南亚历史的群体形成之前，“打破殖民霸权话语”成为东南亚各族文化人面对的首要任务。王任叔为常年驻守印尼的华人，而萨努西·巴尼为印尼人，两人都有多年联合印尼各族人民与荷兰殖民者、日本入侵者等反动势力斗争的经历，因此对于当地历史的重视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在史料相对匮乏（一方面是殖民者的有意破坏，另一方面是本地史料缺乏的客观因素）的大前提下，“文学”记载虽未必“真实”，在比对与考证过程中其背后的“主观性”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社会背景有一定的挑战，但如果能从“只言片语”中发现与时代相吻合的资料，从而进一步完善相关叙事，也不失为促进历史研究、改进对“人物思想”认知的一种举措。

（二）以“史”证“文”：史料比对、考据过程中的文学思考

对于《小坡的生日》进行相关的东南亚“民族”研究，不仅仅要关注具体的“中文写作”视野下的“南洋民族社群”，同时，在逐一解读其对应族群背后展现的文化符号（例如衣着、职业）的过程中，也要思考文学书写背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就是属于这些定居新加坡不同民族的“经济基础”，而他们在老舍笔下的“形象”则属于中文视野下的“上层建筑”——老舍让读者能比较表面地认知到新加坡不仅仅有华人移民和英国殖民者，同时也有印度裔、马来人和阿拉伯人这些具有多元文化的族群。

（三）文学书写中的“多元包容”认知

王润华曾在评述《小坡的生日》的文尾对老舍的“预言”给予正面评述：“老舍虽然在新加坡的中学和街边观察了只有半年，他却看出很多小孩像小坡，会成长成为新加坡多元种族国家的好领袖。”[6](P 48-49)新加

坡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众多，在其独立前后，本地从官绅到市民都极其重视“族群和谐”，将其视为“新加坡”共同体的一个基础。

新加坡南亚裔穆斯林曾建设带有“苏非主义”（Sufism）色彩的“纳格尔圣陵”（Nagore，词源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一个小镇），这个公共空间不仅仅容纳穆斯林进行“圣纪”等宗教活动，同时也接纳大量信仰印度教、华人民间信仰的印度人和华人移民。在 1857 年某次大型庆祝活动中，华工与印度劳工甚至联手与英国殖民警察发生冲突，抗议殖民者的不仁管控[23](P 101-103)。由此可见，新加坡不同民族很早就已经开始追求“求同存异”的多元包容社会形态。这种追求虽然常常会面对各种各样现实问题的困扰，但却是相关学者贯通“文”与“史”过程中更到位思考东南亚社会“多种颜色”的必经之路。

在实践相关中国南洋主题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需立足“历史”，把“文学”与对应的时代背景、民族社群、社会风貌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对“多元包容”予以更为准确的认知。哪怕是寥寥数字的“只言片语”，研究者和读者也都要对此重视起来，因为这些容易被忽略的文字片段很可能才是文学萌生的根基与土壤。立足历史、关注社会，从人民的角度完善东南亚研究，是未来文史各领域研究者必须夯实的“基本功”。

参考文献：

[1] 小坡的生日出版[N].时事新报,1934-6-11.

[2] 朴园.书报评介：小坡的生日[N].清华周刊,1935(7/8).

[3] 郑家瑗.读《小坡的生日》[N].申报,1946-7-4.

[4] 张宗顺.浅谈《小坡的生日》的儿童情趣[J].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1985(1).

[5] 曾广灿.老舍研究在日本和南洋[J].社会科学战线,1996(6).

[6]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7] （英）齐亚乌丁·萨达尔著.东方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马雪峰 苏敏译,2005.

[8] 朱崇科.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以《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9] 罗克凌.后殖民误读：老舍《小坡的生日》新释[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10] 汪鲸.适彼叻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11] 老舍.小坡的生日（1-6）[N].小说月报,1931(22-1).

[12]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13]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下）[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14] Vineeta Sinha.Unpacking the Labels “Hindu” and “Hinduism” in Singapore[J].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1997(25-2).

[15] 老舍.小坡的生日（7-10）[N].小说月报,1931(22-2).

[16] John Miksic.Singapore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1300–1800[M].Singapore: NUS Press,2013.

[17] （英）理查德·温斯泰德.马来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姚梓良译,1974.年 9 月，第 399 页。

[18] 老舍.小坡的生日（11-14）[N].小说月报,1931(22-3).

[19] 老舍.小坡的生日[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7.

[20] 马欢著.冯承钧校.瀛涯胜览校注[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 1 月，第 64 页。

[21] （马来亚）阿都拉·蒙西.阿都拉传[M].吉隆坡:热带出版社,1998.年 7 月，第 3~4 页。

[22] 周南京.关于巴人的印尼历史著作[J].东南亚纵横,1991(2).

[23] （印度）苏尼尔·阿姆瑞斯.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

“Bringing Out the Various Colors of the Nanyang”

——Looking at Singapore Multiethnic Society from Lao She's *Xiaopo De Shengri*

Liu Zilin (Shaoguan University, China)

Xu Mingyue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China)

Luo Honghai (Shaoguan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As Lao She's Southeast Asian theme novel, *Xiaopo de shengri* (Xiao Po's Birthday)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public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ethnic" theme in *Xiaopo de shengri*. *Xiaopo de shengri* involves four ethnic groups: Chinese, Indian, Malay, and "A La Bo" (阿剌伯, Arabian people), reflecting the multi-ethnic community landscape of modern Singapore. This article combines research and basic historical facts related to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Keywords: Lao She; *Xiaopo de shengri*; Singapore; Multiethnic society; Chinese literature

第 1 卷第 1 期
202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02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18

子宫的谎言：回归母体的《弃儿汤姆·琼斯史》

钱亮帆[1] 刘立翔[1] 赵文浩[1]

（[1]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弃儿与弃儿叙事作为一个重要书写内容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古代与近代的文学作品中，《弃儿汤姆·琼斯史》则集中表现了这一主题。一方面，“弃儿”的身份成为“追寻”的前提，并由此展开汤姆·琼斯的游荡，具有叙事层面的延展力量；另一方面，母体本身所发生的抛弃事件又与其隐藏的凝视性质的关心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汤姆·琼斯的精神荒原提供一个方向标。《弃儿汤姆·琼斯史》不仅呈现出个体“弃儿”的人生际遇，更以“史”的概念贯穿起人类的“被抛”与“被抛弃”的事实和“追寻”的动作。无疑，“弃儿”是充斥着原型意义的他者符号，尤其是对于现代文学来说，角色身份经历了从“弃儿”到“孤儿”的流变，正也以此窥见现代文学中的去伦理化的现象，达到“回归母体”的有机书写。

关键词： 弃儿；《弃儿汤姆·琼斯史》；母亲；子宫

《弃儿汤姆·琼斯史》[1]是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的代表作，首次出版于 1749 年。小说讲述了弃婴汤姆·琼斯被善良的乡绅奥尔华绥收养后，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磨难与误解。他被合法继承人布立非诬陷，被赶出家门，途中历经艰险，最终在真相大白后与爱人索菲亚团聚，并继承了财产。这部作品通过汤姆的经历，展现了 18 世纪英国社会的全貌，揭示了人性的善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

在《弃儿汤姆·琼斯史》中，汤姆·琼斯的生母是奥尔华绥的妹妹白丽洁。白丽洁与一个教士的儿子发生了私情，生下了汤姆。为了掩盖这一秘密，白丽洁将汤姆遗弃在奥尔华绥的床上。奥尔华绥发现汤姆后，决定收养他，并为白丽洁提供了一笔钱，让她远走他乡重新开始生活。后来，奥尔华绥的管家婆和家庭教师误以为汤姆的生母是村中的女仆詹妮·琼斯，而詹妮为了掩盖真相，接受了白丽洁的贿赂，承认汤姆是自己的孩子。直到小说的结尾，真相才大白：瓦脱夫人〔即詹妮·琼斯〕向奥尔华绥揭露了汤姆的真实身份，说明汤姆是白丽洁的私生子。

“弃儿”形象在世界文学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早期人类文学书写中。而“弃儿”的生成必然离不开两个行动角色，一个便是具有“抛弃孩子”和“生育孩子”的“母亲”，另一个便是“被抛弃者”，即“弃儿”。而在《弃儿汤姆·琼斯史》中则有机地将二者粘合在了一起。

一、弃儿与弃儿叙事

弃儿，顾名思义，即被抛弃的孩子。《说文解字》里解释道：“弃，捐也。从廾推 棄之，从 。 ，逆子也。弃，古文棄。 ，籀文棄。”[2]即表示双手推着箕筐 将婴孩丢在有人过往的地方。而弃儿的现代英语是：”foundling”，来源于英国弃儿文学的写作。

[作者简介]钱亮帆（2003- ），男，四川广安人，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刘立翔（2002- ），男，山东日照人，云南大学社会学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化与家庭社会学；赵文浩（2002- ），男，河北石家庄人，云南大学社会工作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个人成长。本文三位作者不分先后，为共同第一作者。

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重点。首先，“弃儿”的身份生成包含了两个直接行动者，一个是“抛弃者”，二个是“被抛弃者”，甚至还有第三个隐含的期待行动者，即“发现者”。这三者构成了“弃儿”的伦理书写，往往“抛弃者”负责了“被抛弃者”的生，但是未育；“发现者”负责了“被抛弃者”的育，但是未生；这种将生育义务一分为二的手法实则是将“母亲”的身份给一分为二，故而才能生成“弃儿”这样的形象。其次，“被抛弃者”大多情况下是没有意识的，即由于年龄的太小及未实现社会化而使得意识的非自主化，故而才能称得上是“儿”。当然，《红楼梦》中无才补天的顽石也能算是“弃儿”，因为其没有经历过“社会化”，心智与社会属性上仍旧是属于“儿”。而那种成人被社会、被时代所抛弃的情况则并不属于“弃儿”的范畴，因为其在被抛弃时已经拥有了主观能动性。

根据以上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诸多文学都涉及到有关弃儿的书写。古希腊神话中，宙斯、赫拉克勒斯、赫淮斯托斯等都是出生即被抛弃[3]；《圣经》中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仍旧带有蒙昧色彩与非自主意识，也能算得上是弃儿；《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吉尔伽美什、萨尔贡都是弃婴；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迦尔纳、《罗摩衍那》的悉多都是弃婴出世；甚至有古波斯的居鲁士、古埃及的奥利西斯、大不列颠的亚瑟王、日本的水蛭子等等。在中国文学中，周朝的始祖便是名“弃”，又被称作“后稷”。《天问》、《列子》、《吕氏春秋·本味》等书记载的“生乎空桑”的伊尹其实也是个弃子。[4]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实际上也是弃儿，《蒙古秘史》中的铁木真、《搜神记》中的朝鲜族朱蒙都是弃儿[5]。中国小说中的弃儿更是家喻户晓，《西游记》里的唐僧、《宝莲灯》里的沉香、“三言二拍”里的许多孤儿.....但是上述弃儿，都是一种带有英雄性、史诗性的角色，在书写时仅仅只是依靠弃儿的身份给他们的事迹增添一种悲壮与崇高，并没有在“弃儿”的本质上作出解释与书写，这种解释与书写一直到达近代才得到重视。换言之，弃儿的叙事由以往的简单身份符号转变为了一种重要的伦理素材，而这种伦理素材的基点便是近代以来的接近市民标准的文学的产生。

所以“弃儿叙事”发生了一种由英雄到平凡、由神话史诗到日常生活的转向。在西方小说里，《小癞子》等流浪汉小说便开始关注到普通人被遗弃，到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中，这种目光更加聚焦到了伦理的书写上。“抛弃者”和“发现者”竟然奇迹般地合二为一，突出了“母亲”这一角色的伦理义务。到了狄更斯的小说中，《雾都孤儿》等不仅刻画了弃儿的生存的个体成长，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弃儿”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这种描写使得“弃儿”的成长历程更加丰满，也使得我们开始反思“弃儿”的普遍伦理意义：作为一个社会上的旁观者，我们有没有义务去承担“弃儿”的生育责任，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是“弃儿”的“母亲”？而进入现代，这种“弃儿”书写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去伦理化的倾向，去“母亲”伦理、去“社会”伦理，“弃儿”也转变成了“孤儿”。这背后折射的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伦理的喷发，“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生存与生命负责。在现代化的断裂的、非连续性的价值标准与伦理关系下，“孤儿”叙事突出了更多的问题。

简言之，弃儿是指被抛弃的孩子，弃儿叙事是指关于弃儿被抛弃到成长与社会化完成时的所有书写，在这个书写中，“母亲”作为一种隐藏的主体，通过“谎言”致使了弃儿的生成。

二、弃儿叙事的隐藏主体：母亲

“母亲”是“弃儿”生成的必要条件，没有母亲便没有孩子，没有母亲的动作便没有被抛弃的孩子。母亲也还是弃儿成长过程中必不可缺的角色，不过这个角色在弃儿的生命历程中被许多其他的角色代替，以致使“母亲”的身份实现了转换。如上所述，“抛弃者”与“发现者”通过分别承担“生”与“育”的义务，从而实现合二为一，即为“母亲”。

（一）母亲的身份转换

“母亲”在弃儿书写中是一个割裂的名词，往往会被割裂成“生产者”与“养育者”两种身份。“养育者”层面的“母亲”性别并非指代女性，而是能够使得弃儿成长的都属于“母亲”的范畴。《弃儿汤姆·琼斯史》中的白丽洁·奥尔华绥，也就是汤姆·琼斯的真正意义上的母亲，在汤姆出生时便假装为其他的孩子抛弃给她的哥哥奥尔华绥先生，可以说是尽到了“生产者”的义务。后续相比于她自己，其实她的哥哥

奥尔华绥先生更能够作为“养育者”来履行义务。白丽洁小姐在书中几乎没有展现出作为汤姆母亲的一面，但是其能够在一些细节上散发出母爱的光辉。白丽洁尽管默默地关注着汤姆的成长，但是作为一个自私的人，尤其是自私的母亲，这种关注并没有被汤姆所察觉，自然也就构不成所谓爱的沟通，汤姆也没有接受这种“养育”背后承载的爱。

而《弃儿汤姆·琼斯史》中还不得不提汤姆拥有的名义上的“母亲”，即那个所谓“抛弃儿子”和“与人有奸情”的农妇：珍妮·琼斯，这个女子好似被当成了一只替罪羊。有趣的是，在原文中白丽洁与乡绅哥哥猜测着：“孩子的母亲准是‘珍妮·琼斯’”。这里的实际母亲竟然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慌乱、惊讶或者不安。

实际上，作为一个“抛弃者”，其内心压力最大的时候反而是在“抛弃”这个动作本身上。可以说抛弃这个行为无异于从一个刚生产不久的生命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流放生命的刽子手。这是第一重的共时性意义上的身份转换，它标志着抛弃者已经丢失了“母亲”这样的身份称谓；第二重的转变便是在孩子的生长过程中能够满足孩子生理需求及塑造孩子人格的人，才能称之为母亲。在汤姆的成长过程中，“母亲”这个词并没有落到哪个具体人身上，可以说汤姆的成长经历是缺乏母爱的，这样的社会化注定是不会完全的。白丽洁小姐不愿意承担母亲的责任，无论是出于自私还是出于环境形式，总之，没有“母亲”身份的“母亲”以无声的谎言欺骗着汤姆。其实不只是汤姆，许多弃儿实际上在后续的成长与社会化的过程中是没有母爱陪伴的。弃儿在成长中的母亲存在方式无外乎三种：其一是母亲的缺失，根本不存在母亲，例如流浪汉小说；其二是母亲并不能承担责任，比如恶毒的后妈，也比如好心干坏事的继母，例如灰姑娘式的童话故事；其三是母亲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母亲，承担了作为母亲的职能。而汤姆所面对的是“无名无实”的母亲，是属于第一类的。

值得一提的是，汤姆在小说的前一部分受到的是奥尔华绥先生的教导，但是这种教导只能说是父亲类型的教导，汤姆是缺乏母爱的。故而在小说的二三部分，汤姆如同流浪汉一般浪迹在农村和城市时，所遇见的女子反而给以他一定的“母爱”式的关怀，这也是为什么汤姆在深爱苏菲亚的同时还和三个淫荡不堪的女子苟合在一起。

总而言之，“母亲”这个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孩子”与她形成对照，可以说母亲与孩子是“他者之他者”的关系。当母亲抛弃孩子时，她就丢失了作为生命代言者的伦理意蕴；当母亲不愿承担孩子成长责任时，她就丢失了作为母亲的伦理根基。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近代弃儿与古代弃儿很大程度上的不同，古代所批评的目光聚焦在母亲之“生”上，而近代所批评的目光则聚焦在母亲之“养”上。

（二）母亲“抛弃”的动作意蕴

母亲的“抛弃”动作是一个意蕴深刻的动作，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两个相对应的场景：一是抛弃的场面；二是发现的场面。有趣的是，发现的场面大多情况下都描写得细致，发现的人大多数也是善良的人、好心的人，例如《俄狄浦斯王》中的牧羊人、《西游记》里的法明和尚等，他们都是有社会良知和社会意识的“好人”，尽管他们并不能承担“母亲”的伦理身份。貌似越这样描绘发现者是好人，越能反衬出抛弃者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事实大多时候都是相反的。抛弃的场面会有两种情况，一种也是描绘得非常细致，另一种则是运用白描手法，留下很广阔的想象空间。而抛弃孩子的母亲并非是十恶不做的坏人，大多数是有难言之隐的女子，有着相似的动机。而抛弃的这个动作，无论是在白描的刻画中，还是细致的描写中，都具备一定的相同。故而我们可以从母亲抛弃孩子的动机、行动元与行动模式来肢解她们抛弃行为的深层意义。

1. 动机

“动机是指引起、维持、推动个体活动以达到一定目标的内部动力。”[6]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及活动方向都是由一定动机驱使的，“抛弃行为”也不例外。为何强调抛弃者并非纯粹的坏人，在很多时候她们展现出的是复杂的人性，原因在于抛弃动机的前置条件，即有孩子能够给母亲抛弃。如果说真的对孩子感到反感，大多数母亲会选择打胎，但是抛弃者却选择了生下他们，再将他们抛弃。或许在古代的抛弃行为书写中并没有这层意蕴，但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近代和现代的书写可以说是对这方面的把控极为精妙。我们可以据此得出一个结论，即孩子本身并不是母亲想要抛弃的动机，也不足以引起母亲本人的反感。

故而，母亲要抛弃孩子的动机便来源于以下条件。

第一，母亲本人是自私的，自我性战胜了母性。代表人物就是白丽洁。试想一下，哪怕其在汤姆成长过程中承认自己是他的母亲，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袒露自己的身份，好像对其本身也没有太多严重的影响。但是她害怕于自己的身份不容许做出这种事情，也害怕自己受到社会压力的谴责。这里的白丽洁是自我但不是母亲，一定意义上来说白丽洁实现了自我意义的启发，但是却逃离了伦理规范的义务。这也是她在抛弃动作时的主要动机，这种动机影响深远，影响到了她在汤姆成长中的表现。

第二，社会道德具有极高的谴责性。有时抛弃一个孩子能够躲避社会道德的谴责，这种谴责来源是广泛的，有来自宗教的，也有来自民俗的。试想一下，《红字》中海斯特·白兰若是能够抛弃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供出孩子的父亲，她的社会生活将会变得相对轻松，但是她用顽强的毅力将耻辱转换为了荣耀。但并不是每个母亲都有着这样的毅力，何况有的社会谴责比《红字》还要严重得许多。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网络暴力也正是一种社会谴责，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第三，生存条件堪忧。托尔斯泰在《穷人》中把桑娜夫妇是否收养已故的邻居的孩子的纠结心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很多时候穷人或者说底层人民都面临着这种痛苦，孩子跟着自己是吃不饱的，生存条件已经堪忧。在讴歌母亲的作品中，常见的就是底层的母亲拉扯着孩子长大成人，如莫言《丰乳肥臀》、虹影《饥饿的女儿》等；但是也有将孩子送给别人或者丢弃到有人的地方的小说也屡见不鲜。

总之，母亲抛弃孩子的动机是多元的，但无外乎来源于这三种条件。有时母亲的抛弃行为并非深思熟虑的，而只是临时起意的，只是因为内心的悄悄的推动力。

2.行动元与行动模式

行动元是抛弃行为所必须的，因为抛弃作为一个事件，必然是需要能够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要素。将“母亲”与其形象意义抽离开来看，抛弃这个动作便成为其作为行动元的独特意义。在事件中，“弃儿”反而成为一种符号，与角色抽离开来的“弃儿”貌似与一件物品没什么不同。而在故事中的另一行动元，便是发现者，能够发现弃儿的要素。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者与养育者是同一角色，但也存在抽离的情况。而在发现者之后便是养育者，主要负责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生理补给与人格塑造。值得一提的是，养育者或许很多时候不止一个，是接连承接的许多人，例如《小癞子》中“我”连续跟随的几个雇主。于是，“抛弃者-发现者-养育者”就成为了整个弃儿叙事的一条行动元链条。这个链条的写作无疑是线性地写作，且是围绕弃儿的单线性写作，所以我们的叙述顺序可以从这个链条的任何一段开始，穿插进回忆等追叙手法。但故事总归来说是比较单一的，也是比较契合弃儿作为核心。

抛弃的行动模式是较为固定的，主要经历了：“抛弃者抛弃-发现者发现-养育者养育”这一个模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历程是历时性的线性叙事。而在每个具体动作下面，又有着不同的模式。抛弃者抛弃有静态抛弃与动态抛弃两种模式，静态抛弃是放在一个较为固定的地方，比如汤姆被放在奥尔华绥先生的床上；动态抛弃是将孩子放在某个动态移动的物品上，比如河水上的木板、道路上的马车，比如江流儿顺水而下。前一种的空间固定性使得抛弃者与弃儿的联系性依旧很强，后面既有可能出现复归的情况，后一种的空间流动性使得抛弃者与弃儿几乎断裂，后续很难出现复归情况。而养育者养育也有两种模式，一种即是单纯的养育，把孩子当作真正的儿童来养；另一种则是不纯粹的养育，带有目的性地培养孩子，例如《聊斋》里把孩子当场杂技表演的工具。这样的行动模式是归纳出来的较为普遍的模式。然而很多时候，这其中将会缺失一些，即“空白行动”，这种空白行动里虽然没有提及这一套行动链，但是能够勾起读者的召唤结构，从而引发想象。

简言之，我们可以归纳出一套关于抛弃的行动链条，这根行动链条无疑强调了“母亲”身份的断裂化。

（三）“母亲”的符号抽象化与再具象化

在抛弃的行动链条里，“母亲”的身份遭遇了一种符号式的抽象化。最为直观的便是养父母向弃儿提及生母时的描述，将孩子的生母作为一种抽象符号来看，貌似这个符号除了生出弃儿外便别无它用。在《弃儿汤姆·琼斯史》中，“母亲”成了一个有“罪”的符号，标榜正义的乡绅认定珍妮就是那个“母亲”，要判珍妮的罪。《小癞子》中，“母亲”成为了一个“虚无”的符号，从未出现过，这隐喻着“我”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从何而去的社会“尴尬”境地。《雾都孤儿》中，奥利弗·退斯特的母亲刚生下他就归

天了，“母亲”成为了一个“死亡”的符号，从而再也没有提及母亲，就像从来不敢提及死亡一般。“母亲”成为了一种符号，服务于作为“弃儿”的孩子。

当然，由于弃儿叙事的特殊性，在很多时候并不会提及他年幼时的生母，但是在其成长中的叙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有关生母的叙事，这种叙事使得“母亲”的形象再具体化了。如同汤姆一般，在故事的大结局，汤姆及奥尔华绥受到了白丽洁死前的遗书，这时，汤姆和奥尔华绥好像又想起了那样一个女子。当然，读者也不得不惊讶菲尔丁的笔法与构造，又翻到前面去看这个被我们漏掉的女性形象与诸多对汤姆的母爱细节。这时作为“母亲”的白丽洁形象一下就跃然纸上，可以说是具有圆形人物的气质，使得我们对于她的印象完全改观，使得对于这个人物的思考更加深刻，作者在这里仅仅只是用了一封信和一个戏剧性的结尾。当然，白丽洁的形象再具体化远不止于此，更加重要的是汤姆对于她的认同，尽管白丽洁已经死去了，但是汤姆对她的承认完成了回归母体的结局，也戳破了“抛弃”这一谎言，回归到了子宫的真相呼唤去。

三、“抛弃”——子宫的多重谎言

在弃儿文学中，“抛弃”实质上是一个谎言，一个专属于母亲的谎言：“妈妈不爱你”的谎言。这种谎言的基础来源于子宫，因为弃儿产生于子宫，故而我们可以说“妈妈不爱你”实质上是来自子宫的一个多重谎言，如果母亲真的不爱孩子的话，何来把孩子生下来，赋予孩子生命呢？从前所述，“母亲”作为一个复杂的身份，她的谎言反而是将真相“妈妈很爱你”包裹着，体现着回归母体的主旨。“子宫”所承载的谎言便是现实谎言、伦理谎言、死亡谎言三重谎言。

（一）现实谎言

现实谎言即基于现实的谎言。正如前所述母亲抛弃孩子的动机有三：本人自私性、社会道德谴责与生存条件堪忧。而基于现实的谎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三个动机。正因为现实是迫连于现实。如果母亲不做出这样的谎言，她可能活不下去，她的孩子也可能活不下去。这种现实谎言是最基础的，也是最为痛苦的谎言。在母亲心中，她的良心会因为抛弃孩子这件事而被反复摧残，她的生活也并没有因为抛弃了孩子而变得更好，一定程度上甚至能看见作为母亲，她是十分后悔的。这句谎言实际上翻译过来的真相其实是：“妈妈很爱你，是因为活不下去，所以妈妈不爱你”。这里的谎言所对的行为便是：母亲很想养育孩子，但是因为生存不下去，所以抛弃了孩子。

（二）伦理谎言

伦理谎言是挣脱了母亲身份的谎言，或者说是母亲身份破碎后不得不圆谎的行为。首先，抛弃者还没有做好从女孩到母亲的身份的转变，这样的伦理冲击使得她不堪忍受。这样的身份几乎可以算是巨大的，在关于女性的古代文学的书写中，常常出现的便是少女、少妇、老婆婆三种形象，然而很多时候被我们忽视的，这三者其实是一个人。通过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方法[7]，我们能够挖掘出许多作者无意识的文本之外的话语。而母亲的伦理转变就是文本之外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少妇年轻的时候或者年老时候的状况，尽管可以想象其面容，但是很难想象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风貌。这种转变对于角色本人来说可以算是心情的激荡。其次，抛弃者还没有做好承担社会伦理与社会道德的义务。抛弃者在此之前大多情况行使的是作为人的权利、作为女性的权利、作为女儿的权利，但是在这样的角色转变之中，抛弃者一下多了许多的义务，这些义务并非短短十个月的时间能够消化完的。这也正是现代许多孕妇产前抑郁的重要原因。这句谎言翻译为真话其实是：“妈妈很爱你，但是妈妈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妈妈不爱你。”值得一提的是，白丽洁小姐后来其实是准备好了的，她生下了汤姆同母异父的兄弟布立非，但是她出于对谎言的愧疚与后怕，以及出于现实的考量，还有自己的主体自私性，并没有站出来承认，反而是与哥哥一起栽赃于别人。这也体现出作为母亲的复杂性。

（三）死亡谎言

死亡谎言是一个哲理性的谎言。在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不需要劳动，只用休息和玩耍，就是子宫，每个人都经历过。子宫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又是一个温暖的怀抱。在这里没有所谓的社会、自然与人，有

的只是沉眠与无意识的清醒。实际上，这样的地方和死亡的归宿——“坟墓”极其相似。坟墓也是封闭的空间，也是没有光亮，唯一不同的可能是坟墓的温度会忽冷忽热。人躺在坟墓里面，也无关社会、自然与人，也是只有沉眠和无意识。从此而言，子宫实际上与坟墓等同，都是某个混沌的质点。而两者的不同则是，究竟是从里到外，还是从外到里换句话说，是被赋予生命，还是被夺走生命。生命其实是从子宫到坟墓的这段距离。第一个把我们从子宫里拉出来的人，是母亲，所以貌似母亲的形象与生命的形象高度吻合。如果母亲并不想赋予你生命，又何必将你从子宫里拉出来呢？这也是一个谎言，一个有关死亡的谎言。假如弃儿未从子宫出世，那他也必然无法走进坟墓，“未知生，焉知死”。而事实上，母亲赋予孩子生命，不仅仅是给了他们生，更教给了他们走向死亡的路：沿着生命的道路走到尽头，便是死亡。子宫说不爱孩子的谎言无疑是虚伪的，正因为其爱着孩子，所以给了孩子生命，更为他们指点了怎样前往死亡，而处于生命与死亡中间的，便是子宫真正想告诉孩子的。看似把孩子抛弃是一个惨痛的谎言，实则在这层谎言之下已经饱含了对孩子的深情的真相。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母亲仍旧是爱着孩子的。

简言之，谎言作为一个残酷的话语，在子宫的表达中却隐藏着真相。谎言是“妈妈不爱你，所以抛弃了你。”，但是真相却是“妈妈很爱你，但是由于现实、伦理、人性等等，妈妈抛弃了你。”二者之间的根本立足点是不同的。在所有的弃儿文学的书写中，对“爱不爱”这样一个情感表达一直是处于高度关注的。透露在弃儿成长过程中，也透露在作者的笔下，无意识地表达了回归母体的爱。

四、“回归母体”——应答子宫的真相呼唤

上述内容提到，子宫是带有真相的，真相实际上就是母爱。弃儿书写中的母亲并非是完全的非人性化的，反而是带有对孩子的爱。白丽洁小姐假如不爱汤姆，便不会写下那封遗书，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谁也不会知晓。而最后汤姆也回归了奥尔华绥的大家庭中，实际上这是汤姆的“回归母体”的行动，这种行动是基于汤姆了解了母亲的真相，即母爱，对着母爱的真相呼唤的应答。

在文学书写中，这样的应答基于两个关于弃儿的重要的条件。从个体角度来说，弃儿应当实现了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从宏观角度来说，弃儿最后脱去了“弃”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从而肩负起了作为人的繁衍的责任：生育。

（一）人的存在与发展

弃儿应答母爱，实际上是弃儿原谅母亲的“抛弃”行为，原本弃儿可以享受到母亲的正常的关怀，如同每个正常孩子一般，但是他却走上了另一条艰涩的道路。汤姆历经了许多劫难，对汤姆来说，这部“历史”书写的曲折便是他自己身上的折磨。在苦难的经历以及道路的成长中，汤姆逐渐从一个血气方刚、没有边际感的小伙，变成了一个较为稳重、成熟的青年。这个转变是巨大的，在社会学上被称之为“社会化”。“社会化的初级场所是家庭”[8]，而作为弃儿，他的家庭社会化是缺憾的，这也影响到了他的性格，年轻时候他就为别人着想。为猎户、为农户着想，能够对别人着想的人实际上在自己内心反复琢磨自己好多次。这也是母亲缺席对他造成的人格意义上的影响。直到汤姆·琼斯历经艰险，他才变成了大人的样子，才知道不能随便玩弄别人的感情，也不能随意的意气用事，他在最终实现了社会化。从一个“弃儿”转变成了一个“人”。实现了人的存在与发展，达成了马斯洛心理需求最高层：自我实现。这时他明白了作为人的意义，他理解了母亲那种谎言下多面为难的境地，进而理解到母爱的真相，故而实现了母体的回归。

（二）生育的责任：繁衍的基本路径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说，神话传说中许多“弃儿”形象的出现可能意味着人类早期的确存在许多“弃儿”。但是这些“弃儿”最终都能够名震一方，成为英雄，这说明人类对于继承有着向来的期盼。“弃儿”本身是一种反繁衍的行为，只管生不管养，也达不成繁衍生息的效果。而弃儿在小说中往往都能活得成功，甚至活成英雄，哪怕是小癞子最后也能活得快乐。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对“弃儿”这种反繁衍的推翻，是对人类繁衍的一种肯定。汤姆最后成长为了“人”，在无意识中接受了作为人的责任，他不再灯红酒绿，而是和苏菲亚一起生活，承担生育的责任。而这种人类繁衍的路径，生育，在代际传承中贯穿了母爱的主

体。这里的母爱已经跳出了母亲对于孩子的爱，而是作为一种人类的普世情感而广泛存在。汤姆的行为在无意识中体现出了“弃儿”群体在宏观意义上的对母体的回归。列维纳斯曾在《时间与他者》中讨论这一话题，从父子关系延申到人类的繁衍性[9]；与此同时，母子关系的割断则从另一个方向推动着人类走向一个更复杂的单子化社会，正如《尤利西斯》里不断落实着本雅明“游荡性”的那对精神父子，“呈现给斯蒂芬和布鲁姆的是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甚至人类本身也处于‘解体’状态。”[10]

值得一提的是，不是每一个弃儿文学书写都带有回归母体的情节。但是每个“弃儿”都有回归母体的潜在倾向。

五、从“弃儿”到“孤儿”：现代文学的去伦理化

“弃儿”这个词和身份在现代化日益精进的今天，好似已经不再怎么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孤儿”书写的兴起。“弃儿”相比于“孤儿”，明显地更强调抛弃行为，也更强调抛弃中的各个主体：母亲、弃儿、养育者等，也有一道明显的行动链条。但是在“孤儿”中，便将其中的各个主体淡化，也没有一套固定的行动链条。《雾都孤儿》直接干脆地让奥利弗的母亲早早地退场，没有进行过多的描绘。这种倾向实际上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去伦理化”的倾向。“孤儿”在慢慢地否定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在否定人天生的先验的社会支持网络，这种否定是对伦理的冲击。J·M·库切的“耶稣三部曲”直接使孩子无父无母，也抛弃养父母自己跑到孤儿院去生活，这样冷峻的笔法使得我们为之心惊肉跳：现代伦理已经稀碎到这种程度了？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甚至摆脱了“孤儿”的特质，把“有罪的父亲”玩弄于股掌之间。

然而实际上，“弃儿”依旧是存在的，甚至在现实生活中是广泛存在。但是由于现代文学的转向，使得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了“孤儿”身上。“弃儿”根据上述本义，就是被母亲所抛弃的孩子。这种抛弃在古代是物理意义上的抛弃，然而到了现代，成为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抛弃。离婚的母亲拖着行李箱走出家门的这一场景可以说在许多单亲家庭都有出现，尽管拖着行李箱出门的也可能是父亲，但是无论如何，弃儿是已经生成了。有时值得感叹的是，单亲家庭或重组家庭下，孩子的生活状况说不定比汤姆流落时更糟。在这个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危机愈发严重，福柯层感叹于词语与世界的断裂和非连续[11]，萨义德也感叹于人文主义在这个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2]。但是这种精神的断裂，受伤的不应该、也不能是孩子，这是对人类繁衍的一次严峻的挑战。假如“生育”这种责任都不能做好，那么又何谈人类的延续呢，“生育”中重点的是“育”，就像弃儿文学中重要的是“弃儿的成长”。假如剥离了“养育”与家庭社会化的责任，那么孩子是真的成为了精神意义上的“孤儿”，这远远比“弃儿”可怕。

再者，“弃儿”的书写，如前所述，大多最终都会走向成功。这说明大家是在期盼于人的成长、人的发展、人的延续的。但是如今“孤儿”的书写，以问题小说的视角来看，那就是痛心疾首，“孤儿”的问题比“弃儿”严重得多，可怜得多，结局也惨得多。悲观的意识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渗透进了我们的写作观与阅读观中，可悲的是，我们还深陷在精神危机里无法自拔。

结语

“弃儿”这一行为看似冷酷，但其实里面饱含深情。“弃儿文学”也为我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文学体验。“弃儿”所蕴含的人类学意义深厚，代表着人类的繁衍与延续。“弃儿”所蕴含的情感沉重，母爱的真相被其书写出来。《弃儿汤姆·琼斯史》是一部意义重大的“弃儿文学”，也是一部关于弃儿成长的“历史”，艺术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现代生活中，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弃儿”，也要更多地去关注母爱、关注母亲。

[参考文献]

[1] 〔英〕亨利·菲尔丁. 弃儿汤姆·琼斯史[M]. 张谷若，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2]〔汉〕许慎著；汤可敬注.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2023.

[3] 〔德〕施瓦布著. 古希腊神话[M]. 周金元,译.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
[4] 饶道庆. 《红楼梦》的“怨弃”情绪与“被弃”原型[J]. 文艺研究，2003(02)：74 - 82.
[5] 萧兵. 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6] 周晓虹主编. 社会心理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7] 张一兵著. 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
[8] 郑杭生主编.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9] 〔法〕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时间与他者[M]. 王嘉军，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0] Ziyang Feng, Liangfan Qian. Modernity Entanglement:Presence of Space, Wanderers, Marginality in Ulysses [J].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25（01）：185-200.
[11] 〔法〕米歇尔·福柯著. 词与物 人文科学的考古学[M].莫伟民，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12] 〔美〕萨义德.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 朱生坚,译；胡桑,校.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The Lie of the Womb: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and the Return to the Maternal Body

Qian Liangfan, Liu Lixiang, Zhao Wenhao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heme of the abandoned child and the narrative of abandonment is a significant subject that is widely present i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ry works around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highlights this theme in particular. On one hand, the identity of being a "foundling" serves as the premise for "searching," which sets off Tom Jones's wanderings and provides a narrative exten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act of abandonment by the mother is combined with her hidden, gaze-like concern, thus offering a direction for Tom Jones's spiritual wilderness.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not only presents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an individual "foundling" but also connects the human experiences of being "thrown" and "abandoned" with the act of "searching" through the concept of "history." Undoubtedly, the "foundling" is a symbolic figure filled with archetypal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in modern litera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s identity from "foundling" to "orphan" reflects the de-ethical phenomenon in modern literature and achieves an organic writing of "returning to the mother."

Keywords: Foundling,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Mother, Womb

第 1 卷 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24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香港适用的法律问题分析

赵彬希

（外交学院，北京市 西城区 100032）

摘要：2022 年 12 月 1 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CISG”）正式在中国香港生效。自此，中国内地与香港两个法域共同适用该公约，成为“一国两制”下国际贸易和法律区域协同的重要事件。然而，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历史与法律地位，其适用 CISG 的过程存在一些特殊和复杂的法律问题。本文从香港的宪制背景出发，分析 CISG 在香港适用的特殊法律问题，包括与内地法律体系的协调、CISG 与香港合同法的潜在冲突、司法解释与实践的挑战等。通过探讨香港放弃对 CISG 第 1 条第（1）款（b）项的保留、仲裁与诉讼中的适用差异等问题，本文提出解决路径，并展望未来香港在全球贸易法中的角色和 CISG 适用的进一步发展。通过深入的法律协调，香港不仅能提升其在全球贸易法律体系中的影响力，还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提供重要保障。

关键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适用；国际贸易

一、引言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在国家间贸易往来中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其统一性的立法规范 CISG 是国际贸易法的支柱。它不仅减少了各国因经济水平差异、法律传统有别、交易习俗不一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还对缔约国国内立法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1]CISG 成立至今四十余年间，已有 95 个国家加入成为缔约国。我国是最早加入 CISG 的国家之一，CISG 的理解与适用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其中包括 CISG 适用于中国香港的讨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作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一直在法律和实践层面与国际接轨。2022 年，我国中央政府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关于将 CISG 的领土适用范围延展至香港特区的声明，该问题的讨论随之过渡到“适用路径”的新维度。由于其“一国两制”的特殊宪制地位，CISG 在香港的适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面临一些独特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香港与中国内地法律体系的协调、香港在国际条约适用中的独立性，以及 CISG 条款与香港现行合同法之间的潜在冲突。本文从香港的宪制地位与法律体系出发，结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理论和实践，分析 CISG 在香港适用的特殊法律问题。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款、司法案例和国际实践的探讨，本文旨在揭示 CISG 在香港适用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以期为 CISG 在香港的适用提供参考。

二、CISG 在香港适用的宪制与法律背景

在分析 CISG 在香港适用的特殊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梳理其适用的宪制与法律背景。CISG 作为一份统一的国际货物销售法律文件，其在不同法域的适用不仅取决于条文的直接效力，也受到当地法律体系与政策环境的深刻影响。香港的特殊宪制地位使其在适用国际条约时面临独特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融合

作者简介：赵彬希（2002-8-18），女，湖南长沙人，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生。

[1] 李昇.《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内地与香港地区统一适用的可行路径[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2(05):33-37.DOI:10.13892/j.cnki.cn41-1093/i.2023.05.007.

内地经验与本地特点的可能性。因此，探讨 CISG 在香港适用的政策与实践基础，以及化解适用障碍的路径，成为理解其在香港成功延伸适用的关键所在。

（一）一国两制与香港的法治发展

在香港适用 CISG 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香港的特殊宪制地位使其与内地共享国家主权，同时保有高度自治权。这种体制既为香港延伸适用 CISG 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础，也促使香港能够在国际法适用上与内地保持一定程度的协同。回归前，由于香港受英国管治，其法律制度深受普通法传统影响。彼时，英国并未加入 CISG，香港对 CISG 的适用缺乏需求。自 1997 年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在维护高度自治的同时，也始终保持着与国际法律和贸易惯例的接轨。根据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不仅体现了对香港的高度尊重，还确保香港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与国际规则和制度的高度一致性。正是基于此背景，中央政府在 2022 年作出将 CISG 适用于香港的声明，进一步体现了“一国两制”政策下的法治协同与贸易发展需求。CISG 的适用为香港提供了一个有利于国际贸易法治化的环境，有助于提升香港作为全球金融和贸易中心的竞争力。而这种国际化法治环境的维持与增强，也符合中国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政策。通过延伸适用 CISG 至香港，香港的法律体系能够更好地与内地的经济互动和国际商事惯例对接，确保了香港的贸易法律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同时，也不会削弱其独立的司法和行政功能。

CISG 在香港适用的积极条件不仅体现在政策支持上，也源于内地和香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制度准备。内地法院在涉港案件中普遍采用 CISG 相关规则，为香港的实际适用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例如，内地法院通常依据国际私法规则，通过“意思自治”或“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如果合同选择了中国法作为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深受 CISG 影响的合同编就会成为主要适用依据。这种间接适用的方式既减轻了 CISG 在香港直接适用的法律冲突，也帮助法官和法律界人士熟悉 CISG 规则。香港在 CISG 适用的立法和推广工作中也进行了前期准备。自 2020 年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通过立法会正式推动《货物销售（联合国公约）条例》的制定，为 CISG 的正式适用铺平了道路。[2]与此同时，香港特别注重公众的法律认知，通过宣讲会、专题问答等多种形式宣传 CISG 的重要性。这种立法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减少了 CISG 与香港本地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也有效提升了 CISG 在香港商界的认可度和适用性。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基础工作都为 CISG 日后的正式生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中央政府声明的关键作用

CISG 在香港的适用之所以迟至 2022 年才正式生效，主要源于历史和法律上的障碍，这些障碍集中体现为各国对 CISG 第 93 条条款的不同解释。[3]根据 CISG 第 93 条，缔约国有权声明条约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其适用的属地。1986 年中国加入 CISG 时，香港尚未回归，自然不涉及其是否适用的问题。即使在 1997 年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仍未立即依据第 93 条作出声明，从而导致部分国家对香港是否适用 CISG 产生争议。在这一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法院对香港适用 CISG 的立场存在分歧。例如，法国最高法院认为中国已明确声明 CISG 不适用于香港；而美国阿肯色州法院则依据第 93 条第 4 款认为，中国政府因未作出正式声明，应视为默示同意 CISG 适用于香港。后者的观点显然缺乏对中国主权和意图的尊重。2022 年 5 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正式提交声明，将 CISG 适用范围延伸至香港。这一声明明确表明 CISG 适用于香港的法律障碍已被化解。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CISG 正式成为香港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对 CISG 的重视，也彰显了中央政府在解决国际法与属地法律关系中的主导作用。

综上所述，CISG 在香港的适用条件已基本成熟。从政策到实践的多方面准备，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声明和推动，为 CISG 在香港的延伸提供了坚实基础。在这一框架下，CISG 的适用不仅为香港国际贸易提供了更加统一和规范的法律环境，也为未来内地与香港在民商事法律领域的协同发展创造了新机遇。[4]

三、CISG 在香港适用的特殊法律问题

[2] 黄惠康.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中国涉外法治建设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纪念香港回归祖国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 25 周年[J]. 国际法研究, 2022, (04): 3-17.

[3] 包佳娜. CISG 在香港适用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J]. 法制博览, 2016, (19): 248.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J].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24, (03): 5-9.

自 2022 年 CISG 在香港正式生效以来，如何在香港这一特殊法域内实现公约的有效适用，成为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焦点。香港的法律体系、宪制背景及与内地的联系，都为 CISG 的适用带来了复杂性。特别是，香港现行法律与 CISG 的衔接问题、司法解释与实践的配合问题，以及 CISG 与香港合同法的潜在冲突，都是需要细致考量的法律问题。

（一）香港放弃对 CISG 第 1 条第（1）款（b）项保留的法律效果

CISG 第 1 条第（1）款（b）项规定了一个“间接适用”的机制，该机制涉及“缔约国在其国土上适用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情况”，而在某些情况下，缔约国可以选择放弃该项保留，直接适用 CISG 的条款，中国大陆在加入 CISG 时，选择了保留该条款，意味着该公约仅适用于中国大陆境外的贸易。[5]而香港放弃对 CISG 第 1 条第（1）款（b）项保留，其法律适用路径不同。

1. 国际贸易合同的三种法律适用场景

针对香港与 CISG 成员国的贸易，CISG 将成为香港与其他缔约国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适用法。这意味着，香港商人在与其他 CISG 国家的贸易中，不再需要依赖香港本地法的国际私法规则来确定适用法，而可以直接依据 CISG 的条款来解决合同争议。

对于香港与提出保留的缔约国的跨境贸易，放弃保留后，CISG 也会在香港与相关国家的货物销售合同中适用。保留国因在加入 CISG 时的保留，使得 CISG 并不自动适用于该国和香港之间的贸易合同。然而，香港放弃保留意味着，在两地跨境贸易中，CISG 将成为重要的法律框架，推动两地在货物销售合同领域的法律统一性。

对于香港与非 CISG 成员国的合同，CISG 并不适用，但香港在实际司法过程中，可能依然通过参考国际商事惯例或类似 CISG 的国际合同法规范，来处理案件。

2.香港与中国内地法律冲突的解决方式

随着香港放弃保留，第 1 条第（1）款（b）项的变化使得 CISG 在香港与内地的贸易中适用，但也带来了与中国内地法律体系的潜在冲突。中国内地在 CISG 加入时的保留仍然存在，这意味着 CISG 不会直接适用于内地与香港的跨境贸易，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法律体系的情况下。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可能会出现法律适用的冲突，特别是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合同法的适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合同可能同时涉及《民法典》和 CISG 的适用，在实践中，法院或仲裁机构可能需要平衡两个法域的法律适用问题。接着是违约责任和救济，内地合同法与 CISG 在违约责任、赔偿标准、合同解除等方面的规定存在差异。香港法院需要对这些差异进行协调，确保两地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并避免产生矛盾。

（二）CISG 对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货物销售合同的适用

因为 CISG 适用于缔约国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而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的“领土单位”而非独立的缔约国，因此该公约不适用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企业所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然而，尽管如此，合同各方仍可基于意思自治原则，自行选择 CISG 作为合同的适用法。[6]在此类情况下，法院也可依据当事人协议作出裁决。例如，在联中企业（资源）有限公司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尽管最高法院认定 CISG 不适用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合同，但也确认了当事人若达成一致同意适用 CISG，相关条款便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此观点后来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处理祥发环球贸易有限公司与青岛宝润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的国际买卖合同纠纷时采纳，法院认为，在庭审中当事方同意适用内地法律并表示不排除 CISG 的使用时，法院可同时依据内地法律与 CISG 对案件进行审理。

中国内地与香港分别采用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两地合同法规则存在差异。鉴于两地之间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迫切需要通过双边协议规范货物销售合同，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规则的可预见性。在香港针对 CISG 适用问题进行的公众咨询中，众多意见建议制定相应的双边安排，以适用 CISG 来处理两地间的合同。

[5] 郑贤凯,韩雪松.《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适用规则探究——基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适用规则分析[J].北方经贸,2023,(01):79-84.

[6] 张为国.中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形式的法律适用[J].中国经贸导刊,2010,(06):96-97.

（三）仲裁与诉讼程序中的适用差异

香港的法律适用不仅体现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也对仲裁程序产生影响。由于 CISG 的生效，香港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处理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争议时，将直接适用 CISG。然而，仲裁与诉讼程序中，CISG 的适用仍然会受到一些差异的影响。

香港是国际仲裁中心的重要基地，CISG 的适用使得香港的国际仲裁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在与 CISG 成员国进行仲裁时，仲裁机构可能会优先考虑 CISG 作为案件的适用法律。香港法院将直接适用 CISG 来审理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案件，尤其是在涉及 CISG 成员国的案件中。[7]然而，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法院需要对香港本地法律与 CISG 规则的协调性进行深入的法律分析，确保不会因适用规则的差异而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

四、CISG 在香港适用中的潜在冲突与解决路径

虽然 CISG 在香港的生效标志着香港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进展，但在实际适用中，CISG 与香港现行法律之间依然存在一些潜在的冲突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和法律体系的地区，其司法实践与合同法体系深受英美法传统的影响，CISG 作为一部国际性贸易公约，虽然在大多数条款上具有高度的国际通用性，但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如何避免或解决与本地法律的冲突，仍需通过精细的司法解释和理论研究进行协调。以下将从几个角度分析 CISG 在香港适用中可能出现的冲突，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一）CISG 与香港普通法体系的冲突

香港的法律体系自回归以来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其合同法深受英美法体系影响，尤其是在合同解释、违约责任、合同解除等方面。CISG 作为一部国际贸易公约，尽管在许多方面与香港现行的合同法有着相似的理念，如重视合同的自由与契约精神，但其某些具体条文与普通法体系的规则可能产生冲突。

例如，CISG 的第 74 条规定了违约方的赔偿责任，即“损失”应当包括违约导致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但香港普通法中的违约赔偿原则则更侧重于损失的实际发生和是否可预见。在香港的传统司法实践中，合同违约的赔偿通常遵循严格的因果关系与可预见性原则，而 CISG 则较为宽泛地允许违约方赔偿“间接损失”，这可能导致香港法院在实际裁判中面临较大的解释空间。

此外，CISG 的第 49 条关于解除合同的规定，也可能与香港《合同条例》中的解除条件有所不同。在香港法下，解除合同往往需要更为明确的违约证据，而 CISG 则允许在一些情况下，合同的一方可在合理期限内解除合同，这可能与香港传统的解除合同规定存在一定冲突。为了避免这种冲突，香港法院可能需要在实际案件中，通过对 CISG 条文的灵活解释来适应本地法律文化。

（二）CISG 的“适用范围”与香港的“特殊法律地位”

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其法律地位和宪制体制赋予其较高的司法独立性。尽管 CISG 在香港正式生效，但其适用范围的界定仍然面临特殊法律地位下的挑战。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对于国际条约的适用需要中央政府的授权或声明。因此，CISG 是否适用于香港，仍然是由中国政府通过正式声明和国际法的解释来决定的。[8]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香港在适用国际法时的机制与内地有所不同。香港的司法体系通常在解释国际条约时，采取更为独立的判断标准。因此，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平衡中央政府声明的立场与香港法院独立解释国际法的职能，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在处理涉及内地与香港的跨境贸易案件时，法院可能面临两个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此时，香港法院不仅需要尊重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还要确保其司法独立性和对本地法律传统的灵活适应。

（三）CISG 与香港《销售合同条例》的冲突与协调

香港《销售合同条例》与 CISG 在很多方面有类似的规定，尤其是关于买卖合同的基本原则、合同履行、违约责任等。然而，两者在某些细节上存在差异，尤其是在解释合同条款和违约责任时，香港《销售合同条例》往往侧重于契约自由和当事人意图，而 CISG 则强调国际贸易中的统一规则和公平交易。

[7] 刘瑛.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D]. 复旦大学, 2007.

[8] 黄佳宁. CISG 在香港适用的适用法律问题探讨[J]. 法制博览, 2016, (12): 167-168.

例如，CISG 第 8 条规定，在解读合同条款时，必须综合考虑当事人的意图、交易背景和商业惯例，而香港《销售合同条例》则更强调根据当事人明确表达的意图进行合同解释。这种差异意味着，香港法院在审理涉及 CISG 的案件时，可能会面临如何协调国际统一规则与本地法律习惯之间的挑战。为应对这一问题，香港法院可能需要通过详细的司法解释，明确 CISG 与香港现行法律体系的衔接方式。在处理跨境贸易纠纷时，法院应当优先适用 CISG 的原则，以确保在全球贸易框架下作出公正的裁决，同时也要注意香港市场的特殊法律背景，确保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适宜性。

（四）CISG 在香港适用中的司法实践与政策推动

为了有效解决 CISG 在香港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突，香港司法机关应加深对 CISG 相关规则的理解，尤其是在处理涉及国际贸易的案件时。香港法院可以通过逐步积累判例，推动司法实践中的统一解释，从而减少法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此外，香港政府也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明确 CISG 与本地法律的衔接。例如，在香港《货物销售（联合国公约）条例》生效后，政府可以定期评估该条例，并根据国际商业实践的变化及时进行修订。通过这种政策推动，不仅能确保香港在国际贸易法方面的现代化和统一性，还能为香港法律体系与国际法的衔接提供更加稳固的法律保障。

（五）CISG 适用路径的完善

随着 CISG 在香港的正式生效，如何进一步完善 CISG 在香港的适用路径，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其司法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在处理涉及 CISG 的案件时，香港应尽量减少与其他法域的法律冲突，并确保 CISG 能够在香港市场中发挥最大的法律效力。在此过程中，香港法院应继续推动司法解释与实践的同步发展，并加强与国际商事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同时，香港政府还可以通过定期开展法律教育与宣传，增强社会各界对 CISG 的认知，为 CISG 在香港的顺利适用奠定坚实的法律与社会基础。

五、结论

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香港正式加入 CISG 以来，这一举措标志着香港在国际贸易法领域的重要进展，并为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法律协调打下了坚实基础。CISG 的适用为香港与内地及其他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提供了更加统一和高效的法律框架，从而增强了法律的确定性和预见性，有效减少了因法律差异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展望未来，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作为全球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CISG 的进一步适用不仅有助于提升香港在全球贸易法律体系中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境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通过加强与内地及其他国际合作伙伴的双边或多边法律协作，香港有望减少法律冲突，提升贸易效率，并为企业创造更加透明与稳定的法律环境。此外，随着 CISG 适用路径的不断完善，香港将在全球法律协调与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李昇.《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内地与香港地区统一适用的可行路径[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2(05):33-37.
[2] 黄惠康.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中国涉外法治建设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纪念香港回归祖国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 25 周年[J].国际法研究,2022,(04):3-17.
[3] 包佳娜.CISG 在香港适用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J].法制博览,2016,(19):248.
[4] 郑贤凯,韩雪松.《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适用规则探究——基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适用规则分析[J].北方经贸,2023,(01):79-84.
[5] 张为国.中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形式的法律适用[J].中国经贸导刊,2010,(06):96-97.
[6] 刘瑛.《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D].复旦大学,2007.
[7] 黄佳宁.CISG 在香港适用的适用法律问题探讨[J].法制博览,2016,(12):167-168.
[8] 杨梦莎.CISG 优先适用法律模式探析——兼评我国国际商事条约适用立法及司法实践[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4):97-103.
[9]连俊雅.《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当事人协议选法竞合适用中的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J].法律适用,2023,(07):100-110.

An Analysis of Leg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in Hong Kong

Zhao Binxi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Abstract：On December 1, 2022,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officially entered into force in Hong Kong, China. Since then, both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have applied the Convention, marking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egal regimes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However, due to the unique historical and legal statu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ISG has raised several specific and complex legal issues. This paper begins by exploring the constitutional context of Hong Kong, analyzing the special legal challenges in applying the CISG in the region.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ordination with Mainland Chinese legal systems,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CISG and Hong Kong's contract law,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By examining issues such as Hong Kong's decision to withdraw its reservation under Article 1(1)(b) of the CISG, and the differences in application between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olutions and looks ahead to the future role of Hong Kong in global trade law, as well a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ISG application. Through deeper legal coordination, Hong Kong can not only enhance its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trade legal system but also provide crucial support for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trade rules.

Keywords:：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Application of Law；International Trade

第 1 卷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27

《情歌》中的疏离与迷惘：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诗意映像

冯子央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T.S.艾略特的《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通过对现代都市环境中个体爱情经验与意识流动的细腻书写，揭示了现代人精神异化的核心症候——破碎、迷惘与疏离。普鲁弗洛克不仅是一种个体心理肖像，更是现代主体困境的象征，其存在体验深受时间的异化、空间的陌生化及自我认知的断裂所塑造。诗歌中的三组关系构成理解其精神困境的核心框架，而现象学视角的引入进一步揭示这一意识结构的深层机制。通过对时间感知、主体认同与行动能力的多重危机的捕捉，艾略特诗学对现代性经验的批判性反思得以显现，为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裂变提供了一种富有诗意且富含哲思的文学表达。

关键词： T.S.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疏离；精神困境；时间意识

T.S. 艾略特（1888-1965）作为 20 世纪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其作品以高度实验性的语言实践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改写了诗歌的表达范式。在他的创作谱系中，初版于 1915 年的《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不仅是其文学道路的起点，也是现代主义诗歌新传统的开端。这部早期诗作以其语言的创新性和意识流动的独特表达，率先确立了艾略特文化交响式的美学风格和文本建构方法。《情歌》既是一部独立的艺术经典，也是艾略特后期创作中诸多主题的滥觞，为他后来的巅峰之作《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奠定了思想与形式的双重基础。艾略特曾在 1919 年的著名散文《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提出，伟大的诗人必须超越个人经验，将创作置于文化传统与“历史意识”的动态流动中，把握“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1]，打破传统与现时创作的线性区隔，将其融汇在一个共时性的文学平面上。《情歌》通过对但丁（前言《地狱篇》）、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典故）等经典文本的隐秘引用，以及对《圣经》、神话和日常都市生活的拼贴式整合，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化诗学，通过文学传统的回溯制造了一面“审视之镜”，在古典崇高和现代琐屑的差异比对下显现独特的诗性张力。诗中普鲁弗洛克的“犹疑”与“迷惘”不仅是个体的心理写照，更是古典时期以来的信仰体系和生存方式被解构后呈现出现代都市生活中孤独、异化、精神空虚等普遍症候。这种对“人”之精神裂变的描摹贯穿于艾略特的整个创作生涯，从早期的《情歌》到《荒原》，再到晚期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他的作品始终以一种哲学化的诗意结构回应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乃至存在危机。《情歌》不仅是艾略特文学道路的奠基之作，更是他探索现代诗歌语言与结构的试验田，它将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古典文化隐喻与哲学反思有机结合，构筑了一种极具历史感与文化密度的诗学体系，成为艾略特通向《荒原》和《四个四重奏》的“前奏乐章”。

一、“疏离”概念辨义与文本定位

（一）哲学溯源和概念辨义

作者简介：冯子央（2003-），浙江杭州人，云南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E-mail:zeiyungvon@gmail.com

[1] [英]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M]. 卞之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3

“疏离”与“异化”作为同源词，其词源滥觞于拉丁文 alienatio，最初表示某种物质财产关系的转让或迁移，这一物质层面的“外在性”在语言演变中逐渐引申出与主体性密切相关的精神意涵，指代主体向他者显现正向情感的非意愿性，以及主体精神状态的失范和断裂。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中，这一概念被重新审视与深化，并衍生出丰富的文化与思想意蕴。黑格尔提出“自我实体泛异化”的概念，强调自我意识如何在自身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产生对立与调和；费尔巴哈则将异化聚焦于宗教对人类精神的压迫，揭示信仰如何使人类在神圣性中迷失自我；马克思进一步延伸了“异化”的社会意义，他将其批判性地运用于资本主义劳动机制的分析中，认为劳动异化是现代社会中最根本的疏离形式，劳动者被迫生产的物质世界反过来掌控了人的生命活动。尽管在具体应用中，“疏离”与“异化”因背景与语境差异而呈现出一定的语义分化，但其核心旨归在本质上依然一致，即关注作为主体的“人”如何在外部世界的压迫或诱惑下经历精神的异化与失范。主体一旦被置于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中，其心理机制便开始显示出焦虑、扭曲乃至失序的状态，这种状态加剧了个体与环境之间的距离感，使人不得不承受“陌生”与“迷惘”作为存在负担。而这一存在状态的表现在现代性语境下尤为显著。随着大工业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传统观念的瓦解伴随着物质繁荣的诱惑、都市文明的扩张、商品拜物教的兴起，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在享受现代物质便捷的同时也面临潜在的危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技术霸权解构，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被工具化逻辑侵蚀，与自我之间的联结更因被资本逻辑和消费主义侵入而日渐稀薄，最关键的是，现代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不再完整与鲜活，而是变得破碎、迷离、陌生。这些变化塑造了现代人精神结构中的一种核心症候——对归属感的无尽追寻，以及对存在意义的焦灼探索。由此，“疏离”成为人类精神状态的显著特征，而其所带来的“迷惘”与“沉沦”则深刻影响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建构。

（二）文本解读的定位与锚点

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正是在现代性语境下，描绘了普鲁弗洛克因与他人的疏离、与世界的疏离、与时间的疏离而陷入迷惘的心灵图景。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对现代都市中主体的精神状态曾今进行了批判考察。他指出，“大城市的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表面和内心映像的连接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2]，都市生活中信息与感官刺激的过度充盈，使个体的精神承受能力达到极限，进而发展出“冷漠”（Blasé attitude）作为应对机制。这种冷漠并非完全的无感，而是一种精神防御策略，使个体在面临复杂环境时保持内在的稳定。然而，冷漠也导致了人与他者之间情感联结的削弱，以及对环境感知的表面化与机械化。齐美尔指出，“这种心理状态，或者说我们面对在短暂的接触中瞬息即逝的大城市生活特点所拥有的怀疑权利，迫使我们矜持起来。”[3]这种自我保护的冷漠态度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在诗中，普鲁弗洛克的内心无疑也受此心理机制影响，行动始终无法跨越自我设定的障碍，与他者的关系也始终停留在虚拟的想象中，呈现出典型的都市主体的精神分裂状态。他的形象不仅是个人的心理肖像，也是现代人群体经验的典型化呈现，其“疏离”与“异化”并非单一维度的，而是从自我、他人、世界三重关系中交织显现：从他与自身意识的隔阂，到与他者情感的断裂，再到与社会秩序的疏远，普鲁弗洛克的“迷惘”成存在困境的象征。艾略特并未直接定义这种“疏离”，而是通过散碎的语言和高度象征化的意象，将这一情感状态嵌入到普鲁弗洛克的意识流中，形成一种含混却真实的体验，将普鲁弗洛克的疏离感具体化为一种可以感知的诗意体验。值得注意的是，“疏离”并非单一维度的，在时间、空间、情感、行动等多个层面完成对现代人存在困境的展现。“疏离”作为一个融汇文学探潜和哲学思致的概念，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极大显现了个体的生命意义，成为折射群体普遍生存状态视见之窗。

二、疏离与迷惘的“关系”显现

（一）“我”与“你”：“自我”的破碎

“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半冷清的街...”[4]全诗开篇就将“二人共在”的对话氛

[2] [德]齐美尔. 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涯鸿 宇声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 259
[3] [德]齐美尔. 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涯鸿 宇声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 268
[4] 穆旦.《穆旦（查良铮）译文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41

围嵌入当下情景的时空与氛围中，通读全诗，我们不难发现，在说话人“我”的场域周围似乎都流动贯穿了一个潜在的“你”。但是在“所指”层面，诗中所谓“你”的身份与意义指向一直以模糊、神秘的形态显现在全诗的文本世界中。具体审视文本内容，言语者“我”是以一种“麻醉的”心灵状态出场于黄昏“冷清”的街道，而这样一种心灵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破碎的、非整全的意识体验，它意味着在保留意识认知能力的情况下失去感官知觉能力，即排除一切感官经验介入的残缺意识活动。由此，心灵状态的残破也将“自我”引向破碎的境遇。“你”作为由“我”分裂生成的心灵投影，实际上代表了另一个“我”在病态状态下的系列意识活动，简言之，即是意识层面的另一个“我”，“街连着街，好像一场冗长的争议/带着阴险的意图/要把你引向一个重大的问题”[5]，言说主体“我”在将无意识与潜意识层面的病态麻木的恐惧、焦虑与眩晕借助言词的路径在“你”之维度上表征出来。回到全文语境，“我”与“你”关系生成本身就说明了“自我”的残缺与破碎，当“我”被“麻醉”，“我”不再是“我”本人感官经验乃至情感体验的认知主体和能动者，自我心灵的“异化”就随之到来。带着麻醉的意识体验漫游于诗中呈现的此在世界的“我”也就必然会对眼前种种存在感到疏离与迷惘，“我”在这个世界中无法直接感知“我”的存在，更无从找准“自我”的定位。《情歌》的开篇于是给全文呈现出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式的迷失体验与陌生感。

（二）“我”与“她们”：“情感”的缺场

本诗的题目虽然为《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但从中似乎很难发现与真正意义上“情歌”相关的部分。没有求爱之情感的喷薄与张扬，没有华美的示爱行文措辞，也没有精雕细琢的爱情意象隐喻。更显著的是，艾略特对主人公想象中使他情意迷乱的“女人”，即所谓“爱情”的意向对象的书写在全文中出现频率比较起对自我意识之流中持续绵延的延宕、犹疑与自我鞭笞的经验情愫的描摹显得微不足道。从现象学的考察角度出发，普鲁弗洛克“爱情”的“意向客体”（noema）即“她们”一直以一种非直观（“直观就是让对象实际地对我们在场”[6]）的形式被给予显现，简言之，就是“在缺席状态下被主体意向”。“她们”并非为主人公所可以直观感知的对象，普鲁弗洛克所有的意识活动都是基于自己的内在经验对“她们”做想象与预测的建构，在其“缺席”的状态下“空虚地意指着”“她们”，并尝试着更多融入自己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她们”之在场的模糊、陌生、不可捉摸恰好映射出主体“疏离”或“异化”的爱情观与心灵状态。普鲁弗洛克在此向读者呈现的，不仅是一种缺乏求爱能力的无力行为，更是缺乏求爱欲望的心理倾向，如“...我已经熟悉了她们，熟悉了一切——”“而且我已经熟悉了那些胳膊，熟悉了一切——”[7]。普鲁弗洛克有时甚至已经厌倦了对“她们”的种种想象与空虚意指，如“白净的胳膊”“衣裙的香气”“纤长的手指”等。现代人的爱情不再表现为奔放炽热的情感与大胆的行动，而是被“异化”或“疏离”为空虚的意指活动、想象与持续不断的内心犹疑。本质上，缺场的并不是“她们”，而是自我求爱的“情感”。“情感”的缺场征显了普鲁弗洛克的“迷惘”，当“情歌”被剥去了“情感”的成分，爱情就不再是爱情，“自我”也不可能是“自我”。

（三）“我”与“他们”：“信念”的解构

现代人普鲁弗洛克的精神“疏离”与“迷惘”集中体现在“我”与“他们”，即古典时代英雄人物的关系上。艾略特作为古典学修养极其深厚的大学者，经常会在其诗中引证大量古典典故来强化主题呈现与表达，如组诗《荒原》前言“西比尔”的意象等。同样，在《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也出现了集中的古典意象群，如《新约·马太福音》里的先知施洗约翰、《新约·约翰福音》里的拉撒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奥德赛与海妖塞壬以及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王子。同时，其中的古典英雄如施洗约翰、奥德赛、哈姆雷特王子为了某种信念的实现奋不顾身并将并超越生死观念的伟岸形象与普罗弗洛克置身此在世界的“疏离”“迷惘”并焦虑、眩晕于对琐碎的细节的想象之渺小呈现，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与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塑造的一系列复杂的、缺乏英雄性、意志消沉的人物群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都在一个充斥着“现代性”的时空中征显出“人”之精神境遇的悲哀、迷惘与疏离。回到文本本身，普鲁弗洛克

[5] 同上

[6] [美]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 现象学导论[M]. 张建华 高秉江译.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1:34

[7] 穆旦.《穆旦（查良铮）译文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43

在持续的犹疑和延宕后即将被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但他的心灵中却不合时宜地显现出永恒侍者伟大的先知形象。很快，这伟大显现的意蕴就在他戏仿的态度中消解了——“尽管我看见我的头（有一点秃了）用盘子端过来/我不是先知——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8]。施洗约翰为了终极信仰付出死亡的残酷代价与崇高形象此刻成了普鲁弗洛克戏仿与反讽的对象，在现代人的心中不再有过去崇高的信仰与理念，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勇气更是无从谈起，何况，普鲁弗洛克甚至连求爱的欲望和勇气也消解散失了；全诗第 14 段中特别提及奥德赛返乡历程中“塞壬的诱惑”一节，古时奥德赛克服塞壬充满诱惑力的歌声之光辉的形象此刻变成了“塞壬们的沉默”，“我不认为她们会为我唱歌”，相反，与其关心塞壬带来的风险，不如关注“是否要卷起裤脚”“是否要把头发向后分”“是否敢吃桃子”这些琐碎的细节，这就是现代世界心灵维度的真实复现——英雄、圣徒、信仰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常人”在此刻成为了永恒。由此，在古今维度的相互观照中，在“我”与“他们”（英雄人物）的比较视域中，现代人信仰缺失与解构的精神处境一览无余，迷惘与疏离似乎成为了无可挣脱的宿命。

三、疏离与迷惘的“时间”之流

现象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时间经验与意识体验的多重维度，同时也为文本细读和意涵解读提供了一种较为可靠的理论视域。其中现象学“内时间意识”概念，作为时间现象生成的核心奠基，可以成为理解《情歌》中主人公意识流动与精神迷惘的关键切入点。在这首诗中，时间不仅是叙事的框架，更是承载主人公情感、思想及其内心矛盾的动态场域。艾略特通过语言的断续与时间的错置，创造出一种深具异化感的诗意时空，使普鲁弗洛克在现代都市的碎片化语境中无力挣扎，展现了现代人深陷时间洪流中的精神漂泊。

（一）延宕与摇摆：无法逃脱的时间漩涡

在艾略特的诗文中，“总会有时间”“总还有时间”等重复句式犹如钟摆般在诗行之间往复摇摆，形成一种强烈的节奏感，正如胡塞尔所言，“内时间”总是围绕主体的意识经验不断绵延[9]。这些“时间”的意象指向普鲁弗洛克对未来的虚妄期待，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心理阻滞和无尽的犹疑。在“总会有时间去暗杀和创新”这一句中，所谓“暗杀”与“创新”并非实际的行动，而是意识中无尽的可能性，是内时间意识对未来的“前摄”展望。普鲁弗洛克试图在这种前摄中寻找某种突破的契机，但这种展望并未带来澄明，而是被琐屑的日常细节与内心的矛盾所侵蚀。比如，“装一副面容去会见你去见的脸”“在你的茶盘上拿起或放下一个问题”，这些行为意象不仅呈现出他对社交场景的扭曲想象，也隐含了他对真实行动的深层恐惧。这种恐惧本质上来源于时间意识的异化，当主体无法调和内在时间与世界时间的张力时，便会陷入深刻的疏离与迷惘。更值得深究的是诗中对“活的当下”意识的描写。普鲁弗洛克并非沉浸于单一的过去、现在或未来，而是处在一种内时间意识的动态交织中。他的“当下”始终伴随着过去的“滞留”与未来的“前摄”，这些时间性维度在意识中交叠却无法和谐统一。“还有的是时间犹疑一百遍…在一分钟内还有时间/决定和变卦，过一分钟再回头”，正是这种意识动态的缩影。这里的“一分钟”并非真实的世界时间，而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延宕与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普鲁弗洛克反复构筑关于未来的幻想，却在每一次前摄中因恐惧与不安而倒退到过去的“滞留”，使“当下”成为一个无法逃脱的漩涡。

（二）瘫软与剥落：不断消解的时间与生命

诗中对“黄色的雾”和“黄色的烟”的描写为时间意识的异化提供了象征性隐喻。视观全诗，“雾”和“烟”不是孤立和静止的工业意象，而是顺着古今时间的变换，也随着普鲁弗洛克的犹疑、思考和行动贯穿全诗，肖似流动的时间一般，穿梭在街道与房屋之间，似乎无处不在，但又无法被真正触及，给与读者一种强烈的超现实感。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达利的画作《记忆的永恒》中描绘了三个时钟在一个极其诡异而荒凉的海岸上瘫软得失去功能的震颤景象，“雾”和“烟”得流动贯穿，也如同画中的超现实梦境景观，使得《情

[8] 穆旦.《穆旦（查良铮）译文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4
[9] [德]埃德蒙·胡塞尔. 现象学的观念[M]. 倪梁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67

歌》得时间感柔化、模糊化，也使得普鲁弗洛克对时间的感知，无论是现时层面上的体验还是对古典意象的把握，都失去了平常意义上的功能，扩大了无形的压力与人的内在麻木，使普鲁弗洛克的“当下”意识始终笼罩在一层压抑的氛围中。其既是对工业文明异化作用的写照，也是对普鲁弗洛克内心世界的形象化呈现。澄明的“绽出生存”应是主体对时间与存在的清醒觉知[10]，而普鲁弗洛克的“当下”却充满遮蔽与迷雾。在普鲁弗洛克反复自问“我可有勇气？”的过程中，“勇气”作为他行动的目标或意向对象，在每一次的前摄中都被放大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导致他对未来的期待最终滑向无力的退却。这种犹疑不仅源于对外部世界的焦虑，更是一种自我内在的分裂体验。内时间意识是主体在清醒觉知的基础上对自身存在的基础构造，而普鲁弗洛克的时间意识显然失去了这种基础性的一致性。他的自我被分裂为期待行动的“我”与无法行动的“我”，这种分裂使得他对自我的认知陷入了无法整合的破碎状态。在时间意识的异化下，普鲁弗洛克的语言也受到被形塑。“我用咖啡匙子量走了我的生命”这一句堪称经典。这里“咖啡匙子”作为日常生活意象成为了一个时间尺度，是对时间微粒化的极致隐喻，也是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机械重复与意义的消解。如同瑞典神秘主义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其诗作《Espresso》中提到的那样：“珍贵蒸馏出的一小杯，充满了和‘是’‘否’和时间同样的力量”[11]。艾略特和特朗斯特罗姆都将“咖啡”或者“咖啡匙子”赋予了某种生命上的价值意义，是对时间的测量和评判，这种对时间的“量化”与“质化”，与普鲁弗洛克意识中无穷的犹疑形成了鲜明比照：在内时间意识的层面，他的犹疑不断绵延，而在外部世界的客观时间中，他的生命却被琐屑的日常切割成毫无意义的碎片，古典时代言说的崇高价值化作咖啡时光的遐思与幻象，使得普鲁弗洛克的存在状态愈发显得荒谬与徒劳。他的“当下”既非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澄明”，也无法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回归到纯粹的意识结构中，而是充满了犹疑、延宕与分裂。正如古巴文学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在其短篇小说《溯源之旅》中描绘的那样，时间被分割，对基本现实的感觉急剧减弱，意识宛如被包裹在“黑暗混沌、濒临死亡”的身体里，记忆和岁月依然顺着懒散延长，可是生命中的一切不再那么重要了，有一些东西顺着时间“缓缓地剥落”[12]。然而，和死前溯源一生的堂·马尔夏不同，看似矛盾分裂怯懦的普鲁弗洛克实际上在不断回望，也在不断追寻，渴求意义，企盼价值。悲哀的是，当他望向身后又翘首未来时，他所能感知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无力和混沌而已，对他来说，当下的都市生活就犹如囚笼，而他身处在名为“身体”的牢房里，看见自己的生命在望不到尽头的庸碌和乏味中忍受时间不断的流逝、剥离和褫夺。

四、结语

现代人的生命旅程，是被夜晚的薄雾和荒原包围的漫漫长途，而普鲁弗洛克则正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现代世界中踟蹰、徘徊、沉沦。他的生命在时间的延宕与空间的迷失中不断剥落，留下的是不可弥合的疏离与无处安放的迷惘。普鲁弗洛克无法回到过去，也无法预见未来，他的当下被无限循环的恐惧与拖延所侵占。艾略特通过普鲁弗洛克的形象，展现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文化命题。在现代文明的洪流中，普鲁弗洛克的破碎不仅是个体的困境，更是时代状况的象征。他的漂泊并非是向着某种救赎的追寻，而是被卷入时间洪流的无力挣扎，其疏离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他的迷惘是暂时的，也是永恒的。由此，T.S.艾略特的《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不仅谱写出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挽歌，更成为一面审视人类精神困境的永恒明镜。

参考文献

[1] [英]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M]卞之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 [德]齐美尔. 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涯鸿 宇声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3]穆旦.《穆旦（查良铮）译文集 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美]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 现象学导论[M]. 张建华 高秉江译.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

[10]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302
[11]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巨大的谜：特朗斯特罗姆短诗俳句集》[M].陈黎 张芳龄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 67
[12] [古巴] 阿莱霍·卡彭铁尔.《时间之战》[M].陈皓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39-59

[5] [德]埃德蒙·胡塞尔. 现象学的观念[M]. 倪梁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6] [美]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 现象学导论[M]. 张建华 高秉江译.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
[7]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8]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巨大的谜：特朗斯特罗姆短诗俳句集》[M].陈黎 张芳龄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9] [古巴] 阿莱霍·卡彭铁尔.《时间之战》[M].陈皓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10]王丽丽.分裂的自我——论《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J].外国文学研究,2000,(01):91-93.
[11]黄遵洸.无情的情歌,独特的意匠——读 T·S·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6):90-94.
[12]郭艳雯.不可言说的情爱——论《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道德焦虑[J].外国语言与文化,2023,7(02):34-43.DOI:10.19967/j.cnki.flc.2023.02.004.
[13]钱翰,崔潇月.生死、情欲与孤独——细读《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J].文化与诗学,2021,(01):216-235.
[14]杨向荣.碎片化审美印象与解剖路径——齐美尔现代性碎片思想的审美解剖[J].阅江学刊,2016,8(04):94-101.DOI:10.13878/j.cnki.yjxk.2016.04.012.

Alienation and Bewilderment in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 A Poe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Existential Crisis of Modern Man

Feng Ziyang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T.S. Eliot's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tricately portrays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fluid consciousness of an individual in the modern urban landscape, revealing the core symptoms of spiritual alienation—fragmentation, bewilderment, and estrangement. Prufrock is not merely a psychological portrait of an individual but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broader existential crisis of modern subjectivity, shaped by the alienation of time, the estrangement of space, and the rupture of self-perception. The three relational structures within the poem serve as a key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is psychological predicament, while the introduction of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further illuminates the deeper mechanisms of this consciousness structure. By capturing the crises of temporal perceptio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agency, Eliot's poetics articulates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modern experience, offering a profoundly poetic and philosophically rich exploration of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psyche.

Keywords: T.S. Eliot; Prufrock; alienation; existential crisis; temporal consciousness

第 1 卷第 1 期
202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025

Doi：doi.org/10.70693/v1i1.428

拉赫玛尼诺夫声乐艺术歌曲作品的风格特点

罗金磊[1]
（[1]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白俄罗斯 220070）

摘要：拉赫玛尼诺夫的声乐艺术歌曲的特点是音乐学界的一重大的瑰宝，因此需要强调拉赫玛尼诺夫的声乐艺术歌曲作品与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两位作曲家的明显联系，同时指出了拉赫玛尼诺夫独特个人风格的存在。变相证实了拉赫玛尼诺夫声乐艺术歌曲在世界声乐艺术歌曲宝库中是一份永葆价值的存在。对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风格方面的分析对应了本文的主题，对于声乐表演者而言拉赫玛尼诺夫的声乐艺术歌曲的特点在文中的诠释是学习相关知识的基础。依靠其前辈的音乐学著作并结合了自己的经验，得出了关于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声乐艺术歌曲作品的风格特点结论。

关键词： 拉赫玛尼诺夫；艺术歌曲；声乐创作；旋律；和声；复调

引 言

声乐艺术歌曲中的歌词在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作曲家的早期作品中，与柴可夫斯基（Pyotr Tchaikovsky）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Nikolai Rimsky-Korsakov）的作品有着明显的联系。然而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从其创作活动中揭示了作曲家的音乐、艺术和世界观立场的个性特征并形成了对体裁的独特诠释。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一种以诗歌为词，并采用钢琴伴奏的声乐形式——艺术歌曲，快速发展起来。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对艺术歌曲的称呼是不同的。在俄罗斯艺术歌曲由属于自己的独有称谓，，“Romance”的替换词为“Романс”。情感抒发的表达方式与宽广、明亮的旋律相结合，对诗歌语言的谨慎态度以及对诗歌的精心阐释。因此，声乐艺术歌曲在俄罗斯也称之为浪漫曲。

一、 浪漫曲声乐艺术歌曲的形式

浪漫曲的表达通过词语的亲密感、诗意的语境和情感的抒发作曲家敏锐地捕捉到了此类音乐的特点。对诗歌文本的语义色调和表现元素的变化做出了敏感的反应，诗歌文本的语义深浅和表现力要素的变化，始终体现在音乐中。

拉赫玛尼诺夫深深地爱上了俄罗斯朴素而又充满诗意的文化底蕴。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洋溢着温暖、真诚，以及与自然交流的颤栗兴奋。在他的浪漫故事中，他描绘了一个内心平静、和谐的幸福世界。拉赫玛尼诺夫的声乐艺术歌曲相当丰富，艺术歌曲是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巅峰的代表作，是一部细腻精巧且较成熟的浪漫曲集，被誉为“属于俄国抒情作品中最富有诗意的创作之列[1]

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深谙人声表现力的奥秘，对其技术手段和表演可能性了如指掌。在他的声乐艺术作品中，他总能巧妙的表达出自己灵魂深处的微妙情感。拉赫玛尼诺夫说过：“音乐应该反映作曲家本人的个性、作曲家的故乡、他最喜爱的作品、他的宗教、影响他的书籍、他最喜爱的图片.....”音乐首先应该是作曲家自身经历的结晶。

在早期的声乐艺术歌曲中，拉赫玛尼诺夫对声乐和器乐部分的特殊配比就已初见端倪。钢琴伴奏织体以其丰富、多样的质地和非凡的色彩而独树一帜。从本质上讲，拉赫玛尼诺夫的浪漫曲中声乐和器乐的起始部分是平等的，而钢琴伴奏则是丰富、多变和极富色彩的。拉赫玛尼诺夫的声乐艺术歌曲中声乐与钢琴

[1] 作者简介：罗金磊，(1994-)，男，汉族，河南郑州人，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白俄罗斯-明斯克州 220070），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声乐歌剧理论。邮箱：luojinlei0505@gmail.com

伴奏配比是平等的，但往往是钢琴伴奏占主导地位。在声乐作品的艺术形象展现中，伴奏强调的是主要内容，体现的是诗歌的精髓。陈琼曾指出，拉赫玛尼诺夫的艺术歌曲具有室内乐的特点， 声乐声部与伴奏声部具有同样重要的艺术表现力[3]

二、 拉赫玛尼诺夫诗歌文本的诠释研究

拉赫玛尼诺夫声乐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始终是对诗歌文本的创造性诠释。创造性地诠释诗歌文本。比如挽歌体裁，在浪漫艺术歌曲«Давно ль, мой друг» (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中所表现的挽歌体裁，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得以实现。歌曲的开头采用了该体裁传统的安静沉思的基调，深思熟虑的语气，缓慢柔软的展开声乐旋律。钢琴伴奏织体是根据文本背景从而使得旋律平滑并赋有质感整体速度不紧不慢地展开。在歌曲再现部分，悲伤的回忆被重新相会的喜悦期待所取代，同样的旋律由转折变得激情澎湃。旋律的转折呈现出激情、狂喜和欢快的特征--“挽歌变成了一首可悲的双线叙事曲”。

拉赫玛尼诺夫的声乐艺术歌曲种类繁多。音乐学家阿佩蒂扬·扎鲁希·阿佩托夫娜[2]在作品集《拉赫玛尼诺夫浪漫曲》两卷版序言中的评论奠定了这一开端，随后，《拉赫玛尼诺夫声乐作品》序言中简明扼要地描述了作曲家声乐作品的特点。薇拉·安德烈耶夫娜·瓦西娜·格罗斯曼[3] 为《拉赫玛尼诺夫浪漫曲唱片全集》所作的序言中简明扼要地描述了作曲家声乐作品的特点。

在十九至二十世纪间，拉赫玛尼诺夫声乐艺术歌曲作品被众多的音乐学家进行了文化背景研究和分析(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阿萨菲耶夫[4]、马克·亨里霍维奇·阿拉诺夫斯基[5]、尤里·弗谢沃洛多维奇·凯尔迪什[6]、尤里·伊万诺维奇·帕伊索夫[7]）；从旋律方面对拉赫玛尼诺夫声乐艺术歌曲研究（马泽尔，列夫·阿布拉莫维奇[8]）；从和声语言方向研究（维克多·奥西波维奇·别尔科夫[9]、塔蒂亚娜·谢尔盖耶夫娜·贝尔沙德斯卡娅[10]）；文字与音乐的关系研究（薇拉·安德烈耶夫娜·瓦西娜·格罗斯曼，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鲁切夫斯卡娅[11]）；钢琴织体的作用和意义研究（斯捷潘尼迪娜·奥尔加·德米特里耶夫娜[12]）；声乐风格的特点研究（奥尔加·伊万诺夫娜·维尔亚诺娃[13]、）。

在过去的 10-15 年间，关于拉赫玛尼诺夫浪漫艺术歌曲的著作层出不穷 奥尔加·伊万诺夫娜·维尔亚诺娃、克里沃舍·阿纳托利·达维多维奇[14]、娜塔莉亚-维克托罗夫娜-鲁萨诺娃[15]。他们探讨了拉赫玛尼诺夫为其艺术歌曲选择诗歌文本的原则，并研究了其声乐作品的形象特点和风格特征。克里沃舍·阿纳托利·达维多维奇 专门研究了拉赫玛尼诺夫声乐歌词情节和主题的特殊性，主要是与其伟大的前辈柴可夫斯基的同类体裁进行比较。因此，克里沃舍·阿纳托利·达维多维奇认为从艺术歌曲《迁徙的风》(Ветер перелётный）中的一句歌词 “白天比黑夜更强 ” (День сильнее ночи）出自俄罗斯诗人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尔蒙特[16]的诗歌，展示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声乐诗歌与柴可夫斯基的诗歌在概念核心上的主要区别。拉赫玛尼诺夫作品中

---

[2] 音乐学家.她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历史与理论系。研究著作包括：《拉赫玛尼诺夫信件》（1955）《拉赫玛尼诺夫的回忆》（1988）

[3]苏联音乐学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荣誉艺术家。艺术史博士。

[4] 俄罗斯和苏联 作曲家、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1943 年）。苏联人民艺术家（1946 年。

[5] 苏联和俄罗斯音乐学家。艺术史学博士、教授。俄罗斯联邦荣誉艺术家（1999 年）

[6] 苏联音乐学家和历史学家。艺术史博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荣誉艺术家（1966 年）

[7] 俄罗斯著名音乐学家、合唱指挥、艺术博士

[8] 苏联和俄罗斯音乐学家、教师。艺术史博士（1941 年）、柴可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教授。

[9] 苏联音乐学家、艺术史候选人、教授。苏联最权威的音乐学家、研究员和教师之一。

[10] 苏联和俄罗斯音乐学家、音乐理论家、艺术史博士、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俄罗斯联邦荣誉艺术家。

[11] 音乐学家。文学博士（1979 年）。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

[12] 萨拉托夫国立音乐学院室内乐团及伴奏培训系教授，艺术史副博士

[13] 俄罗斯联邦荣誉教师、理论学科教师。任教于柴可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

[14] 俄罗斯联邦荣誉艺术家；俄罗斯作曲家联盟会员；俄罗斯作曲家联盟荣誉会员

[15] 毕业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音乐理论博士研究生

[16] 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和评论家。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艺术歌曲《你，我的田野》（根据托尔斯泰的诗歌改编），在这首作品中，拉赫玛尼诺夫转向了 “俄罗斯歌曲 ”的体裁。可以明显感受到 拉赫玛尼诺夫受到“强力集团 ”作曲家们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具有戏剧化的 “俄罗斯歌曲 ”特点，而这正是柴可夫斯基的特色。

三、 拉赫玛尼诺夫声乐艺术歌曲形象创作

在研究拉赫玛尼诺夫声乐艺术歌曲作品中的风景主题时，研究者指出，几乎有一半的作品是纯粹的现实风景性质或作曲家自己创造了一个风景背景。此外，研究者还考虑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各种情况，其中既有完全和谐的融合，也有相互冲突的分离。在专门研究拉赫玛尼诺夫声乐歌词的研究和方法论文献中，作为一个套曲创作问题（拉赫玛尼诺夫声乐套曲 38 号 的浪漫曲中最为常见）在这里，音乐与诗歌句法之间的关联分析问题得到了解决。

对拉赫玛尼诺夫声乐艺术歌曲中塑造艺术形象的外部文化因素的研究也同样有趣。作曲家的声乐作品一直吸引着研究者，但能够持续、全面地探讨 “文化 ”作用的作品范围有限、以及能够持续、全面研究音乐外因素作用的作品却很少。

在研究拉赫玛尼诺夫的浪漫曲方面， 阿萨菲耶夫 1928 年著作《19 世纪俄罗斯浪漫曲》的系列文章具有特别的学术价值。

这些文章充满了生动的文学表达和隐喻，充满了精确、简洁的言情历史特征作为一种音乐流派和文化形式，包括对拉赫玛尼诺夫声乐艺术歌曲形象领域的详细描述。

事实上，正是 阿萨菲耶夫 为俄罗斯作曲家的浪漫主义作品，其中包括拉赫玛尼诺夫的历史、音乐和艺术研究确定了方向。

因此，阿萨菲耶夫 在注意到拉赫玛尼诺夫浪漫主义作品中微妙的心理抒情性时，将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与契诃夫早期艺术剧院的绘画、文学和艺术相提并论。他特别写道，拉赫玛尼诺夫在文学（契诃夫）、歌剧院（马蒙托夫企业）、戏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绘画（列维坦、涅斯捷罗夫、奥斯特鲁霍夫）中都更接近俄罗斯艺术现实主义的精华。

阿萨菲耶夫强调，拉赫玛尼诺夫是真诚的，他没有摆架子。在他的音乐中，一切现在看来是修辞的东西都是说服和鼓舞人心的手段。在拉赫玛尼诺夫悲怆的抗议中，有一种撕裂和哭泣，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可以理解的，年轻的作曲家本能地用他的冲动、他的愿望和内心想法对痛苦的感受做出了回应。拉赫玛尼诺夫的 “激励 ”性所蕴含能量是直击灵魂的。拉固有的 “激励风格 ”在他的器乐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二钢琴协奏曲》开头的主题，尤其是该协奏曲充满活力的结尾，都是由此产生的。

但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其他作品也具有惊人的声部可塑性：《弗朗西斯卡》。他还创作了轻快、温柔、深情的浪漫艺术歌曲：《丁香花》、《小岛》、《这里真好》、《黄昏》、《有许多声音》、《致孩子们》、《在我的窗前》、《夜是悲伤的》。这一方向与拉赫玛尼诺夫风格的发展有关，其特点是旋律的调性和长度以及复调钢琴声部的丰富分支。作曲家的风格特征在他不朽的《第三钢琴与管弦乐队协奏曲》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合唱交响曲——《通宵守夜》，以及声乐领域的——《练声曲》……作为冲击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旋律急促而激昂的发展路线在悲壮康塔塔《钟声》中再次得到体现。阴深空灵的音响色彩与忧伤暗淡的旋律制造出了悲情的钟声，它是一种间接地表达在作品里通常暗示主人公悲剧的命运[2]。

四、 结语

因此，拉赫玛尼诺夫声乐艺术歌曲作品的主要特点如下

1) 旋律曲调优美；

2) 对文字的敬畏态度；

3) 音乐抒情性和戏剧性；
4) 钢琴声部在揭示文学文本文字内容方面的主导作用；
5) 音乐中和声音结构的特殊性；
6) 声乐人声部分和乐器伴奏的复调性具有作曲家独特的结构性。
7) 声乐艺术歌曲作品艺术形象语义内容具有深度含义。

参考文献：
[1] 汤雨. 拉赫玛尼诺夫浪漫曲《丁香花》演唱分析[D].重庆师范大学,2019
[2] 李筱艾. 拉赫玛尼诺夫浪漫曲钢琴部分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1.
[3] 陈琼：《拉赫玛尼诺夫艺术歌曲中的钢琴定位》，《黄钟》2005 年第 3 期.第 122-128 页.

Stylistic features of Rachmaninoff's vocal art song compositions

Luo Jin-lei

Belarusian State Academy of Music.Belarus 220070

Abstract: Characteristics of Rachmaninoff's vocal art songs are a great treasure of musicolog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se the obvious connection of Rachmaninoff's vocal art song works with the composers Tchaikovsky and Rimsky-Korsakov,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point out the existence of Rachmaninoff's unique personal style. In a disguised way, it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Rachmaninoff's vocal art songs as an everlasting value in the world's treasure trove of vocal art songs. The analysis of the stylistic aspects of the composer Rachmaninoff corresponds to the theme of this articl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chmaninoff's vocal art songs in the text is the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knowledge of vocal performers. Relying on the musicological works of his predecessors and combining them with his own experience, the conclusion on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composer Rachmaninoff's vocal art songs was drawn.

Keywords： Rachmaninoff; art song; vocal composition; melody; harmony; polyphony

第 1 卷 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20

“共同缔造理念”下的乡村教育发展

张钰杰[1]
（[1]广州市黄埔区沧联小学，广东 广州 510700）

摘 要：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提出“共同缔造”这一概念其中“共”是核心和灵魂，通过调动多方协同共创，促进成果共享，共同缔造美好生活。在这一思想理念的引领下，乡村振兴有条不紊推进，乡村生活环境和组织建设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乡村居民关心的教育落后问题依然存在。

关键词：乡村教育；共同缔造；乡村振兴

国家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指出：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大、人口增多，年轻家长进城打工、城区购房，受出生人口影响，乡镇学生源骤减，因此更迫切需要乡镇教育进行改革，由于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开展成效显著，基于教育集团化管理成功经验推广下，推进乡村教师素质整体发展、提高，解决农村孩子接受优质教育。乡镇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和下一步办出人民满意农村教育关键还在于对师资的管理和科学发展，也只有教师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阻碍办好农村教育的瓶颈、短板。教育集团办学的优势显现促进和推动了乡镇教育发展，这一成效的背后其实是国家对于基层治理的强大助力。

一、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国家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命题。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事要内涵。

2021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关键，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重点，以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共同缔造”是近年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探索。这探索发源于广东云浮。广东云浮市是广东北部的农业市，经济欠发达，农村落后，社会建设薄弱。云浮市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发展，重视社会建设和人居环境改造，积极开展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

共同缔造行动，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抓手。

二、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实施，乡村和城市间出现了一定的发展差异，为切实缩小城乡发展差异党中央实施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乡村教育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支撑。

（一）战略支撑：教育促进乡村经济振兴

1.教育是促进乡村经济振兴的重要战略资源

教育资源本身属于一种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其和乡村社会实现了充分融合，学校、幼儿园等都是教育资源的外在表现形式。通过对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深度分析，不难发现在乡村教育中主要包含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两种，在乡村教育体系当中不仅包含着幼儿园、小学，同时也存在着普通中等学校和成人教育机构，因此，乡村教育体系本身也属于我国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为了切实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党中央开始重点关注乡村教育的发展，在实践过程中，党中央做出了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部署。这一方面是改善农村民生水平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因此，为了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便必须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通过促进乡村教育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奠定坚实基础[1]。

2.乡村教育是培育乡村振兴人才的重要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教育可以通过更新乡村人员知识体系、培养乡村人员专业技能的方式，将乡村人才直接转化成社会生产力，从而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因此，在知识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社会环境下，对乡村学生进行直接教育，通过这一手段，促进先进技术和全新知识在乡村中的广泛传播将能够调动起乡村人员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如此以来，不仅可以切实的提升乡村自治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特征采用针对性的手段保证乡村教育的高水准开展，这样以来，才能真正的实现乡村振兴。

（二）战略关键：促进乡村教育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所需部署的重要战略，其一方面描述了我国乡村未来发展的总体蓝图，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未来乡村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然而，我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当前限制乡村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资源方面的不足，因此，乡村振兴并非在一朝一夕间便能实现的，只有科学开展顶层设计，并突破深层次体制机制的制约，才能在促进乡村振兴实现的基础上保障乡村教育的发展。

1.科学规划重点开展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对我国乡村分布的特征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分布零散是我国乡村的主要分布特征，与此同时，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着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在地理位置偏远的农村地区更是存在着发展资金匮乏的情况。因此，相较于城市地区而言，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难度非常大。而如若长期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作为物质支撑，那么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便会受到极大程度的影响。例如，当前许多乡村地区存在着道路交通条件差、垃圾处理设备建设滞后、生活用水短缺等情况。而且，在网络技术蓬勃发展的社会环境下，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大幅提升，繁华的城市深深吸引了乡村青壮年人口的目光，因此，当前乡村地区还存在着人口非

[1] 杜尚荣,刘芳.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教育：内涵、逻辑与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19(09):57-62.

理性向城市流动的情况。除此之外，现阶段乡村地区还存在着保障制度不健全、缺乏人才吸引力的情况，这也是导致优秀教育工作者“下不去、留不住”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2]。由此可见，为了充分的发挥乡村教育在促进乡村振兴实现方面的作用，便必须重点关注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实践过程中，负责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相关工作人员需科学细致的开展规划工作，并着手促进乡村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推进，从而为乡村教育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经济的进步提供坚实保障。

2.出台优惠政策建设城乡一体化人才双向流动机制

乡村教育要想得到稳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大量优秀人才的流入和丰富教育资金的注入，另一方面也需拥有优良的制度支撑和优惠的政策扶持。就拿人才来说，乡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优秀人才的流入，倘若仅仅依靠乡村的老人和孩子，那么乡村教育便会失去发展的活力，同时也无法实现稳定健康发展。乡村振兴亦是如此，只有提升乡村的人才吸引力，才能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因此，政府部门应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促进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这才是促进乡村教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只有做到“聚天下人才而用之”，才能达到促进乡村发展的宏观目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要想真正的促进乡村的开放性建设和发展，便必须关注体制机制层面改革的开展，只有给予乡村发展以政策性扶持，才能建设出科学的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从而达到乡村人才“来易来、去能去”的效果。因此，在促进乡村教育发展时，不能仅仅关注办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需提升乡村学校对优秀教师的吸引力。现阶段，解决乡村教师“向城性”单向流动已然成为了促进乡村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难题。因此，政府部门迫切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状况出台有针对性的倾斜政策，从而为乡村教育的发展保驾护航。

3.明确权责建设乡村教育发展的投入保障机制

经费投入不仅会影响乡村教育的稳定发展，同时也会影响乡村教育在促进乡村振兴方面作用的发挥。现阶段，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仍然是由省级政府统筹规划，并由县级政府付诸实践的体制。但乡村教育经常会出现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不仅如此，在有限财力的约束下，县级政府往往会重点关注城市的发展，而乡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往往得不到有效的重视，在这一环境下，许多乡村的学校出现了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这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教育的发展。为了更好的实现乡村振兴，建设极具地方特色的现代乡村教育体系，便必须革新和完善乡村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因此，应当推进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时提升乡村教育经费投入与配置等级,进一步发挥省和地市一级政府的作用,在经费的筹措与使用上做出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同时,加强乡村教育发展引入社会资金的政策体系建设,确保乡村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3]。

三、“共同缔造理念”下乡村教育的发展意见

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交叉，人民对美好教育的向往就是新时代的教育目标。好的义务教育能增加乡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促进乡村经济、文化更好更快发展。因此，完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实现共同缔造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策略之一。目前乡村教师队伍中依然存在组织纪律散漫、工作态度消极被动、欠缺主人翁意识等不良情况。乡镇学校作为基层公共服务组织，在共同缔造中也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共同缔造理念”为启示，完善自身教师队伍建设，充分调动基层教师的工作积极

[2] 闫海玲,宋尚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优先发展乡村教育事业[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8(05):24-27.
[3] 杜育红,杨小敏.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支撑的乡村教育及其发展路径[J].教育文化论坛,2018,10(03):137-138.

性和创造力，提升乡镇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基层政府和各公共组织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指导方针，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共同缔造理念”是由党中央提出的，为了夯实群众路线，扎根基层，促进城乡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其指导思想对于完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对乡村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引导，旗帜鲜明地落实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指导方针，富有创造力地解决和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积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首先是加强乡村教师的思政教育。由于教师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使命，因此切忌闭门造车，墨守陈规。作为一名新时代教师，在关注课标的同时，也应当了解国家方针政策，及时吸收新的能量，用广阔的视野丰富自己的教学思路，用积极地思想引领自己的日常工作，用时代的要求促进自己的教育教学革新。学校领导和党员应当发挥领头羊和组织者的作用，引导乡镇基层教师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用鲜明的政治思想引领教师的思想，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而促进教师更好地完成日常教育教学工作。

其次应当加强乡村教师队伍中党员的组织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保障。增加乡镇基层教师中间的党员数量，扩大党组织在基层教师中的影响力，促进党员在基层教师中间的带头模范作用，定时对乡镇党员教师进行培训，使基层教师在党员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下实现自我激励和管理。

（二）充分体察当地乡村教师生存现状

“共同缔造理念”中的“共谋、共建、共管”强调群众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基层党组织要在充分了解当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给予乡村教师政策和制度上的支持，充分体察当地乡村教师的生存现状，从而调动乡镇基层教师自我管理和自我革新的积极性，保证“共谋、共建、共管”结果上的“共评、共享”。这要求党组织在教师日常管理过程中应当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充分了解自己所在乡镇学校教师生存现状的特殊性，抓住主要矛盾，从而制定正确的解决方案，促进当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首先是了解当地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现状。“共同缔造”要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应当下沉到群众中间，实地考察，校领导和党员干部也应当关心所属学校基层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倾听基层教师的大事、小事，建立党群信任，帮助基层教师解决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调动基层教师自我革新和自我发展的动力。

其次是健全教师意见反馈渠道。党群互动必须是双向的，如果只有单向的下达指令，缺乏基层向上级的反馈渠道，那么共创共建的效果将会停留于表面。乡村振兴的实施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靠的是一线的基层教师。因此，在教师中间也应当有向上级的反馈渠道，一线教师的建议必须被倾听，并且领导和党员干部对于一线教师的需求应当给予及时的反馈。让一线教师感受到自己是单位的主人翁，从而调动基层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内驱力。

（三）改进学校管理制度

乡镇学校在学校管理上存在制度落后、管理松散、一言堂等现象。因此，建立良好的学校管理制度，是完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途径之一。其一，提升校园管理的民主性。好的方针政策应当来源于人民，符合人民的所思所想。在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增加一线教师在管理中的发言权，增强基层

教师的校园主人翁意识，提升基层教师自我管理能力。其二增加校园管理的灵活性。地方学校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开展特色办学，因地制宜地设置学校特色课程，给予基层教师-定的自我发挥和创新空间，灵活设置激励奖惩制度，激发教师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其三，保持校园管理的先进性。及时落实国家政策法规，如：积极落实教师轮岗制度，促进城乡教育资源整合和交流；积极开展基层教师培训，让新入职的教师尽可能多的吸收骨干教师的工作经验；不拖欠基层教师薪资，使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薪资同工同酬；与时俱进，开展丰富多彩的教研活动。其四，注重校园文化的建设。良好的工作氛围能提升教师自身的自我认同感和工作效能感，校园文化建设是营造良好工作氛围的基础之一，也是促进乡村教师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教师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途径之一。

（四）坚持多方协同共创

“共同缔造理念”在工作中强调培育共同精神，要在每一个环节中发挥群众主体的作用，致力于解决基层工作中的深层次问题，避免只停留于表面，在完善乡镇基层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校领导和党员干部也要坚持多方协同共创的原则，充分调动对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有关的各方组织的参与积极性，其中包括党组织领导者、校领导、基层教师和家长。其一，政府及上级领导要给予乡村教师政策倾斜，让乡村教师在工作的时候尽量减少后顾之忧。例如：薪资保障、职业发展保障、生活及住房保障等。同时，政府及上级部门必须提升乡村教师的社会职业认同度，使得乡镇基层教师更多地获得职业幸福感，社会对乡镇基层教师的职业认同度高也更有利于家校联合，从而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其二，提升教师自我革新能力。例如：在教师中间树立榜样模范，增强教师自我提升意识；鼓励党员带头在教师中间形成良好的精神风尚，逐步形成良好的工作风气，积极传递正能量；灵活设置薪资奖励制度，提升教师的工作热情。其三，促进家校联合。增加群众对学校教学质量的监督和评价渠道，打通家校沟通渠道；在工作中增加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互动的频率，良好的沟通能够提升乡镇学校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值。家长的意见和反馈能够促进教师自我反省和自我发展，丰富乡镇基层教师的工作经验。

参考文献

[1]闫海玲,宋尚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优先发展乡村教育事业[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8(05):24-27.

[2]杜育红,杨小敏.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支撑的乡村教育及其发展路径[J].教育文化论坛,2018(03):137-138.

[3]杜尚荣,刘芳.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教育：内涵、逻辑与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19(09)：57-62.

[4]王飞.乡镇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困境及对策研究[D].青岛大学,2021.

[5]冯江,张淑媛.“共同缔造”理念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08):124-126.

第 1 卷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v1i1.429

“以气论艺”：汉魏书法与文学的理论交融

张智涵[1] 钱亮帆[1] 王笛[2]

（[1]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2]广州美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汉魏时期，无论是书法还是文学都有了一个较大的进步，相较于秦汉，这一时期文学上出现了所谓的文学自觉；书法上名家辈出，书体发展，碑刻与书帖数量增加等。而理论方面，文论与书论在这一时期也空前发展，臻于成熟。“气”在此时作为一个重要的节点，促进了文学与书法的交融。

关键词：气；文论；书论；曹丕；王羲之

一、“气”的概念以及在汉魏时期的应用

（一）“气”字义溯源及道家观照

“气”作为一个字符在中国的极早就产生并开始使用，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之中就有“气”字的记载，殷人刻“气”字为 [1]。白于蓝先生以为甲骨文中的“气”字当作“乞求”之“乞”讲，音亦读为“乞”[2]。而后来为了更与“三”字相区别，将上一横改为向上弯折之状。如今的“云气”、“气候”这类表示自然之“气”的意义当为假借。在后来，自然之气的假借意义占据主流，直到如今仍然如此。

经过不断的发展，“气”的意义也开始渐渐发生改变，衍生出了既是物质又是精神的重要哲学范畴。这一演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明显，“气”一字大量出现在当时的文献当中。黄老学者尤其重视对“气”进行观照与解读，如郭店简《太一生水》曰：“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是以“气”来作为对天地最为基本的认知，当然在这一条中，“气”仅限于人对于自然界的客观描述，尚且未对其加以区分与辨别。

《老子》第四十二章讲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讲的乃是自然界之中存在着对立而又统一的阴阳二气，它们相互作用运动达到“和”的状态。此处老子将气分为阴阳二端，明显带有道家辩证哲学的色彩，并且指出二气运动以致“和”，相较于前文所提到的《太一生水》楚简之中的气，《老子》的“气”更带有主观的意识；结合《老子》第十章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则可知《老子》对于“气”的理解是更倾向于“柔弱胜刚强”的阴柔特性。又《庄子·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曰：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4]。

[1] [作者简介]张智涵（2004- ），男，四川雅安人，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古代美学；钱亮帆（2003- ），男，四川广安人，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王笛（2004- ），四川雅安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专业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美术史、书法史。本文三位作者不分先后，为共同第一作者。

在此处，庄子对于气的理解相较于老子又向前了一步，从纯粹的物质层面开始逐渐脱离，开始结合自然与人事来谈论气。庄子讲到人的生与死并不是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气”，人的身体与生命并非人所拥有，而是天地委之于人，生与死，不过是气的聚散，气始终都是齐一的，那么只要顺应自然，置生死于外，则无所畏惧。庄子此段借助气之聚散来抒发自己齐万物的思想，侧面反映了其思想当中“气”的升华。

（二）“气”的形而上路径

余敦康先生谈及中国传统哲学时提出，中国传统的哲学更注重“用”而非“体”，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哲学家并不甚注重谈论事物的本源与本体，而常常被作为首要讨论对象的是事物与人之关系[5]。传统哲学对“气”的讨论同样存在这一特点，道家的庄子较早对“气”与“人”进行了联系，而进一步将气进行形而上的上升并与人事相结合的是孟子。孟子云：“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下则是对“浩然之气”的展开阐释：“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6]”。孟子所言之“气”，非独自然界当中之物，而是由人的义与道所感发，强大而刚健，生生不息，是能够充塞于天地之间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在此，我们可以将道家之“气”与儒家之“气”比较对看。

前文提到道家所认为的气，带有“和”与“柔”的处下示弱的特质，而此处儒家提出的“至大至刚”的“气”则与之截然相反，原因就在于二家在讨论“气”时，对于“天”与“人”——即自然与人事的侧重不同。道家以道为本，以虚静无为为主，以顺应自然为基，更倾向于“天”，其顺应天道，无欲无为，即能全性；守弱处下，就可以保全自身，所以道家的“气”带有自然的静穆意味。

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更侧重于人事，尤其在乎作为，《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7]”，在儒家看来，“气”的本色就是刚健有为、运动不息的，而若要能够有为，“气”就不能阴柔羸弱，否则就不能支撑人事的一切行动，所以在同一章中，孟子又提出了“志为气帅，气为体充”的观点：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6]。”

志在于人为，故人的“浩然之气”是为“志”服务的，另一方面，若要有为，就必须保持“气”的充盈，这就是先秦儒家“气”论的底层逻辑。

（三）“气”的现实路径

到汉魏时期，“气”与“人”有了更进一步的结合，在这一时期，“气”常常被作为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出现。魏时人刘劭作《人物志》以识人，辨高下，知优劣，在《人物志·九征》开篇便提到：“若量其材质，稽诸五物；五物之征，亦各着于厥体矣。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8]。”刘氏将人身上的骨、筋、气、肌、血与五行的金、木、水、火、土结合，得到了“五象”，五象就代表了性格特征不同的各类人物。值得注意的是骨、筋、肌、血这四体在人的身体之中是实在的，“气”一体则是虚有的，这里明显能够看到刘劭对于孟子“养气”观念的肯定与继承，但是刘劭不仅仅止步于继承，其对孟子所言的“至大至刚”进行了辩证式的界定：“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

《说文》：“朗，明也[9]。”明与孟子如火如日般刚强的气有一定的联系，而刘劭对朗又进行了限定，即“清”，从此处可以看出刘氏对清新、清雅的好尚。后文又说“谓之文理”，《论语·雍也》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刘劭所言之气，不仅仅要注重坚明刚强，也就是“朗”，但是又不能流于粗野，所以又要用“清”来约束，这种约束在外的表现就是礼。这种尚“清”的人物评判

风向也与当时盛行一时的玄学风气有关。

除了《人物志》以外，汉魏时期其他涉及人物品评的典籍也会经常用到“气”，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例，以下列出几条以供参看：

《德行第一》：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文学第四》：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
《雅量第六》：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品藻第九》：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10]

可见在当时，“气”之用于评论人物，界限十分宽泛，不仅可以从外在来评价人物的面貌，而且可以指代人的性格、才能，更重要的是，“气”在这一时期可以指人物的言辞，如《文学》篇提到的“辞气俱爽”。在中国传统思想家看来，言辞与文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孔子将言语与文学皆列于“四科”之中。文学可以“言志”，寄托大道，申述志向，而言辞的功用也在于表达，《论语·卫灵公》载：“辞达而已矣[6]”。文学与言辞同样作为可以表情达意的工具，那么人在以“气”作为人物言辞的指代时势必也会将目光放到有相同功能的文学上，所以在汉魏之际，“气”也开始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指标。

二、汉魏文论当中的“气”

（一）曹丕《典论·论文》首创“文气”之说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极高地位的一篇，而其中所说到的“文以气为主”之观点就为《典论·论文》的价值奠定了重要基础。大多数学者认为，曹丕第一次将“气”运用于文，作为文学批评的中重要指标，其观点如下：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1]。

“文以气为主”首先肯定了“气”在文学之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思想明显是对孟子“养气”说的继承[12]，并且将“气”的地位进行了抬高，如果说刘劭《人物志·九征》之中“骨、筋、气、肌、血”是将“气”与其他四体同列作为人物才性之分的依据，那么《典论·论文》此处就是将“气”上升到了主体地位，作为文的主要内涵。文所面对的主体有二，一为作者，二为读者，作者本身带有独属于自己的气韵，在创作之时气随笔出，遂成其文，而读者在进行阅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字里行间所体现的精神内蕴，在同篇之中，曹丕还有“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等语，皆表现出了“气”由作者所传，由读者所感，反之，读者又返于作者，用气来说之。

其次，曹丕“文气论”的重要观点就是对于文之“气”做了清浊二体之别。古人以为人依阴阳二气而生，即上文所引《老子》第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观点。万物依阴阳之气，而势必各有所倚重，或由阴气主导，阳为辅弼，或由阳气主导，阴为应承；而另一方面，由阴主导非阴而已，也有阳的成分，只不过相较于阴而言较少，不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只有阴而无阳，那就倒向一边，至于偏激，也就无“以为和”的说法了，反之，阳占主导地位时亦然。正是因为阴阳之间有一方为主，所以阴阳之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性与独特性[13]，在此处，曹丕也运用了“清浊”这一对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言说文之“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清”指的是超拔爽朗的清刚之气，而“浊”则指代沉雄凝重的郁柔之气[14]，不论清浊，皆是由天而生，人在后天不得相易。这一观点在后世看来有失偏颇，人多以为不

然，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曹丕在文学批评史上首提“文气”，作为先行者，其理论或失于疏漏是正常的事，并不能磨灭文帝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气”思想

继曹丕之后，刘勰也时常以“气”来论说文。在《文心雕龙》第二十七篇《体性》篇之中，刘勰将文章列位“八体”，即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不同风格，文有八体之故，刘勰则认为是“才、气、学、智”四者综合运动的结果[14]，《体性》篇曰：“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15]”，四者综合造成文的不同。“气”作为重大影响因素之一，刘勰以为气是“情性所铄”，乃先天形成，这与曹丕“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说法有较大的相似性。

另外，在《文心雕龙》中，刘勰经常将“风”与“气”的意义贯通使用。《文心雕龙》第二十八篇为《风骨》，风骨一般指的是人的精神和体貌，刘勰全篇应当总体围绕这个词展开，而“气”在这一篇中却处处出现。在《风骨》篇的开头，刘勰就说到，诗经六义之首当为风，因为其“志气符契”，范文澜以为“气为未动，风为已动[15]”，从某种程度来说，“气”乃“风”之先导；又《风骨》篇中引曹丕《典论·论文》中“文以气为主”的一段来申说“气”是“风”的重要体现方式，文章不可无气，气盛则“风”亦生，“风”生则动物感人，文章对人的感染力就体现在这里。

同时，刘勰还提出了文的“养气”之说，在其之前，孟子已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到了汉代，王充又“制《养气》之篇[15]”，王充之《养气》今不传，但是通过推断，其思想大概对刘氏有极深的影响。刘勰所言养气，非独养文章之气，更要养作者之气：

>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鸟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15]。

刘勰谈到，孩童的“气”和老人的“气”因为经历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别，同样的，有的人志气较盛，所以思虑敏捷而不觉得疲劳，但是有的人气较人衰，所以考虑过多就会损伤心智。如果一个人本身只有水鸟般的才质而去羡慕飞鹤那样的长胫，最后一定会导致害神残性，所以曹操害怕为文过多而减损寿命，陆云感叹思虑过度等等这些都不是无稽之谈，所以为文之人除了在对文章的风骨和文采进行雕琢之时，还应当注重培养自己的“气”，以避免因作文过度而陷入损伤情性的困境，而“养气”之法，就在于无为清静：

> 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15]。

在刘勰看来，人之为文，是受到自然之感发，如陆机《文赋》所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于是从内心油然升起，而表露于笔，整个过程都是自然的生发，而并无过多的劳形穿凿，所以，在进行文学写作时，应该“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文心雕龙·养气》），如果过度沉迷，如同后世贾姚那般“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势必会损伤肝胆，破坏人的和气。为了调畅性情，就需要以无为以虚静，在觉得烦闷无绪的时候及时舍去，不要使自己内心壅塞。为文之道在于“闲”，闲适才可致虚室生白，逍遥谈笑，这样才能游刃有余，保使自己的灵感源源不绝，心智也不会受到损伤。

三、文学与书法交融的节点——气

（一）汉魏书论举隅

汉代是中国书法大发展的时代，秦汉以来的文人沿着先前的路子进行创新，在这一时期，草书、隶书脱胎于秦文字，并逐渐走向成熟，楷书在汉代渐渐显露；文人有意识地从事书画艺术基本上始于东汉[16]，至于汉魏，更是大盛，书论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爆发式的发展，在中国书法史上取得了极高的地位。

文人以“气”对文学或者书法进行批评，但并未指明“气”所包含的内容，所以对于这一问题学界也有争议，有人以为“气”乃指作者之气，有人以为是作品之气，众说纷纭。在此，笔者采纳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11]以及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17]意见，将作者之气与作品之气两个方面兼而论之，对汉魏时期谈及“气”的重要书论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这一时期众多宝贵的书论内容并未保存下来，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历代的书论进行了编录，其中集录较广，较为权威的是《历代书法论文选》和《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两种，这两个选本汇集了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代表性作品，基本能反映气的运用史实，故主要在这两部书中选取以下以下篇目，并从创作者的角度与作品品评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 创作者角度

①蔡邕《笔论》：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18]。

②王羲之《笔势论》：

笔势论十二章健壮第六：放纵宜存气力，视笔取势，行中廓落，如勇士伸钩，方刚对敌[18]。

2. 作品品评角度

①索靖《草书势》：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娆廉苫，随体散布[18]。

②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18]。

③王羲之《笔势论》：

笔势论序：扬波腾气之势，足可迷人[18]。

④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18]。

⑤王僧虔《书赋》：风摇挺气，妍靡深工[19]。

⑥袁昂《古今书评》：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臣谓锺繇书意气密丽。

殷钧书如高丽使人，抗浪甚有意气，滋韵终乏精味。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18]。

⑦萧衍《草书状》：但体有疏密，意有倜傥，或有飞走流注之势，惊竦峭绝之气，滔滔闲雅之容，卓荦调宕之志，百体千形，巧媚争呈，岂可一概而论哉！（草书之险绝，千奇百怪）[18]

⑧萧衍《答陶隐居论书》：棱棱凛凛,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18]。

⑨萧衍 《古今书人优劣评》：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

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

郗愔书得意甚熟，而取妙特难，疏散风气，一无雅素[18]。

⑩庾元威《论书》：所学正书，宜以殷钧范怀约为主，方正循纪，修短合度。所学草书，宜以张融、王僧淡则，体用得法，意气有馀[19]。

⑪庾肩吾《书品》：仁义起于麒麟，威形发于龙虎。云气时飘五色，仙人还作两童[18]。

（二）“出位之思”——文学与书法以“气”为节点的交融

无论中外，语言艺术与图像艺术的关系一直都是文艺史上的重要话题，18 世纪的莱辛最早也是最为系统地对这一组关系进行了论述，其《拉奥孔》提出“诗画异质”，认为诗广而画狭，诗高而画卑，语言艺术与图像艺术存在高下之分，并不能完全兼容。同样是在德国，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的艺术门类并非不能兼容，而是可以为彼此提供新的力量[20]，即“出位之思”（Andersstreben）。这一思想最早由德国哪一位学人所提出已经模糊不可考，而最先将 Andersstreben 一词译作“出位之思”并引入中国文艺批评的是钱钟书先生，在其《中国诗与中国画》[21]一文中，“出位之思”一词用于评价杜甫的诗与王维的画，认为他们二人能分别在诗与画的领域有如此的突破是诗画两种艺术互相吸取了新力量的结果。同样的，书法作为一种静态的图像艺术，其在汉魏之际产生新变必然脱不开文学的功劳，而文学的新变亦是如此，这两种艺术门类之间同样存在“出位之思”的共同性，而书与文交融的节点就是“气”。

如何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书法与文学中的“气”，曹顺庆先生以为，“气”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是“中国人对天地万物本源及其根本活力的一种认识。它既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但却可以具体地表现为一定的精神或物质之中……[22]”另外，曹顺庆先生认为，“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根本性的建设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气的文化”, 因为气是中国人世界观中的一个核心范畴, 代表了中国传统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不论是在书论还是在文论当中，“气”的具体内涵一直是模糊的，没有人能够准确的为“气”下定义，所以，要认识“气”如何贯通了书法与文学，要从“气”的本体——一种中国独特的思维方式开始。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不少擅长文学的作家同样善书，书法一体的地位在汉魏之际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在此之前，以士大夫为代表的文字使用者大多不甚重视汉字的美感与章法，其将书视作比文更低一等的雕虫小技，此时仅仅有“书”而无“法”，所以，我们今人所见的出土文献当中，不同人书写时所遵照的笔法往往无定，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魏时人钟繇提出 “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的观点，将书法所展示的美也看作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流露，是能够“言志”的艺术；文人士大夫对书法地位的提升，使书法渐渐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指标的艺术门类，那么我们未尝不可以说汉魏也是“书法自觉的时代”。文人以“气”作为一股新的动力注入到书法之中，使“气”成为书法的重要品评标准——即为“书”的“法度”。从东汉的蔡邕，到晋代的王羲之，再到梁时的萧衍，这些身上同时兼有文学家、书法家两重身份的创作主体始终标举“气”为书法创作的准则之一，对书法与文学的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前文已说，书法是一种静态的图像艺术，而草书相较于其他书体而言更具有符号性与抽象性。以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评价郗愔为例，曰：“郗愔书得意甚熟，而取妙特难，疏散风气，一无雅素[18]”。郗愔最善草书，“风气”便是草书的显著特征，现以其具体作品《廿四日帖》为例来分析其作品中的“风气”。如萧衍所言，“疏散”“摇曳”是此帖的特征，在章法的安排上，《廿四日帖》的主要重心在整个作品的左上部分，整个章法的布局错落有致，给人以行云流水般的流畅感，赏心悦目；在笔法上，郗愔用笔看似随意草就，实则精心安排，其草书线条质量极高，犹如鱼线绞丝，轻盈但不谄媚，同时具备风韵和骨力，同时，其草书用笔而不全然用，在某些关键部位设置为“断笔”，即前后两笔不相互勾连，这样的笔法给给予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并且虚而不实，更显得散漫放松，仿佛一派若不经心貌，符合萧散自然、摇曳生姿、严肃活泼的特点。

文论之中同样注重“风气”是刘勰，其《风骨》篇提到：“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15]”，刘氏评价文章之风骨与书法有共通之处。

魏晋的草书强调清刚，在注重清新气息的同时也要注重线条的骨力，反对笔画的拖沓孱弱，文章亦然，清健俊逸，潇洒出尘，兼具刚骨，不事柔媚是好文章的追求。书法与文学同样对“风气”中的“清”与“骨”有所好尚，足以见得这两种艺术相互的渗透与交融。

文学与书法的交融并未止步于汉魏，而是延及后代，自六朝以降，每代的文学家与书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将文学与书法相较参看，至有宋一代又是新变，宋代诗人，尤其是以黄山谷为代表的江西派诗人常常将诗与书法并提，江西诗人作诗重视句法的斟酌，看重形式结构本身所形成的艺术之美，这与书法之重章法结构不谋而合，所以黄山谷等俱在文学与书法上有极高的修养，并且可以看出其书法与文学相互影响与交融。而当今人在看宋代及其他时期的书法与文学时不应忘记，正是汉魏时人以“气”作为书法与文学的融通点，并行论之，才有了后世如此丰厚且宝贵的艺术成果。

参考文献

[1] 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编著：《甲骨文合集补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年。
[2] 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白于蓝撰此条。
[3]（三国魏）王弼著、 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版。
[4] 刘文典著、 赵锋、诸伟奇点校：《庄子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版。
[5] 余敦康著：《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6]（宋）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
[7] 黄寿祺、张善文著：《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版。
[8]（三国魏）刘劭著、 梁满仓点校：《人物志》，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
[9]（汉）许慎著、 （宋）徐铉校：《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
[10]（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版。
[11]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12] 胡大雷：《从“谈说之术”到“文以气为主”——文气说溯源新探》，载于《文学评论》，2013 年第 03 期。
[13]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编写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 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14] 郭绍虞著：《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15]（南朝梁）刘勰著、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
[16] 张克锋著：《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画论的会通》，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 年。
[17] 罗宗强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版 ：“那么，曹丕文气说的含义是什么呢？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表现在文章中的气，即文气。而‘气之清浊有体’的气，则是指作者的气。”
[18] 上海书画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年版。
[19] 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年版。
[20] [英] 沃尔特·佩特著、李丽译：《文艺复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版。
[21] 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 年第 01 期。
[22]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于《文艺研究》,1996 年第 02 期。

'On art by qi ' : the theoretical blending of calligraphy and literature in Han and Wei dynasties

Zhang Zhihan，Qian Liangfan，Wangdi

Yun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Abstract : During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both calligraphy and literature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Compared with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so-called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ppeare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period. There are many famous calligraphers, the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the increase of inscriptions and book posts. In terms of theory, literary theory and calligraphy theory also developed unprecedentedly and matured during this period. As an important node at this time, ' Qi '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calligraphy.

Keywords : Qi ; literary theory ; book theory ; cao Pi ; wang Xizhi

第 1 卷第 1 期
202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02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40

AIGC视角下粤绣非遗传承创新研究

黎家良[1]，张淑敏[1]
（[1]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粤绣承载着千年岭南文化精髓，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工艺体系堪称中华传统手工艺的瑰宝。在工业化浪潮冲击下，粤绣技艺面临市场份额萎缩、传承群体老化及人才断层危机，传统传承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本研究以AIGC技术赋能粤绣文化创新传承为切入点，通过设计范式革新与工艺知识图谱构建的双维论证，系统阐释智能生成技术在纹样创新、工艺解构及文化传播等层面的赋能机制，验证了数字技术驱动非遗“活态传承”的可行性路径。研究同时揭示，技术介入与传统工艺特质的适配性矛盾、智能生成内容的文化准确性校验，以及数据采集过程中的技艺保密等关键问题亟待解决。基于此，本文提出三维度应对策略：其一，构建“AI设计师+绣娘工匠”协同创新体系，实现智能算法与手工智慧的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建立工艺动态数据库；其二，打造“虚实共生”的审美教育矩阵，运用AR刺绣体验装置与生成式艺术展览，重构公众对传统工艺的价值认知；其三，建立“区块链+非遗”的版权保护机制，制定涵盖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与成果转化的全流程伦理规范。研究表明，AIGC技术通过解构-重组-再创造的数字化路径，不仅显著提升粤绣纹样的现代转化效率，更在工艺知识图谱构建中实现隐性经验的显性传承，为非遗项目开辟出“数字工匠”培育与“元刺绣”产品开发的双重创新赛道。

关键词：粤绣；AIGC；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文中强调，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粤绣，源自岭南地区的传统刺绣艺术，是中国四大经典刺绣之一，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其精湛的针法、绚丽的色彩和独特的岭南文化韵味闻名于世，广泛应用于服饰、装饰品和艺术品等领域，是岭南文化的生动体现。然而，随着现代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冲击，粤绣市场份额逐渐萎缩，近二十年来相关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了约60%；另一方面，粤绣技艺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难题，从事粤绣的艺人平均年龄超过50岁，且年轻一代传承人的占比不足10%。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于AIGC技术对粤绣文化的创新性表达与传播，使其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促进传统技艺的现代转型与持续繁荣。

一、AIGC与粤绣相关概述

1.1 AIGC技术的内涵

AIGC，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是依托机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内容自动生成的新兴领域。通过神经网络，AIGC可以学习大量数据中的特征和模式，从而自动生成新的内容。AIGC在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生成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以GPT系列为代表的

[1] 作者简介：
[1]黎家良（2001-），男，广东茂名人，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2]张淑敏（1999-），女，山东聊城人，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寒地非遗数字化艺术传播策略研究（批准号：23BXW084）

Transformer 架构极大提升了语言理解与生成能力，生成对抗网络（GAN）通过对抗博弈生成逼真图像，变分自编码器（VAE）则通过潜在向量空间实现图像多样化生成。随着算力提升、算法优化以及数据量的指数级增长，AIGC 技术从理论走向实践，广泛应用于内容创作、设计辅助、智能客服等多个领域，成为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1]。特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中，AIGC 技术为传统艺术形式如粤绣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和创新性转型的技术支持。

在艺术创作中，AIGC 技术主要表现为图像生成、艺术品自动创作与定制以及数字互动艺术等方面。例如，AIGC 可以自动生成与传统艺术风格相似或创新的艺术作品，甚至能将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相融合，创造出全新的视觉效果。此外，AIGC 技术能够快速响应个性化定制需求，创作出符合现代消费者审美的艺术品。通过 VR 和 AR 的结合，AIGC 也使得艺术创作变得更加互动与沉浸式，打破了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增加了观众的参与感。

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AIGC 技术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与挑战。首先，AIGC 能够帮助传统艺术进行数字化保护，例如将粤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案与技法进行数字建模，使其在未来能够以虚拟的方式得以保存和传承。其次，AIGC 能够赋予传统艺术新的生命力，使其在现代化的表达形式中焕发活力。通过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艺术风格融合，AIGC 能够使传统艺术作品更加符合当代审美，拓宽了传统艺术的创作空间和传播途径。更重要的是，AIGC 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播更为普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输入生成艺术作品，从而提高了传统艺术的可接触性和全球认知度。

然而，AIGC 技术也面临着潜在的风险。由于技术的自动化特性，过度依赖 AIGC 生成的内容可能导致文化的异化，无法完全传递传统艺术的核心文化价值。传统艺术的传承不仅依赖技术再现，更需要人类的情感和理解。因此，在利用 AIGC 推动传统文化传承时，应保持对传统艺术精髓的尊重，避免文化内涵的“同质化”。

1.2 粤绣的历史与艺术特点

粤绣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据唐代苏鹗《杜阳杂编》记载，永贞元年（805 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在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点画分明，细如毫发，其品题、章句无不具矣”，展现出极高的刺绣技艺水准[2]。清代是粤绣的鼎盛时期，乾隆五十八年，广州成立刺绣行会“锦绣行”和专营刺绣出口的洋行，规范绣品生产各环节[3]。光绪年间，广东工艺局在广州开办缤华艺术学校，专设刺绣科，岭南画派始祖高剑父任校长，致力于培养刺绣人才。粤绣艺术特色鲜明，注重光和影的和谐运用，绣品色彩常以对比强烈的红色和绿色打底，并伴有金线勾勒，洋溢着南国明快浓烈的特色。在绣材运用上，粤绣大胆创新，除常规丝线、绒线外，还运用孔雀毛捻缕等不同绣材展现独特质感。题材方面涵盖龙凤、花卉和历史故事等，既蕴含传统吉祥寓意，又反映岭南地域文化与生活百态。粤绣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它与当地的民间信仰、历史背景紧密相连，深刻反映了广东地区的社会文化精神。

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粤绣的传承面临着严峻的困境。首先，传承人才的短缺是一个主要问题，传统手工艺的学习和传授多依赖于师徒关系，而随着现代社会对传统手工艺兴趣的降低，年轻一代对粤绣的兴趣逐渐减弱，导致技术断层。其次，市场萎缩也是粤绣传承的一个重要挑战，传统手工艺品的需求减少，粤绣逐渐面临市场空间的压缩。最后，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脱节使得粤绣在当代社会中显得有些过时，难以吸引更多的关注。为了推动粤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保留其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创新与现代化转型，“活态传承 ”粤绣尤为重要，不仅要求保存传统技艺，更要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这一传统文化，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二、AIGC 技术对粤绣传承创新的赋能机制

2.1 设计范式革新

在数字化技术与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AIGC 技术为粤绣设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推动传统技艺向现代艺术形式转型。设计师可借助 AIGC 图像生成工具（如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通过精准的指令与关键词，快速生成兼具传统粤绣元素与现代艺术风格的设计草图，从而在传统工艺基础上拓展创新边界，激发新的艺术灵感。此外，AIGC 技术在优化传统粤绣图案方面展现了巨大潜力。通过精细布局和色彩调整，AIGC 能简化繁复图案，突出核心主题，增强视觉冲击力，更好地契合现代市场对简约、优雅风格的需求，吸引年轻消费者。

同时，AIGC 技术为粤绣文创产品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例如，在开发广州塔主题文创产品时，设计师可利用 AIGC 技术融合广州塔的现代轮廓与传统粤绣元素，生成创意草图并转化为 3D 模型，再通过设计软件精细化绘制和 3D 打印实现量产，并迅速推向市场。这种方式不仅符合现代审美，还深刻融入岭南文化特色，提升了粤绣产品的市场吸引力，拓展了其在当代生活中的应用空间。

AIGC 技术推动粤绣设计的多维度创新，突破了传统工艺的局限，融合现代审美与技术手段。通过深度学习与数据分析，AIGC 能够解构粤绣传统纹样的构成、色彩及文化寓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例如，AIGC 能将经典荔枝纹样与现代简约线条相结合，形成适合时尚服饰的独特设计，或为家居软装创作以绿色生态为主题的粤绣纹样，拓展粤绣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此外，AIGC 对粤绣工艺的数字化剖析也带来了工艺创新的机会。通过 AIGC 技术，复杂的工艺要素，如针法、色彩搭配和材料使用，能够转化为数据模型，并通过算法优化，生成创新的工艺路径。例如，AIGC 可以将 3D 打印材料与粤绣的钉金绣结合，创作出具有立体感的现代作品；或利用智能配色系统，在传统色彩基础上生成全新的色彩方案，从而提升粤绣的视觉效果和艺术表现力。这种数据驱动的设计革新不仅增强了粤绣的时代感，也拓展了其应用领域。

2.2 工艺知识图谱构建

AIGC 技术在粤绣的传承过程中，起到了系统性整理与传承的作用，尤其是在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与知识体系整合方面。粤绣技艺中存在大量依赖经验积累的隐性知识，例如如何通过感觉控制针法力度与丝线张力，这些细微而复杂的技术难以通过传统的文字与语言传递。借助 AIGC 的动作捕捉技术与传感器设备，绣娘的操作过程被精确记录，并通过数据分析转化为可视化的知识模型。这些模型不仅通过图表展示操作技巧，还辅以详细文字说明，能够让未来的传承人学习粤绣时更直观地理解每一项技巧。

此外，AIGC 还帮助构建了粤绣的全面知识体系，涵盖了粤绣的历史渊源、工艺技法以及图案寓意等方面。通过建立结构化的知识图谱，该知识图谱将粤绣的各类元素通过语义关系相互连接，构建一个丰富的知识网络，传承者和研究者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与学习。通过强大的查询和展示功能，用户可以快速获得与粤绣相关的各类信息，帮助他们追溯粤绣的技艺传承与风格演变。更重要的是，这一知识图谱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资料库，更有潜力成为“活态 ”平台。此外，AIGC 还能够根据学习者的进度和兴趣，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推荐，进一步加速粤绣知识的传承与普及。这种集成式的知识图谱不仅提高了粤绣传承的效率，也使得其更具可持续性，帮助新的传承人系统化地掌握技艺，推动粤绣文化的长期发展。

2.3 文化传播

AIGC 技术为粤绣文化传播开辟了新的维度，显著提升了其文化影响力和传播效果。通过个性化的传播

内容生成，AIGC 能够根据不同受众的文化背景、兴趣偏好和媒介使用习惯，量身定制传播内容。面向海外受众时，AIGC 可以融合当地文化特色与粤绣元素，创作具有故事性的宣传视频，提升文化交流的深度与效果。针对年轻群体或儿童，AIGC 可以开发粤绣主题的动画绘本等，以趣味化的内容激发他们的兴趣，从而扩大粤绣文化的受众基础。更为重要的是，AIGC 使得粤绣文化的传播可以跨越多个媒介形式，形成沉浸式的传播体验。通过 VR 和 AR 技术，AIGC 能够开发虚拟粤绣展览和互动体验应用，用户可以身临其境地观察粤绣作品的细节。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生成的短视频和动图等轻量化内容，也能够迅速引发讨论和分享，形成裂变式传播，进一步扩大粤绣文化的影响力。

三、AIGC 技术应用于粤绣传承创新面临的问题

3.1 技术与传统工艺适配性难题

AIGC 技术在粤绣传承创新中面临设计与传统工艺的脱节和艺术情感表达缺失的问题。尽管 AIGC 生成的设计在创意上具有新颖性，但往往与实际刺绣工艺存在差距，如设计的复杂图案无法通过传统技艺实现，或者材料选择不符合实际需求。此外，AIGC 生成内容缺乏手工刺绣中的情感深度，难以传递粤绣特有的人文精神，造成作品在艺术感染力上的不足。

3.2 生成内容文化准确性存疑

AIGC 技术在生成粤绣图案时可能存在文化寓意解读偏差和对文化背景理解不足的问题。由于缺乏对粤绣深厚文化的理解，AIGC 可能误解传统图案的象征意义，导致不当的设计组合，进而误导公众对粤绣文化的认知。此外，AIGC 难以完全把握粤绣所承载的岭南地方文化，可能导致其创作的作品脱离粤绣的文化根基，削弱其作为地域文化符号的独特性[4]。

3.3 数据采集与技艺保密困境

AIGC 在粤绣传承创新中的应用面临数据采集过程中存在的技艺保密风险。为了让 AIGC 学习粤绣技艺，必须采集大量核心技艺数据，但这些数据可能会面临泄露的风险，影响粤绣技艺的独特性和传承者的利益。同时，传统的口传心授方式与 AIGC 技术在技艺数据共享上的冲突，可能导致传承人对数据化传承产生抗拒，限制了 AIGC 在粤绣领域的推广和应用。

四、AIGC 赋能粤绣的未来发展策略

4.1 构建“AI 设计师+绣娘工匠”协同创新体系

在粤绣的传承与创新过程中，建立“AI 设计师+绣娘工匠”的协同创新模式能够最大化发挥技术与传统工艺的优势。AI 设计师利用 AIGC 技术，可以在创意构思阶段为粤绣提供丰富的灵感和设计初稿，这些初稿基于大量历史数据、艺术风格和市场趋势生成，兼具创新性与现代感。然而，AI 生成的设计通常难以直接转化为实际的手工作品，缺乏手工艺中的细腻与情感表达。在此过程中，绣娘工匠凭借其精湛的技艺，负责将 AI 生成的设计转化为具体的刺绣作品。工匠们通过对每一针每一线的精准掌控，将 AI 设计赋予生命和灵魂。为了加强这一协同过程，可以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建立详细的工艺数据库，记录刺绣过程中每一个细节的数据，如针法的使用、色彩层次的搭配等。这些数据的实时分析和反馈不仅能够为工艺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还能促进 AI 与传统手工技艺的深度融合，推动粤绣工艺的创新与发展。

4.2 打造“虚实共生”的审美教育矩阵

利用 VR 和 AR 技术，能够为公众提供沉浸式的粤绣体验，进一步提升粤绣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通过 AR 技术和虚拟刺绣体验装置，观众可以通过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将传统的粤绣过程带入现实场景中，实现虚拟与现实的无缝对接。这种技术不仅使得粤绣的工艺细节更加生动可见，还能帮助大众理解刺绣技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此外，通过举办生成式艺术展览，AIGC 与粤绣的结合为创新作品提供了新的展示平台。在这些展览中，参观者可以欣赏到融合现代科技元素与传统粤绣技艺的作品，进而重构公众对传统工艺的认知，激发他们对粤绣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这种“虚实共生”的审美教育方式不仅拓展了粤绣的传播渠道，也为培养新的传承人和消费者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推动粤绣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广泛传播。

4.3 建立“区块链 + 非遗”的版权保护机制

在 AIGC 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确保粤绣的版权保护和技艺的安全传承至关重要。为此，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版权保护机制将为粤绣的创作与传播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性为数据和创作信息提供了高度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在粤绣的数字化创作过程中，所有的设计数据、创作过程和成果都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加密处理和记录。这不仅保证了创作过程的透明性，还能确保核心技艺的数据在采集与传输过程中的保密性。通过区块链为 AIGC 生成的粤绣作品提供唯一的数字版权证书，可以明确作品的版权归属，防止作品被盗用或未经授权的传播。此外，这一机制也为传承人提供了法律保障，确保他们的知识产权和创作成果不会遭受侵害，进一步推动 AIGC 技术在粤绣领域的健康发展，确保技术的应用符合伦理规范，并最大限度地保护传统技艺的独特性与创新性。

五、结论

AIGC 技术为粤绣非遗传承创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数字化路径。通过设计范式革新与工艺知识图谱构建，AIGC 技术在纹样创新、工艺解构、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赋能作用，有效提升了粤绣纹样的现代转化效率，实现了工艺隐性经验的显性传承。然而，在应用过程中也面临技术与传统工艺适配性、文化准确性校验及技艺保密等问题。通过构建“AI 设计师+绣娘工匠”协同创新体系、打造“虚实共生”的审美教育矩阵以及建立“区块链+非遗”的版权保护机制等三维度应对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推动 AIGC 技术与粤绣的深度融合与发展。本研究不仅为粤绣的当代传承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其他非遗项目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范式参考，对构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未来，随着 AIGC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有望为非遗传承创新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毛志伟,邢向晖,孙广生.浅谈 AIGC 在通信设计领域的应用[J].邮电设计技术,2023,(07):25-30.
[2] 陈贤昌.跨界融合下现代粤绣题材创新设计与表现[J].设计,2024,37(09):35-38.
[3] 赵春柱.传统外销服饰装饰探究及当代纹饰图案设计[D].江南大学,2023.
[4] 海傲雪.陕西地域文化元素在刺绣艺术中的表现研究[D].西北大学,2018.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Yue Embroide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IGC

Jialiang Li, Shumin Zha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ue Embroidery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the millennial Lingnan culture. Its unique artistic style and craftsmanship system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reas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andicraft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wave, the techniques of Yue Embroidery are facing the shrinkage of market share, the aging of the inheritance group, and the talent gap. The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model is encounter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empowerment of AIGC technology in the innovative inheritance of Yue Embroidery cul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rough the two - dimensional demonstration of design paradigm inno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aftsmanship knowledge graph, it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intelligent generation technology at the levels of pattern innovation, craftsmanship d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verifies the feasible path of digital - technology - driven "living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research also reveals that key issues such as the adaptability contradi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he cultural accuracy verification of intelligently generated content, and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echniques during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 urgently need to be resolv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 dimensional countermeasures: First, construct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of "AI designer + embroiderer craftsman" to achiev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s and manual wisdom, and establish a dynamic craftsmanship database through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Second, create an aesthetic education matrix of "virtual - real symbiosis", and use AR embroidery experience devices and generative art exhibitions to reconstruct the public's value percep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hird, establish a copyright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blockchain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formulate a full - process ethical code covering data collection, model training,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rough the digital path of deconstruction - recombination - recreation, AIGC technology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Yue Embroidery patterns, but also realizes the explicit inheritance of tacit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aftsmanship knowledge graph, opening up dual innovation tracks of "digital craftsman" cultivation and "meta - embroidery" product development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Keywords：Yue Embroidery; AIG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ving Inheritance

第 1 卷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38

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背景下国家与美政治互信对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影响

黄佳丽[1]

（[1]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上海 200233）

摘要：当前全球供应链重要性愈发突出，美国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旨在通过打造美国盟伴阵营加强自身全球供应链参与度优势并打压对手国家，因此一国与美政治互信程度对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影响有着密切关系。以芯片、新能源汽车与关键矿物三大重要战略产业为例，研究发现总体上一国与美政治互信程度越高，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越强。其中，在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背景下，三大产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受到政治互信的影响有所分化，芯片产业与关键矿物产业所受影响相比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更加显著，美国及其盟伴体系在关键矿物产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有显著上升，芯片产业相比于对手国家有所轻微下降。因此，中美两国应该意识到加强政治互信合作从而实现在全球供应链参与度上的务实合作，促进双赢；中国面对美国的战略竞争也要因产业制宜，继续加强新能源汽车行业优势，提升关键矿产行业的附加值出口，加强芯片行业的创新研发投入。

关键词： 供应链；政治互信；全球供应链参与度；中美竞争

一、 导论

全球供应链贸易（Supply- chain Trade）的重要性随着生产国际化带来的货物、技术、投资、服务和人才的频繁跨境流动而日益突出，早在 2014 年就有学者指出，全球供应链贸易蓬勃发展彻底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关系。[1]当前，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干预主义的推动，经济上供应链战略的再岸化（reshoring）逐步取代离岸化（offshoring），全球供应链布局也在发生深刻变革。以美国为代表，自拜登上台执政以来，采取多种措施重塑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企图通过以关键产业为核心的“近岸生产”、“友岸外包”减少美国供应链中对中国的依赖性，实现“去中国化”和“去风险化”，重建自身产业优势。可见，拜登政府重塑供应链战略是与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大趋势的背道而驰，是美国以经济安全为理由实施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战略，不仅是美国在经济竞争上对中国的“竞赢”（outcompete），更加剧了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趋势和全球经济发展的碎片化。

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对各国参与生产分工的全球供应链的重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拜登政府实施的重塑供应链战略之中，明确提出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国，并通过推行近岸化生产加强与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生产联系与经济合作，同时深化与友岸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合作。不难看出，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的诉求之一旨在凭借同盟伴国家的政治互信程度提高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打压对手国家。然而，一国在与美国在政治上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构建的双边关系是否能够提高其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参与程度而相应降低与美政治互信程度低的对手国家参与度？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背景下美国及其盟伴体系是否能够提高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亟待进一步研究。

二、 文献综述

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各国的经济往来不断加深，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生产全球化不再局限于最终商品的交易，资金、技术和人员流动以及跨国企业的频繁活动使得全球经贸往来包含更多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无疑凸显了供应链贸易的重要性。同时，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往来愈发受到彼此间政治关系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气候影响。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指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深化，非军事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在国家间关系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且由此产生更具决定性的权力衡量指标——敏感性与脆弱性——以此来分析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复杂交织。[2]其中全球供应链贸易作为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的重要经贸往来内容，其发展不断受到干扰，尤其是在以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新冠疫情（Coronavirus Pandemic）以及俄乌冲突（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的“3C 危机”为突出代表的全球性问题频发的当下。供应链原本的脆弱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放大，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加紧了对供应链的审查，以期塑造摆脱中国影响的更具韧性的供应链。[3]供应链发展越来越与国家安全挂钩，成为国家维护经济安全与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以供应链生产为基础的国家经贸利益愈发成为国家双边合作的重要内容。

经贸利益以及经济安全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一并突出，随之突出的还有国家将供应链安全作为构建国家间双边关系的核心目标。经济安全化这一概念指出，国家间经济关系中政治安全逻辑对市场自由化逻辑的超越使得对外贸易、投资等跨国经济活动不断呈现出“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的特点。[4]国家以主权安全受到威胁的理由，带有极强的主观性以及对经济问题的政治影响的夸大性，并不断在经贸领域使用政治上的保护手段，以国家间双边关系的巩固加强推动经贸发展。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论强调构造各种行为体关系与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并将权力来源划分为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大基础结构，而基本供应链领域属于生产结构性权力，对于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相互依赖武器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理论中的网络性权力，与结构性权力类似，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网络中中心节点利用非对称优势对其他节点施加影响。[5]从技术供应链角度出发，美国经济安全化的目标与战略重点就是通过加强对高技术供应链体系的控制从而针对中国构造不平等的战略竞争优势，以此深化网络性权力的不对称性并推动供应链权力格局向更不平等的等级化发展。[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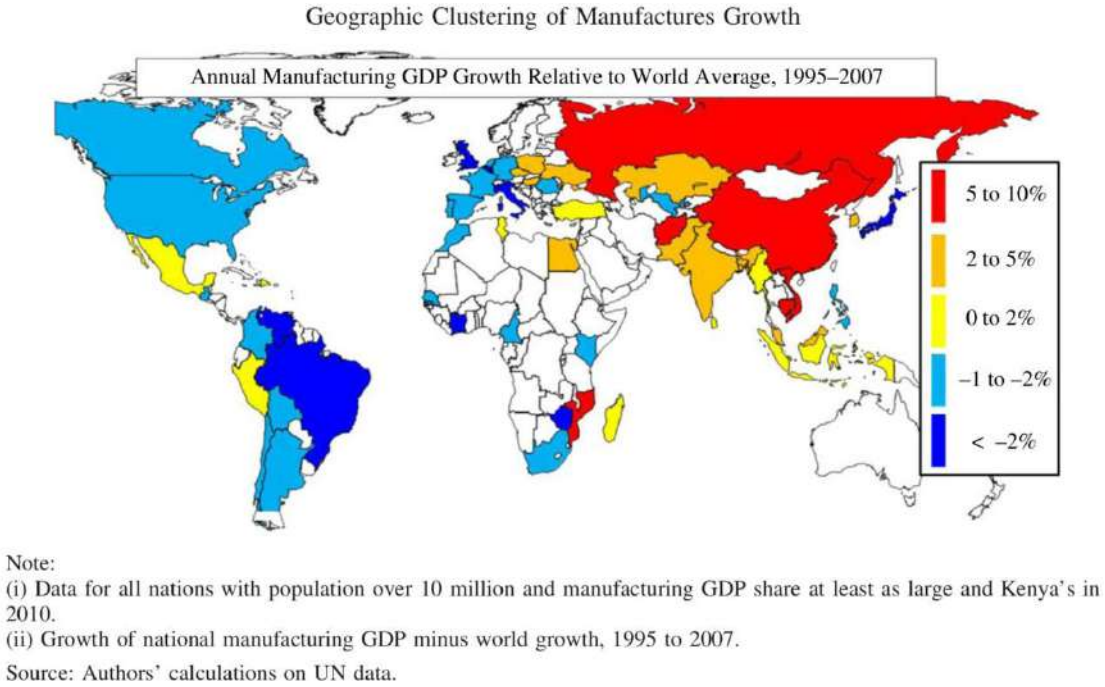
在全球供应链贸易重要性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关于国家间政治互信程度与友好往来对经贸往来的重要影响，鲍晓华、卢波[7]指出各国加强政治互信能够促进国家间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务实合作，显著增加国家间经贸合作利益。国家间的友好互动促进双边政治互信程度不断提高，从而促进各国的经贸合作。[8]而国家间的政治冲突与战争则会使得国家间贸易受损，国家间政治关系越坏，经贸关系随之受损。[9]

综上，现有的研究将各国全球供应链贸易作为国家间政治关系与经贸合作的重要讨论内容，准确阐明了供应链在国家政治与经济领域上的双重重要性；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引入国家权力因素并对权力概念进行了扩充，加强了对一国采取经济安全化战略企图护持其霸权并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战略优势的行为的解释力。但是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国家政治关系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鲜少从全球供应链的视角出发；此外，随着美国拜登政府对供应链重塑战略如火如荼地推进，在这一背景下，相比于对其动因的集中性研究，战略旨在塑造的美国及其盟伴体系供应链参与度优势是否成功未得到体现，同时其对手国家在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变化和影响也值得探讨。任琳指出，[10]霸权国利用相互依赖武器化中的网络性权力从整体和长期来看不但不会产生霸权国期许的加持作用，反而会产生霸权侵蚀效应。因此，探究美国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背景下的国家与美政治互信程度对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影响，是本研究的重要创新点。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全球供应链布局自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至今产生了重要变化。总体来看，随着全球化的第二次解绑

（Globalisation’s 2nd Unbundling），技术流动使得南北国家之间产生生产的分享，因此亚洲所在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供应链在全球制造业发展中发展飞速，从而形成了全球供应链三大分区——亚洲工厂（Factory Asia）、北美工厂（Factory North America)和欧洲工厂（Factory Europe）。[11]从图 1、图 2 可以看出，从全球供应链分区生成至今，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供应链区块影响力始终不容小觑。因此，有理由相信，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上台宣布启动对华贸易战再到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美国的供应链安全化措施不仅趋向政治少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更呈现出对中国的倾向性和针对性。结合参考拜登政府的供应链战略重点以及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产业优势的两大因素，本研究以芯片、新能源汽车和关键矿物行业供应链为重点产业，具体考察国家与美政治关系对该国在上述产业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产生的影响。



Note:
(i) Data for all nations with population over 10 million and manufacturing GDP share at least as large and Kenya’s in 2010.
(ii) Growth of national manufacturing GDP minus world growth, 1995 to 2007.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s on UN data.

图 1 1995-2007 年全球年度制造业 GDP 相对增速的地理分区[①]

[①] 图片来源：Baldwin, R., López-Gonzalez, J. Supply-chain Trade: A Portrait of Global Patterns and Several Testable Hypotheses [J]. The World Economy, 2015, 38(11): 1682-1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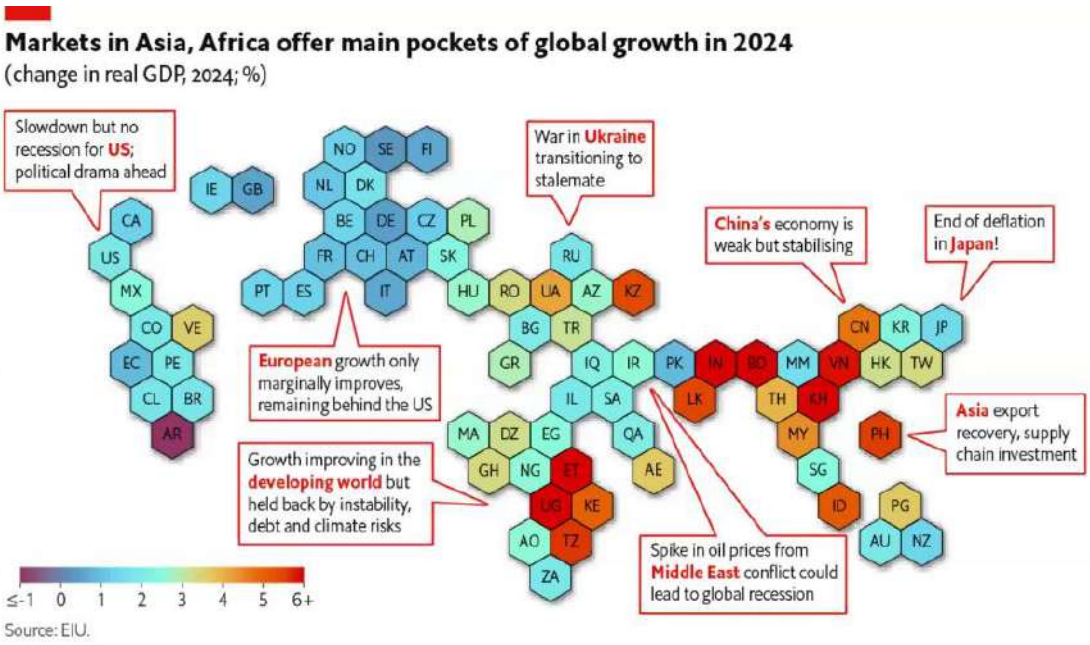


图 2 2024 年全球各国实际 GDP 增速预计对比[①]

以芯片行业为例，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SIA）2023 年 5 月发布的 2023 年美国半导体产业概况《2023 SIA Factbook》，[12]美国 2022 年的芯片销售市场份额占据了全球的 48%，报告称，“保证了美国在主要半导体市场的领导地位”；同时，2022 年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研发支出在总销售额中占比 18.75%，而中国的占比是 7.6%，“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的半导体研发支出”；此外，总部位于美国的半导体公司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的半导体公司在 2022 年占据了半导体总市场份额的 48%，“占据了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半导体销售市场份额的领先地位”。所显示数据足以说明美国对芯片行业的重视，以及从中美之间在芯片供应链中的地位差距可以推断，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企图凭借不对称差异继续遏制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并保持自身及盟伴体系优势。新能源汽车作为中国制造业与出口贸易中的优势产业，自 2016 年以来年销量和保有量持续居于世界首位，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比例达到 66%且当年汽车年出口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出口国，但随之而来的是 2024 年 2 月拜登政府宣布限制中国新能源汽车准入以及其余限制中国新能源汽车向美国出口的措施。[13]朱广芳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 2010-2022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韧性，发现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韧性在逐年提高的同时抗冲击能力仍待增强。[14]因此本研究考察新能源汽车这一中国优势行业在考虑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后一国在该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具时效性。关键矿产一直是美国供应链安全审查的重点，也是近年来学界进行中美大国竞争研究的热门话题，《2022 年美国关键矿产清单》[15]的发布明确界定了美国认为的有供应链断裂风险的关键矿产范围，包含镍、锌等 50 种元素。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稀土供应国，美国在关键矿物供应链中对中国有极强依赖性而脆弱性突出，但中国的紧缺战略性矿产资源也同时面临需求大而供应少且对外依存度高等巨大风险。[16]因此，关键矿产作为重要战略性资源意义突出。

美国作为将供应链安全战略作为地缘竞争战略的代表国家，早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将供应链安全纳入国家战略，普遍认为在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之后美国供应链的经济属性不断被安全化和政治化突出而淡化，但美国供应链战略的明确形成时间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17]因此，本研究主要集中拜登政府旨在追求有韧性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这一大背景，并对其战略政策进行了梳理，如表 1。

表 1 美国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的重要文件

时间	名称	内容简述	涉及领域/措施	提及合作国家/地区

[①] 图片来源：Marro, N., et al. Global Trade Outlook Webinar [R].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24-04-12. https://www.eiu.com/n/webinars/global-trade-outlook/.

2018 年及后续更新	《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2022 年《出口管制条例》）[①]	针对高科技领域（半导体、5G、人工智能）的出口限制，维护美国国家安全	高科技出口限制	美国（本土化）；针对中国
2020 年 2 月及后续更新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②]	审查外国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增加审查类型	外国投资审查	针对中俄及其他“对美科技和军事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
2021 年 2 月 24 日	供应链安全审查行政令[③]	全方位评估和防范供应链风险，复兴美国本土制造业产能与创造就业机会	供应链风险评估	“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2021 年 6 月	“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④]	加强供应链韧性，关注半导体、关键矿产、制药、大容量电池四个关键供应链	关键供应链韧性	“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2022 年 2 月	供应链安全审查行政令年度评估报告[⑤]	审查国防、能源、交通、公共卫生、信息与通信技术以及农产品和食品生产六大供应链	关键基础设施韧性	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墨西哥、印太合作框架（IPEF)、The Quad
2022 年 8 月	《芯片与科学法案》[⑥]	对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巩固产业优势	半导体产业支持	欧盟国家、日韩、台湾地区等
2022 年 8 月	《通胀削减法案》[⑦]	投资气候和清洁能源、医疗保健，支持本土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产业	气候和清洁能源	美国本土、北美地区（美加墨合作）
2022 年 10 月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⑧]	强调关键供应链稳定，制造业回流与流向“友岸”，形成对华竞争优势	供应链稳定与竞争优势	印太地区和欧洲的民主盟友和伙伴

[①] 参见：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Electronic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Title 15, Subtitle B, Chapter VII, Subchapter C -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B/OL]. [2025-02-13].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15/subtitle-B/chapter-VII/subchapter-C.

[②] 参见：U.S. Congress.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H.R. 5841) [EB/OL]. 2018 [2025-02-1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841.

[③] 参见：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Signing of an Executive Order on Supply Chains [EB/OL]. 2021-02-24 [2025-02-1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24/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signing-of-an-executive-order-on-supply-chains/.

[④] 参见：The White House.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e,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100-Day Reviews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017 [R/OL]. 2021-06 [2025-02-1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⑤] 参见：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A Year of Action and Progress [R/OL]. 2022-02-24 [2025-02-1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capstone-report-biden.pdf.

[⑥] 参见：U.S. Congress. CHIPS and Science Act (H.R. 4346) [EB/OL]. 2022-08-09 [2025-02-1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4346.

[⑦] 参见：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EB/OL]. 2022-08-09 [2025-02-13].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inflation-reduction-act.

[⑧] 参见：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OL]. 2022-10 [2025-02-1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023 年 8 月及后续更新	重要技术投资禁止行政令（最终投资限制规则）[①]	限制美国对特定国家的技术投资，涉及半导体、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	技术投资限制	中国及港澳地区
2024 年 1 月	《生物安全法案》[②]	加强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本土化，限制与某些外国生物技术提供商的业务往来	生物医药本土化	美国（本土化），点名部分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2024 年 7 月和 10 月	半导体和超级计算技术出口管制更新[③]	扩展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技术的出口限制，增加对云计算的监管	半导体和云计算管制	中国（包括其实体、分支机构及代工厂），其他“国家关注对象”（如俄罗斯、朝鲜、伊朗）

表格来源：作者根据资料自制。

归纳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的特点，首先，涵盖了本土化、区域化特点，带有明显的新干预主义与少边主义特质。拜登政府在供应链战略中背离自由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方向，将联盟作为改变供应链布局和规则指定的战略工具，大力拓宽美式联盟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明显的封闭式少边主义色彩。[18]其次，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带有极强的对华针对性，明确将中国作为地缘竞争对手，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本质上带有浓重的地缘政治博弈色彩。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的理由与中国在供应链中具有的稳定地位以及美国国内的供应能力不足密不可分，美国企图与中国脱钩断链从而延长自身和盟国的供应链长度，增加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进一步威胁对手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背景下，一国增进与美国的政治互信会提高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相反，与美政治互信不足则会降低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

如图 3 所示，本研究以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为大背景，区分战略所提及的盟伴国和对手国，考察该国该行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是否上升。更进一步地，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与合作伙伴在全球供应链参与度上升，加之敌对国家与威胁国家的参与度下降，则代表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实施符合其预期。

[①] 参见：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ddressing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s in 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Countries of Concern [R/OL]. 2023-08-09 [2025-02-1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3/08/09/executive-order-on-addressing-united-states-investments-in-certain-national-security-technologies-and-products-in-countries-of-concern/.

[②] 参见：U.S. Congress. To Prohibit Contracting with Certain Biotechnology Provider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H.R. 8333) [EB/OL]. 2024 [2025-02-13]. https://www.congress.gov/118/bills/hr8333/BILLS-118hr8333eh.pdf.

[③] 参见：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Addressing U.S. Investments in 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Countries of Concern [EB/OL]. 2024-10-28 [2025-02-1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10/28/fact-sheet-addressing-u-s-investments-in-certain-national-security-technologies-and-products-in-countries-of-conc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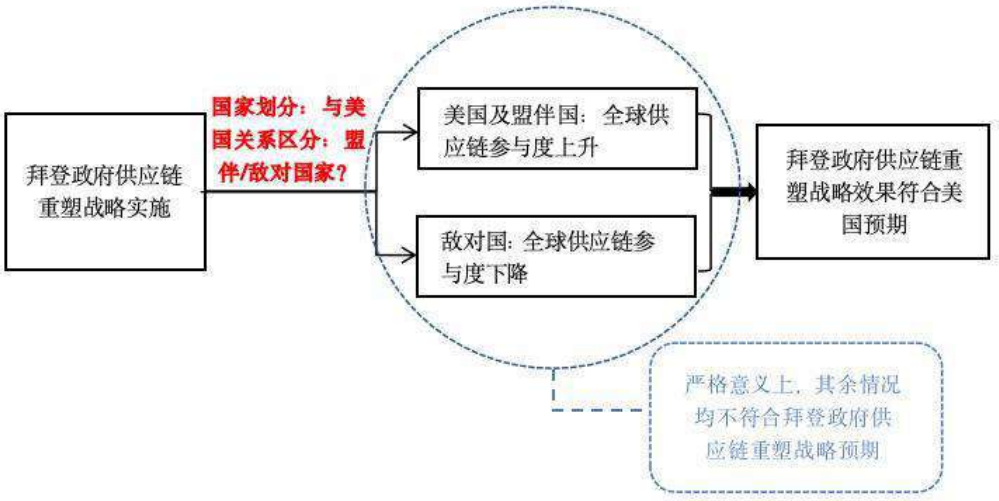


图 3 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背景下与美政治互信与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因果机制图[①]

四、 研究设计

本文采取量化分析与案例研究结合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采取量化回归方法分别得到半导体产业、新能源汽车和关键矿物产业一国与美国政治互信程度和该国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关系，再分别进一步进行案例分析，对结果进行进一步阐述。

（一）、变量设计与指标构建

被解释变量：国家的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参考 Wang 等[19]和 Koopman 等[20]的方法，一国一行业在在全球范围内的间接增加值出口与出口中所含来自全球的国外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值，考虑芯片、新能源汽车与关键矿物行业。结合上文分析与数据可得性，研究选取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 15 个国家在 2018-2022 年在芯片、新能源汽车与关键矿产行业的全球供应链参与度。

（简示：国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 $=\frac{\text{间接增加值出口}}{\text{一国一行业总出口}}+\frac{\text{出口中国外增加值}}{\text{一国一行业总出口}}$）

解释变量：与美政治互信度。政策冲击下，一国与美国关系（按联合国投票与美国统一程度）区分国家性质，根据联合国投票理想点（Ideal Points）位置进行计算，将一国与美国的理想点位置相减取绝对值，数值越小代表两国政治关系越好。[21]因此将结果取相反数，数值越大则表示政治互信度越高。

控制变量：参考赵景瑞等[22]和王茜、叶家钰[23]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亚太价值链重构的研究设计控制变量，尽可能排除国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其他国家层面相关影响因素以控制内生性。包含：政府干预（一国年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经济实力（一国年不变价美元的 GDP）、自然资源禀赋（一国年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的比重）、人均资本（一国年固定资本存量与年就业人数之比）、劳动力结构（一国年 15~64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二）、模型设计

本文借鉴 Nunn 和 Qian 的研究，[24]因考察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的政策影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政策对照组（无从考察有国家完全没有受到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的影响），设计通过广义双重差分法（generalized DiD）考察美国供应链战略中所提及的盟伴体系国家与对手国家与美政治互信程度对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影响。

[①]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首先，本文构造随机效应回归、固定效应回归与时间序列回归模型，考察一国与美政治互信程度对其芯片、新能源汽车和关键矿产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影响：

$$Y_{ijt} = \alpha_0 + \beta_0 D_{ij} + C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其中，Y_{ijt}是 i 国 t 年 j 行业在全球供应链参与度，β_0是自变量回归系数，D_{ij}是 i 国与美国的关系，C_{it}是控制变量，μ_i是个体固定效应，γ_t是时间固定效应，ε_{ijt}是随机误差项。

其次，考察美国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这一政策背景因素，构建广义双重差分回归模型，以 2021 年拜登政府上台作为战略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探究一国在 2018-2022 年与美政治互信程度对其芯片、新能源汽车与关键矿产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影响：

$$Y_{ijt} = \alpha + \beta（D_{ij} \times T_t）+ C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2)$$

Y_{ijt}是 i 国 t 年 j 行业在全球供应链参与度，β是双重差分系数，交互项$D_{ij} \times T_t$是核心解释变量，C_{it}是控制变量，μ_i是个体固定效应，γ_t是时间固定效应，ε_{ijt}是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

OECD-WTO Database on Trade in Value-Added 数据库、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ADB-MRIO）数据库、UIBE GVC Database、所选取国家官方统计局、WTO 官网、世界银行官网、联合国官网、白宫官网等。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数据说明

根据研究设计重点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 2018-2022 年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 15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涵盖 2018-2022 年芯片、新能源汽车和关键矿产行业的数据。根据 OECD TiVA、ADB-MRIO、UIBE GVC 数据库对三个行业的指标覆盖，以及各国投入产出表的统计分类，选取所属行业分类基本大类目进行测算回归。[①]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VCPT_C	芯片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0.697	0.283	0.247	1.321
GVCPT_V	新能源汽车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0.589	0.244	0.116	1.339
GVCPT_M	关键矿产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0.612	0.319	0	1.136
lnGDP	经济实力（一国年不变价美元的 GDP，取对数）	15.101	0.908	13.249	17.228
lnpercapital	人均资本（一国年固定资本存量与年就业人数之比，取对数）	18.456	1.363	15.512	21.072
lngov	政府干预（一国年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取对数）	3.221	0.326	2.649	3.949
lnlabor	年龄结构（一国年 15~64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加 1 取对数）	4.192	0.059	4.068	4.338
nature	自然资源禀赋（一国年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的比重）	2.232	3.743	0	18.5
countryrelation	一国与美国政治关系（理想点差距）	2.032	1.002	0	3.752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①] 因数据可得性，根据所选数据库与各国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以电子与光学原件装备统计数据衡量芯片所属产业大类数据，以汽车和交通装备数据衡量新能源汽车所属产业大类数据，以矿产与开发采掘数据衡量关键矿物所属产业大类数据。

2、各国芯片、新能源汽车与关键矿产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图

如图 4 所示，以 2018-2022 年美国等 15 国芯片行业所属大类产业进行全球供应链参与度折线图绘制，前后向参与度加总后，能够看出越南和墨西哥的参与度较高，并且呈现出一定的波动趋势，其参与度虽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但这种高参与度并不直接等同于高附加值。相反，这可能意味着这些国家主要从事的是供应链中的低端环节，如组装和基础制造等附加值较低的工作。这些任务通常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技术含量和利润率相对较低，导致尽管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高，但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和创新能力提升有限[①]。相比之下，美国、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且变化趋势较小，显示出这些国家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中的稳定地位。具体分析 2018-2023 年中美两国的半导体出口金额变化（图 5），可以发现中国总体呈现大幅度上升赶超美国的趋势，意味着美国在供应链中的出口优势正逐步被中国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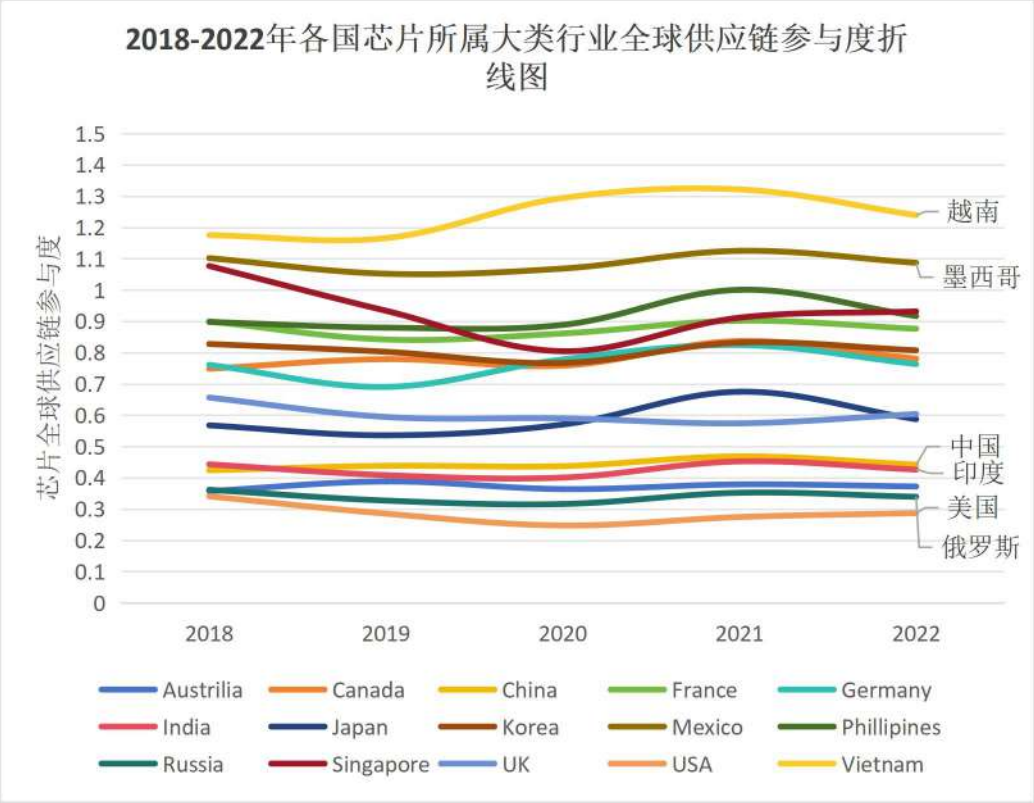


图 4　2018-2022 年各国芯片所属大类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②]

[①] 相关论述可见：吕越, 陈帅, 盛斌. 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 [J]. 管理世界, 2018, 34(8): 11-29.；王玉燕, 林汉川. 全球价值链嵌入能提升工业转型升级效果吗——基于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11): 51-61.

[②]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数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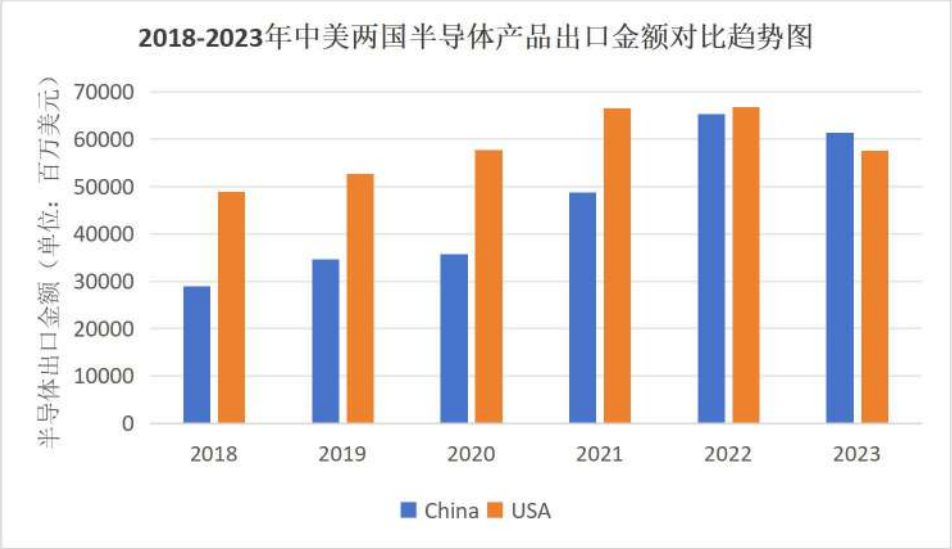


图 5　2018-2023 年中美两国半导体产品出口对比趋势图[①]

以 2018-2022 年美国等 15 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所属大类产业绘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折线图，如图 6，前后向参与度加总后，发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参与度优势明显大于美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参与度虽然也相对较高，但与中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这反映了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日益增强的竞争力。具体分析 2018-2023 年中美两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变化（图 7），可以发现中国在 2021 年开始出现大幅度攀升，并大比例超过美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不难看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供应链领域中占据较大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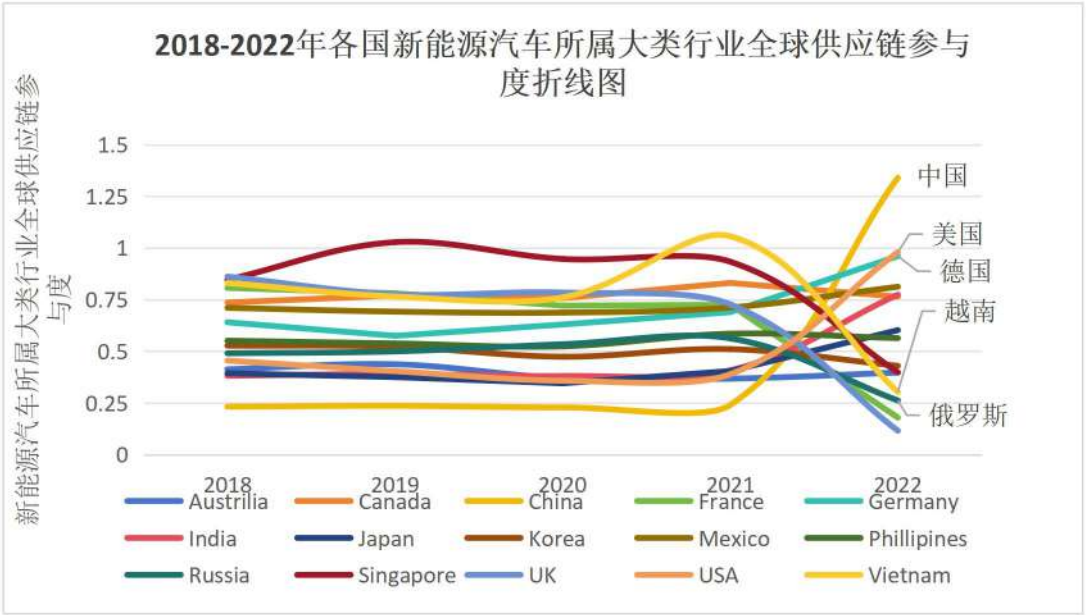


图 6　2018-2022 年各国新能源汽车所属大类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②]

[①]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数据整理。
[②]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数据整理。

图 7　2018-2023 年中美两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对比趋势图[①]

2018-2022 年美国等 15 国关键矿产行业所属大类产业绘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折线图如图 8，能够看出中美两国参与度均较低，且相比于美国来说，中国在关键矿产全球供应链上的参与度更低。这反映出在这些关键矿产产业中两国的需求偏向内需，而非全球供应链的参与，且中国更加集中在供应端而非深入链上各个环节[②]。而图 9 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在 2018-2023 年贵金属出口金额，不难发现中国在贵金属出口的金额占比中不及美国，反映出两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同的角色分工，美国可能更专注于如研发和关键技术生产等高附加值的环节，而中国则可能更多凭借价格优势参与原材料供应和初步加工等环节。

[①]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整理。

[②] 相关论述见： 李建武, 马哲, 李鹏远. 美欧关键矿产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2, 37(11): 1560-1565.；赵霞, 郭亚宁. 欧美关键矿产战略布局及影响研究 [J]. 情报杂志, 2024, 43(4): 54-59.；孙海泳. 美国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布局、制约因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J]. 太平洋学报, 2024, 32(6): 4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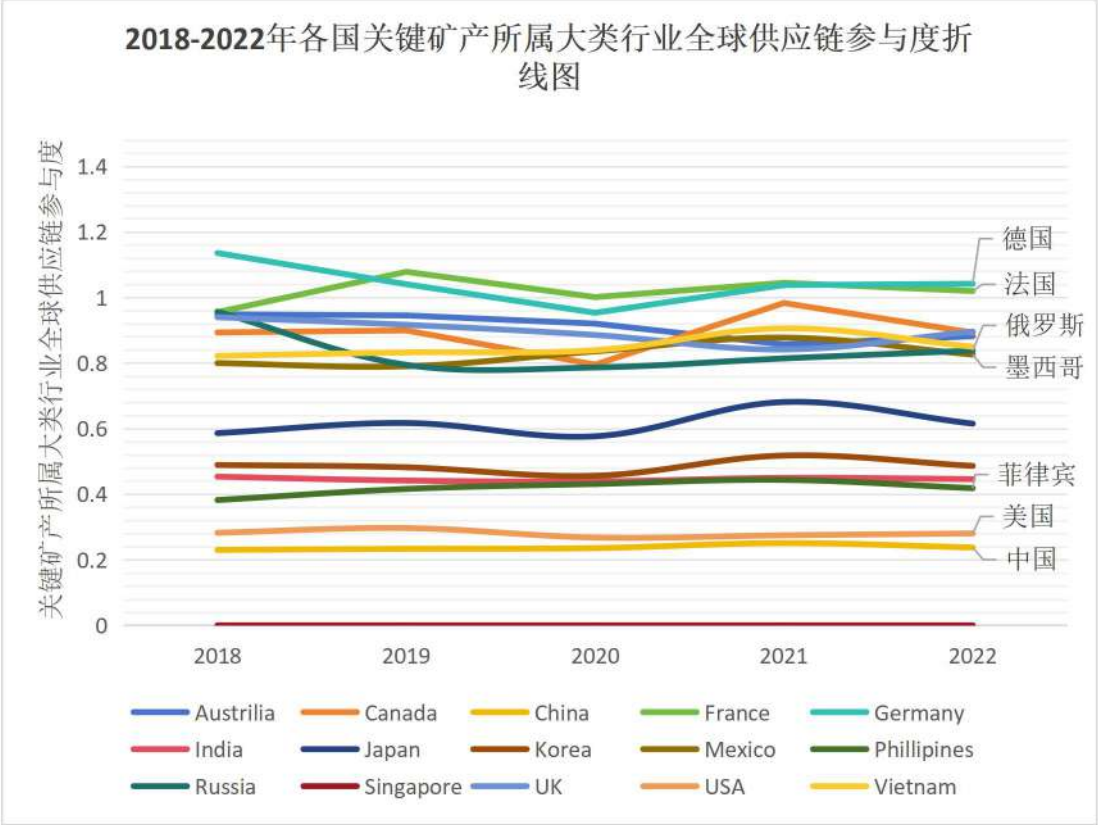


图 8　2018-2022 年各国关键矿产所属大类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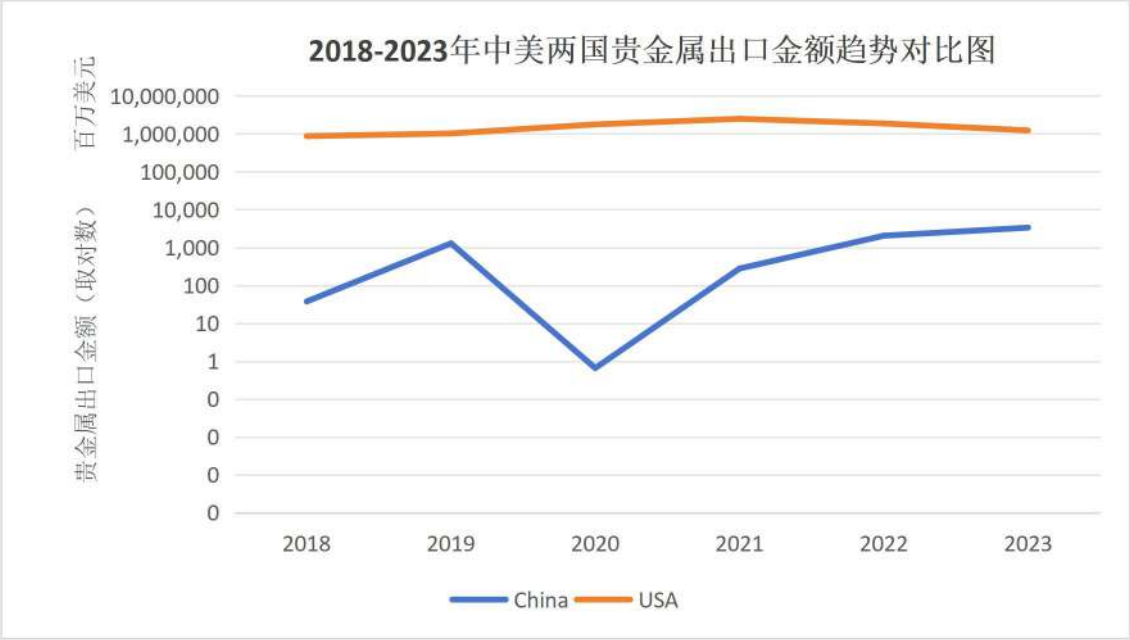


图 9　2018-2023 年中美两国贵金属出口金额趋势对比图[②]

（二）、回归结果

1、基准回归

首先根据模型（一）进行随机效应、固定效应和时间序列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以一国与美国关系作为自变量，一国在三大产业供应链的全球参与度为因变量，三类回归显著性都较强，且总体上为正

[①]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数据整理。
[②]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数据整理。

数。其中，在随机效应回归下，一国与美国政治互信关系与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呈现正相关，芯片行业中一国与美国关系每提高 1%，该国全球供应链参与度提高 13.7%；在个体与时间双重固定回归的结果下，美国以及一国与美国关系越好的国家，在三大产业供应链全球参与度都越高，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新能源汽车行业体现出一国与美国关系每提高 1%，全球供应链参与度提高 45.33%。而关键矿产供应链则呈现出更明显的显著性，在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系数为 25.89。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随机效应回归、固定效应回归与时间序列回归								
	模型（一）								
	（1）			（2）			（3）		
	countryrelation			countryrelation			countryrelation		
GVCPT_C	0.1370***			0.3363			0.1396***		
	（5.20）			(0.98)			（6.04）		
GVCPT_V		0.0221			0.4533*			0.0314	
		（0.47）			(1.39)			（0.40）	
GVCPT_M			1.1438*						-0.6554***
			（1.46）			25.8894***			
						（5.62）			（-17.53）
lnGDP	-0.1095	-0.1221	1.7688	-0.0802	-0.1336	2.6516*	-0.1753***	-0.1328	-0.1492*
	（-1.25）	（-1.46）	（1.27）	(-0.64)	(-1.11)	（1.57）		（-1.04）	（-1.56）
							（-5.71）		
lnpercapita	-.0296	-0.0056	-0.2801	-1.1949	5.8165	101.0666*	-0.0129	0.0014	-0.1869***
l	(-0.51)	（-0.10）	（-0.30）	(-0.34)	(1.71)	（2.11）	（-0.56）	（0.02）	
									（-3.25）
lngov	0.0494	0.0545**	-0.2058	0.0843**	0.0947**	-1.1534**	0.0538***	0.0485	-0.2679***
	(1.47)	（1.70）	（-0.38）		(2.38)	（-2.06）	（3.78）	（1.10）	
				(2.03)					（-9.11）
lnlabor	-0.5028	0.1037	2.5817	5.6131	-2.3117	-88.6444	0.2603*	0.0451	0.4671
	（ -0.67）	（0.14）	（0.21）	(1.01)	(-0.43)	（-1.18）	（1.43）	（0.04）	（1.25）
nature		-0.0206*	-0.1249	-0.0233	-0.0374**	0.1204	-0.0046	-0.255*	-0.0483***
	-0.0284**	（-1.84）	（-0.67）	(-1.18)		（0.45）	（-0.15）	（-1.40）	
	（ -2.42）				(-1.98)				（-3.62）
常数项	4.6129*	1.9810	-32.0932	-0.4672	-96.1230*		2.0462*	2.2582	6.8666***
	（1.37）	（0.62）	（-0.60）	(-0.01)		-1581.709**	（2.36）	（0.45）	（3.07）
					(-1.46)				
						（-1.71）			
时间固定效应	N	N	N	Y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N	N	N	Y	Y	Y	N	N	N
R^2	0.24	0.17	0.11	0.12	0.09	0.05			

注：***、**、*分别表示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1)(2)组括号内为 t 统计量，(3)组括号内为 z 统计量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2、广义双重差分回归与稳健型检验

（1）、广义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以与美政治互信关系和以 2021 年作为政策实施时间节点的 2018-2022 年的时间作为交互项变量，一国在三大产业供应链的全球参与度为因变量，进行广义双重差分回归。根据表 4 结果可以看出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实施背景下一国与美政治互信关系不同对三大产业产生差异化影响。在芯片产业和关键矿产行业呈现显著性，而新能源汽车行业回归结果不具有明显显著性。政策实施后，芯片产业供应链中美国及其盟伴国家参与度反而降低，与美国关系提高 1%，芯片全球供应链参与度下降 5.7%；关键矿物产业呈现 0.001 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相关性系数达到 2.58，由此推断在关键矿物产业中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实施针对对手国家较为成功。

表 4 广义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及稳健型检验

变量	广义双重差分回归模型（二）					
	（4）	（5）	（6）	（7）	（8）	（9）
	Time*Treat			安慰剂检验：Time*Treat_new		
GVCPT_C	-0.057*			0.0105		
	(-0.73)			（0.51）		
GVCPT_V		-0.016			-0.0298***	
		(-0.21)			(-2.71)	
GVCPT_M			2.577***			-0.0251
			(2.23)			(-2.38)
Time	0.2918	0.3389**	-0.2859			
	（1.44）	(1.78)	(-0.10)			
Treat	0.4156	0.4630*	23.5233***			
	(1.13)	(1.35)	(4.76)			
Time_new				-0.3612	0 .0171	0.0031
				(-1.07)	(1.11)	(0.2)
Treat_new				0.1159***	-0.0301	0 .0264
				(3.38)	(-0.91)	(0.38)
lnGDP	-0.0440	-0.0888	2.6960*	0.0537	-0.0162	-0.0933
	(-0.34)	(-0.74)	(1.57)	(0.51)	(-0.37)	(-0.55)
lnpercapital	-3.6255	1.5914	64.4582	-0.1305***	-0.0989***	0.0177
	(-0.86)	(0.40)	(1.14)	(-2.85)	(-2.65)	(0.13)
lngov	0.1038**	0.1319***	-0.7714	-0.0423**	-0.0075	-.0445
	(2.23)	(3.03)	(-1.23)	(-1.88)	(-0.36)	(-0.72)
lnlabor	10.2779*	5.0063	-40.3596	-0.1917	-0.5285	-1.2395*
	(1.54)	(0.80)	(-0.45)	(-0.22)	(-0.75)	(-1.30)
nature	-0.0292*	-0.0471**	0.0503	0.0039	0 .0006	0.0226***
	(-1.44)	(-2.48)	(0.18)	(1.25)	(0.15)	(7.54)
常数项	24.037	-49.6888	-1105.941	2.9887	4.9175*	6.9842**
	(0.33)	(-0.72)	(-1.12)	(0.72)	(1.55)	(1.73)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R^2	0.25	0.21	0.25	0.39	0.47	0.28

注：***、**、*分别表示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2）、广义双重差分回归稳健型检验结果

根据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结果，平行趋势图（图 10、11、12）呈现出以 current 为政策实施节点，芯片产业和关键矿产行业政策实施的效果随着时间发展和政策节点变化具有较明显性，相比而言新能源汽车行业显著性较弱，符合回归结果。安慰剂检验中，将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提前为 2019 年，时间范围限制在 2018-2020 年，并且将差分回归交互项变量改为时间和理想点的交互项，可以看出芯片产业和关键矿产结果不显著，而新能源汽车行业显著，与原回归结果相反，通过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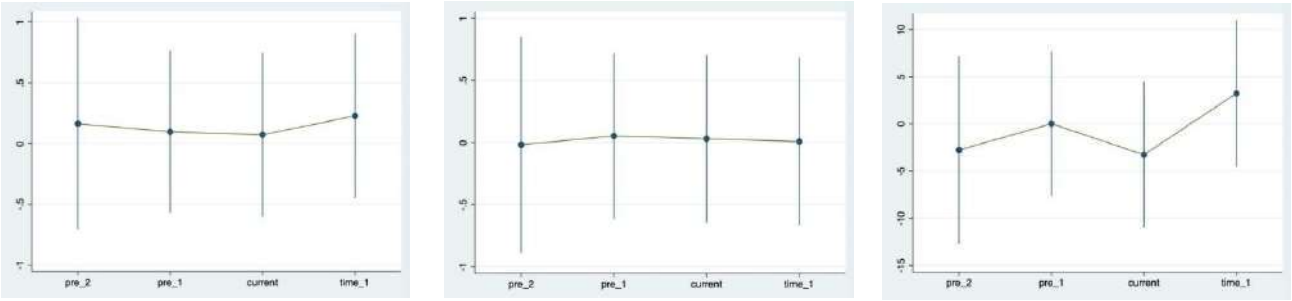


图 10-12 芯片、新能源汽车、关键矿产行业政策效果平行趋势检验[①]

3、结论总结

在美国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的大背景下，国家与美政治互信程度对全球供应链参与度起到显著作用，一国与美国关系建立政治互信的程度越高，总体上来说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越强。

美国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实施背景下，各国与美政治互信程度对其在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不同，呈现出分化差异。在关键矿产行业供应链中，与美国政治互信程度低的国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受损程度相比而言较高，而在芯片产业供应链参与度有所上升，新能源汽车产业供应链参与度则未受显著影响；与美国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在关键矿产行业供应链中参与度显著受益，但在芯片产业供应链参与度轻微下滑。

进一步推断，美国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总体上不符合政策塑造全球供应链参与预期。虽然在关键矿产行业中，与美国政治互信程度弱的国家所受冲击最大，但在芯片产业中，美国及与美国政治互信程度越高的国家在美国实施供应链战略后反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下降，同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美国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并未对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起到显著作用。

六、 案例分析

（一）、半导体：美台联合对中“围堵”，制华结果并不如意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对于与其政治互信程度较低的国家冲击小，与美政治互信程度低的国家在芯片产业供应链参与度反而未出现下滑趋势。以拜登政府对台半导体产业政策影响为案例，拜登政府半导体政策着重以《芯片与科学法案》（The CHIPS Act of 2022）为核心，[②]呈现出以正向补贴投资和反向约束管制的特点，其中“护栏条款”[③]更是直指中国，指出接受美国政府补助的半导体实体

[①]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②] 参见：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 Transportation, The CHIPS Act of 2022 [EB/OL]. 2022-08-03 [2025-02-13].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services/files/592E23A5-B56F-48AE-B4C1-493822686BCB.

[③] 参见：U.S. Congress, H.R.4346 - Chips and Science Act [EB/OL]. 2022-08-09 [2025-02-1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4346.

企业不得在中国参与半导体发展的相关交易行为，违者将撤回补助，同时美国带头构建以排华性为根本特点的半导体产业联盟，组建了以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为核心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在这些政策背景下，台湾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也是全球半导体企业龙头之一的台积电于 2020 年宣布赴美投资设厂，并在 2022 年继续扩大投资规模。在这样的形势下，台积电却并未保持持续强劲的增长势头，根据台积电 2023 年年报，2023 年台积电营业净利润相比于 2022 年下降了下降了约 12.85%，[①]同时，2023 年台湾半导体产业产值相比于 2022 年预计衰退 10.2%，而 2023 年美国半导体市场总销售额较 2022 年衰退 5.3%。[②]在美台合作并未取得自身强势增长的同时，对中国的遏制也并未取得理想效果。据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SEMI）报告预计，2024 年中国芯片制造商预计将保持 15%的产能增长，几乎占据行业总产能的三分之一，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台湾地区的 4%增长率。[③]

该案例不仅从一定程度上印证量化结果反映的美国及与美国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在美国实施供应链重塑战略后反而在全球芯片产业供应链中的参与度下降，更说明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在半导体行业中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从而验证了假设。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领域进行的“小院高墙”战略旨在以排他性和对华针对性构建少边主义美式联盟，兼具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美国以期借此达到强化自身优势并遏制中国从而进一步护持霸权的预期目的，但事实上却对本国芯片发展造成了损害，也并未为其盟友带来强势增长。

（二）、新能源汽车：美对华 EV 进口关税加增至 100%，保护主义态势严峻

2024 年 5 月 14 日，拜登政府宣布美国进口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原有的 301 关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征关税，将原有的 25%关税税率提高到 100%。[④]拜登政府宣布颁布此项政策的背后首先体现了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激烈竞争趋势与产业干预政策愈加强烈的交织，更体现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大发展优势无法轻易被美国保护主义政策撼动，因此拜登选择继续加码。根据 2024 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与麦肯锡共同发布的全球新能源汽车联合研究报告，2023 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占全球销量的 58%，其中中国品牌在本土市场的销量占比高达 83%，并且 2023 年新能源汽车出口 173 万辆较 2022 年同比增长 55%，到 2030 年中国销量前十车企市场份额预计能够突破 90%并且中国车企在全球销量前十大车企中预计有望占据多个席位，重塑全球新能源汽车工业格局。[⑤]

一方面，拜登政府在 2024 年对于进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关税政策继续大幅度加码，以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大表现都能够说明量化结论中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背景下与美政治互信程度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并未对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起到显著作用。另一方面，在拜登政府提出的供应链重塑战略构想中，依靠相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是其盟伴基础，中国电动汽车出口越来越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严格审查，但从新能源汽车行业领域中国依旧强劲的增长表现看来，美西方合作围堵并未起到显著效果。

（三）、关键矿物产业：中美关键矿产政策调整，战略竞争升级

自 2021 年拜登政府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着重指出关键矿产供应链战略并于 2022 年更新关键矿产清单，在此后美国围绕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对华竞争逐步升级。2022 年 8 月颁布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⑥]激励关键矿产的国内开发，并加大对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关键矿产原料的投资，同期发布

[①] 数据参见：台积电官网. TSMC Annual Report 2023 (II) [R/OL]. 2024-03-12 [2025-02-13]. https://investor.tsmc.com/static/annualReports/2023/english/ebook/index.html.

[②] 数据参见：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TSIA）2023Q4 及全年台湾 IC 营运结果出炉 [R/OL]. 2024-02-18 [2025-02-13]. https://www.tsia.org.tw/PageList?nodeID=19.

[③] 数据参见：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全球半导体晶圆厂产能预计 2024 年增长 6%，2025 年增长 7% [R/OL]. 2024-06-18 [2025-02-13].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10605e7a37fd4964a0e79cbbc90cbe36.html.

[④] 参见：Memorandum on Ac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Related to the Statutory 4-Year Review of the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R/OL]. White House, 2024-05-14 [2025-02-1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4/05/14/memorandum-on-actions-by-the-united-states-related-to-the-statutory-4-year-review-of-the-section-301-investigation-of-chinas-acts-policies-and-practices-related-to-technology-transfer-intellectua/

[⑤] 数据参见：McKinsey & Company. “Global Electric Vehicle Market Penetration to Reach 50% by 2030” [R/OL]. 2024-02 [2025-02-13]. https://www.mckinsey.com.cn/2030 年全球乘用车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将达 50/.

[⑥] 参见：White House. Building A Clean Energy Economy: A Guidebook to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s Investment in Clean Energy and Climate Action [EB/OL]. 2022-08 [2025-02-13].

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也提到半导体产业中所需的关键矿物供应链保护，强调对于关键矿物原料生产来说应避免芯片生产供应链断裂。2022 年 11 月颁布《两党基础设施法》，[①]通过资金支持减少对锂、钴和稀土元素的进口依赖。在与盟友合作方面，拜登政府在 2022 年发起“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②]旨在加强清洁能源和先进技术领域中所需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涵盖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主要盟友国家。2023 年 3 月美日签署《日美关于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协议》（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gn Critical Minerals Agreement），[③]2023 年 5 月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澳美气候、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转型条约》(Australia-United States Climate, Critical Minerals, and Clean Energy Transformation Compact)，[④]都旨在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为应对美国日益严峻的竞争姿势，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与矿产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在 2024 年和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地区展开矿产资源项目合作，避免关键矿产产生断裂风险。

从中美两国对于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政策调整能够看到，中国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方面存在风险。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高度依赖进口，且进口具有高度集中性，[25]中国虽是关键矿产中一些矿物的高存量国，但是国内消费需求高使得供不应求的同时，在许多种类中仍需要依赖进口；同时，中国依赖进口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一部分内部政局动荡，另一部分则是美国的盟伴国家，因此中国的关键矿产较大程度上受美遏制，反映出量化部分结论中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背景下与美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中参与度高。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24 年 5 月发布的《2024 全球关键矿产展望报告》，[⑤]中国在关键矿产开发和投资中更加关注和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有关的锂、镍和钴等电池金属，美国关注关键矿产供应链多样化的背景下，印度尼西亚、非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全球供应中的份额显著且影响力巨大。由此看来，关键矿产在芯片和电动汽车电池中扮演基础性核心角色，更需要中国更加关注美国及其盟伴国家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报告同时指出，预计到 2030 年，近 50%的精炼市场价值集中在中国，超过 90%的电池级石墨和 77%的精炼稀土元素会来自中国，这是中国在供应链安全中的一大显著优势。因此，中国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国家带来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威胁能够有应对基础，但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升级的严峻形势或将长期存在。

七、 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前全球经济形成以供应链生产全球化为核心的格局，各国在经贸交往中愈发注重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美国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的实施着重强调对美国及盟伴国家在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保护，同时摆脱对对手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依赖。该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一国与美政治互信程度成为对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芯片、新能源汽车和关键矿产行业的战略重要性突出。经过研究发现，第一，国家与美政治互信程度对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起到促进作用，一国与美国关系建立政治互信的程度越高，总体上来说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越强。第二，聚焦到各个行业，关键矿产行业中美国及其盟伴国家全球供应链参与度显著上升，与美政治互信程度较低的美国对手国家参与度下降；新能源汽车行业中该战略背景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2/Inflation-Reduction-Act-Guidebook.pdf.

[①] 参见：U.S. Congress.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 Public Law No. 117-58 [EB/OL]. 2021-11-15 [2025-02-1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3684/text.

[②] 参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 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EB/OL]. [2025-02-13]. https://www.state.gov/minerals-security-partnership/.

[③] 参见：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gn Critical Minerals Agreement [EB/OL]. 2023-03-21 [2025-02-13].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3/march/united-states-and-japan-sign-critical-minerals-agreement.

[④] 参见：White House. Australia-United States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 An Alliance for our Times [EB/OL]. 2023-05 [2025-02-1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australia-united-states-joint-leaders-statement-an-alliance-for-our-times/.

[⑤] 内容和数据参见：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Global Critical Minerals Outlook 2024 [R/OL]. 2024-05 [2025-02-13].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ee01701d-1d5c-4ba8-9df6-abeeac9de99a/GlobalCriticalMineralsOutlook2024.pdf.

下国家与美政治互信未对供应链参与度产生显著影响；芯片产业中与美战略预期相反，与美政治互信程度越高的国家在全球供应链参与度有轻微下降。因此，对华而言，与美国政治互信程度较低会对其供应链参与度有所损害；新能源汽车行业作为中国的优势产业，中国仍能在全球供应链参与中保持优势；芯片产业参与度有轻微上升，但优势并不明显；相比之下，关键矿产行业的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受到较强冲击。中国在拜登政府实施供应链重塑战略的背景下应该如何应对是当下面临的关键问题。

首先，中美两国应该意识到加强彼此间政治互信程度能够共同提高两国在全球供应链参与度方面的国家利益，寻求求同存异的合作是彼此利益最大化的共同追求。中美大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下，两国构建政治上的互信合作关系能够增加经贸领域的利益，提升双方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

其次，在美国拜登政府供应链重塑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面对美国对国际交往中国家间关系进行明显的阵营划分与对立构筑，中国应该守住优势，加强回防。中国应该加强新能源汽车的供应链参与度优势，在创新开发和市场开拓方面深入推进，政府继续通过减税补贴和加大创新投入资金等措施提高新能源汽车全球供应链的参与度；在关键矿产行业中国目前已经有相应的反制出口应对措施，今后的关键矿产出口应该注重增强附加值的优势，而非简单的原料净出口；在芯片领域，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创新开发上的科研与资金投入，努力弥补企业在研发资金上与美国的差距，同时发挥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加强中国供应链参与度的竞争力。

最后，中国应该继续深化国家间政治互信程度从而推动多领域供应链合作共赢。中国持续坚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不动摇，推动打造以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通过双边政治互信关系的打造巩固经贸领域合作，从而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实现多个产业中的合作共赢，充分发挥政治合作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 Baldwin, R., Robert-Nicoud, F. Trade-in-Goods and Trade-in-Tasks: An Integrating Framework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92(1): 51-62.

[2] 基欧汉, R., 奈, J. 权力与相互依赖 [M]. 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4-56.

[3] 王中美. 欧美供应链韧性战略的悖论与中国应对 [J]. 太平洋学报, 2022, 1: 36-50.

[4] 任琳，孙振民. 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 6: 83-109, 158-159.

[5] Farrell, H., Newman, A. L.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44(1): 42-79.

[6] 唐新华. 联盟与枢纽："经济安全"重塑技术权力体系 [J]. 美国问题研究, 2023, 2: 99-122, 222-223.

[7] 鲍晓华，卢波. 政治互信能否促进务实合作：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J]. 财经研究, 2022, 4: 109-123.

[8] 杨攻研，刘洪钟. 政治关系、经济权力与贸易往来: 来自东亚的证据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 12: 110-130, 159-160.

[9] 杜映昕. 国家间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文献综述及基于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实证研究 [J]. 经济学报, 2015, 2: 124-144.

[10] 任琳，孟思宇. 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2, 39(5): 53-77, 3-4.

[11] Baldwin, R., López-Gonzalez, J. Supply-chain Trade: A Portrait of Global Patterns and Several Testable Hypotheses [J]. The World Economy, 2015, 38(11): 1682-1721.

[12]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 2023 Factbook [R].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May 2023. 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wp-content/uploads/2023/05/SIA-2023-Factbook_1.pdf.

[13] 封凯栋, 陈俊廷. 改变世界的新机器？——新能源汽车全球竞争的前景 [J]. 文化纵横, 2024(2): 75-88, 159.

[14] 朱广芳.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韧性评价研究 [J]. 中国物价, 2024(4): 23-28.

[15] U.S. Geological Survey. 2022 Final List of Critical Minerals [R]. U.S. Geological Survey,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2022-02-22. https://d9-wret.s3.us-west-2.amazonaws.com/assets/palladium/production/s3fs-public/media/files/2022%20Final%20List%20of%20Critical%20Minerals%20Federal%20Register%20Notice_2222022-F.pdf.
[16] 于宏源. 关键矿产的大国竞合分化、治理困境和中国选择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15): 83-90.
[17] 孙成昊, 申青青. 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 [J]. 美国研究, 2023, 37(1): 113-137.
[18] 王中美. 少边主义、美式联盟及对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影响 [J]. 太平洋学报, 2024, 32(1): 57-71.
[19] Wang Z. et al.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677, 2013.
[20] Koopman et al.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2): 459-494.
[21] 鲍晓华, 卢波. 政治互信能否促进务实合作：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J]. 财经研究, 2022(4): 109-123.
[22] 赵景瑞, 孙慧, 郝晓. 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J]. 西部论坛, 2021, 31(4): 1-17.
[23] 王茜, 叶家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影响 [J]. 国际商务研究, 2024, 45(2): 1-15.
[24] Nathen Nunn, Nancy Qian. The Potato's Contribution to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a Historical Experi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6): 2015-2041.
[25] 万军，陈震. 中国关键矿产供应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J]. 世界知识，2024(4)：22-25.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Trus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Global Supply Chain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upply Chain Reshaping Strategy

Huang Jiali[1]

[1]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upply chain reshaping strategy aims to strengthen the United States' advantage in global supply chain participation by building alliances and suppressing rival nations. Therefore, the level of political trust between a count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global supply chain participation. Taking three strategic industries—semiconductors,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critical minerals—as example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general,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olitical trus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ronger a country'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upply chain reshaping strategy,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trust on global supply chain participation varies across these industries. The semiconductor and critical minerals industries are mo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political trust compared to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of critical mineral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s seen a slight decline compared to rival

nations. Therefore,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to achieve pragmatic collabor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 participation, promoting mutual benefits. In response to 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a should tailor its strategies by industry,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its advantages in the new energy vehicle sector, enhancing the value-added exports of critical minerals, 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and R&D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Keywords： Supply Chain; Political Trust; Global Supply Chain Participation; U.S.-China Competition

第 1 卷 第 2 期
2025 年 3 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2
Feb. 202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36

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的建构与磨合

倪诗云[1]
（[1]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广东 佛山 528231）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博士教师是艺术类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队伍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具有重要意义。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的建构直接关系到现代艺术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但由于学术资源匮乏、团队支撑不足、教学任务繁重和职业认知偏差等诸多现实因素的存在，共同体的建构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要从实践出发，着眼师生福祉，优化资源配置，增强职业认同；坚持“四位一体”人才工作，拓宽引进渠道，科学规划发展；勇于先行先试，探索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发展新模式，促进艺术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艺术类高职院校，博士教师，共同体

一、 研究背景

伴随着全球经济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加剧，就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2024 年在一些社交媒体上被称为“博士学历贬值元年”“博士学历断崖式贬值之年”。作为博士就业的主要方向的本科院校教职逐渐趋于饱和，普通高等学校相关招聘策略和入职待遇多次调整，考核要求不断提升。在复杂多变的就业形势下，博士入职高职院校现象屡见不鲜。所谓高职院校，是指区别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承担高等职业技术教学任务、培养应用型和技术性人才的学校。[①]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现代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教师素养和教育质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2021 年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师风师德建设，全面提升教师素养。”2022 年发布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还强调“实施职业教师学历提升行动。”博士作为高等教育的高层次人才，对于提升高职教育质量、促进产业融合和打造特色职业教育品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截至 2024 年 10 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有专任教师 1656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教师占比 49.1%。[②]越来越多高职院校基于学校发展需要积极引进博士人才，高职院校也成为博士主要就业领域之一。然而，相对于发展迅猛的科学技术类高职院校，艺术类高职院校在科研经费投入、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等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同时由于博士培养模式与高职教育需求不匹配、博士职业发展路径不明确和部分艺术类高职院校学术资源不充足等多种因素的局限，博士教师与艺术类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仍处于磨合期。

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博士“扎堆”入职高职院校的现象。有专门对高职院校博士教师引进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的，例如闫子靖和曹晔对高等职业学校新增专任教师的来源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博士学历

[1] 作者简介：倪诗云（1995-），女，汉族，广西桂林人，广东艺术职业学院艺术人文学院讲师（广东佛山，510640），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文系博士，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粤剧粤曲史、职业教育。

① 郝天聪.应用导向 高职院校科研定位及其实践逻辑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2:9.
②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学校简介[EB/OL]. [2024-10-21].https://www.szpu.edu.cn/xxgk/xxjj.htm.

教师占比增加，东部地区新增专任教师来源与学历结构优于中西部地区；[③]徐珍珍和韦清考察了高职院校博士学位教师的规模分布、供需关系、引进动机、引进质量等方面概况。[④]有讨论高职院校博士教师发展路径的，例如付达杰[⑤]、韩菲尹[⑥]、王亚南[⑦]等从高职院校博士教师现实困境出发，探讨了博士教师的发展策略。此外，还有学者从政策工具等不同视角出发，对高职院校博士教师引进政策进行深入研究。[⑧]这些研究从宏观的视角考察了博士与高职院校的关系，但缺乏对特定类型高职院校博士群体的关注，特别是处于弱话语权艺术类高职院校及其博士教师的研究。

事实上，艺术教育是确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而艺术类高职院校在“立德树人”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其通过专业艺术教育，可以培育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艺术技术技能人才，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传播、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以及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的“高水平高职院校”和“高水平专业群”的双高建设背景以及日益激烈的就业形势下，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在生存和发展方向上已构成共同体。广东位于经济发达和文化氛围浓厚的珠三角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吸引了大批博士的聚集。本文将以广东地区艺术类高职院校为例，梳理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共同体关系；通过研究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建构的困境、意义和发展路径，为艺术类高职院校博士教师成长以及当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 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

共同体的思想是由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提出和建构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⑨]1887 年，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其论著《共同体与社会》中则将共同体看作一个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并指出共同体不只人与人之间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关系或共同生活方式，还包含共同认同感与归属感。[⑩]此后，共同体内涵不断延伸扩展，出现了“社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涉及诸多领域的共同体概念和内涵。但就其基本内容而言，所谓“共同体”，是指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具有密切社会联系和相似生活方式、具有强烈归属感的相对稳定的组织或群体，共同体成员按照约定的规范和方式来开展活动。

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属于典型的领域共同体，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形成的新的共同体内涵。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是指基于艺术类高职教育利益、为促进艺术高职院校和博士教师合作发展需求而建构的艺术类职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合作规范性导向和交往秩序。换句话说，由于复杂的生存竞争和发展难题，艺术高职院校和博士教师结成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关系框架，而这种框架要求建构出共同目标和价值取向的交往规范，这就是艺术高职院校和博士教师共同体。

（一）艺术类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

③ 闫子靖,曹晔.高等职业学校新增专任教师来源的现状调查与思考[J].职业与教育,2022,(16):66-71.

④ 徐珍珍,韦清.高职院校博士学位教师引进与发展的现状调查研究[J].职教通讯,2024,(7):5-16.

⑤ 付达杰,张炜,唐琳.高职院校博士教师发展困境与超越[J].职业技术教育,2023,(17):41-45.

⑥ 韩菲尹,何志伟,浦琳琳,罗莹.高职院校博士引进的困境与突破[J].职业技术教育,2024,(11):68-74.

⑦ 王亚南,邵建东.向左还是向右：高职院校博士学位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抉择困境的实证研究[J].职教通讯,2024,(7):17-23.

⑧ 邹云,张晓超.政策工具视角下高职院校博士学位教师引进政策研究——基于 60 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1):86-95.

⑨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⑩ 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024 年教育部办公厅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显示，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共计 1613 所，其中专科层次职业学校 1562 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51 所。本科层次的艺术类职业学校仅 2 所，为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和成都艺术职业大学，均为民办。[11]

表 1 2024 年艺术类职业本科学校名单（2 所）

2024 年艺术类职业本科学校名单（2 所）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标识码	主管部门	所在地	办学层次	备注
1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4136013435	江西省教育厅	景德镇市	本科	民办
2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4151012969	四川省教育厅	成都市	本科	民办

广东省 2023 年有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3 所，高职（专科）学校 93 所[12]，其中艺术类职业学校仅有 5 所，分别为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和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广东省艺术类职业学校 3 个为公办院校，2 个为民办院校，皆非本科层次。

表 2 广东艺术类职业院校名单（5 所）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标识码	主管部门	所在地	办学层次	备注
1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4144012962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市	专科	
2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4144013707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市	专科	
3	广东艺术职业学院	4144014407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市	专科	
4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4144012961	广东省教育厅	肇庆市	专科	民办
5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4144012576	广东省教育厅	珠海市	专科	民办

2019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13]提出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教育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同年 10 月，教育部和财政部正式发布《关于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拟建设单位的公示》，其中艺术类高职院校仅有 4 所，分别为上海工艺美术学院、湖南工艺美术学院、苏州工艺美术学院和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广东省有 14 所高职院校上榜，无一所是艺术类高职院校。[14]2021 年，广东省教育厅启动了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共立项 30 所建设单位、15 所培育单位，仅 2 所艺术类高职院校入围建设计划。

由此可见，艺术类高职院校在发展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学校层次和政策扶助有待进一步提高。“双高计划”是当前高职院校发展的顶层逻辑，也是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国家政策。《实施方案》和“双高计划”中强调“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15]师资是“双高计划”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关键主体，其专业水平直接影响“双高计划”建设的进度和效能。而艺术类高职院校专业教学团队一部分来自艺术中专的师资，即专业表演院团的演职人员或本校中专留校生，其

[11] 百海教育.2024 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最新名单出炉！共计 1613 所[EB/OL]. [2024-11-1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YzNDcyMw==&mid=2651306452&idx=1&sn=18c6681b753846ca26860430e222b30a&chksm=85d99be88cf5851068393474b194989dfdd8f8ad275a46ecdf1d07e0fdb0748a318f10ca9855&scene=27.

[12] 广东省教育厅.2023 年广东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4-11-15]. https://edu.gd.gov.cn/zwgknew/sjfb/content/post_4407184.html，

[13] 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24-11-15].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14] 中国政府网.关于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拟建单位的公示[EB/OL]. [2024-11-15]. https://www.gov.cn/xinwen/2019-10/26/content_5445161.htm.

[15] 同上。

艺术实践经验丰富，但普遍存在学历水平不高、理论基础薄弱的问题；一部分师资则从高等艺术院校毕业，教学和艺术实践经验需进一步提高。《实施方案》还指出要“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16]2021 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条件和要求进行了规定，其中“必需的教师队伍”规定“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 50%，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 15%”。[17]博士研究生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已成为职业院校升级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的硬性指标。

表 3 广东艺术类职业院校师资情况

序号	院校名称	师资情况
1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学校共有 1111 名教职工，其中专任教师 956 人。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 266 人，占比 27.8%；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643 人，占比 67.3%。[18]
2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学校现有教职工 600 人，先后培养了全国模范教师 2 名、南粤优秀教师 10 名、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 6 名、文化和旅游部“万名旅游英才”13 名。[19]
3	广东艺术职业学院	学校拥有专任教师 459 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 112 人，博士 43 人。[20]
4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现有专任教师 845 人，其中硕士以上学位教师占比 53%，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占比 16%。目前拥有各类高层次人才 133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教师 24 名。[21]
5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有众多来自海内外的博士、教授荟萃校园，还有包括亚洲工艺美术大师、世界著名乐团首席表演家等在内的众多行业精英来校执教授艺。[22]

因此，加强师资队伍现代化建设和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注重博士教师的引进和培养，是艺术类高职院校推动“双高计划”建设必然要求，也是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二）博士教师就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四年我国博士招生规模持续扩大。2020 年博士招生人数为 11.6 万人，2023 年已达 15.3 万人，预计 2024 年招生人数会达 16 万人。[23]2024 年 7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专家核查及评议结果公示》，新增 6 个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同时新增 831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924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4]其中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幅达 80%，新增 480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专业学位博士点增幅达 86%，增加 351 个点。博士培养人数显著增加。

从教育市场供需关系来看，2023 年高等教育专任教师 207.49 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学校 134.55 万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3.08 万人；高职（专科）学校 68.46 万人。[25]结合历史数据，截至 2013 年我国已培养约 50

[16] 同上。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EB/OL]. [2024-11-1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101/t20210129_511682.html.
[18]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学校简介[EB/OL]. [2024-11-15]. https://www.gtcfla.edu.cn/info/1018/3051.htm.
[19] 广东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学校简介[EB/OL]. [2024-11-20]. https://www.gdla.edu.cn/549/list.htm.
[20] 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学院简介[EB/OL]. [2024-11-20]. https://www.gdddc.edu.cn/xxgk1/xyjj.htm.
[2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学校简介[EB/OL]. [2024-11-20]. https://www.gdatv.edu.cn/contents/51/5.html.
[22]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学校简介[EB/OL]. [2024-11-20]. https://www.zhac.edu.cn/ArtWeb/about.aspx?alias=xxjj.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4-11-15].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410/t20241024_1159002.html.
[24]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 6 个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N/OL]. 新京报，2024-08-01 [2024-11-1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6180366354992721&wfr=spider&for=pc.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4-11-15].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410/t20241024_1159002.htmll.

万名博士生，至 2022 年又新增 60 万名博士生，如果加上近两年博士生新增人数，我国培养的博士毕业人数将超过 120 万人。而当前高等教育专任教师并非都是博士学位，虽然普通本科学校仍是博士毕业的主要目标院校，但相关岗位已趋于饱和，未来必然有一大批博士流入职业学校、企业和社会其他岗位。由于历史原因，艺术类高职院校师资力量相对不足，高层次人才需求量大，能够为文科类或艺术类博士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同时，高职院校更具职业稳定性和编制优势。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带编制的工作岗位因其稳定性更备受青睐。博士正常毕业年纪大多为三十岁左右，若无其他兼职收入和家庭支撑，毕业后生活压力显著增加。一些高职院校的编制岗位为博士毕业生提供了职业安全感，降低了就业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压力。特别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能够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吸引了许多追求经济稳定和生活质量的博士。而且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科研环境灵活，科研压力相对较小，新进博士在职业晋升和发展上也更具竞争优势。高职院校成为博士就业的主要流向之一。

可见，博士入职高职院校是教育市场、职业稳定性、经济激励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02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26]当前中国职业教育正处于转型期，其中职教科研还存在研究分散、基础薄弱和内容虚浮等问题，博士教师入职高职院校，特别是艺术类高职院校，将为职教科研注入强势力量。从教育市场供给端、需求端以及二者生存发展方向来看，艺术类高职院校和博士教师已构成共同体。总之，艺术高职院校和博士教师共同体以构建共赢的艺术类职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合作关系为目标，核心在于艺术类职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合作共赢、共生发展。

三、 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建构的困境

引进或培养博士教师，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构建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是艺术类职教发展的必然之路。然而，由于艺术类高职院校学术资源、资源配置、发展规划等方面还有待完善，与博士教师共同体的建构还面临许多困境。

（一）学术资源匮乏，没有必备的科研平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艺术职业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国家文化局鼓励和协调下，几所本科艺术院校和众多中专层次的艺术学校相继成立。中专层次的艺术教育以地方特色的舞蹈和戏曲艺术形式为主，例如 1958 年成立的广东粤剧学校和 1959 年创建的广东舞蹈学校。这些中专层次的艺术教育基本满足了我国 90 年代以前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需求。1985 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逐步建立起一个由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对、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1999 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开展使得高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高等艺术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体系不断完善。

然而，艺术类高职院校学术资源严重匮乏、相关经费投入不足是不争的事实。艺术类高职院校长期以来聚焦的是艺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以教学为主，科学研究起步晚，缺少学术资源运行基础以及学术资源投入传统。与经费充足、学术资源运行体系成熟、重视科研平台建设的普通本科院校相比，艺术类高职院校的有限经费更多投入在专业教育资源建设、实习实训条件完善和学校教育设施建设等方面，其图书馆书籍文献、数据库资源和科研设备等很多暂时无法满足正常的科研需求，难以与博士教师入职前的学术发展能力形成有效衔接，直接影响了博士教师科研获得的开展。

当前，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建设教育强国阶段，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相比，职业

[2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 [2024-11-20].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410/t20241020_1158425.html.

教育科研还存在一定差距。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 2024 年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上指出：“没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就没有或者不大可能有高质量教育发展。”[27]职业教育科研对职业教育发展至关重要。艺术类高职院校在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方面的匮乏，直接影响了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的建构，不利于二者的共同发展。

（二）团队支撑不足，缺少合理的系统规划

高校人才引进是一个细致复杂的过程，需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以及学校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实际来进行系统规划，明确引才目标和需求，注重人才队伍结构优化，构建和谐的学术生态。

艺术类高职院校的博士教师引进机制亟待健全，其目前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其一，盲目引进，缺乏明晰系统的规划。一些艺术类职业院校由于本身硬件条件稍逊于其他类型职业院校，在吸引博士人才常落于下风。但为了完成“升本”的硬性指标要求，部分艺术类职业院校只能盲目引进博士，未能从学校实际出发，甚至存在重学历而轻专业、轻质量的问题，进而导致引进人才与学校发展战略、专业发展规划不匹配的问题。其二，引进标准模糊，过于追求学历头衔。结合各地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政策文本来看，学历头衔是各高职院校引进的主要依据，依然存在唯论文、唯职称和唯学历的现象，忽视高技能人才的引进，不利于构建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其三，发展环境不足，缺少团队支撑。艺术类高职院校的招聘文件与其他大多数职业院校一样，以个体引进为主，缺少团队引进。博士教师入职高职院校后，面临教学、科研等资源匮乏、所学专业与入职岗位的专业和专业群脱节、没有团队支撑以及学校规划不足导致发展受限等诸多困难，无法产出预期成果，造成博士与学校的双向失望。

（三）教学任务繁重，行政科研划分不清

关于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的计算，教育部曾多次发布相关规定。例如 1995 年中国高等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学校教师工作日和教学工作量试行办法》；1981 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等。至 1985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当前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提出：“改革上述试行办法，由各高等学校参照该办法自行决定教师工作量的计算办法及其定额，教育部不作统一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并没有统一的工作量标准。中等教育层次的课时量也多是一省一策、一市一策，没有国家层面的统一标准。由此，高职院校教师工作量实际上由各学校自行规定，艺术类高职院校也是如此。但由于教师数量、学校发展等诸多因素影响，高职院校教师教学工作量往往较高，部分学校专任教师每年要求完成五百多个标准学时的教学工作量。因为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专任教师除了完成基本的授课任务外，还需要完成额外的教学改革与研究任务、专业群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等教学相关工作，任务繁重。此外，部分艺术类高职院校还普遍存在“论资排辈”“平均主义”“年轻就该多干活”等思想落后和管理失衡等问题，新入职师资往往身兼数职，产生不公平感却无可奈何。

博士教师由于“博士”这一特殊头衔，其能力和期待往往被放大。“博士”事实上只代表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并且“博士”非“博”，而是术业有专攻。但在实际工作中，“博士”往往演变成了“六边形战士”，需要胜任各类工作，超越了其专业能力范围，甚至造成“把把抓，把把瞎”的问题。

（四）职业认知偏差，认同意识亟待提高

过去部分职业院校普遍存在“重教学、轻科研”的问题，即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分割、教学内容与科研内容无关。同时，艺术类高职院校的科研定位与普通高校存在区别，其科研更侧重于实践性、应用性和服务型，而非纯理论、纯基础性的研究。因此，博士入职艺术类高职院校后，难以继续进行与普通高校相似的科研工作，学校科研基础薄弱、学生科研思维缺乏、研究方向难以聚焦和职业认同感难以获得等诸多因素，导致博士在高职院校的工作和职业发展与他们预期产生偏差。而职业院校以教学为主导，科研与教

[27] 吴岩.需要来一场职业教育科研的真革命[N/OL]. 中国青年报，2024-11-15 [2024-11-3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5767758533200828&wfr=spider&for=pc.

学的矛盾始终存在，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如何提高认同意识，是当前艺术类高职院校和博士教师共同体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四、 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发展路径

2022 年，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文化艺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文化艺术职业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文旅同行发展要求更加匹配，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作用更加凸显。”[28]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艺术职业教育肩负着繁荣国家文化事业、培养多样化艺术人才的重要职责，而人才的价值和作用将更加凸显。为此，“如何引进”“如何发展”成为构建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亟待解决的问题。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职院校、博士教师和相关政府部门相互协作、共同促进。

（一）着眼师生福祉，优化资源配置，增强职业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同”之思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29]，即以个人自由平等为基础，追求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关系。构建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并非说“博士”拥有特殊地位，而是针对近年大批博士入职职业院校现象，探讨博士如何更好融入、服务于艺术类高职院校，推动艺术类高职院校现代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教学与科研平台。艺术类高职院校应当积极拓展经费来源渠道，包括国家财政性经费收入、社会捐赠收入、事业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合理分配资金资源，加强教学设施和科研平台建设，提高师生教学、科研和生活整体满意度。其次，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各类型师资之特长。明确各部门、各主体职责和发展路径，各司其职，各骋所长，建立团结合作、协同发展的教职合作关系。艺术类高职院校缺乏一定的学术资源，但在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下积累了一定的企业资源，学院可以根据专业建设需求，充分发挥博士等各类师资专业特长，优化教学和科研资源配置，与企业建设文化艺术类研究中心，深化科教融汇；最后，增强职业认同，尊重各教师群体的合理发展需求，充分倾听教师和学生诉求，借助政策和科学手段营造平等、团结和友爱的校园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博士教师经历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拥有强烈的学术发展内在诉求，因而在职业教育教学认同感方面比较薄弱。有必要强化博士教师职业认同，加强师风师德建设，使其认识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都占据同等重要地位，明白教育育人的使命价值，树立共同的教育价值理念。

（二）坚持“四位一体”人才工作，拓宽引进渠道，科学规划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了人才与创新的重要性。[30]艺术类高职院校要坚持和强化“引人、育人、用人、留人”的“四位一体”人才工作。其一，建立绿色通道，拓宽引进渠道。建立引进行业名家、领军人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专业团队绿色通道，提升“双师型”教师比例，积极兑现引进待遇，吸引更多博士加入。其二，坚持“因材施教”，提供精准式培养培训。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最缺乏的是“双师型”博士层次的职教师资，其既需要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又需要一定的实践经验和行业背景。高职院校要注重博士教师的培养，根据博士教师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安排针对性的教学工作，还要鼓励其积极参与实践，提供相关产业实践平台，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设和壮大高水平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其三，以创新方式使用人才，使博士教师最大化发挥专业能力。建立博士人才激励机制，搭建人才大数据库、产学研用平台和创新创业平台，为人

[28] 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关于促进新时代文化艺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 [2024-11-15].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4/25/content_5687005.htm.
[29] 康有为.大同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210.
[30] 习近平.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EB/OL]. [2024-11-20].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3/07/content_5272045.htm.

才提供安居、健康、金融和创业实践等领域服务，形成积极向上的创新发展文化。其四，提供长周期、多元化和高弹性的组织支持。高职院校的人才引进政策并非一蹴而就、看到博士入职就算完成任务，其维度包括办公条件、薪酬津贴等物质支持，项目参与、职称晋升等工作支持以及相互尊重、互帮互助的情感支持，要不断加强团队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增强博士教师的组织归属感。

（三）勇于先行先试，探索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发展新模式

第一，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校企合作模式。艺术类高职院校应当进一步加强与文化和旅游等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关系，优化“订单式”培养模式，尝试实施联合招生，按需培养，共同商定招生计划和方案。推行“产学交替、多岗轮换”的办学模式，构建产业领头人和专业负责人的“双导师”制，建立企业和高职院校博士人才资源库，畅通高级技术人才、行业名家等向学校教师岗位的流动通道，进一步增强博士教师向“双师型”教师转型的积极性，推动现代职业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第二，充分利用博士教师资源，加强高校间交流合作。相较于其他师资力量，博士教师在学术人脉关系上有一定优势，主要包括与导师、合作者、同门等建立的强人脉关系，以及通过学术会议、讲座活动建立的弱人脉关系，充分利用这些学术资源，支持博士教师参与学术会议，加强与国内外普通高校的交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高职院校的科研、管理等方面的短板；同时，博士在学术动向和教育发展方向上具有一定敏锐度，畅通博士教师沟通渠道，探索艺术类高职院校协商议事新模式，有助于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的发展。

第三，与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资源共建共享，提升社会服务功能。艺术类高职院校应积极参与各级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和重点文化项目，与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开展资源共建共享。博士教师作为艺术类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和实践者，则应当献谋献智，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研究和宣传、文化交流合作与推广、文化科技创新等活动中去，通过专业知识和能力将艺术类高职院校的优势资源进行转化和传播。在共同的文化服务中，提升共同体的认同感和社会影响力。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改革。”[31]在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增长放缓所带来的教育规模紧缩趋势下，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已逐步形成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发展还关系到现代艺术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博士教师共同体要明确自身肩负的职责，立足于世界变化大格局和中国发展大历史，为繁荣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认同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郝天聪.应用导向 高职院校科研定位及其实践逻辑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2:9.
[2] 闫子靖,曹晔.高等职业学校新增专任教师来源的现状调查与思考[J].职业与教育,2022,(16):66-71.
[3] 徐珍珍,韦清.高职院校博士学位教师引进与发展的现状调查研究[J].职教通讯,2024,(7):5-16.
[4] 付达杰,张炜,唐琳.高职院校博士教师发展困境与超越[J].职业技术教育,2023,(17):41-45.
[5] 韩菲尹,何志伟,浦琳琳,罗莹.高职院校博士引进的困境与突破[J].职业技术教育,2024,(11):68-74.
[6] 王亚南,邵建东.向左还是向右：高职院校博士学位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抉择困境的实证研究[J].职教通讯,2024,(7):17-23.
[7] 邹云,张晓超.政策工具视角下高职院校博士学位教师引进政策研究——基于60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1):86-95.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 [2024-11-2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9] 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 康有为.大同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210.

The Construction and Run-in of Ar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h.D. Teacher Communities

Ni Shiyun[1]

[1]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Foshan*

Abstract：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Doctoral teacher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level talent team of art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eachers. The construction of art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doctoral teacher communiti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t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many practical factors such as lack of academic resources, insufficient team support, heavy teaching tasks and professional cognitive bia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practice, focus on the well-being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hanc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dhere to the "four-in-one" talent work, broaden the introduction channels, and scientifically plan the development; We should be brave enough to take the lead in experimenting, explore new mod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doctoral teacher communiti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rt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Art vocational colleges, Ph.D. Teacher, community

第 1 卷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57

文化认同视域下烧麦传说叙事的建构与重塑

王琦[1]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10）

摘要：烧麦作为源于呼和浩特的特色美食，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时至今日，烧麦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传播内蒙古味道的一个饮食文化符号。在农牧交错的多民族地区发源的烧麦，其背后的传说多种多样，烧麦传说的构建展现了历史上各族人民在归化城交流交往交融的生活样态，传说的重塑则体现了各民族在交流的进程中，如何不断加强巩固共同的文化认同。通过对烧卖传说叙事构建及重塑的梳理，从文化认同的视角认识烧麦文化对于内蒙古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的重要意义，打造富有内蒙古特色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烧麦；传说叙事；文化记忆；文化符号

烧麦，不仅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传统美食，在海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日本称作“焼売”，是代表性的中华料理。烧麦的名称、起源时间众说纷纭，根据地区不同也有不一样的制作方式，但自明清以来，烧麦便以归化城（即呼和浩特）的最为正宗，关于烧麦的传说也以归化城为背景的版本最多、流传最广。长久以来，烧麦都是内蒙古地区人们钟爱的美食，各种版本的烧麦传说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这一发展历程中，烧麦传说叙事的构建与重塑体现出了各族人民形成共同文化认同的过程，为我们认识内蒙古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人文视角，同时通过对于烧麦传说叙事的梳理，探究传说背后的民族交流与文化交融，有助于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饮食文化符号，共筑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

一、 烧麦的起源与传说

（一）烧麦的起源与名称

烧麦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小吃，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积淀，其名称和种类也多种多样，烧麦，也叫烧卖、稍卖、稍麦、稍美、烧梅、纱帽、捎卖、稍梅、鬼蓬头等。[1] 烧麦的制作特点是使用未发酵面制皮包馅儿，顶部不封口捏出细褶作石榴状。关于烧麦最早的史料记载，来源于 14 世纪朝鲜教材《朴通事》，里面出现了在元大都售卖“素酸馅稍麦”的记载，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关于烧麦的记载，应当是宋元时期的《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里面有“烧卖扁食有何难，三汤两割我也会”的句子，到了明清时期，《金瓶梅词话》中有“三个大包子，还零四个桃花烧卖”的描述，《儒林外史》中则写“席上上了两盘点心，一盘猪肉心的烧卖，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清末学者傅樵村在《成都通览》中记载，当时成都有“各样烧麦，大肉烧卖、地菜烧卖、冻菜烧卖、羊肉烧卖、鸡皮烧卖、野鸡烧卖、金钩烧卖、素荞烧麦、芝麻烧麦、梅花烧麦、莲蓬烧麦……”。[2]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烧麦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小吃，南北方都有，而且在南方还有许多不同口味的创造，但是流传至今最负盛名的仍然是内蒙古的羊肉大葱烧麦，清朝时候北京、天津开的烧麦馆子，都会特别写明是“正宗归化城烧麦”，可见当时人们心中，烧麦是以归化城为正宗，至于烧麦的不同称呼，在不同典籍中都有使用，综合了现在人们的普遍称呼，本文将统一称为“烧麦”。

[1] 作者简介：王琦（1990-），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二）烧麦传说版本与流变

关于烧麦的传说，也以呼和浩特的烧麦传说最为丰富多样。在《朴通事》中记载：“以麦面做成薄片，包肉蒸熟，与汤食之。方言谓之稍麦，麦亦作卖。又云皮薄内实切碎肉，当顶撮细似线稍系，故约稍麦”，也就是说，烧麦一开始只是因为用麦面做皮，顶端搓细像线稍稍系上，才叫做烧麦的。类似的命名方法还有“稍梅”，因顶端似梅花，“鬼蓬头”，因顶端捏出褶似蓬乱的头发，以及因发音相似的“纱帽”。

也就是说，在烧麦命名之初，人们主要以外形、发音为烧麦命名，烧麦的名称背后并无太多深意，也没有赋予更多的叙事。

而呼和浩特的烧麦名称起源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明清时期的归化城茶馆林立，人们在喝茶谈天的同时点一些点心佐茶，对于茶馆来说，这个点心便是捎带着卖的，于是叫做“捎卖”。《绥远通志稿》中记载，“茶肆附带卖之，俗语谓附带为捎，故称捎卖耳。”[3]

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时，有兄弟二人在呼和浩特开了包子铺，后来哥哥娶了媳妇，兄弟要分家，于是包子店归哥嫂，弟弟在店里打工卖包子，弟弟为增加收入，就在蒸包子时作了些薄皮开口的“包子”一起蒸熟，卖包子的钱给哥哥，开口“包子”的钱算自己的，因为是跟包子捎带着卖的，所以取名“捎卖”，后来名称演变，向南传播就改叫烧麦了。

这个传说后来经过演变，更加细化：康熙年间，归化城南门外的大什字来了一位叫安三泰的天津人，开了一家包子铺，雇佣其小舅子刘三为其打工。后刘三在征得安三泰同意后，自创一种小包子在空隙间出售，买此包子者问：此为何物。刘三曰：此物为捎带的卖，就叫捎卖吧。[4]

看得出来，呼和浩特烧麦传说中的核心部分是烧麦名称的由来，也就是“捎带着卖”，但背后的故事从简略到细致，人物设定不断完善，情节更加引人入胜，到后来的康熙私访月明楼、乾隆赐名都一处等故事，呼和浩特的烧麦传说不断完善丰富，形成了十分特色的叙事体系。

二、烧麦传说叙事的建构与重塑

叙事建构是指通过选择、组织和呈现事件、人物、场景等元素来构建一个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的故事。通过叙事不仅可以传达出更为丰富的信息，体现故事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风貌，还可以引发听着的情感共鸣、传播价值观、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等。在烧卖传说的叙事建构中，这些功能都有所体现。

（一）烧麦传说叙事的构成要素

叙事的构成要素组成有事件、人物、背景、主题、视角等，在烧麦传说叙事中，事件主要围绕解释烧麦名称的由来，即为“捎带着卖”，但是在情节描述上从宽泛解释茶馆餐饮习俗，到逐渐演变为兄弟两人开店，弟弟辛苦创业，或是外地人来归化城做生意，无意间造就了烧麦的形成，在传说主题上，也从一开始没有太多感情色彩的茶馆生意，逐渐变为外来人员勤劳致富的故事，成为了让大家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传说背景的设定大多在明清时期，烧麦的广泛传播或建立在茶馆盛行的前提下，或基于外来人口的开发与创新，故事中的主人公也一样，从一开始的没有具体的主人公，到后来具体地设置了主人公的人物关系（兄弟、姐夫小舅子）。从烧麦传说叙事的构成要素中开得出，随着烧麦传说的不断流传，其构成要素也随之逐渐丰富、有趣。

（二）烧麦传说叙事的重塑

1.烧麦传说叙事中核心人物的重塑

烧卖传说中最典型的核心人物重塑是“康熙驻跸归化城”事件的出现，由于康熙的到来，衍生出了许多与皇帝有关的逸闻趣事，其中烧麦的由来传说也和康熙产生了联系，有一个版本的烧麦传说便是：康熙西征噶尔丹途径呼和浩特大召寺，彼时已是深夜，但康熙感到饥饿难耐，就敲开路边的一家包子铺，可是

包子铺里的面粉已经不够，焦急万分的掌柜灵机一动，把淀粉和白面掺到一起做成面皮，加上羊肉馅，康熙吃了这既像包子又不是包子的食物后赞不绝口，便问是何物。掌柜顺口说了句，这是捎卖。康熙问为何叫捎卖，掌柜解释说，是包子铺捎带着卖的，所以叫捎卖。

康熙驻跸归化城期间还有一个著名的轶事叫做“康熙私访月明楼”，这个故事在大召中记载为“康熙北寻塞外，曾驻跸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微服私访，当他在月明楼小饮时，却因忘带酒资而遭地头蛇安三泰百般刁难和挟众围攻。期间，店伙计刘三闻讯赶来，并声称以自己的年薪作抵为康熙解了围，康熙为此把刘三接往京城。而由此事了解安三泰乃一恶霸，经常欺百姓，被绳之以法，百姓得以安宁”。

在这个故事中虽然并未出现烧麦，但随着康熙私访月明楼故事的流传，烧麦的传说和康熙逐渐建立起了联系，在私访月明楼的过程中，伙计刘三因救驾有功，被康熙皇上叫到北京当差，刘三却不愿做官，就在北京城的鼓楼大街开了一家烧麦馆，康熙亲自题字：“归化城捎卖十里香”，从此归化城的捎卖便名播京城了。

关于烧麦的流传，还有一个关于乾隆皇帝的轶事，在乾隆三年，浮山县北井里村王氏，就在北京前门外的鲜鱼口开了个浮山烧麦馆，某年除夕之夜，乾隆从通州私访归来，到浮山烧麦馆吃烧麦，因除夕夜里别处都关门，只有烧麦馆还开着，故乾隆回宫后亲笔写了“都一处”三个大字，命人制成牌匾送往浮山烧麦馆，从此都一处变成了名满京城的烧麦馆。

将不知名的主人公重塑为当时的皇帝，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攀附英雄祖先”[5]的做法可以让烧麦的来源更为神圣，从而激发民众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烧卖传说中加入了康熙和乾隆这样的人物，无疑是这一法则的体现。

2.烧卖传说叙事中故事背景的重塑

烧麦传说的背景主要有三个类型，一是以归化城的茶馆为背景，为在茶馆喝茶的客人捎带着提供烧麦这种点心，二是以外来人员创业为背景，如天津来的开包子铺的掌柜，店里有人制作类似包子的东西名为烧麦，三是以康熙驻跸归化城为背景，引出烧麦的由来。

这三个背景的构建，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归化城的社会风貌和清朝时期的历史脉络。归化城地处北疆，本不是茶叶产地，但在明万历年间俺答汗建造归化城后，明朝与土默特部的贸易便稳定持续到明朝灭亡，到了清代，归化城更是一跃成为沟通内地、蒙古与俄国的贸易集散地，随着归化城酒楼、茶肆的发展，形成了城中行商坐贾、茶楼酒肆的繁华闹市局面，清朝诗人王循写诗描写了当时归化城的繁华景象：“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

此外，康熙亲征噶尔丹途中，由于担心军粮不济，便委托商人随军，随军商人担当起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的重任，在辗转沙漠万里的运输途中，他们同时兼做了沿途蒙古人的生意，他们把内地的商品卖给蒙古人，再将换回的牲畜、牧产品贩到中原地区。这些商人又被称作“旅蒙商”，旅蒙商来自山西、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各地，以山西为主，这些商人的到来使得归化城的商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同时各大、小商号的掌柜、买卖人每日谈论国事、行情，交换商业情报的场所，便选在了烧麦馆子。同时，清朝中期开始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也在烧卖传说的建构中有所体现，在归化城开包子铺的天津掌柜，在茶馆闲聊吃烧麦的各地食客，折射出清代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翻过长城“走西口”，来到归化城求生存、创新业的历史进程。

3.烧卖传说叙事中故事情节的重塑

最初的烧卖传说并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是单纯从外观上解释了烧麦有可能的名称由来，而随着传说的不断流传，引出了“捎带着卖”的名称由来，并设计了不同的情节来交代这一由来。

从简单的兄弟共同创业，哥哥开店卖包子，弟弟勤劳肯干，创新出了烧麦，到后来把开店的人塑造成了“反面角色”，成为了当地恶霸，并对微服私访的康熙百般刁难，此时忠厚老实的店小二出面解围“救驾有功”，恶人最终被惩罚。重塑后的烧麦传说情节更为跌宕，最后康熙回京后报答了店小二刘三，还让他去京城做官，这样的叙事契合了民众心中朴素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善恶观”，同时刘三去了京城不愿做管便开了烧麦店，这样烧麦便传入了京城。

对于烧麦传入京城，在京城打出名号的传说，则是乾隆在大年三十从通州微服私访回宫途中，发现路

上店铺都以关门，只有一家小店还在营业，吃过饭后乾隆得知小店还没有名字，就说“这个时候还开门营业，京都只有你们这一处了，就叫‘都一处’吧”，后日又差人送去一块题字的牌匾，自此都一处便名动京师，有藏头诗赞曰：“都城老铺烧麦王，一块黄匾赐辉煌。处地临街多贵客，鲜香味美共来尝。”

在重塑的烧麦传说中，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传说中的人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了微服出访的康熙和乾隆，最后人物得到了褒奖，烧麦也得到了传播，通过这样喜闻乐见的故事，将烧麦传入京城的传说进行了升华，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对于烧麦的认同和自豪感。

三、烧麦传说叙事的当代启示

（一）加深共同历史记忆

呼和浩特烧麦传说蕴含着多民族交流融合历史记忆，烧麦的起源传说中有的提到烧麦是由汉族的包子做法演变而来，在口味上也以羊肉大葱馅儿知名，很显然，这是在烧麦当地与汉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的饮食习惯和口味相互交融的结果，这种融合的过程通过传说被记录下来，让不同民族的人们回忆起先辈们在饮食文化方面的相互学习和接纳，加深了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创造饮食文化的历史记忆。

同时，明清时期的归化城是中国北部重要的商贸枢纽，烧麦传说也反映了当时的商业繁荣景象。传说中烧麦在茶馆、酒肆等地方出现，这些场所是当时各族商人、旅客汇聚之地，展现出了清初旅蒙商的兴起对于归化城发展的重要作用，烧麦作为一种食物在商业活动中传播，见证了各族人民在经济交往中的互动。人们在流传烧麦传说的过程中，能够回忆起当时归化城的变迁，以及不同民族在交易过程中共享美食、交流文化、商业贸易的场景，从而加强了对归化城作为商业中心时期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经济活动的历史记忆。

（二）增强群体文化认同

随着烧麦传说的不断流传，各民族认同的价值观也逐渐在其中凸显。例如包子铺伙计为了生活努力创新烧麦制作方法的故事，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劳，月明楼里善良正义的伙计刘三，替被恶霸刁难的康熙解围，并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为康熙付酒钱，最后得到了皇帝的嘉奖，传达了做人应善良正义，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善恶观，还有得到乾隆皇帝青睐的都一处掌柜，在大年三十其他店铺都关门的情况下，只有王掌柜还坚持子时关店，才有机会遇到微服私访归来的乾隆，这也是对劳动人民勤劳致富的歌颂。

这些赞扬勤劳、善良的价值观通过传说在各民族群体中的广泛传播，使人们在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加了对以这些价值观为核心的群体文化的认同。

此外，烧麦作为呼和浩特极具特色的美食，其传说赋予了烧麦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人们在品尝烧麦时，不仅是享受美食，更是在感受一种文化传承。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游客，了解烧麦传说后，都会对这种饮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敬意。对于生活在呼和浩特的各民族群体来说，烧麦传说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标签，增强了他们对当地饮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呼和浩特的烧麦传说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是城市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讲述和传播烧麦传说时，其实是在强化自己作为呼和浩特人的身份意识。各民族群体生活在这座城市，都以烧麦传说为自豪，这种自豪感转化为对城市文化的认同。烧麦传说就像一个文化纽带，将不同民族群体与呼和浩特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使他们认同自己作为城市一员的身份，进而增加了对城市群体文化的认同。

（三）构建区域文化符号

烧麦是呼和浩特最具代表性的美食符号之一。传说为烧麦增添了文化魅力，使其从一种简单的食物上升为区域文化的象征。无论是在本地的餐馆、街头小吃摊，还是在对外宣传中，烧麦都与呼和浩特紧密相连。烧麦传说中关于其独特的制作工艺、风味特色等内容，更是突出了它作为区域文化符号的特点。人们

一提到呼和浩特，就容易联想到烧麦，这种联想成为了区域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烧麦传说体现了呼和浩特区域文化的融合性特点。它展示了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在呼和浩特这片土地上相互交融的过程。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烧麦传说代表了呼和浩特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吸引着更多人来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

最后，烧麦传说还承载着呼和浩特的城市记忆，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它就像一个记忆的宝库，记录了城市的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等诸多信息。作为城市记忆符号，烧麦传说能够唤起本地人的怀旧情感，也能让外地人更好地了解呼和浩特的过去和现在。

结语

呼和浩特烧麦的传说，不仅是关于美食起源的故事，更是多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化篇章。在其流传过程中，烧麦传说的叙事不断被构建与重塑，从最初简单的命名解释，到融入人物情感、社会背景与复杂情节，以及康熙、乾隆等帝王元素的加入，这一过程反映了归化城在明清时期不断发展的繁荣景象，以及当地各民族对地区、文化不断增强的认同。

立足当代，我们应继续珍视烧麦传说，传承其文化精髓，利用烧麦传说打造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和文化符号，让它在新时代继续发挥作用，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推动呼和浩特乃至内蒙古地区的文化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廷芝主编.中国烹饪辞典[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852.
[2] 傅崇矩.成都通览[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173.
[3] 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7.
[4] 佟靖礼，张德祥.呼和浩特史话[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240-241.
[5]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07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haomai Legend Nar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Wang Qi [1]

[1] *Baotou Iron＆Steel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Baotou,China*

Abstract：As a specialty dish originating from Hohhot, Shaomai has a history of several hundred years. Today, Shaomai is not only a type of food but also a culinary cultural symbol that spreads the flavors of Inner Mongolia. Originating in a multi-ethnic region where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tersect, Shaomai is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legen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legends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Guihua City, whil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se narratives demonstrates how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solidified their shared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exchanges. By exami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haomai legend narrativ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Shaomai culture in foster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in Inner Mongol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aims to create a cultural symbol rich in Inner Mongolia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Shaomai; Legend Narratives;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Symbol

第 1 卷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54

诗歌堪舆学：书写天地人之间的关系

——论赵野的山水美学建构

高若栋[1]

（中国文化出版社，中国 香港 999077）

摘要：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重要成员中相对独立、异质的一位，赵野笃信历史，饱受古典文学滋养。其诗歌所展露的关照丹青的写作意识、自然隐逸的追求、对于道德观的尊崇、基于实虚交混的情怀，对于当代诗歌的审美转向和语言生态产生着持续性影响。研究赵野的诗学要旨，如何解构其文本中关于山水美学的建构和审视、反思是主要问题。援引中国传统文化场域中研究天地人之间关系的堪舆学相关内容，掺入乃至突破固有的诗学批判及理论体系，从而融合并充盈学术视角、逻辑经验、意识脉络等位面，以此发掘开拓的新内涵和境界，既有利于对赵野作品展开进一步的重释或阐明，也得以对当下及未来的汉诗发展做出超越范式的积极探索，创造部分镜鉴价值。

关键词：中国文学；诗歌；山水美学；赵野；古典精神

一：天人之际与山水启示

王夫之曾在《古诗评选·卷四》中谈到诗歌写作置于天地之间、文人之心的至高追求，即“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1]的境界，这与司马迁在《史记·报任安书》中所谈到的史学家之终极理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2]存在高度相似性，文史学人对于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探究和阐释几乎填满了至少两千余年的封建史，直至进入 20 世纪伴随学术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迭代，更细分且精准的分类学科成为了研究该内容的主要路径与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史之内对其关注下滑甚至剥离的必要，事实上关于自然万象和人物个体之间的联系，从情感的输出、对称或不对等性的关照与交互、唯物探索或唯心主义的揣度想象等诸多方面，仍具备影响文史领域研究的开拓或丰富性的有力价值。近几十年以来，汉语诗学（尤现代诗）由于域外文化的深度接入和介入、大量研究及评判体系对欧美的效仿甚至搬挪，事实上已经造成了诗歌中的古典中国道路和所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西化之路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裂隙，传统文化所长期讲究的兼容并包思想缺乏一处延伸的臂弯，当代前沿的域外理论无力仅依托自身便完成中国化（本土化）的结合与脱变过程，关于这一问题的处理议案，有不在少数的学者如李敬泽般提出了方向性思考，“文学上的‘中国道路’，正与现实社会中的‘中国道路’一样，既应该凸显自身的独特之处，也应该对世界秩序造成根本性的挑战，使之更趋公平、合理，而不应该以既定的西方标准来加以衡量”[3]，而如何实现文学上的中国道路塑造之议程，如何修缮传统诗学与现代受域外深度影响的具备全球化通联趋势的诗学之间的衔接点，构筑既凸显“自身特色”又对公共学术足以做出“更趋公平、合理”的贡献的诗学研究方案尤为重要。从以堪舆学为代表的传统内容入手，将其与古典时代本就关系紧密的诗歌文学重新结合，融汇某种近乎链化的立体的结构版图，以此来补充与辅助部分诗学的文本批评、理论研究是一条值得推动的可行之路，有如赵野在诗论中所言“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应该追溯到禅宗的公案和庄子的卮言”[4]一般，

[1] 作者简介：高若栋，（2003-），男，汉族，四川成都人，中国文化出版社联合期刊编辑、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诗学研究。邮箱：3296139382@qq.com

从今返古、溯古，乃至找出历久弥新、亘古有效之资源喂养当代，不失为一种对文化厚度的解构与重整之旅。

按照颜师古在《汉书》中的注释，“堪舆，天地总名也”，即释意为堪舆二字是天地的一项称谓，而李善在注《文选》时则说的更为透彻，“堪，天道也；舆，地道也”[5]，即可以理解为“堪”是关乎天的学说，“舆”是关乎地的学说，堪舆二字合并，即是关于人类研究天与地的学说。而天地之间万象万物自然也容纳其中，按照现代学科模板比较，堪舆学几乎染指了天文历法、地理地势、民俗宗教、景观建筑、生态或生命学等诸多内容，以世界与人的关系为核心所展开的杂糅、融合性研究，几乎伴随了漫长中国诗歌史的大部分阶段。非止相对开明、开放和具备普遍科学可释性的内容，实际上长期被赋予迷信、神秘色彩的内容，甚至囿于封建礼教和道统政治等因素束缚绑票的信息素，也在某种相对独立、孤僻的发展路径中与诗歌发生着互补与合流，以“暗通款曲”为主要方式，而极少见公开“会聚”、大肆共促的局面。事实上单从“堪舆”的字面含义理解，诗学本身甚至就是研究堪舆的学科，从书写天穹到感怀大地，从自然世界的气候、昼夜、云雨出发创作并基于创作而研究这一切。从已有的“堪舆”角度出发，当陆续拨开堪舆学的厚重标签和被动符号，可以窥见从先秦诗经时代到唐宋古文运动，从南朝宫廷诗歌到晚清同光体，甚至包括 1940 年代前后以孙毓棠为代表的现代诗人和 21 世纪以来引入“元诗（metapoetry）”[6]概念的张枣，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广义或狭义概念上的以堪舆为代表的文化集群影响。“堪舆”在诗学领域上表现最为突出的部分，也正是其最广为知名的板块，即“风水”一门。

所谓“风水”，能够扁平化理解为关于“藏风之处，纳水之所”的学问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关于山水、历史的研究，这是服务于先人社会的生活运转的较早的实用性学术内容，距今 6000 余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便已发掘出载有天上星象和地面投射的图像的蚌壳类陪葬品，以及半坡出土的具备天象图式和星象记载的彩陶盘[7]，而在相关的书面文献中，《黄帝内经》与《易经》之中包含大篇幅的关于星宿、山川、江河对人的作用；和人关于山川风月、阴阳时序的分析和治用的内容。按照邵雍、朱熹的推论，前者的成书年代甚至早于以屈原为代表的最先发的一批浪漫主义诗人。堪舆学中对于山川地理的研判和神仙传说的构造与解读，几乎会同历代诗人内心高昂的精神欲望形成一体，“天人合一”与“形神兼备”的追求在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诗人群体中体现尤为明显，按照学者董斌所归纳的贴合现代学术结构的“风水十八条”中“阴阳调和辩证原则（Yin Yang Dialectics to Achieve Harmony）”与“审美原则（Aesthetic Appreciations）”[8]更是足以解读大量咏物、怀古的诗歌作品，两宋诗词之内无论婉约豁达、明清文人札记无论志怪仙侠，都在潜移默化中贴合着源远流长的山水学问。时至今日，新诗已历百年，现代汉语的构造和习惯早已经和千百年前发生了较大变化，着眼的事物更加丰赡、受域外波及更为明显，但笔迹一旦面向旷野、河山，诗人所被激发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省思和敏锐意识，即能够快速依托“山水选择原则（Bound by Mountains and Near Water）”[9]在作品中复原乃至超越生动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浪。而在沉郁钝挫、失意惆怅之际现代诗歌也同样更本能化地在古典色彩的山水中放逐、释放自身，得以获取更曼妙、自然的境地。对于伟大的汉语传统而言，诗人之于天地间最深邃而隐秘的理解，储存于纸面上数不尽的山水中。

谈论赵野，就如同谈论浮冗句法横行的场域中最具气魄和纯净度的一炉檀香，他的抱负是策动凌驾于当下物质社会所提供的信息给养之上的美学建构，自古以来仁人志士对于近乎完美的“天时地利人和之境”的追求在他的身形上清晰可见，譬如“自然自有圆融的生命/我们都在追求一种实现”[10]，赵野立足于“实”而持续处于“虚”的境地，这并非退却或沉溺在一味复古的幻想迷雾之间，而是剥离、提炼的过程，他坚信人的任一时刻与命运之间、命运与自然万象之间存在某种枢机的纽带，预言和实现之间、古与今之间可以熔铸整体化的意识禀赋，“人与自然之间的认同以及相互之间的‘回响’（echoing）”[11]始终震撼并感染着他。事实上长期受风水伦理、山水色彩所吸引和波动的，是几乎整部中国山水诗的总集，譬如峦头派注重山川形势载空间形象上的天地人合一境界、宗庙派注重在时间序列上达到天地人合一的状态、园林规划领域对藏风聚气的布局和造景手段[12]以及其所囊括的阴阳五行、干支生肖、四时五方、八卦九风、三元运气等内容，足以支撑起诗歌写作时语言的向度、寓言、隐喻甚至双重隐喻、对景物的描绘、价值输出的持续性呈现、折射等，甚至是类似罗尔斯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问题的处理[13]。山水的

学问足可吞噬或包裹命运性的思考，赵野对敬文东谈及汉诗的两项伟大主题“万古愁”和“天下忧”[14]也生长并斡旋在其内。他是如今并不多数的保持如此思考和执行写作的文人，依仗并信赖传统诗学的遗留物和捍卫汉语之美的尊严，具备怀天悯人之心、相对广阔的现实社会实践涉猎经验以及其转换凝练的思想区块，侦破口语的盲目崇拜、学术黑话累积的伪壁垒。研究其对堪舆学术和山水精神的继承，和反向研究堪舆概念和古山水的重影在其笔端策动的现象，实际是同一问题。赵野在诗学上对“美”的建构和发展，在事实上推动了新的天地人关系的分析式诞生。这是可贵的总结篇，亦是启示录。

二：诗中画意或画中诗意

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发展与赵野的关系，几乎造就了隔代继承的奇观现象。赵野诗歌创作发轫的1980年代正处于一批年轻写作群体狂热激昂的热衷于反叛、颠覆、重塑的火热时期，以“莽汉”、“非非”、“他们”、“极端“、“撒娇”为代表的流派更是以对“今天派诗人”的“弑父”为先导，以语言和体式的解放（包含部分对口语化的推崇）作为核心观念。同期的诗坛环境，可谓大旗招展、府邸林立，江湖诗人们一再为传统诗歌的严肃性“解绑”，将更生活化甚至庸俗化的辞藻付诸其间；知识分子写作集群则大有成为欧美门生的趋向，依托史蒂文斯、悉尼、施耐德、弗罗斯特、毕肖普等域外名家的手笔展开效仿实验，理论研究领域则对哈罗德·布鲁姆等人的著作大肆引进学习乃至视为主干，以此增生发展。更少部分的维持地区性写作的群体，相对沉潜安宁，但曝光度则少了很多。赵野是极其特殊和异质的同期诗人，他具备与“第三代”同侪们类似的勃勃野心和宏大斗志，但并不放纵自身的审美随同飘散的语言表演、臻于技巧的舞台姿势而合流，在狂歌浩荡的群体之间，他明辨杂音与粗嗓中的不纯粹物，最终选择走自身的僻静之路。他的选择堪称某种“秩序之美”，在闹中取静、繁杂中取一瓢饮的写作路径，这并非意味着他完全以守旧者的姿态拱卫保守主义的门扉，事实上一股与生俱来的“激情和阴谋”[15]从始自终都伴随其身，赵野是从古典汉语中脱身的改革者、现代社会里孤绝笃定的卫道士。他的诗歌思想横向毫不吝啬地与境内、域外的各流派产生交互，不断甄别、汲取和卸下，如同王元化所提出的“以西学为参照系，而不以西学为坐标”[16]的思想。纵向几乎跨越了以世纪为定量的里程和古老中国相接壤，千百年前的山水诗如浪潮般涌入他的胸口，这种精神的传递，造就了《广陵散》《天命之诗》《山居赋》等作品的诞生，赵野看似极重抒情的诗歌，实际上是某种“冥想诗（meditative verse）”[17]的升格，诗人心有方略、穿梭时空，坐定当下、神交古人。所谓冥想，在更形象的层面解读，实际上就是一幅波澜斗折、迂回深厚的画卷。得益于古山水的启示，让更立体的世界装入他的内心，在金融商厦、闹市街衢之间捡拾秦砖汉瓦，打磨时间和其饱含的意义。

在风景品评之中常用的形容词是“如诗如画”，解构该词，实际上除却最直观的对于非诗非画之物的修饰作用外，词语本身还内蕴着一种深层的关系逻辑，即是“诗”与“画”间的高度契合、相融的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性。从古至今人们都无法忽视绘画艺术与诗歌语言艺术之间的互补与互惠的作用，翻开百年新诗历程，不在少数的大诗人都兼具着艺术家的身份，赵野更是深度参与绘画领域，作为画家、策展人、鉴赏学者频频亮相，因而分析他的诗歌之时，应该不能忽视“画”的参与度和重要地位。赵野以诗佐画、以诗作画，浩瀚的描摹图景之中闪烁着丰富的思想性和“意义”构筑的过程，正如“古人的‘山水’概念包含了天道、道德、世界观、梦想、信仰、归宿感等多方面的含义”[18]一般，他的诗歌也同样如此，在《庄子卮语》中写到“悲剧英雄消失谱系里/该如何接住苍山的飞雪”[19]，沉重的道义感和在一定程度上割裂画面的分镜效果，是赵野得以驱使语言穿越田园牧歌、都市小曲和流水账般生活纪实的利器，他的笔触即是肩膀，担负着为当下的情感褶皱搜寻解药的使命，而更为要紧的是掀开个体感官的藩篱，在更广大的层面上补给公共经验。以决心开拓出区别于城镇化写作、学院术语纠缠、后现代先锋泥沼的崭新路径，即是“以心眼而非肉眼想象和关照物质世界”[20]，让诗歌写作、诗学批判、理论破译不在停滞或深耕于当下时区的当下场域，令时间轴的琐碎变更为有限落差的阶梯和无限视野的窗阁，在古与今、叙事和抒情、一帧画面和持续的万花筒之间消除白障和盲区。赵野钟情于历史，他所惯用的一系列诗歌技巧、创造的语言产品，几乎都有历代诗画的残影或青灯照耀，他对文化信息的收编、情绪模块的抚慰、词语句法的驯化

和改良，令人心惊而感佩。

诗画之间的技艺交辉，是赵野剖析天地、阐释堪舆的密钥，以“我与天意定个契约/出入山水之间，俯仰成文”[21]的姿态遍取山川湖海为己用，然后用诗文字行回以敬意，在高度及物的汉语力量、近乎无穷的写作资源（灵感来源）的加持之下，赵野笔端的盆景美学甚至都能具备风花雪月的历程，一杯鸡尾酒和半盏荔枝烧间，都能夹含历史的沉思和现场性写作的真实触感，这绝非单纯的造神流水线产物，也远高于空口呐喊和四处拆词的合谋。按照胡晓明的说法，陶渊明堪称“以整个生命投向大自然怀抱的第一位诗人”[22]，他的作品所反应的返璞归真、退离俗尘甚至遨游太虚的境界，按照陈寅恪的评价，应该高度吻合“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23]之境地，如此的写作模式对赵野触动甚大。自韩偓、林逋开始的两宋时代在“诗句里去找绘画题材和布局的试探”[24]的路线，实际上就是自陶氏之后历代演进发展的结果，长期以来追逐效仿的诗人繁多，然而能达到类似效果的作品并不多见，而抵达近似水平之后又长期安守于其间停步写作的诗人，又着实占据了“不多见”中的大多数。赵野在很早期（1985 年前后）写作之时也曾有过类似的情愫和模式创作，譬如《河》中“闲云飘乎无踪/马群跑向天边/我的心思无往不返”[25]。而之后多年漫长岁月中，他的诗歌明显发生了迭代变化，更具凌厉气势、棱角的语言，更深厚的可控叙述空间，更具胆气和经验与包括政治色彩、人性灰度等方面多位面碰撞和握手，诸如“具有相当浓厚的政治意蕴”的郭熙[26]等前人的风貌，无疑被赵野广泛吸收。当 2022 年写完《碧岩录》时，他的诗歌已经抵达了西摩尼得斯(Simonides)所谓的 “画是无言之诗、诗是有声之画(Painting is silent poetry, and poetry is a speaking picture）”[27]概念。

雨后的苍山万法流布
云中惊现这碧岩，当头一喝
鸟闻声相悦，衔来满纸话头
落花乱坠牵动成毁天气
那么，如何是写作的最高法则
一卷书成帝国轰然崩塌
东方起嘉气，他奔赴娑婆地
甫开口道路就长满荆棘
谁识得这语法谁就识得真心
我其实在乎手指超过月亮
世界有大神秘成其所是
凡不可言说者，皆以诗说之

半世已然，皆不在明白里
流水过刀锋何曾飞去
心上一杆秤，只秤虚空
山河岁月都转归自己
时时拣择最后无从拣择
谁能替我生，谁能替我死
日出东山，月亮便落西山
多少事物住在言端语端
骷髅里的眼睛犹放光明
龙吟枯木中，血脉未了断
此心如动，大地当会惶恐
一句诗飘落百味具足[28]

赵野讲究逻辑义理，与唐代王维、柳宗元为代表的参悟禅境的质地有相似之处，但基于此更具锐度分明的语言锋刃、游刃有余的应变智慧，以及最为重要的创见性价值，才是他长期信赖并引以为傲的诗学秘辛。从“雨后的苍山”写到“帝国轰然坍塌”造就如此物事跨越幅度的文字，着力点恰到好处，并不过分渲染、堆砌，支撑和拓展画面所运用的语句精炼简洁，无半分赘物存在。处理抒情内容中隐埋或隐去的时间线路，和以“我”为中心的面朝包括“真心”、“月亮”、“流水”、“生死”、“骷髅”和“枯木”等自然与社会世界中万象万物的言说间的关系，几乎做到了丝绒状的嵌合感，在一句一词之内难以彻底割裂划分其单一的使命，如同中国古典绘画领域，方闻曾评价北宋神宗时代的《早春图》时所用“模拟幻真（mimeticillusionism）”一词[29]，赵野在诗艺之中所造就的幻化如真、虚实熔合的状态无疑在卷帙浩繁的诗歌史中怀揣匠心开凿了一处小山河、新天地。他所超越“程式化布局（schematic layout）”[30]的诗歌，为现代汉语在题材上书写山水新风、在体裁上创造长诗或组章，都起到了注入经验和启发开端的效用。

三：价值重构和传统延伸

关于汉语诗学中古典、传统和历史积淀性的内容，赵野很早便展开了甄别、重组和守护的进程，自 1990 年代以来，对于刻板的静态山水、附带偏激意识形态的逻辑衍生物、对音韵或范式持有执着偏重的美学概念等内容，被他陆续淘汰抛弃；而关于“祖先”概念的崇拜、古朴的感性语言、克制繁复化的句法机制、对儒道释文史哲兼顾的均衡之心等元素被他持续抬升、引以为宝典。赵野在诗中的擘划和规制行为决定了他绝非一个抱守残缺、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诗人，譬如解志熙和李章斌所言的“韵律(rhythm & prosody）定义为语言元素在时间上的有规律的重复”[31]概念便被赵野在文本之中较好的体现而出，并不细究具体单行与单行之间尾韵的连贯，摒弃格律诗词时代对范式化倾向不可逆的信赖和倚靠，以韵律美的本身，来消解美的外在形式化的束缚，既尊重了当今语境的面貌，也不至失去古典精神的传序。至于语言宽容度和消化能力，则是谢灵运、范宽等“大山水家”所具备的特殊才华，千百年后的赵野几乎习得甚至进一步拓增了这一切，他的古拙之气从玄虚过渡到庄严，而这种肃穆非但不会落入严苛说教的地步，反而反射出的新颖和雄心的气息夺人心魄，现代诗场域内近乎没有第二者会如此写作，在这般内容上苦下功夫和具备天赋，“绝大多数先锋诗人视为危途弃之不顾的取向”[32]被赵野紧攥手中，从枯山水写到春和景明，又在无山水的地方，与诗中造就的“山水”博弈并共生，犹如“当代诗人在写作中直接与语言搏斗，把语言的媒介性提升为发明性”[33]一般，他的“山水”也成为了一项具备“发明性”的可塑之物、非物之思，甚至从诗的组成元素、背景幕布扩展并涨大为诗的“族谱”。诸如此的诗学价值受赵野的改良和增生，在独立的层面成为了更具体充盈的体系论，在融合层面，事实上为赵野自身的“抵抗诗学”忠实服务。

抵抗、制衡、兼容，是赵野诗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构成了内核。他的诗歌语言纯净度极高，饱含孤独、清幽的色彩，与企盼和追逐崇高社会的思想领域，达成了某种彰显关系。赵野的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他的诗歌，中国五世纪前艺术家们贴合“神仙家、道家或佛家的封闭性自我追求”和“自给自足（self-contained）”[34]的理想世界，绝非赵野的乌托邦。他所讲究的天下道义，是近似范仲淹、张载的知识分子使命意识，乃至更进一步超越了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以对天下人的“心性”、“良知”、“自觉”和“梦想”做出理想国式的憧憬和自励。“如赵野这样葆有平和心态与虚静心境者，实不多见”[35]，现实中，赵野以较为特殊的“半隐”姿态维系于社会，在大隐于市和小隐于野之间，介于庙堂和投身江湖之间，决裂抵抗和遵从规训之间，他以横渡或兼及的思想指导生活和写作。如同赵汀阳曾指出“一旦山水与社会分开来而成为大地内部的超越之地，大地就因为空间的划分而具有了人文的丰富性和对照性同时穿插有两种价值维度，逐鹿逐利的社会是英雄与奸雄的博弈空间，而在其外具有超越性的山水则属于异人，包括学者、僧侣、隐士、渔樵和艺术家”[36]，赵野显然具备一些英雄或奸雄气质，但诗中非常多见如僧侣或渔樵般的恬淡、清新或淡忧和远愁之感，在超越物质社会和依赖物质社会之间，他选择抽离出一半的身位用以感知和侧探世界的全貌，即使根本不存在“全貌”全知的概念。

对于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文人而言，做到真正好的诗歌，需要不回避痛苦与虚无。而对于发展日新月

异，伴随科技革命进程的当代诗人而言，除却痛苦与虚无等个体情愫的不回避外，还将直面从道德观、文化理念、商业模式等多位面甚至全方位的冲击，诗人身份的位移或下滑、纸媒图书期刊行业距离聚光灯愈行愈远，处理诸如此的矛盾，单凭当代场域内所流行或横行的思想内容，赵野其实很难完成自身的诗学建构和对“美”的追逐。在如高居翰所言“世界处于不断变化的骚动景象，而非对自然之永恒秩序加以肯定”[37]的客观情况之下，他敛聚传统文化、汲取古典诗学智慧的行为十分精妙。在主观上，所谓的“元音写作”以汉语的内在系统完成自我革新，回应并试图解决“现代诗人面对的是一个动荡激荡的世界，传统价值已经瓦解，人与世界之间的和谐甚至连续性都已经大量失落而亟待重建”[38]的生态状况，赵野“化古”和“拾遗”的手段是为了古为今用的思想实践、对中国诗学及文化道统的独立性的维护意识而服务。在诗中所出现的，无论是“”君子、“小人”、“圣贤”或者“百姓”，都有力构筑着立足于中土的精神符号和“故园”图景，赵野在诗中反驳着域外产生的单薄谬论或不切中实际情况的批判，同时又为真正可靠的信息做出诗歌形式的佐证。诸如美国学者裨治文所谈的“华人不好远游“[39]的论断，在“汉语要召回飘远的游子/做个暗夜持灯人/他将见证一次次覆灭/为新的经验正名”[40]之中被赵野反驳，至于海伦·文德勒等学者认为“浪漫主义并没有被现代/后现代主义诗歌所取代，相反它以新的形式在二十世纪继续焕发着活力”[41]的表述，赵野甚至能够以自身为实例来佐证这一观点。

“传统”在写作上延伸向何处？回答这一问题就如同答复“历史将驶向何方”一般，答案是未知或者永恒。传统是一种经验的集群，任何时期的任何作家都不是孤立如岛屿般存在的，如同在赵野的心中一直存活着古典时代的美学思想甚至是整个时代一样，诗中一句“吾从宋”[42]即揭开了其沉浸其中之心。赵野对时代、命运的理解就聚集于他所雕刻、抚慰、珍视的纸面上的山水中，用汉字写山水画，在画中篆刻青铜器、冶铁、农耕或牧马，视野从咫尺望向天涯。他怀揣有汉唐之心，秉持带有唐宋遗风的思想，在细腻与宏大之间善于沽取文字“安身立命”的方法论。重建或创造“有规范自由，法度却仍灵活”[43]的美学篇章，研究堪舆（天地），关照自身、哺育或修缮当代文学的弱肢和缺口。十七岁便步入诗坛的赵野，面对杜甫、博尔赫斯、阮籍、艾略特、李煜、阿赫玛托娃等繁如云锦的诗人群体，几十年来走入又走出，他爱的山河与流水在“现代意识”和“古典参照”之间坐拥一块独立的位置，过分繁华，过分安静。

参考文献：

[1] 李天道. 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思想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55.
[2] 余敦康. 哲学导论讲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36.
[3] 李敬泽. 会议室与山丘[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 102.
[4] 赵野. 庄子卮语[J]. 诗刊. 2025(1): 75-80.
[5] 刘跃进. 〈文选〉学丛稿[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119.
[6] 张枣. 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作姿态[J]. 上海文学 2001(1): 186-191.
[7] 武家壁. 论半坡彩陶盆的天象图式[J].文博. 2020(3): 37-47.
[8] 陶机灵、危婧婧.浅议拙政园堪舆的科学性[J]. 农业科技与信息：现代园林. 2008(4): 22-24.
[9] 陶机灵、危婧婧.浅议拙政园堪舆的科学性[J]. 农业科技与信息：现代园林. 2008(4): 22-24.
[10] 赵野. 庄子卮语[J]. 诗刊. 2025(1): 75-80.
[11] 巫鸿. 天人之际：考古美术视野中的山水[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 177.
[12] 吴洋、常静怡、宋阳. 浅析堪舆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以清漪园为例[J].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2023(3): 62-70.
[13] 赵汀阳. 人工智能提出了什么哲学问题？[J]. 文化纵横. 2020(1): 43-51.
[14] 赵野. 剩山[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232.
[15] 曹梦琰. 秩序之美——赵野诗歌论[J]. 新文学评论. 2014(3): 135-138.

[16] 王元化. 九十年代反思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n 2000: 20.
[17] 艾略特. 艾略特诗学文集[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249.
[18] 西川. 北宋：山水画乌托邦[M].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 38.
[19] 赵野. 庄子卮语[J]. 诗刊. 2025(1): 75-80.
[20] 田晓菲. 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41.
[21] 赵野. 剩山[M]. 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109.
[22] 胡晓明. 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M]. 江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42.
[23]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04.
[24] 钱锺书. 宋诗选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42.
[25] 赵野. 剩山[M]. 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5.
[26] 石守谦. 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46.
[27] 胡晓明. 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M]. 江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222.
[28] 赵野. 剩山[M]. 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232.
[29] 方闻. 夏山图：永恒的山水[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6: 164.
[30] Harrie A. Vanderstappen. The Landscape Painting of China[M]. edited by Roger E. Covey. Gainesvelle：University Pressof Florida,. 2014,. pp. 34-35.
[31] 李章斌. 走出语言自造的深化——中国新诗论集[M]. 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264.
[32] 沈奇. 秋水静石一溪远——论赵野兼评其诗集〈逝者如斯〉[J]. 当代作家评论. 2005(2): 114-118.
[33] 李心释. 语言观脉络中的中国当代诗歌[J]. 江汉学术. 2014(4): 52-58.
[34] 巫鸿. 天人之际：考古美术视野中的山水[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 201.
[35] 颜红. 白雪掩埋的火焰——论赵野的古典抒情[J]. 当代作家评论. 2005(2): 118-123.
[36] 赵汀阳. 历史·山水·渔樵[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88.
[37] 高居翰. 图说中国绘画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35.
[38] 奚密. 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89.
[39] 裨治文. 联邦志略[M]. 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8: 5.
[40] 赵野. 剩山[M]. 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108.
[41] 李章斌. “王在写诗”——海子与浪漫主义诗人的自我定位[J]. 文艺争鸣. 2013(2): 82-88.
[42] 赵野. 剩山[M]. 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76.
[43]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46.

Poetry and Geomancy: Wr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Earth, and Man——On Zhao Ye's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Gao Ruodong[1]

[1] *China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Hong Kong 999077，China*

Abstract: A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heterogeneous member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poetry movement, Zhao Ye firmly believed in history and was nourished by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writing consciousness of caring for Dan Qing, the pursuit of natural seclusion, the reverence for moral values, and the mixed feelings based on reality and virtuality displayed in his poetry have a sustained impact on the aesthetic turn and language ecology of contemporary poetry. The main issue in studying Zhao Ye's poetic essence is how to deconstruct the construction, examination, and reflection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in his texts. Quoting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geomancy i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earth, and man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field of China, incorporating and even breaking through the inherent poetic criticism and theoretical system, thus integrating and enriching academic perspectives, logical experience, consciousness, and other aspects, and exploring new connotations and boundarie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further reinterpreting or elucidating Zhao Ye's works, but also to making positive explorations beyond paradigms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etry, creating some mirror value.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Poetry; Landscape aesthetics; Zhao Ye; Classical spirit

第 1 卷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51

用文化综艺讲“新国潮”故事：在年轻化表达中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营[1] 崔梦远[1]
（[1]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230601）

摘 要：在泛娱乐化的媒介生态语境下，文化综艺节目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表达载体。文化综艺节目凭借丰富的内容创新、灵活的传播策略，讲述中国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如何借鉴历史，让古老的传统文化焕发“年轻态”，如何促进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是文化综艺节目繁荣发展的创作命脉。本文以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化综艺节目为研究对象，从跨文化交流、内容设计、传播模式三个方面分析文化综艺节目如何用“年轻化表达”展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讲好“新国潮”故事。

关键词：文化综艺；年轻化表达；传统文化；“新国潮”故事

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文艺创作要“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1]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与“魂”，为当代电视创作提供了“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2]。例如，2025 年春晚的《栋梁》，以中国传统建筑为主题，从北京中轴线和梁思成手稿中寻灵感，并结合“XR+数字孪生+VP”等技术，打造虚实融合的舞台，展现古建筑的千年神韵；2023 年央视春晚上演的《满庭芳·国色》，以水袖、伞、扇子、花翎、剑五种传统器物为“形”，以桃红、湘叶、群青、凝脂、沉香五种传统颜色为“神”，将“东方舞韵”与“千年国色”结合，展示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从央视春晚爆火的《只此青绿》《行云流水》《飞天》到近年来口碑与收视双赢的《中国考古大会》《中国地名大会》《万里走单骑》，从河南卫视频繁出圈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到以“家”为核心，聚焦“年文化”的《丰年》《黄河泥娃》《国色天香》“年宇宙”系列节目，这些节目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要想让文化综艺节目持续高质量发展，就需要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译、经典IP的创造性转化、媒介融合的交互式传播，通过“年轻化”表达，讲好“新国潮”故事。只有这样，文化综艺节目才能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建构文化认同，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3]。

一、文化转译：传统文化酝酿新国潮

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4]传统文化作为国家社会历史沉淀的结晶，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也是世代传承的无限价值宝藏。然而，原生传统文化想要在当代社会生生不息，不能止步于保守和封闭，而要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以实现活态传承，将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的转译。所谓文化转译，就是把一件传统艺术珍宝放在新的语境中进行解读和鉴赏，

[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S2023AH050045）；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024KY004）

作者简介：

[1]马营（1990—），男，河北保定人，安徽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2]崔梦远（2001—），女，安徽合肥人，本科。

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5]

电视节目作为大众传媒的典型代表，能契合当代受众的审美需要，并对文化内容进行合理的现代转化。同时，电视节目也因为受众范围广、传播能力强和兼容性与渗透性并存的特点，使其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本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将传统文化的原真性称为“灵韵”，当下，原生文化在电视综艺传播中不断被生产、消费和传播，在娱乐消遣的同时忽略美感和灵韵，因此，在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机械复制时代”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2016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关于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提出“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不断研发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优质节目”[6]的指导方针。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故事里的中国》《书画里的中国》《典籍里的中国》《非遗里的中国》等以诗词书画、历史典籍、文化遗产等为素材、以创新表达为手段、以国家形象为目标、以年轻人为主要受众群体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应运而生，并在千帆竞发的综艺节目市场中已然成为当下文化风尚的领军者。这些节目通过年轻化表达方式，使晦涩难懂的历史文本转译成通俗易懂、富有趣味性和互动性的现代语言表现形式，弱化传统文化带给观众的距离感和差异性。如《舞千年》以“无字天书”《十二风舞志》为引题，创新打造古风剧情舞蹈，实现当代“古风”与Z世代“无缝”连接；《上新了·故宫》以六百年历史的文化宝藏为背景，创新结合文创产品运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登场了！洛阳》以历史文化的寻根之旅为主线，创新采用明星探索团视角，实现观众与历史元素的亲身互动。这些节目都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创新形式和内容，吸引了广大年轻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用文化综艺讲述“新国潮”故事，不仅潜移默化地将原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价值理念进行输出，同时也实现了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展示。媒体时代，作为民族精神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国家形象不仅有助于形成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且还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一个鲜明而一致的国家形象。[7]因此良好的国家形象建构，既能展示中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又能增强受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此外，文化综艺节目在体现国家人文风貌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复制或再现传统元素，而是通过创新性地整合、改编、演绎等方式，在保持传统特色和内涵的基础上赋予其新时代意义和审美价值，这样既能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更多样、更具吸引力、更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和载体，也能为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起到重要作用。

二、内容创新：创造性转化经典 IP

“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8]在娱乐综艺节目占据收视率高地的当下，文化综艺节目如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价值，又适应时代潮流不断创新艺术形式，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20 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引入IP概念，并强调“培育和塑造一批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创IP，加强IP开发和转化，充分运用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表演、网络视频、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产业形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9]。在内容为王的传媒时代中，“IP热潮”由流行文化、粉丝效应和群众参与共同推动，其高质量、高商业和高价值的持续影响力成了全媒体时代融合转化的核心要素。文化综艺节目创造性地转化中华文化IP，展现了与时代潮流相适应，不断创新艺术表现形式的新生机。

（一）拟人形象：“原型意象”的当代表达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意象”是一种审美范畴，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10]荣格将“原型”定义为人类集体无意识里反复出现并具有普遍性和深层性的典型模式，是种族记忆中传承下来的基本形象，也是一种心理结构。[11]当某些意象经过历史的沉淀和传承，能够持续影响人们的精神和意志，并具有超越个体和时代的象征性，这种特殊的意象就可以称为“原型意象”。原型意象可以来源于神话传说中（如女娲、夸父、织女、嫦娥等），也可以来源于人间生活中（如唐诗宋词中的自然类形象）。[12]原型意象在民族文化历史中形成，代表了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取向。因此，在集体无意识作用下，原型意象所具有的固定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作为传统 IP 进行创造性转化时更能激发观众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共鸣。频繁出圈的河南卫视文化综艺节目非常善于原型意象的融合转化：水下中国舞《祈》节目取自屈原《天问》中对洛神形态与气质的想象，通过水下舞蹈的创新演绎，唤起观众对

屈原和洛神的文化记忆；《七夕奇妙游》节目取自《梁祝·十八相送》《白蛇传·断桥相会》和《牡丹亭·游园》等中国经典爱情故事，通过昆曲、越剧和豫剧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唤起观众对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学的文化记忆；《中秋奇妙游》节目取自“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通过轻盈柔美的舞蹈表演，唤起观众对中秋节和月亮神话的文化记忆。这些基于原型意象进行改编的传统 IP 被运用到文化综艺节目中，架构起了历史文化与当代生活之间的沟通桥梁。

而在传统 IP 的创造性转化中，拟人是原型意象在当代表达最常用的手法。追溯到中华文化的古代典籍中，拟人，是文学作品里常用且重要的修辞手法之一。作为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外在维度的拟人意象是最早被众多研究者所关注的，当一个非生命物体具有类似于人类的面部和身体特征时，往往更容易被拟人表达。随着二次元文化的流行，“万物皆可拟人”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例如，在文化综艺中，这种“近取诸身”的做法也被运用到炉火纯青：《只此青绿》用舞者的站立和跳跃展现《千里江山图》的层峦叠嶂；《唐宫夜宴》用唐朝少女的风姿绰约展现大唐盛世的传统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用说唱俑的自我宣传展现国宝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综艺节目运用拟人的表达方式，主动与观众建立起情感交流渠道，以年轻化语态转化传统 IP，极大地提升了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认同。

传统文化元素在拟人形象创新下产生了新颖别致的视觉效果，在舞台上呈现出历史文化符号和谐共存的美感，创造出令人惊叹赞美的中华传统文化奇观。作为一种特别的年轻化表达方式：拟人化意象，不仅可以使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难以言说或难以直接展示的内容，也可以激发观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例如，《国家宝藏》节目中，每件文物都有一个拟人化的形象，通过故事化讲述，展现了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这种方式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让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更深的认知和认同。文化综艺节目运用原型意象的拟人化表达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3]，作为一种年轻化表达有效途径，能够使观众更好地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二）流量加持：特色嘉宾的专业化呈现

在数字多媒体时代，“流量”成为互联网关注度量化的一种表征。在注意力经济主导的网络世界中，流量关注度越高的领域，越容易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文化综艺节目为了打破收视群体固定化的局面，常常邀请流量明星为节目嘉宾，以此吸引年轻受众，拉近传统文化与年轻群体间的距离。明星作为社会传播工具的风向标，往往是文化观念和文化信息的重要能指[14]，邀请符合节目气质的明星，既能美化观众的视听感受，也能拓宽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明星把批判、观点等融入“个人体验和感觉”，引导观众形成“非政治化的眷恋”，即对现状的认可。[15]由明星本身引发而非强加的认可模式带有人情味与人格化的特征，这种营造出的拟态氛围使观众在明星、叙事和自身的个体特征的共同影响下产生了一种“介入感”或“同化”，[16]从而在观看、模仿和认同中引起共鸣。

文化综艺节目通过邀请“流量明星”进行专业领域的创新呈现，同时借助特色嘉宾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提高节目质量和深度，并增强节目的号召力和话题性。例如，《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一本好书》《朗读者》等节目选用了董卿、撒贝宁等知名节目主持人和康震、蒙曼等大学教授，作为特色嘉宾；《上新了·故宫》《登场了！洛阳》《登场了！敦煌》《了不起的长城》等节目在流量明星和专业嘉宾的带领下，提高了节目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并坚定了观众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同时借助明星效应，节目也更加贴合年轻受众以及粉丝的喜好，并通过庞大的粉丝群体对节目进行二次传播与宣传，提高节目的收视率。

约翰·菲斯克曾说过，粉丝是那些对文本有过分热情的读者，他们以一种主动的、激情的、狂热的、参与式的方式阅读。[17]流量明星和特色嘉宾的节目设置，使节目和粉丝之间形成了一种有针对性的黏性，从而达到了“粉丝经济”的营销目的。例如，《国家宝藏》通过邀请易烊千玺、雷佳音、蔡明等明星担任国宝的守护人，有效地提高了观众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度和认同感，同时也促进了粉丝对国宝的喜爱和尊重；《上新了·故宫》以聂远、周一围、魏晨等明星为开发员，运用创新的展示方式和互动模式，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对故宫文化的兴趣和好奇；《登场了！洛阳》由汪涵、唐九洲、罗一周等明星组成探索团，通过

亲身体验和现场访谈，展现了洛阳作为古都的历史魅力和文化底蕴。文化综艺节目利用名人的影响力来推动了经典IP的转化，利用粉丝群体的“导流”作用提高了节目的知名度，利用粉丝经济和流量红利来达到明星效应和文化价值的平衡，并激活传统文化的年轻化表达，提高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三）仪式空间：建构文化共同体想象

文化综艺节目的审美风范与节目基因源于经典文化与传播空间的精彩碰撞。这种碰撞为受众观看节目营造了一种正式的、纯粹的仪式体验。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詹姆斯·凯瑞阐述了传播的“仪式观”的含义。他认为，这种观点强调的不是信息在空间上的扩散过程，而是社会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是信息本身的共享方式，而是信仰和价值观的共同体现。[18]仪式传播作为传播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涵盖了社会文化的整个传播进程。例如，全媒体特别节目《三星堆新发现·揭秘》基于热门话题，以现场考古为视角，以360°全景视频追踪拍摄，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再现，引发了公众的热议。观众通过节目的参与互动连接在一起，将对历史文化记忆的回归与感悟转化为集体记忆的缅怀与反思，形成一种仪式性的电视传播。

文化综艺节目对“文化仪式空间”的建构，具体体现在把民族文化符号进行意义生产和具象呈现，从而成为真正的传播战略。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意义生产的过程模型，他认为意义的产生和传递依赖于符码的运用和诠释，他指出，我们通过编码的方式将事物置于符码之中，并且需要接收者通过解码的方式来理解和翻译意义。[19]以文化遗产类的综艺节目举例来说，聚焦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的节目，如《艺览吾“遗”》《新生万物》《非遗里的中国》等，聚焦民俗的节目，如《“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古韵新声 系列节目》《“中国节气”系列节目》 《“中国好时节”系列节目》等，聚焦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节目，如《中国考古大会》《万里走单骑》《了不起的长城》等，这些节目通过展示文化遗产的民族文化符号，将其编码为特定的意义，观众在接收节目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社会经验等因素进行解码，并构建出自己的意义，这个过程中，观众会根据自身的认知和情感经验，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重新诠释，并将其与自身的文化背景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文化共同体想象。文化综艺节目通过传播文化信息、呼唤历史记忆、想象文化共同体等方式，在经典IP转化中展现出高质量的表达力。同时，它们也借助所创造的文化仪式空间，在社会中发挥着连接文化共同体、传承民族精神等重要作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表明，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下，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在受众的共同认知和想象力中获得了归属。文化综艺，借由共同文化信息进行修正和转换，营造出与观众共有的仪式空间，让观众沉浸在相同身份，共同信仰的“文化共同体”中。仪式作为一种文化构建与传承的沟通系统，不仅仅是一系列礼仪性、规范性和模式化的行为叙事，更是一种具有凝聚作用的文化传播方式。[20]文化综艺节目通过频繁且持续的交流，在参与者之间塑造了集体记忆，这种基于共同想象的集体记忆不仅增强了经典IP转化的效果和影响力，也使观众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和认同。

三、传播策略：创新性发展媒介融合

随着互联网文化和新媒介技术的出现，文化综艺的观众需求日趋多元化，以青少年为主的受众群体已经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消费对象，在新的受众人群和媒介环境下，立足于文化综艺进行精准化传播是文化综艺节目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保障。

（一）互动参与：观众在场的弹幕狂欢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大众传媒呈现出打破常规、表达自由的新格局。观众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选择性不断增强，媒体宣传更加注重观众的互动参与和情感体验，传播的游戏化特征逐渐显现。正如威廉·斯蒂芬森在《大众传播游戏理论》中所写：“大众传播之最妙者，当是允许阅读者沉浸于主观性游戏之中者。”[21]斯蒂芬森认为，传播的目的就是传递快乐，而弹幕的特性正好符合大众传播游戏理论。弹幕是一种实时共享的交流媒介，反映在场参与者的情感。这种互动方式为观众带来了一种信息交互的快感，让很多人在即时的反馈下，体验到集体的狂欢。文化综艺节目在多个视频网站掀起弹幕互动的热潮，如Bilibili视频中的《舞千年》《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及爱奇艺视频中的《上新了·故宫》《登场了！洛阳》《登场了！敦煌》等，这些综艺节目作为一种动态交流的传播媒介，将弹幕式思维与游戏化理念运用到在场参与的受众中，让观众通过弹幕互动进行集体的视听狂欢。

对于网络媒介的受众群体来说，弹幕互动也是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集中体现。人们在狂欢时，打破阶层的限制、挑战社会的规范、推翻传统的观点，自由地表达自我。[22]在观众的交流与探讨中，不同观点相互碰撞，相同意见可以引起圈层认同。例如，在《舞千年》中，当《相和歌》的女演员从天而降时，屏幕上出现了许多赞美她美丽与神秘的弹幕，如“美哭了”“太好看啦”“天仙下凡”等；在《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中，一位古玩说唱兵马俑以拟人化口吻说“减肥真难”后，屏幕上出现了许多与之共鸣或者调侃的弹幕，如“哈哈哈哈哈”“是我了”“减肥真的好难”等；在《国家宝藏》中，随着LED显示屏上的《千里江山图》徐徐打开，不少观众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所震撼，并在屏幕上表达了他们对这件国宝美丽与灵动的感受，如“太美了”“好漂亮”“我觉得它在发光”等。弹幕所带来的及时交流和多向互动使用户体会到一种抱团式的体验，增强群聚感的同时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这也是弹幕传播的意义所在。

总之，文化综艺节目中弹幕的传播方式，改变了以往文化传播里单向的传受关系，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者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充分的交流互动。弹幕符号互动是多维度的，其基础在于观众渴望参与其中、表达自我和获得认同的需求[23]，观众通过在弹幕上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建议，引发群体共鸣，使个人的情感表达转变为集体的互动认同。这种弹幕狂欢式的参与互动，既能迎合观众的心理需求，又能增强观众的集体认同感，通过年轻群体的表达方式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跨屏共享：去除空间壁垒的“云设计”

美国学者凯文·凯利指出，现代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多屏时代，屏幕对一切事物都有影响，人们成为了“屏幕人”，屏幕可以是平面的或流动的，也可以是固定的或移动的，而且屏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24]作为信息传播的最前端，屏幕是连接虚拟与现实的直接端口。在当今多屏幕的大趋势之下，创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都得到了新媒介技术的支持，而大众传媒也逐步建立起更为便捷快速的信息传播模式：跨屏传播。这种传播模式突破了屏幕之间的时空壁垒，标志着“云设计”的新时代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

作为当前视听内容生产的主要形式，“云设计”已经逐步在电视综艺节目中形成了大小屏互通、多平台联动的跨屏交互系统。湖南卫视在 2020 首先开播了《嘿！你在干嘛呢》《天天云时间》等多个“云设计”创意综艺节目，开创了电视节目的“云设计”先河。之后“综艺+跨屏”的“云综艺”新模式日渐成熟，通过“云直播”“云演唱”“云朗诵”等形式创意，让“云设计”更加生动活泼。例如《中国诗词大会》就有一个“云上”千人团的环节，通过腾讯云实时音视频技术，实现千人在线连麦、共诵、出题、答题等互动功能。此外，《国家宝藏》通过“云讲解”“云观展”等方式，展示了各地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和故事；《见字如面》通过“云朗读”“云对话”等方式，还原了历史人物的书信和情感。这些节目的“云设计”一方面打破不同屏幕之间的壁垒，另一方面又强化各场景的共享优势，实现多屏媒介多线并进的云端叙事，增加了参与者的热情，也提高了观众的体验感。

云设计提升了文化传播的移动性和即时性，通过大屏与小屏的联动，观众能够获得全新的文化体验与参与方式。电视节目可以利用智能设备屏幕作为二次创作的媒介，从而拓展其表达空间和创意可能性，同时也反映了电视消费文化的独特魅力。[25]“云设计”的创新尝试，使得低成本、短周期的节目获得良好的播出效果，并且结合高质量的文化内容不断向外输出，使得文化类云综艺将年轻化的表达方式得以最大化。例如，在节目的录制上，采用大众传媒与爱奇艺、优酷、腾讯等网络平台合作跨屏直播，运用微博热搜、短视频推送等新媒体手段，提高文化传播的广泛性，从而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云设计的背景下，跨屏共享和虚拟传播，逐渐呈现出性能高效、运用灵活等优势，为文化综艺节目的传播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

（三）故事演绎：“艺术+科技”的场景式阅读

故事演绎是将传统文化经典以多种艺术形式跨界呈现的创新方式，它利用立体式、情境式、戏剧式的视听表达，让观众感受到中华文明的魅力和价值，并且有效地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和热爱。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故事演绎作为一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综艺方式，深受他们的青睐。例如，《舞千年》就是以鉴舞官向神书《十二风舞志》献舞为故事主线，采用影视剧制作流程，讲述蕴于舞蹈之中的华夏故事。虽然早期有一些文化类节目也是用故事化的方式传播我国传统文化，如《百家讲坛》《名师讲坛》等，但是这些节目仅仅依靠讲述者来吸引观众，形式较单一且不生动。随着讲坛式

传统文化节目日渐式微，一批以“场景式阅读”进行媒介融合的“新国潮”综艺也应运而生。

罗伯特·斯考伯和谢尔·伊斯雷尔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中提到，未来25年互联网将进入场景时代。[26]在不断变化的网络化新媒体环境下，场景传播作为媒介时代的新入口，为传递直观而多样、丰富而具体的信息提供了虚拟环境，场景成为了继内容、形式、社交之后媒体传播与接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27]因此，文化综艺节目需要建构独具中国艺术特色的“艺术+科技”场景，让传统历史故事直观而立体地展现在荧屏上，实现文本叙事到视听叙事的成功转换。例如，《典籍里的中国》通过运用实时跟踪、环幕投屏、AR等数字技术，讲述《尚书》《史记》《徐霞客游记》《孙子兵法》《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经典古籍中的历史与文化，为观众营造360度沉浸式场景体验；《一本好书》通过运用LED显示屏等高科技方式，演绎《头号书迷》《悲惨世界》《了不起的盖茨比》《简·爱》《骆驼祥子》《红岩》等文学书籍中的经典情节，为观众提供独特的视听享受；《国家宝藏》通过运用全息投影技术展示“小剧场”中的3D幻影文物，演绎“铜鎏金木芯马镫”“辛追墓T形帛画”“妇好鸮尊”“大克鼎”“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落霞式彩凤鸣岐七弦琴”等国宝的“前世”与“今生”，为观众展现历史与艺术的魅力。“场景式阅读”为文本构造的“书中世界”注入了一股活水，有效实现了场景与文化的创新融合，为观众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从而更好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结语

近年来，文化综艺节目蓬勃发展，涌现出一系列高水平、高质量的节目，从《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到《朗读者》《见字如面》，从《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到《诗画中国》《斯文江南》，这些节目以人文情怀和历史文化为表现内容，不断向年轻态发展，呈现出一种“新国潮”的势头。在情感层面，文化综艺节目激发了观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让中华儿女共同追寻文化的理念与精神，推动年轻群体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在行为层面，文化综艺节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石，引导观众向善向美，以深厚的历史文化激发民众的文化自信，实现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同时，文化综艺节目还能够在国际传播中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讲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故事。为了更好地推动国际传播工作，我们需要加强对文化综艺节目的创作和制作水平，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并且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 (2017-01-25)[2024-01-28].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2]毛泽东.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二周年[J].当代戏剧,2014,(03):1.DOI:10.13369/j.cnki.ddxj.2014.03.022.

[3]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J].群言,2005,(01):17-20.DOI:10.16632/j.cnki.cn11-1005/d.2005.01.001.

[4]梁启超. 梁启超讲文化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5]王静.传统文化类APP设计研究[D].江南大学,2016.

[6]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EB/OL]. (2016-06-20) [2023-02-28]. http://www.nrta.gov.cn/art/2016/6/20/art_31_31064.html.

[7]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J].国际新闻界,2007,(03):5-10.

[8]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1(002).

[9]《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 [2023-06-28].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27/content_5565316.htm.

[10]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1][瑞士] 卡尔·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 [M]. 冯川, 苏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2]张佩华.“形象”、“意象”及“原型意象”刍议[J].攀登,2003,(04):96-98.

[13]习近平谈世界遗产[J].海峡通讯,2021,(06):22-23.

[14]保·麦克唐纳,李二仕.重新认识明星现象[J].世界电影,2001,(04):44-66.

[15][英] 理查德·戴尔. 明星 [M]. 严敏,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6]陈晓云. 电影理论基础 [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17][美]约翰·菲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18][美] 詹姆斯·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 [M]. 丁未,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19] HALL S.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M]. London: Sage Publicatons, 2002: 61.
[20]孔朝蓬.文化类真人秀节目中传统文化传播策略探析[J].中国电视,2016,(11):17-20.
[21]William Stephenson，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New Jersey:Transaction，1988.
[22]马志浩,葛进平.日本动画的弹幕评论分析:一种准社会交往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4,36(08):116-130.DOI:10.13495/j.cnki.cjjc.2014.08.008.
[23]邓昕.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弹幕视频解析——以 Bilibili 网为例[J].新闻界,2015,(13):14-19.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15.13.002.
[24]刘翼,贺菲琳.屏幕生态系统下电视媒介的传播困境与对策[J].青年记者,2017,(26):17-18.DOI:10.15997/j.cnki.qnjz.2017.26.010.
[25]赵晖,于欣彤.电视“云综艺”的探索、问题与对策[J].当代电视,2020,(04):61-65.DOI:10.16531/j.cnki.1000-8977.2020.04.014.
[26][美] 罗伯特·斯考伯, 谢尔·伊斯雷尔. 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 [M]. 赵乾坤, 周宝曜,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27]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新闻记者,2015,(03):20-27.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15.03.003.

Telling "New National Trend" Stories with Cultural Variety Shows: Identifying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Youthful Expression

Ying Ma [1], Mengyuan Cui [1]

[1]*School of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China*

Abstract: In the media ecological context of pan-entertainment, cultural variety shows, with their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variety shows rely on rich content innovation and flexibl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and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w to learn from history, rejuvenate anci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a "youthful attitude", and promote the audience's identification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the creative lifeline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variety shows. This paper takes representative and influential cultural variety show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how cultural variety shows use "youthful expression" to show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ell "new national trend" stories from three aspec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tent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mode.

Key words: Cultural Variety Shows; Youthful Expression; Traditional Culture; "New National Trend" Stories

第 1 卷第 1 期
202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02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556

打破完美的枷锁：认知行为疗法对完美主义者社会适应能力的干预效果研究

邵良超[1] 鞠晓蕾[2]

（[1]韩国金泉大学，庆北 金泉 39528，[2]内江师范学院，四川 内江 641100）

摘要：适应不良性完美主义作为一种高风险人格特质，与社会焦虑、抑郁及人际功能损害等心理问题密切相关，显著影响个体社会适应能力。本研究系统探讨了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在改善完美主义者社会功能中的干预机制及临床效果。研究表明，CBT 通过整合认知重构、行为实验等核心策略，能有效修正完美主义者的非理性信念和回避行为，显著提升其社会参与意愿。同时，基于互联网的 CBT（ICBT）及第三代疗法（如 MBCT、ACT）为个性化干预提供了新思路，但其长期效果与文化普适性仍需深入验证。

关键词：适应不良性完美主义，认知行为疗法，社会参与意愿，个性化干预

一．完美主义者的认知行为特征及其心理影响

完美主义是一种复杂的人格特征，其核心表现为追求极高的标准，并在未达到预期目标时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7]。研究表明，完美主义可分为适应性和适应不良性两种类型[28]，前者体现为设定高但可实现的目标并为之努力，后者则表现为追求不切实际的标准，伴随着严格的自我批评和对失败的强烈恐惧[27]。根据多维完美主义量表（HMPS）的理论框架，完美主义可从三个维度进行考察：自我导向（追求个人卓越）、他人导向（对他人持有完美期望）和社会导向（认为他人对自己抱有过高期待）。这种多维度的概念化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完美主义的表现特征。适应不良性完美主义对个体社会功能的影响尤为显著。研究发现，这类个体往往表现出显著的社交焦虑和人际敏感性，持续担忧他人的负面评价[10]，并倾向于采用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23]。这种持续的社交忧虑不仅导致孤立感增加，还会显著降低生活满意度[12]。相比之下，适应性完美主义能够促进个人成就和自我成长；而适应不良性完美主义则因其难以企及的标准和持续的不满足感，引发多种情绪困扰和社会适应问题[19]。具体而言，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常因过度关注社交表现而陷入焦虑，进而选择退出社交互动，难以建立深层的人际连结[29][21]。他们往往认为他人对自己抱有过高期望，这种信念加剧了自我意识，强化了对社交失误的恐惧[25]，最终导致回避行为增加，加深社交孤立和孤独感[22]。针对这一问题，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被证实为最有效的干预方法，其核心在于重塑阻碍社会参与的非理性信念和行为模式[26]。通过系统整合认知重构、行为实验和自我同理心培养等策略，CBT 能有效帮助个体应对社交焦虑，提升社会适应能力[32]。

表 1：适应性完美主义与适应不良性完美主义的特征对比

类型特征描述	相关心理问题
适应性完美主义追求高标准，但能够接受失败，具有弹性	成就动机↑ 焦虑水平↓
适应不良性完美主义追求不切实际的标准，对失败极度恐惧，自我批评严重	社交焦虑↑ 抑郁风险↑

二．认知行为疗法对适应不良性完美主义的干预机制

（一）CBT 概述

CBT 是一种系统化、循证导向的心理治疗方法，通过修正非理性认知和调整适应不良行为来缓解心理问题[17]。针对适应不良性完美主义的 CBT 干预主要包括认知重构，行为实验和问题解决技巧训练[14]。研究证明，CBT 可以显著降低完美主义倾向，同时提高社会功能。接受 CBT 的参与者普遍社交焦虑显著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增加[16]。心理治疗师指导的 CBT 采用个性化干预，有效地解决完美主义者独特的认知和行为模式[27]。

（二）CBT 的认知重构

认知重构是CBT的核心技术之一,是识别和改变他们完美主义思维中非理性信念的重要过程[26]。完美主义者经常发现他们被困在一种信念中，即他们必须取得完美的成就，以避免被拒绝或批评。通过认知重构，引导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理解这种思想和行为的复杂性。以此可以深入了解认知扭曲和灾难性思维如何助长他们的焦虑和回避倾向[5]。通过系统性的认知训练，个体能够逐步识别出这些非理性思维模式，并学会用更具适应性和现实基础的信念体系来替代它们[17]。这一转变过程可以通过典型案例来说明：当完美主义者持有"我绝不能犯错"这种刚性思维时，治疗师会引导其重新审视这一信念，帮助其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同理心的认知框架。例如，认识到错误是人类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且有价值的经历，它们提供了学习和提升的机会，而非个人价值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这种认知转变不仅能显著降低心理压力和焦虑水平，更能帮助个体建立起一种更为健康、平衡的自我关系，从而增强其心理韧性和适应能力。

（三）CBT 的行为实验

行为实验作为 CBT 的核心治疗策略之一，为完美主义者提供了系统化的实践平台。这种干预方法独特之处在于它鼓励个体主动暴露于引发焦虑的社交情境中，直面对错误和他人评判的恐惧。研究表明，当社交焦虑的适应不良完美主义者参与精心设计的行为实验时（如在社交聚会中故意展现小失误），能够获得挑战原有认知图式的直接经验[8]。这种结构化的体验不仅提供了检验完美主义信念的实证依据，更能有效降低个体的社交焦虑水平，增强其社交互动的自信心。通过系统性地突破舒适区，个体往往能够意识到先前对负面评价的预期过度夸大，这种认知重建过程不仅提升了其自信水平，更培养了面对挑战的心理韧性。

表 2：CBT 的核心技术与干预目标

类型技术	干预目标	关键效果
认知重构	修正“全有或全无”思维	自我批评减少，灾难化思维缓解
行为实验	降低社交回避行为	错误容忍度提升

三．认知行为疗法对完美主义者社会适应功能的改善效应

（一）减少社会焦虑

认知行为疗法（CBT）在缓解完美主义者的社交焦虑方面显示出显著效果，根据 Galloway 等人进行的荟萃分析[14]，接受 CBT 干预的个体社交焦虑显著降低，社会参与度明显增加。认知重构在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重建对失败的恐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终有助于减少社会交往中的焦虑[2]。这一变革性的过程给予了个人新的自信和韧性，以更亲和的方式去适应社会。

（二）改善社会功能

认知行为疗法（CBT）通过培养适应性社交技能和减少回避行为，显著提高了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的整体社交水平。接受 CBT 干预的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通常对他们的社会互动表现出更大的满意度，并越来越倾向于参与社会活动[9]。研究表明，CBT 增强了社会自信，使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能够积极地探索不太担心批评的社会场景[16]。这种新的自信改变了他们的社交体验，使他们能够建立更深的联系和更令人满意的互动。

（三）增强自我同情心

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经常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这只会加深他们的社会挑战。CBT 积极鼓励个人通过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和善待自己来培养自己的同情心[1]。自我同情的增加与社会调节的改善有关，随着个人将焦点从避免失败转移到积极的社会互动上，这些变化培养了对自身更宽容的态度，并允许与他人建立更丰富，更有意义的关系。

表 3：CBT 对不同类型完美主义的效果对比

类型	干预重点	改善指标
自我导向型	降低自我批评标准	自我接纳度↑ 焦虑↓
社会导向型	挑战“他人高期待”信念	社交回避↓ 关系满意度↑

四．认知行为疗法的创新模式与发展趋势

（一）基于互联网的认知行为治疗（ICBT）

基于网络的认知行为治疗（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ICBT）的出现，显著拓宽了完美主义者接受治疗的机会。最近的研究表明，ICBT 与传统的面对面治疗一样，可以有效缓解完美主义和改善社会功能[24]。一般来说，ICBT 计划的特点是自我指导模块，强调认知重构和行为实验，并且通常补充治疗师的支持选项[29]。这种灵活性允许个人以更适合自己的速度参与治疗，从而促进更个性化的治疗旅程，产生更有意义的变化。未来研究需探索人机协同模式（如 AI 辅助实时情绪识别），以平衡效率与人性化干预的需求。

表 4：传统 CBT 与 ICBT 的对比

维度	传统 CBT	ICBT
可及性	依赖线下资源，成本较高	突破地域限制，成本较低
个性化支持	治疗师实时反馈，灵活性高	依赖预设模块，灵活性较低
适用人群	适合高动机、需深度干预的个体	适合轻度症状、时间受限的个体

（二）第三代认知行为疗法

第三代认知行为疗法，包括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MBCT）和接纳与承诺疗法（ACT）被证明是治疗完美主义的有效方法。这些创新方法优先考虑接受完美主义思想，而不是直接修改它[3]。第三代疗法在治疗高度情绪回避和自我批评的个人展现出显著的效果[4]。

MBCT 鼓励个人批判性地观察自己的完美主义思想，从而减少其对社会功能的影响[18]。MBCT 和行为表现出对加强情绪调节和抑制社交回避的承诺。这种疗法通过使用正念和接受策略，使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能够建立更富有同情心的关系[11]。鼓励个人不加判断地接受完美主义倾向，减轻情感负担，专注于有意义的生活目标，而不是追求无法达到的标准[20]。最后，MBCT 和 ACT 强调带着不完美生活的重要性，而不是试图完全消除完美主义思想，这些变化与社会功能的改善和焦虑的减少有关[6]。

（三）CBT 与其他治疗方法的结合

近年来，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探索认知行为疗法（CBT）和多种疗法的整合，用以改善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的社会适应。例如，人际关系疗法（Interpersonal therapy，IPT）和 CBT 的结合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地应对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经常面临的人类挑战，如社会孤立和关系冲突[13]。此外，专注于培养自我同情心的同情聚焦疗法（Compassion-Focused Therapy，CFT）也与 CBT 相结合，使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能够减少自我批评，加强人际关系[15]。

五．认知行为疗法的应用挑战与未来研究方向

认知行为疗法（CBT）已被广泛证明是应对适应不良完美主义的有效干预手段，尤其在缓解社交焦虑、改善社会功能和增强自我同情方面表现出显著效果[14]。然而，尽管 CBT 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仍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CBT 的长期效果

虽然大量研究表明 CBT 在短期内能够显著降低完美主义倾向并改善社会适应能力，但其长期效果仍需更多研究支持。例如，Handley 等人发现，接受 CBT 干预的完美主义者在治疗后 6 个月内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降低，但 12 个月后的效果有所减弱[16]。这表明，CBT 的长期效果可能受到个体差异、环境因素和治疗依从性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如何通过加强后续支持（如定期随访或强化课程）来维持 CBT 的长期效果。

（二）文化差异与 CBT 的普适性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样本，而完美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应对策略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社会导向型完美主义，即过度关注他人对自己的期望[30]。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探索 CBT 在非西方文化中的适用性，并开发文化适配的干预策略。例如，结合本土化的心理教育内容或调整行为实验的设计，以更好地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个体的需求。

（三）CBT 对不同类型完美主义的效果差异

完美主义可分为自我导向型、他人导向型和社会导向型[12]。现有研究表明，CBT 对自我导向型完美主义者的效果最为显著，而对社会导向型完美主义者的效果较弱[16]。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导向型完美主义者更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而非自身认知偏差。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探索针对不同类型完美主义的个性化干预策略，例如结合人际关系疗法（IPT）来应对社会导向型完美主义者的人际关系问题。

（四）基于互联网的认知行为疗法的潜力与挑战

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的认知行为疗法（ICBT)作为一种灵活且可及性高的干预方式，研究表明，ICBT 在降低适应不良性完美主义得分和缓解社交焦虑方面与传统 CBT 效果相当[24]。然而，ICBT 的长期依从性和治疗效果仍需进一步验证。例如，Vernmark 等人发现，ICBT 参与者的中途退出率较高，这可能与其缺乏治疗师的实时支持有关[29]。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探索如何通过增加互动性（如在线咨询或实时反馈机制）来提高 ICBT 的参与度和效果。

（五）现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现有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许多研究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此外，样本量较小和缺乏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设计也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未来的研究应采用更严谨的实验设计（如多中心 RCT）和多样化的数据收集方法（如行为观察或生理指标），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六. 总结与临床实践启示

认知行为疗法（CBT）已经被确立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增强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的社会适应。通过解决与完美主义相关的基于社交焦虑的认知和行为机制，CBT 帮助个体减少回避行为,培养自我同情,更充分地参与社会互动的能力。认知重构，行为实验，行为纠正和心理教育的整合使 CBT 擅长解决干扰社会功能的不适应思维模式和行为。基于互联网的认知行为疗法（ICBT）和第三代认知行为疗法的最新进展通过正念认知疗法（MBCT）以及接纳与承诺疗法（ACT）拓宽了完美主义者的治疗环境。今后的研究应深入地研究这些整合模式，强调维持社会协调和人类幸福长期改善的重要性。随着不断的精细化，个性化，CBT 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可以在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拥有更充实的社会生活和发展情感韧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Aldea, M. A., Rice, K. G., Gormley, B., & Rojas, A. (2010). Telling perfectionists about their perfectionism: Effects of providing feedback on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48(12), 1194-1203.
[2] Alden, L. E., Ryder, A. G., & Mellings, T. (2002). Perfectionism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fears: Toward a two-component model.
[3] Alsubaie, M., Abbott, R., Dunn, B., Dickens, C., Keil, T. F., Henley, W., & Kuyken, W. (2017). Mechanisms of action in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and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in people with physical and/or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55, 74-91.
[4] A-tjak, J. G., Davis, M. L., Morina, N., Powers, M. B., Smits, J. A., & Emmelkamp, P. M. (2015).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for clinically relevant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problems.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84(1), 30-36.
[5] Barahmand, U., Shamsina, N., Rojas, K., Geschwind, N., & Iya, F. H. (2023). Mechanisms Linking Perfectionism and Social Anxiety: The Role of Hostility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Positive Social Outcomes.Journal of Psychiatric Practice®,29(2), 94-103.
[6] Cladder-Micus, M. B., Vrijsen, J. N., Fest, A., Spijker, J., Donders, A. R. T., Becker, E. S., & Speckens, A. E. (2023). Follow-up outcomes of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35, 410-417.
[7] Curran, T., & Hill, A. P. (2019). Perfectionism is increasing over time: A meta-analysis of birth cohort differences from 1989 to 2016.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5(4), 410-429.
[8] Egan, S. J., & Hine, P. (2008). Cognitive behavioural treatment of perfectionism: A single case experimental design series.Behaviour Change,25(4), 245-258.
[9] Egan, S. J., Wade, T. D., Shafran, R., & Antony, M. M. (2014).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 of perfectionism. Guilford Publications.
[10] Egan, S., Piek, J., Dyck, M., & Kane, R. (2011).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erfectionism scale.Clinical Psychologist,15(3), 121-132.
[11] Finucane, A., & Mercer, S. W. (2006). An exploratory mixed methods study of the accep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activ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rimary care.BMC psychiatry,6, 1-14.
[12] Flett, G. L., & Hewitt, P. L. (2014). Perfectionism and perfectionistic self-presentation in social anxiety: Implications for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Social anxiety, 159-187.
[13] Flett, G. L., Hewitt, P. L., Nepon, T., & Besser, A. (2017). Perfectionism cognition theory: The cognitive side of perfectionism. InThe psychology of perfectionism(pp. 89-110). Routledge.
[14] Galloway, R., Watson, H., Greene, D., Shafran, R., & Egan, S. J. (2022). The efficacy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of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for perfectionis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51(2), 170-184.
[15] Gilbert, P., & Procter, S. (2006). Compassionate mind training for people with high shame and self-criticism: Overview and pilot study of a group therapy approach.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 Practice,13(6), 353-379.
[16] Handley, A. K., Egan, S. J., Kane, R. T., & Rees, C. S. (2015).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group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for perfectionism.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68, 37-47.

[17] Hofmann, S. G., Asnaani, A., Vonk, I. J., Sawyer, A. T., & Fang, A. (2012). The efficacy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A review of meta-analyses.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36, 427-440.
[18] James, K., & Rimes, K. A. (2018).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versus pure cognitive behavioural self-help for perfectionism: A pilot randomised study. Mindfulness, 9, 801-814.
[19] James, K., Verplanken, B., & Rimes, K. A. (2015). Self-criticism as a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healthy perfectionism and distr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9, 123-128.
[20] Leeuwerik, T., Cavanagh, K., & Strauss, C. (2020). The association of trait mindfulness and self-compassion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symptoms: Results from a large survey with treatment-seeking adult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44(1), 120-135.
[21] Mackinnon, S. P., Battista, S. R., Sherry, S. B., & Stewart, S. H. (2014). Perfectionistic self-presentation predicts social anxiety using daily diary method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6, 143-148.
[22] Rais, O., & Norton, P. J. (2024). The effects of fear of evaluation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social anxiety in college students. Current Psychology, 1-12.
[23] Rosser, S., Issakidis, C., & Peters, L. (2003). Perfectionism and social phobi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s and impact on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7, 143-151.
[24] Rozental, A., Shafran, R., Johansson, F., Forsström, D., Jovicic, F., Gelberg, O., ... & Buhrman, M. (2024). Treating perfectionism via the Internet: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omparing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to unified protocol.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53(3), 324-350.
[25] Shafique, N., Gul, S., & Raseed, S. (2017). Perfectionism and perceived stress: The role o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46(4), 312-326.
[26] Ciharova, M., Furukawa, T. A., Efthimiou, O., Karyotaki, E., Miguel, C., Noma, H., ... & Cuijpers, P. (2021).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behavioral activation and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dult depression: A network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89(6), 563.
[27] Shafran, R., Cooper, Z., & Fairburn, C. G. (2002). Clinical perfectionism: A cognitive–behavioural analysi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0(7), 773-791.
[28] Stoeber, J., & Otto, K. (2006). Positive conceptions of perfectionism: Approaches, evidence, challeng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4), 295-319.
[29] Vernmark, K., Hursti, T., Blom, V., Asplund, R. P., Nathanson, E., Engelro, L., ... & Andersson, G. (2024). The Effects of Mindfulness-Focused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n Elevated Levels of Stress and Symptoms of Exhaustion Disorder: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linical Psychology in Europe, 6(3), e12899.
[30] Yang, H., & Stoeber, J. (2012).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perfectionism scale: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34, 69-83.

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n Enhancing Social Adjustment for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ts

[1]Shao Liangchao， [2]Ju Xiaolei
[1]Gimcheon University, korea
[2]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China

Abstract: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 as a high-risk personality trait,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psychological issues such as social anxiety, depression, and interpersonal dysfunction,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individuals' social adaptabilit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ntervention mechanisms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in improving social functioning among individuals with perfectionism.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CB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ore strategies including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and behavioral experiments, effectively modifies perfectionists' irrational beliefs and avoidance behaviors, notably enhancing their willingness for social engagement. Additionally, Internet-based CBT (ICBT) and third-wave therapies (such as MBCT and ACT) offer novel approaches for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 although their long-term effectiveness and cross-cultural applicability require further validation.

Key words ：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Social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

第 1 卷第 1 期
202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02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49

新质设计力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张淑敏[1] 黎家良[1]

（[1]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本研究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出发，提出以“新质设计力”为核心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通过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框架分析，新质生产力促使设计力向“新”发展，论述新质设计力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价值、困境挑战与多维创新路径。研究发现，设计力通过创新转型为传统文化注入活力，推动“设计+”与文旅融合，提升城市和社区规划，以及通过科技赋能与系统性赋能提升文旅体验。从设计多学科交叉、数字经济驱动、品牌建设等三个维度探讨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通过科技创新和设计创新，推动文旅产业形成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市场活力。

关键词：新质设计力；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文旅产业正经历从传统模式向创新模式的转变，在市场需求和科技进步的双重驱动下，文旅行业面临创新乏力、体验单一、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强调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管理模式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旨在通过技术创新、要素优化和产业融合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资源利用率，并推动产业全面升级[1]。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设计力通过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创新了文旅产品和服务形式，优化了用户体验，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和市场活力。

一、“新质”设计力概念与特征

设计力是基于消费升级和商品升级的背景提出的。苏文曾指出“设计力的形成过程，是一场修行，来源于设计师对生活的体悟，是一个内求的过程。[2]”设计力是指设计师或设计团队通过创新思维、创意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利用艺术、技术、市场等多种因素，创造出有形或无形产品的能力。新质设计力的“新”与“质”是新质生产力“新”与“质”的体现，新质设计力的“新”体现了技术创新、跨界整合和设计思维的升级，而“质”则代表了设计在文化、美学、可持续发展和用户体验方面的高质量追求。新质结合，推动设计从传统的美学与功能领域，迈向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生态价值创造。新质设计力不仅是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也为各个行业的创新和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方法。新质设计力的“新质”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融合创新、用户体验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借助前沿科技驱动设计，提升设计效率和精准度；与科技、文化、商业等领域深度融合，创造全新业态；设计中融入文化元素和社会价值观，推动设计与文化的双向融合；注重用户的全程参与感和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新质设计力是设计力从传统的单一功能性向多维度价值创造转型的价值体现。

[1] 作者简介：张淑敏(1999-)，女，山东聊城人，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黎家良(2001-)，男，广东茂名人，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二、新质设计力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质设计力通过技术、文化与用户体验的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的全面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已显示出强大的推动力。[3]”新质设计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表现，通过设计创新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实际产品与服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2.1 创新驱动：科技与设计融合，推动文旅产品和服务升级

科技创新与设计创新推动产业转型，特别是在文旅产业中。两者融合优化供给模式，创造全新体验，助力文旅向智能化、体验式转型。创新驱动提升竞争力，新质设计力通过科技与设计创新升级文旅产品。科技为设计提供工具，设计创新利用科技实现差异化与个性化。设计创新融入文化创意、科技元素和独特体验，打造竞争力强的文旅产品。新质设计力整合 VR、AR、AI 等技术，优化场景体验，增强沉浸感。科技与设计的融合也体现在文化创意赋能品牌塑造上，提升文化吸引力和市场影响力。科技与设计融合将推动文旅产业向高质量、智能化、多元化发展。

2.2 产业融合：打破边界，实现文旅与多产业深度融合

文旅产业正由单一向多元融合转变，打破传统边界，与科技、文化等多产业深度融合。此融合注入新活力，拓展发展空间，创造新经济增长点。文旅融合为核心，提升文化体验，推动文化传播；科技推动文旅创新，智慧旅游应运而生，提升旅游体验；多领域融合催生新业态，如体育旅游、乡村旅游等，满足多样需求。文旅产业将实现多元化、智能化、生态化发展，为经济增长和文化传播注入新活力。

2.3 用户体验优化：个性化设计提升游客参与感和满意度

个性化设计通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提升游客参与感和满意度。其核心在于以用户为中心，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和产品，创造独一无二的旅游体验。传统模式已无法满足多元化需求，通过数据分析把握游客兴趣，设计个性化服务；沉浸式体验设计增强游客与环境互动，提升参与感和满意度，进而增强品牌忠诚度。

2.4 绿色设计：推动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4]”作为一种将生态保护、资源节约和文化传承融入到设计理念中的实践方式，绿色设计不仅仅是技术的应用，更是一种发展理念的转变。生态旅游和乡村旅游推动地方经济与生态保护双赢，绿色设计推动文旅产业绿色运营，减少碳足迹，赋能品牌价值，吸引环保游客，打造绿色旅游品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平衡[4]。

三、新质设计力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3.1 技术基础与创新能力不足

新质设计力需技术创新支持，尤其在数字化与智能化设计领域。文旅企业因技术基础弱、资金人才匮乏，技术应用受限，问题在于技术初级应用，未深度整合高效利用。如 AR、VR 技术因滞后或维护不力，难提供流畅沉浸式体验；大数据挖掘分析能力不足，游客需求预测表面化；创新能力缺失亦制约发展，技术与设计脱节，文旅产品缺乏新意，体验单一；技术与设计脱节削弱产品创新性，挑战产业竞争力。

3.2 文化适应性与本土化削弱

如何实现新质设计力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规避“文化水土不服”的困境，是亟需解决的难题。文化适应性的缺失不仅会削弱旅游体验的深度，还可能导致文化的扭曲与误解，过度依赖科技手段而忽略文化独特性，会降低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深度体验。需要在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需求之间找到平衡，既能展示地方文化的精髓，又能满足不同文化背景游客的需求，从而确保文化的真实传承与创新表达。

3.3 资源整合与产业协同难度大

新质设计力的有效实施需要整合科技、文化、市场等多领域资源，但文旅产业的综合性使资源整合的复杂性成为企业创新的瓶颈。文旅产业需要科技公司、文化机构、政府部门等多方协同，但利益协调和资源分配的困难导致合作效率低下，阻碍资源的最优配置。跨行业合作的缺失使得文旅企业难以有效整合科技与文化资源，限制了新质设计力的发挥，进而阻碍了文旅产业的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3.4 用户参与度与体验度不足

新质设计力的精髓在于借助创新设计手段，深化游客的参与层次与体验质量。当前文旅企业在确保游客在旅游全过程中能够保持高度的参与热情和深度的体验感受方面，仍面临显著挑战。游客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文旅企业难以通过单一设计满足多样化需求。新质设计力倡导通过创新设计增强游客的参与感，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平衡设计的复杂性与操作的便捷性，确保游客能顺利沉浸式参与体验，企业也需要在技术创新和用户友好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四、新质设计力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创新路径

4.1 多学科交叉，驱动文旅创新设计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突破学科壁垒，形成交叉融合、多元并蓄的学科布局，从而扩大一专多能、素质全面的跨学科人才供给，为新制造、新业态、新服务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5]。新质设计力正是在学科多元交叉与技术跨界融合的新形态下，聚焦文旅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科技创新发展。多学科交叉设计的核心在于跨越传统学科的边界，将不同领域的知识、技能和视角融会贯通，从而实现系统性创新。第一，科技与设计的深度融合，提升产品科技感与互动性，使文旅形式不再局限于物理体验，而是向沉浸式、交互式体验迈进。第二，人文学科的深度介入，挖掘地方文化故事，将文化符号、民俗元素、历史事件等有效融入设计中，增强了文旅产品的叙事性和文化深度，使得游客的体验不仅限于视觉的享受，更具有情感的共鸣和历史的沉浸感。第三，社会科学与用户体验设计结合，深入理解游客的需求和行为，设计出符合游客心理预期和审美偏好的产品与服务，让游客在整个游览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关怀和便利，将文旅体验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从表层向深层次进行全面提升。第四，多学科人才、知识交叉，激发创意和灵感，碰撞丰富多彩的设计方案，使其在多个维度上进行深入优化，呈现出既美观、实用，又富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文旅产品与体验。通过这种跨界融合，文旅产业得以在内容深度、体验广度和文化内涵等方面实现系统性提升，从而更好地满足现代游客的多样化需求，推动文旅产业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

4.2 数字经济驱动，赋能文旅产业的全新体验

数字经济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科技要素的全面嵌入、产业融合的深度升级以及新兴技术的应用，改变文旅产业的内核与外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前沿技术，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实现了从内容创意、互动体验到资源管理的全面数字化转型。第一，新科技重塑文旅落地场景。要积极推进文物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通过数字采集、云端服务和智慧技术等前

沿科技，完成文物文化遗产的采集、存储、展示等流程，实现文物文化遗产数字化保存[6]。延长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增加了文化的传播半径，使通过数字途径“参观”文化遗产。第二，数字经济推动文旅产业拓展新的“文旅+”模式，例如“文旅+体育”、“文旅+虚拟演艺”、“文旅+数字博物馆”等新业态。借助新技术和新形式的多样表达，使游客不再受限于物理空间，通过线上平台参与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拓展了传统文旅的服务边界。第三，数字技术、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深度赋能，推动智能化文旅服务体验。建设智慧景区，实现景区内游客流量的实时监测、设施的自动化控制和运营管理的智能化调度。借助智能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游客的旅游过程从智能化推荐、语音导览、智能支付，到跨平台的旅游资源共享，数字经济将旅游体验从简单的信息获取和游览观光升级为智慧化、互动式和体验式的全方位文化享受。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文旅产业的创新与升级，不仅使文化与旅游体验焕然一新，更推动文旅产业在内容、模式和服务等各个层面向智能化、个性化和深度化方向发展。

4.3 品牌建设，提升文旅产品的附加值

品牌建设作为提升文旅产品附加值的核心路径之一，通过品牌化运作，获得了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文化内涵、设计力与市场需求的深度融合，从而提升文旅产品的整体价值，为文旅产品增添了情感共鸣、文化深度和社会责任。第一，新质设计力通过本地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与转化，将其融入文旅产品设计中，品牌联动与跨界合作，深化多重文化内核，构建视觉与文化的双重品牌价值，为产品注入了新的文化符号和科技附加值，形成“文化+设计+科技”的新型文旅品牌形象，提高了品牌的影响力和产品的市场附加值。第二，文旅品牌建设的核心是与消费者的情感连接，而品牌故事是建立这种连接的重要桥梁。新质设计力通过创意设计，将景区、文化、历史等元素转化为独具特色的品牌故事，让游客在购买文旅产品或体验文旅服务时感受到品牌所传达的精神和文化内涵。第三，以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在线直播等数字化渠道，制作品牌相关的短视频，展示品牌故事、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游客在景区的真实体验，文旅品牌能够与目标受众建立更加直接和互动的联系，扩大品牌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五、结论

新质设计力通过技术与设计的跨界融合，激发了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推动了文旅产业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发展，丰富了文旅体验，为文旅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未来，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与设计的结合，注重创新思维与文化内涵的融合，打造更具吸引力和文化价值的文旅产品与服务。新质设计力的持续深化，将助力文旅产业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实现文旅产业的全面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N]，《求是》2024 年第 11 期.
[2] 苏文.设计力要做的是“雪中送炭”[J].中国广告,2022,(08):24-27.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第 1 期.
[4] 姚树洁，张帆．区域经济均衡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J].宏观质量研究,2021,9(06):1-16.DOI:10.13948/j.cnki.hgzlyj.2021.06.001.
[5] 董占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设计学科基础与实践路径[J].美术观察,2024,(07):11-16.
[6] 徐芳．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4,47(03):62-67.DOI:10.13964/j.cnki.zgsxswdx.2024.03.010.

Research on Empower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with New Quality Design Power

Shumin Zhang[1], Jialiang Li[2]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study proposes a path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with "new quality design power" as the c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power towards "newness", and discusses the internal logic, value, dilemma challenges and 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 path of new quality design power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The study found that design power injects vitality into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cultural tourism, improves urban and community planning, and enhances cultural tourism experience through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systematic empowerment.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s discuss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digital economy drive, and brand building.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sign innovation,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s promoted to form new formats, new scenes, and new models, and the industry's competitiveness and market vitality are enhanced.

Keywords：new quality design power;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第 1 卷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71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教育与学习中的优势与风险

李展鹏[1]

（[1]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各领域的广泛使用，为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在外语教学上，GenAI 的普及给外语教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因其便利性，GenAI 能够为外语教学提供个性化指导、提供外语各技能训练、自动生成评估与反馈、提供外语教学新指导等优势。然而，GenAI 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也会给外语教学带来风险和挑战，如增加违反学术诚信的风险、影响教师角色和职业发展、降低学生学习自主能动性、生成不合理的答案与解析等。因此，在享受 GenAI 便利性的同时，也要关注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合理利用 GenAI 技术，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学生外语能力的全面发展。文章总结前人的研究，探讨 GenAI 为外语教育和学习带来的 4 点优势和 4 点风险，并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出 6 点建议。

关键词：GenAI；外语教育和学习；优势；风险；建议

1. 引言

近年来，得益于大数据、先进算法等科技手段的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应运而生。其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和内容生成能力，为外语教育与学习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在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正逐渐颠覆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为教育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该模型不仅能够扮演多种教学角色，还能够为教育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更丰富的教学和学习方式[24]。由此可见，GenAI 的崛起为教育带来新生态，不仅改变了教育模式，也能够重塑了师生角色、教学环境、教学资源，给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然而，在享受便利的同时，GenAI 也为外语教育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在充分利用 GenAI 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必须谨慎应对其带来的挑战，以确保外语教育和学习的健康发展和有效变革。文章将结合前人的研究，探讨 GenAI 在外语教育与学习中的 4 点优势和 4 点风险，并为未来 GenAI 在外语教育与学习中的相关研究提出 6 点建议。

2.GenAI 在外语教育与学习中的优势应用

在 GenAI 诞生之前，外语教学主要采用传统的课堂模式，即课上以教师授课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课下则进行机械的作业练习，缺乏互动性和趣味性。然而，得益于 GenAI 的各种先进的功能，课上和课下教学内容的设置转向了更高阶的方向，即课上解决复杂问题、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辨能力和情感价值观，课下解决基础问题、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15]。不同 GenAI 模型具备各自独特的功能和优势，它们在外语教学中展现出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在其辅助下能够改善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成果[6]，如提

[1] 作者简介：

[1] 李展鹏（1999—），男，广东珠海人，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言测试、英语教学。

供外语各技能训练，通过学生的表现自动生成评估与反馈，并根据评估与反馈建立学生个性化指导，并为提供外语教学新指导。由此可见，合理利用 GenAI，能够为外语教学带来许多便利。以下列举这 4 点应用场景进行说明其优势。

2.1 提供外语各技能训练

学习者学习外语，必须掌握核心基本五大技能，即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除了传统的课堂授课，GenAI 技术还能够为外语学习各个方面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21]。对于听力和口语，GenAI 可以通过模拟真实的对话环境，与学生进行实时交流，帮助学生练习口语表达和听力理解。这种模拟对话可以根据学生的水平调整难度，并能够提供即时反馈；同时通过语音识别技术，GenAI 可以帮助学生练习发音，并提供即时的纠正和指导。这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发音技巧，提高口语表达的准确性。

在阅读和翻译方面，GenAI 能够迅速提供文章的翻译，并对文本进行深入的语篇语义解析，包括对长难句的结构和含义进行分析、同义词替换，同义句释义等，同时生成相应的配套练习，帮助学生巩固文章内容以及语法、词汇的学习。同时 AI 翻译在翻译质量、效率和使用体验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使用 AI 翻译教学系统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翻译成绩和学习效率[8]。

对于写作，GenAI 可以根据要求生成一篇例文，供学习者积累写作中的好词好句，进一步帮助提升学生的写作质量和写作效率[23]。冯庆华、张开翼（2024）[12]则通过比较了 ChatGPT-4o 和文心大模型 4.0 两种 GenAI 生成的作文，发现两者在难度上存在差异，有的更适合高年级学生，而有的则更适合低年级学生，因此，在选择 GenAI 模型时，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进行匹配。以写作为例（如表 1），根据用户输入的提示语，GenAI 模型能够按照提示语的要求迅速生成一篇情节合理的童话故事写作。

表 1 GenAI 生成的童话故事写作示例

设置提示语
请你用下列 5 个词（短语）生成一篇童话故事写作：The rising moon, forest, when, girls, stones
模型结果（部分）
Once upon a time, in a small village hidden within the depths of a mystical forest, there lived a group of girls who held a deep reverence for the rising moon. They believed that the moon's light held magical properties and that it could grant their deepest desires. Each evening, as the moon's soft glow began to illuminate the forest, the girls would gather beside a tranquil river that flowed through the heart of the woods. They would place their hands upon the smooth, cool stones that lined the riverbed, whispering their wishes to the moon, hoping that their pleas would be heard and their dreams fulfilled. [...] From that night on, the girls worked tirelessly to make their dreams a reality. They used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resources, and they never gave up, even when faced with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And as the rising moon watched over them, they knew that their wishes were coming true, one by one.

2.2 自动生成评估与反馈

除了基本的外语技能训练，外语的学习离不开训练后的评估与反馈。GenAI 通过先进的算法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自动评估学生的语言测试和作业，包括语音、语法、拼写、写作、翻译等方面[14]。尤其是在写作上，有研究发现 GenAI 在其评分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加之其能够提升作文批改质量和效率[19]，并提供多种标准的反馈[2]，为人工评估提供宝贵的支持[4]，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人工评阅压力。这种自动评估不仅能够提供实时、个性化的反馈，帮助学生及时纠正错误，加深理解[1]，还能够识别学生的弱点，帮助学生学习和改进写作技巧，改善写作质量，从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提高[13]。

此外，GenAI 还能充当一名语言测评专家的角色，如考虑写作或翻译是否符合英语使用习惯，并给出修改建议[24]。这种自动化评估和个性化指导的功能，提供连贯、动态的测评[17]，不仅能够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还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也有研究者发现，人机混合的二语写作反馈模式，能

够显著提高学习者的反馈投入，从而显著提升其二语写作水平[25]。如表 2 所示，根据用户输入的提示语，GenAI 模型能够迅速生成对学生作文评估与修改的详细建议。

表 2 GenAI 对学生作文的评估与修改建议

设置提示语
请你评价并修改这篇文章，维度包括：词汇、语法、逻辑。
模型结果（部分）
词汇： 1. 使用了一些高级词汇，如“intend”、“celebrate”等，但有些单词可能用得不准确或不太自然，例如“obtain”在这里似乎不合适，因为通常不会说“obtain a result”。 [...] 语法： 1. “Learning that you intend to celebrate obtaining the first prize in English opera festival”中的“obtaining”用法不是特别恰当，所以应该是“Learning that you intend to celebrate winning the first prize in English opera festival”。 [...] 逻辑： 1.“More than half of individuals consider that watching English movies is an ideal method to relax ourselves”这句话似乎与后面的内容无关。 [...]

2.3 建立学生个性化指导

在传统的外语教学中，教师通常以中等水平的学生能否听懂为教学目标，这导致水平较低的学生难以跟进，而水平较高的学生则感到教学内容过于简单，因此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个别需求，不利于提高总体水平。然而，现在人们已进入了 GenAI 的时代，生活中已离不开 GenAI。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学生的外语学习方式也正在经历转变。传统的统一课堂授课逐渐向更加灵活的移动学习和混合式学习模式转变，学习不再受限于特定的时空环境。同时，GenAI 技术可以帮助教师提升高意识学习能力，掌握新质素养，并实现个性化教学和跨学科教学[27]。

鉴于此，由 2.1、2.2 所述，在全面了解学习者的外语水平、得出评价和反馈后，GenAI 能够为学习者制定一个适合的学习方案，提供个性化指导。例如，GenAI 技术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水平和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材料，克服资源限制，并满足不同学习风格和兴趣，从而辅助不同水平的学生学习外语[7]。这种智能系统能够分析学生的学习进展，识别他们的优缺点，使学生能够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学习状态。此外，GenAI 还能根据学习者的兴趣、学习风格、能力、偏好和认知特点，为他们打造个性化的学习计划[3][15][21]，从而促进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的发展。如表 3 所示，用户多次输入提示语，GenAI 模型能够迅速生成为初中生推荐的外语个性化指导的建议。

表 3 GenAI 为初中生推荐的外语个性化指导的建议

设置提示语
作为一名初中生，目前英语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希望能够提升词汇量和写作水平，有什么推荐的学习材料或 APP？
模型结果（部分）
作为一名初中生，你可以利用一些学习材料和应用程序来提升你的词汇量和写作水平。以下是一些推荐：

学习材料：

1. 词汇书：
   - 《新概念英语》系列：这是一套经典教材，适合初学者逐步提升英语水平。
   - 《牛津英语字典》：虽然不是教材，但它可以帮助你更准确地理解单词的含义和用法。

[...]

APP：

1. Anki：一个强大的间隔重复记忆工具，适合记忆单词。
2. Duolingo：一个免费的语言学习应用，提供词汇和写作练习。

[...]

其他资源：

1. 英语学习网站：如 BBC Learning English、VOA Learning English 等，提供丰富的英语学习材料。

[...]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材料和应用程序，结合实践和复习，相信你的英语词汇量和写作水平会有显著提升。记住，持续的练习和实际应用是提高英语水平的关键。

设置提示语

建议再具体一些。

模型结果（部分）

好的，以下是我为您总结的适合初中生的英语词汇和写作学习材料或 APP：

1. 单词学习应用：
   - 百词斩：通过图片、例句和游戏等方式帮助学生记忆单词。
   - 扇贝单词：提供每日单词打卡功能，适合坚持学习。

[...]

8. 英语学习书籍：
   - 《新概念英语》：经典英语学习教材，适合不同阶段的学生。
   - 《牛津英语词典》：权威的英语词典，有助于单词学习和发音。

以上推荐的英语词汇和写作学习材料或 APP，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和使用。

2.4 提供外语教学新指导

除了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GenAI 还能为教师提供外语教学新指导。对于一名外语教师而言，所教授的内容与拥有的知识容量有限，有时并不能满足教学计划。然而，GenAI 犹如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成为强大的教学辅助工具，提供大量的外语教学资源和教材支持[14][20]，帮助教学在备课和设计教案时更加高效和精准[18]。GenAI 能够分析大量的教育资源和数据，为教师提供教学策略和内容的建议，甚至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自动生成教学计划。同时，对于教师而言，像改卷、统计分数与排名等这样重复性的工作可由机器取代，节省教师的时间，把更多精力放在教学当中，使内容更有针对性[9]。如表 4 所示，根据用户输入的提示语，GenAI 模型能够迅速生成一份详细的阅读教学计划。

此外，GenAI 还可以用于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包括学生的学习进度、成绩分布、学习习惯和兴趣点等。通过这些分析，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挑战，从而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当的关注和支持，促进师生互动[1]。

表 4 GenAI 生成的阅读教学计划

设置提示语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please write a teaching plan about reading and arrange some teaching activities.

模型结果（部分）
Objectives: 1. Students will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key ideas and details from the text. 2. Students will practice identifying main ideas and supporting details. [...] Procedure: 1. Warm-up: [...] 2. Reading Activity: [...] 3.Analysis and Discussion: [...] 4. Vocabulary Enhancement: [...] 5. Application and Extension: [...] 6. Homework Assignment: [...] Extra Activities: If time permits, students could engage in role-playing scenarios inspired by the article, such as acting out a scene in which they struggle to understand a foreign language or overcoming fear of speaking in public. This would further enhance their comprehension and engagement with the material.

3.GenAI 在外语教育与学习中的潜在风险

GenAI 拥有诸多便利，能够为外语教学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然而，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的弊端和挑战同样值得关注与深思。如果在外语教学中滥用 GenAI，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从而不利于外语教学的发展。基于前人的研究发现，GenAI 可能会生成不合理的答案与解析，而学生受认知限制，易将其误认为正确答案，导致思考减少，学习自主性下降，进而可能引发学术不诚信，并影响教师角色与职业发展。以下列举其中 4 点应用场景进行说明其带来的风险。

3.1 生成不合理的答案与解析

GenAI 生成的文本都是基于互联网上的大量文本，而文本的质量参差不齐，在受到训练数据时可能包含人类社会的各种偏见[14][17][22]，如年龄歧视、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等。有时对于自身无法回答的问题，还可能自行捏造答案，生成知识性错误，传达出一种足以以假乱真的文本信息[16]。

换句话说，GenAI 生成的文本模型可能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10-11]。即使生成的文本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有时用户难以甄别对错，从而被错误的文本信息误导[17]，不利于学生未来的外语学习，例如生成的文本可能有语法错误，或对某个语法点进行错误解释，此时需要教师加以引导纠正，教会学生仔细核实与辨别[13]，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让学生学会质疑问题，不盲目接受 GenAI 生成的答案。通过这样的引导方式，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在利用 GenAI 的优势的同时，避免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学生的外语学习效果。如表 5 所示，尽管用户输入了的提示语，但 GenAI 模型生成的建议却是在答非所问，而且只是在重复原来的错误表达，甚至产生错误的解析。如果教师未对该解释进行把关，则学生很容易被误导，不利于学生改进。

表 5 GenAI 生成的不合理解释

设置提示语
请你给出详细的评价并修改这篇作文，维度包括：词汇、语法。

模型结果（部分）

词汇：

1. “determine how to celebrate it”中的“how”后面应该接动词的原形①，所以应该是“determine how to celebrate it”。

[...]

语法：

1. “More than half of individuals consider that watching English movies is an ideal method to relax ourselves”中的“consider that”后面应该接动词的原形，所以应该是“consider that watch② English movies is an ideal method to relax ourselves”。

[...]

*注：①正确解释应为“接动词不定式 to do”;②正确解释应为“接动名词”，“watching”。

3.2 降低学生学习自主能动性

由于 GenAI 的便利，学生可能会减少思考，而过于依赖用 GenAI 去搜索答案等，降低其主动性[21]，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懒惰，导致学习自主性愈发下降[10]。虽然 GenAI 生成的内容可以为学生提供许多问题的解答，但如果不加以引导和监督，学生可能会过度依赖 GenAI 的解答而影响独立思考、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2]，减少深入学习和思考。这种情况下，GenAI 技术不仅不能促进学生的成长，反而可能阻碍学生的思维发展。

例如，在写作文时，如果学生一遇到问题就选择让 GenAI 生成一篇文章，那么他们就会失去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来解决问题的机会，这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非常不利[2]。鉴于此，学生自主能动性的下降，可能会使其成为技术的奴隶[26]。因此，外语教师应该教育学生如何合理地使用技术，以及如何在没有技术的情况下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3.3 增加违反学术诚信的风险

凭借其庞大的语料库和先进的算法，GenAI 能够迅速为用户提供各种问题和主题的答案。这种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信息检索和内容生成的效率。然而，学术界也担心，有的使用者可能会将 GenAI 生成的文本直接作为自己的论文内容[5][13]。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学术诚信的基本原则，还可能对学术界的公平性和研究成果的可靠性造成严重影响。正如 3.1 所述，GenAI 生成的内容虽然可能看似原创，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合理，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严谨的论证过程，这可能导致学术研究质量的下降；同时其便利性可能降低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如 3.2），减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而全盘复制粘贴 GenAI 所生成的答案。鉴于此，许多国外或地区的高校也明令禁止学生使用 GenAI 写作业[18]。

但仅仅禁止使用 AI 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培养他们独立学习和研究的能力。此外，对于学生而言，可能会出现考试作弊、作业剽窃等现象，而这也需要教师采取相应的措施去应对这种状况[3]，如使用更先进的工具检测 AI 率，及时发现和纠正抄袭、剽窃等行为，确保学生能够遵守学术规范。

3.4 影响教师角色和职业发展

随着 GenAI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许多知识都可以从 GenAI 中获得。但学生受到知识认知的限制，有时难以区分 GenAI 的解析是否正确，若与教师的讲解相悖，学生可能认为教师的讲解错误，则可能降低教师的信任度[21]。因此，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以适应新的教育技术，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教学质量[27]。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GenAI 的使用可能减少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不利于学生在学习中的成长，可能弱化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意识到教学的本质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学习过程，GenAI 技术只是充当“辅助”的角色。教师需要学习如何处理教学中的人机关系，利用 GenAI 技术促进师生互动，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究，建立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此外，将许多工作交给 GenAI 去完成，对于教师教育水平的提高、了解学生情况不利。以批改作文为

例，把作文全盘交给 GenAI 批改，教师虽然减少了工作量，但是如果未能审核批改结果，教师就难以得知学生的有哪些进步和不足，同时教师批改作文的能力也会下降。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新技术、新理念，以确保自己的教学方法和内容能够与时俱进，满足学生的需求。

4.未来的研究方向

作为外语教师，应当认识到合理利用 GenAI 的潜力，同时也不可忽视其潜在的风险。因此，在未来的教学实践和研究中，可尝试积极探索如何最大化 GenAI 的优势，并制定相应的策略来预防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外语教师才能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同时，有效地利用 GenAI 为外语教学带来创新和变革。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文的探讨，对于未来相关的研究，可以尝试从以下 6 个方面进行：

（1）可将 GenAI 与外语教学理论融合，如探讨 GenAI 如何与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等外语教学理论相结合；

（2）探讨如何利用 GenAI 技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

（3）研究 GenAI 技术对教师角色、教学方式、专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4）尝试研究如何利用 GenAI 技术缩小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5）研究 GenAI 技术可能带来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例如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6）探讨如何做到及时更新数据库或语料库，使 GenAI 生成的教学内容能够跟紧时代步伐。

5.结语

文章结合前人的研究，探讨了 GenAI 在外语教育和学习的优势和风险，并对未来相关的研究提出了 6 点建议。关于优势，GenAI 能够提供外语各技能训练、自动生成评估与反馈、建立学生个性化指导、提供外语教学新指导。关于风险，GenAI 可能会增加生成不合理的答案与解析、降低学生学习自主能动性、违反学术诚信的风险、影响教师角色和职业发展。因此，对于 GenAI，要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教师的工作除了传统的传道、受业、解惑，还应当顺应时代的潮流，学习 GenAI 在外语教学中的功能，把 GenAI 融入到外语教学当中，构建外语教育新形态，实现“师—生—机”三者互动。

当今社会已离不开人工智能，只有合理利用 GenAI，才能使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功能最大化，并规避其中的风险。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外语专业人才，教师应当构建一种融合了人工智能的教学新模式，以便更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语言技能、文化理解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全面提升自身的外语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外语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1]Al-Khresheh, M. H. (2024). Bridging technology and pedagogy from a global lens: Teachers’ perspectives on integrating ChatGPT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6*, 10021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666920X24000195

[2]Barrot, J. S. (2023). Using ChatGPT for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Pitfalls and potentials. *Assessing Writing*, *57*, 100745. https://doi.org/10.1016/j.asw.2023.100745

[3]Hong, W. C. H. (2023). The impact of ChatGPT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5*(1). https://jeti.thewsu.org/index.php/cieti/article/view/103

[4]Mizumoto, A., & Eguchi, M. (2023).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using an AI language model for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2*(2), 100050. https://doi.org/10.1016/j.rmal.2023.100050

[5]Moorhouse, B. L., & Kohnke, L. (2024). The effects of generative AI on initial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The perceptions of teacher educators. *System*, *122*, 103290. https://doi.org/10.1016/j.system.2024.103290

[6]Rahimi, A. R., & Sevilla-Pavón, A. (2024). The role of ChatGPT readiness in sha** language teachers' language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meeting accountability: A bisymmetric approach.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7*, 100258. https://doi.org/10.1016/j.caeai.2024.100258
[7]Tafazoli, D. (2024).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generative AI in democratizing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7*, 100275. https://doi.org/10.1016/j.caeai.2024.100275
[8]Yuxiu, Y. (2024).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AI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Systems and Soft Computing*, *6*, 200072. https://doi.org/10.1016/j.sasc.2024.200072
[9]陈茉 & 吕明臣. (2024). ChatGPT 环境下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当代外语研究(01):161-168.
[10]崔希亮. (2024). 人工智能——语言教学的机遇与挑战.华文教学与研究(02):20-29.
[11]代翔 & 郭丽君. (2023). ChatGPT 介入高等教育的方式、风险及应对策略.高教探索(05):12-17.
[12]冯庆华 & 张开翼. (2024). 人工智能辅助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探析——以 ChatGPT-4o 和文心大模型 4.0 为例.外语电化教学(03):3-12+109.
[13]郭茜，冯瑞玲 & 华远方. (2023). ChatGPT 在英语学术论文写作与教学中的应用及潜在问题.外语电化教学(02):18-23+107.
[14]胡壮麟. (2023). ChatGPT 谈外语教学.中国外语 20(03):1+12-15.
[15]孔蕾. (2024).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专业教学中的应用：以《大学思辨英语教程·精读》教学为例.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7(01):11-18+90.
[16]厉晓婷 & 王传领. (2024). 人工智能时代用户媒介素养的养成:机遇,挑战及应对策略.中国编辑,2023(10):74-78.
[17]刘建达. (2024). 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测评：机遇与挑战.现代外语（06）：1-11.
[18]毛文伟，谢冬 & 郎寒晓. (2023). ChatGPT 赋能新时代日语教学：场景、问题与对策.外语学刊(06):25-33.
[19]魏爽 & 李璐遥. (2023). 人工智能辅助二语写作反馈研究——以 ChatGPT 为例.中国外语 20(03):33-40.
[20]文秋芳 & 梁茂成. (2024). 人机互动协商能力：ChatGPT 与外语教育.外语教学与研究 56(02):286-296+321.
[21]杨连瑞. (2024). ChatGPT 大语言模型背景下的二语习得.现代外语 47(04):578-585.
[22]杨小微 & 王珏. (2024). ChatGPT 应用于基础教育的机遇、挑战与应对——“刷题式”教育、学生学习、“超级教师”及教育公平.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5(02):125-136.
[23]徐林林，胡杰辉 & 苏扬. (2024). 人工智能辅助学术英语写作的学习者认知及行为研究.外语界(03):51-58.
[24]许家金 & 赵冲. (2024). 大语言模型在英语教学中的角色.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7(01):3-10+90.
[25]张亚 & 姜占好. (2022). 人机混合反馈环境对学习投入和二语写作水平的影响研究.外语界(04):40-48.
[26]周洪宇 & 李宇阳. (2023). ChatGPT 对教育生态的冲击及应对策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4(04):102-112.
[27]祝智庭，金志杰，戴岭 & 姜浩哲.(2024).数智赋能高等教育新质发展：GAI 技术时代的教师新作为.电化教育研究(06),5-13.

The Advantages and Risks of GenAI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Zhanpeng Li[1]

[1]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incepti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bringing great convenience to work and learn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GenAI has brought revolutionary impact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Due to its convenience, GenAI can provide personalized guidance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ovide training in various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automatically generate evaluations and feedback, and provide new guidance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owever, GenAI is also a double-edged sword, and improper use can br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uch as increasing the risk of violating academic integrity, affecting the rol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reducing student autonomy in learning, and generating unreasonable answers and explanations. Therefore, while enjoying the convenience of GenAI,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it brings, and make reasonable use of GenAI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ies.This article summarizes previous research, explores the four advantages and four risks that GenAI brings to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and proposes six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Gen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dvantages; risks;suggestions

第 1 卷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62

“形残”与“神全”：《红楼梦》僧道形象的宗教象征与三教合流的文化实践

刘卓仁
（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 吉隆坡 50603）

摘要：在《红楼梦》中，僧道形象不仅承载着宗教的象征意义，更通过“形残神全”的悖论性构建，对儒家礼教秩序及其身体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儒家传统强调身体的完整性与道德秩序的统一性，而原著中的癞头和尚与跛足道士则以身体的残缺颠覆了世俗的认知，体现了佛道智慧对儒家价值观的挑战。同时，原著通过通灵宝玉、太虚幻境等叙事策略，模糊了佛、道、儒三者的界限，呈现了清代三教合流的思想趋势。僧道形象不仅在个体层面引导人物走向救赎，也在象征层面构建了一种超越儒释道之争的精神体系。贾宝玉“中举”与“出家”的结局，既反映了三教在哲学层面的整合，又揭示了清代文人在儒家理想与佛道超脱之间的精神撕裂。《红楼梦》借“形残神全”这一文学策略，在宗教、伦理、哲学层面实现了一种超越性整合，使其成为清代三教合流的文学典范。

关键词：《红楼梦》；僧道形象；形残神全；三教合流；宗教象征

一、形残：对儒家世俗秩序的颠覆

（一）儒家身体观与礼教秩序的文学解构

在儒家伦理体系内，身体始终是礼教秩序的物质载体与符号象征。《孝经·开宗明义》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1]确立身体完整性作为孝道伦理的起点，而《礼记·玉藻》通过“君子九容”[2]（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等）将身体规范编码为道德秩序的具象化表达。这种身体观在明清社会已深度制度化——科举选拔不仅考察经义文章，更通过《大清会典》规定“身、言、书、判”的铨选标准，其中“体貌丰伟”被列为士人入仕的核心条件。[3]《红楼梦》中贾政“端方正直”的士大夫形象（第三回），正是此类价值观的文学投射：其服饰的“蟒袍玉带”、举止的“踱方步”、乃至训诫宝玉时“站如松”的仪态（第十七回），皆构成儒家礼教秩序的肉身化展演。

清代礼法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身体完整性的意识形态功能。《大清律例·户律》明令禁止“残疾之人”继承宗祧[4]，《礼部则例》更以“体相不称”[5]为由剥夺跛足、眇目者参与科举的资格。这种制度性排斥，使得身体残缺在世俗认知中与道德缺陷形成隐喻性关联。袁黄《了凡四训》提出的“形残为业障所显”[6]之说，将生理缺陷阐释为前世罪孽或现世德行的外化标记，从而在宗教伦理层面巩固了儒家身体观的权威性。在此语境下，《红楼梦》中癞头和尚“满头疮癞”、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的文学设计（第一回），构成了对儒家礼教秩序的尖锐挑衅——当贾府以“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自诩时（第二回），僧道却以“非正常”身体闯入其象征系统，宣告另一种价值尺度的在场。

原著通过贾宝玉形象的矛盾性，进一步凸显身体政治的内在张力。尽管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第三回）的外貌完全符合世家公子的审美标准，但其“毁僧谤道”的言论与“潦倒不通世务”

作者简介：刘卓仁（2000-），男，陕西汉中人，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的行径（第三回），却构成对儒家身体观的隐性背离。这种“形全而神残”的倒置修辞，与僧道“形残而神全”的特质形成镜像对照：当宝玉以完整之躯承载离经叛道之思时，癞头和尚却以残缺之相践行度化众生的宗教使命。杨儒宾在《儒家身体观》中提出的“形-气-神”[7]三元结构，在此被曹雪芹创造性重构——儒家强调“形全”以维系礼教秩序，佛道则以“神全”颠覆形神关系的既定等级。

更具颠覆性的是，僧道形象通过介入贾府命运，解构了身体完整性与社会合法性的必然关联。癞头和尚在甄士隐梦中赠予通灵宝玉时（第一回），其“癞头跣足”的污浊形象与“仙寿恒昌”的庄严祝祷形成戏剧性反差。这种反差暗含对清代身体政治的双重批判：一方面，佛道智慧无需依托“体貌丰伟”的儒家认证体系；另一方面，贾府“白玉为堂金作马”的世俗荣耀（第四回），反衬出权力集团对身体的工具化操控。正如卜正民在《明清社会史论》中指出的，18 世纪中国精英阶层通过身体表演维系身份特权，[8]而《红楼梦》让僧道以“残缺之躯”穿透这种表演性，直指礼教秩序的精神虚无。

因此，《红楼梦》中僧道的“形残”特质，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儒家身体政治的符号政变。当跛足道人以《好了歌》瓦解甄士隐的世俗执念时（第一回），其身体的失衡姿态恰成为价值系统坍塌的隐喻——印证了《道德经》中“反者道之动”[9]的哲学框架下，残缺不再是需要矫正的病理现象，而是洞见真理的必要条件。这种书写策略不仅挑战了清代礼法的制度化暴力，更通过文学想象开辟出超越儒释道分野的精神空间。

（二）僧道之“残”对儒家价值的挑战

《红楼梦》中癞头和尚与跛足道士的残缺身体，本质上是针对儒家价值体系的符号暴力装置。通过将“癞”“跛”等病理特征转化为宗教批判的能指，曹雪芹不仅解构了儒家“形-德”同构论的合法性，更以身体政治的文学操演，揭露了礼教秩序背后的认知暴力机制。

1. 病理符号的宗教转义：从污名化到神圣化

在清代医学话语中，“癞”（麻风病）被视为“风毒侵体”的恶疾，《医宗金鉴》明确将其归因于“德行有亏”；[10]“跛足”则被《相理衡真》解释为“命途多舛”的体相学征兆。[11]这种病理学与伦理学的合谋，使得身体残缺成为儒家礼法排斥“他者”的合法性依据。然而，《红楼梦》通过符号转义策略，将此类污名化特征重构为宗教神圣性的标识：癞头和尚“满头疮癞”的溃烂肌肤（第一回），恰似佛教“白骨观”修行的肉身演示——以病朽之躯昭示“诸行无常”的终极真理；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的失衡步态（第一回），则暗合道教“负阴抱阳”的哲学意象，其身体残缺成为“反者道之动”[9]的动态隐喻。

这种转义过程在通灵宝玉的赠予仪式中达至高潮。当癞头和尚以“癞头跣足”之姿将玉石塞入婴儿口中时（第一回），他不仅僭越了儒家“君子授受以礼”的交往规范，更通过身体与圣物的并置，制造出神圣/污秽的认知悖论。列维纳斯在《整体与无限》中提出的“他者之脸”理论，在此遭遇中国式改写——僧道的残缺身体成为刺入儒家象征秩序的“异质性存在”，迫使读者重新协商“正常/异常”“洁净/污秽”的边界定义。[12]

2. 礼法秩序的文学解构：疯癫叙事的颠覆潜能

僧道形象对儒家价值的挑战，更体现在其“疯癫”言行的仪式化展演中。跛足道人吟唱《好了歌》时“拍掌大笑”的狂态（第一回），构成对《礼记·曲礼》“毋侧听，毋嗷应”[2]之规训的戏谑反抗。这种表演性疯癫，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揭示的“理性他者”形成跨文化呼应——僧道以被排斥者的身份，反向揭露礼法秩序的荒诞性。[13]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疯话”往往承载着原著最深邃的哲学命题：《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诘问（第一回），不仅解构了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承诺，更将历史时间压缩为佛教“成住坏空”的循环片段。

这种颠覆性在贾瑞之死的情节中达到伦理批判的顶峰。当跛足道人向贾瑞授予“风月宝鉴”时（第十二回），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宣言，实为对儒家“非礼勿视”规训的极端化演绎——道教法器以毁灭性的镜像反射，暴露出礼教压抑机制与欲望结构的同源性。僧道在此扮演着齐泽克所谓的“意识形态批判者”角色：他们通过过度遵循礼法逻辑（如以“治邪”之名摧毁欲望主体），揭示出该逻辑自身的非理性内核。

3. 比较视野下的范式革新：从因果工具到哲学主体

相较于《聊斋志异》将僧道简化为因果报应的执行工具（如《僧孽》中惩戒恶行的和尚），[14]《红楼梦》赋予残缺僧道以本体论地位。癞头和尚在太虚幻境中与警幻仙姑共掌“痴情司”（第五回），标志着宗教角色从伦理裁判者向存在论阐释者的转型。这种转型在跨宗教叙事中尤为显著：当僧道共同引渡柳湘莲时（第六十六回），佛教“剃度”与道教“弃剑”被并置为同一救赎仪式的组成部分，暗示三教差异在终极关怀层面的消融。

此种书写策略，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形成隐秘对话。僧道的残缺身体及其疯癫言行，构成对儒家“严肃文化”的狂欢式颠覆：他们以“降格”的身体（如癞头、跛足）与“升格”的精神（如预知命运、点化众生），重构了形而上/形而下、神圣/世俗的等级秩序。这种颠覆最终服务于曹雪芹的宗教哲学实验——在“形残神全”的辩证框架下，佛道智慧既批判儒家伦理的局限性，又为其提供超越性救赎的可能，从而在文学维度实践了清代三教合流的思想命题。

（三）身体残缺在宗教中的文化隐喻

《红楼梦》中癞头和尚与跛足道士的“形残”特质，绝非偶然的文学设计，而是承载着明清三教互动语境下深层的文化隐喻。这一符号体系通过解构儒家“礼”的肉身化秩序，完成了对世俗价值的宗教性批判，并暗含佛道思想对儒家伦理的超越性对话。

从儒家传统而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1]的训诫，将身体完整性与道德秩序紧密绑定。杨儒宾在《儒家身体观》中指出，儒家视身体为“礼”的具象化载体，健康端正的外表象征着个体对家族伦理与社会责任的承担。[7]贾府中贾政、贾宝玉等男性角色被反复强调“面如冠玉”“形容秀美”，正是此类价值观的文学投射。然而，僧道形象的“癞头”“跛足”等身体残缺，构成对儒家礼教符号的激烈反讽：当贾雨村、甄士隐等儒生以衣冠楚楚之态沉溺功名时，癞头和尚却以“癞疮满布”的污秽之躯手持通灵宝玉（第一回），暗示佛道智慧对儒家世俗权威的消解。这种“以残破显真如”的书写策略，与晚明王阳明“破心中贼”的心学话语形成隐秘呼应——二者皆试图通过颠覆外在形式抵达精神本源。

可以说《红楼梦》中僧道身体的残缺成为佛道否定世俗价值的隐喻性宣言。佛教“不净观”强调肉身无常，《维摩诘经》以病躯维摩诘阐释“法身无相”[15]；道教《庄子·德充符》亦借兀者王骀等畸人论证“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16]。曹雪芹显然承袭了这一思想传统：跛足道人吟唱《好了歌》时“一足高来一足低”的失衡姿态（第一回），恰与其揭示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循环逻辑构成镜像——身体的残缺映射着世俗价值观（功名、财富、情爱）的终极虚妄。然而，这种批判并未止步于佛道对儒家的单向否定，而是嵌入清代三教合流的思想史脉络。雍正帝在《御选语录》中宣称“三教异用而同体”[17]，《红楼梦》则通过僧道协同度化（如共携通灵宝玉入世、共引柳湘莲出世）的叙事，将三教之争转化为“形残而神全”的共谋：佛道的“反常之相”撕开儒家伦理的完美表象，却为三教在精神维度实现整合开辟空间。

这一文化隐喻亦与明清“三教论衡”的实践深度交织。自宋明理学试图统合三教以来，儒释道在哲学层面的竞争从未停歇，而《红楼梦》以文学想象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案：让佛道以“边缘他者”的身份，从外部刺破儒家伦理的封闭性。癞头和尚赠玉时所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第八回），表面是道教长生祝祷，实则暗含佛教“诸行无常”的悖论警示；跛足道人度化甄士隐时点破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第一回），更将儒家的仕途经济解构为荒诞戏剧。这种“以道释补儒”的叙事策略，与清初颜元、李塨等儒者批判理学空疏、主张“习行经济”的思潮形成张力，二者皆试图重构儒家价值，但《红楼梦》选择以佛道话语而非儒学内部革新完成批判，折射出文人群体在康乾盛世下的精神困境：当儒家济世理想遭遇现实溃败（如曹家被抄的家族创伤），佛道的“残缺智慧”反而成为维系意义世界的救命绳索。

因此，《红楼梦》僧道形象的“形残”绝非单纯的宗教元素点缀，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化符号实践。它既是对儒家身体政治的文学反叛，亦是对三教合流命题的艺术回应，最终在“以残破证圆满”的悖论中，揭示了清代文人试图超越儒释道分野、重构精神秩序的思想努力。

二、神全：佛道救赎与三教的精神合流

《红楼梦》对佛道救赎叙事的重构，本质上是一场以文学实践回应清代三教合流命题的思想实验。通过赋予癞头和尚、跛足道士“形残神全”的悖论性特质，曹雪芹不仅消解了佛道二教的教派壁垒，更在终

极关怀层面实现了三教精神的哲学整合。这种整合既非简单的功能互补，亦非教义拼贴，而是通过宗教符号的文学转译，构建起超越性救赎的本体论范式。

（一）僧道的双重身份：佛道混融与宗教符号的能指滑动

癞头和尚与跛足道士的身份模糊性，是《红楼梦》实践三教融合的核心策略。从命名学视角观之，“茫茫大士”（癞头和尚）与“渺渺真人”（跛足道士）的称谓已暗示佛道混融倾向——“大士”为佛教菩萨尊称，“真人”系道教仙真名号，二者并置构成跨宗教的神圣性叠加。这种叠加在通灵宝玉的入世仪式中达至顶峰：当僧道共同将玉石携入红尘时（第一回），佛教的“因缘和合”与道教的“承负”理论被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暗示世俗命运同时受佛道双重法则支配。

更具突破性的是柳湘莲的度化场景（第六十六回）。癞头和尚以佛门偈语“来自情天，去自情海”点化其痴念，跛足道士则以道教科仪“掣雄剑斩情丝”完成剃度仪式。此处的佛道分工已非教派差异的体现，而是救赎手段的符号化分工：佛教提供认知层面的顿悟（“情天情海”的虚空本质），道教执行身体层面的割裂（“斩断烦恼丝”的具身实践）。这种分工模式与清代民间宗教实践中“佛治心、道治身”的实用主义传统形成互文，但《红楼梦》通过文学升华，将其转化为对人性困境的立体救赎方案。

僧道身份的混融性，实质是清代三教合一思潮的文学投射。雍正帝在《御选语录》中强调“佛道皆明心见性之学”[17]，《红楼梦》则通过叙事证明：当救赎目标指向终极解脱时，佛道差异仅是方法论之争，其本体论指向完全一致。这种一致性在太虚幻境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第五回）中得到形而上确认——佛教之“空”与道教之“无”在此被整合为同一真理的不同表述维度。

（二）救赎功能的三教共性：伦理补位与终极关怀的和解

《红楼梦》的救赎叙事始终在三教的价值张力中展开。贾政的儒家济世理想体现为对科举制度的顽固坚持：他训斥宝玉“竟将‘四书’一气背明”（第七十八回），试图通过知识规训重建家族伦理秩序。这种“入世救赎”的局限性在元妃省亲（第十七至十八回）、探春理家（第五十六回）等情节中暴露无遗——儒家伦理虽能短暂维系家族运转，却无法抵御“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历史宿命（第五回）。

相较之下，佛道救赎展现出对人性困境的更深刻穿透力。甄士隐在《好了歌》点化下“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第一回），不仅实现个体解脱，更以“出世”姿态完成对儒家“家国同构”逻辑的否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否定并非全然拒斥儒家价值：当癞头和尚治愈宝玉疯癫（第九十四回），使其得以履行“中举”责任时（第一百一十九回），佛道智慧实际扮演着儒家伦理拯救者的角色。此种叙事悖论，印证了余英时所谓“两个世界”的辩证关系——佛道的超越性救赎，恰恰为儒家世俗秩序提供了存续的精神基础。

贾宝玉从“出家”到“中举”的结局描写（第一百二十回），成为三教救赎共性的终极隐喻。其中“中举”是对儒家孝道（“不枉天恩祖德”）的形式妥协，“出家”则是对佛道真谛（“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本质皈依。这种分裂非但不是叙事败笔，反而深刻揭示了清代文人的精神困境：当三教在救赎层面达成形而上的和解后，个体仍不得不在现世中承受价值选择的撕裂之痛。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论及的“自我压抑”，在此获得文学性呈现——宝玉的结局证明，三教合流能够提供哲学层面的整合方案，却难以消解历史情境中的实践矛盾。[18]

（三）清代宗教政策的影响：制度化合流与文学转译

《红楼梦》的三教融合叙事，与雍乾时期的宗教政策存在深层互动。雍正帝在《御选语录》中宣称“三教异用而同体”[17]，并亲注《金刚经》《道德经》，试图构建以帝王为核心的三教统合体系。这种政策导向在原著中体现为僧道形象的“去教派化”特质：癞头和尚既持诵佛经（如第二十五回“除邪祟”金光明咒），亦施行道教科仪（如第一回“通灵宝玉”的开光仪式），其宗教实践已超越宗派界限，服务于更高层级的救赎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原著与道教内丹学经典《性命圭旨》《太乙金华宗旨》的互文关系。两书皆主张“三教一家”“性命双修”，《红楼梦》则通过“通灵宝玉”的符号设计予以文学转化：玉石既是佛教“摩尼珠”（象征本性清净），又是道教“金丹”（隐喻性命修炼），更是儒家“传家宝”（承载家族伦理）。这种多重象征的叠合，与《太乙金华宗旨》“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修行次第形成对话，但曹雪芹通过宝玉“失玉-寻玉-弃玉”的情节演进（第九十四至一百二十回），解构了制度化修行的机械性，

将三教整合提升至“明心见性”的哲学高度。

此种文学转译，本质上是对清代三教合流政策的批判性回应。当雍正试图通过政治权力收编宗教资源时，《红楼梦》却以僧道形象的边缘性（癞头、跛足）与神圣性（预知命运、点化众生）之悖论，暗示真正的精神整合无法依靠制度强权实现。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论，18 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充斥着“妥协的智慧”，[19]而曹雪芹通过文学想象，将这种妥协转化为更具主体性的精神突围——在宝玉“披大红猩猩毡斗篷”跪别贾政的经典场景中（第一百二十回），僧（出世）与儒（入世）的二元对立最终以审美化方式达成和解，标志着三教合流从政治建构到文学升华的范式转型。

三、佛道救赎与三教的精神合流

（一）佛道救赎的双重面向：个体超脱与伦理补位

佛道角色在《红楼梦》中的救赎行动，始终交织着对红尘苦难的消解与儒家伦理的隐性修补。从佛教视角观之，茫茫大士（癞头和尚）对甄士隐、柳湘莲等人的度化，本质上是对“众生皆苦”命题的文学诠释。甄士隐在女儿被拐、家宅焚毁后，因跛足道人《好了歌》点化而“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第一回），恰如《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20]的叙事化呈现，个体通过勘破“好”（世俗欲望）与“了”（空无真如）的辩证关系，实现从“我执”到“无我”的跃迁。道教视角下，渺渺真人（跛足道人）对贾瑞的“风月宝鉴”警示（第十二回），则实践了《道德经》“反者道之动”的哲学：以欲望镜像的毁灭性展示，迫使沉溺者直面“正照骷髅，反照红粉”的生死真相。[9]

然而，这种看似出世导向的救赎叙事，暗含对儒家伦理秩序的补救意图。当贾宝玉因“通灵宝玉”丢失而陷入疯癫时（第九十四回），癞头和尚的再度现身不仅恢复了其神智，更间接维系了贾府摇摇欲坠的宗法结构，使得宝玉康复以完成“中举”这一儒家人生使命（第一百一十九回）。这种叙事策略恰恰揭示出清代三教合流的本质特征，即佛道的超脱智慧并非全然否定儒家价值，而是在精神层面为其提供形而上的支撑。正如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所论，大观园的“理想世界”与贾府的“现实世界”始终存在张力，而僧道角色恰似沟通二者的媒介，他们以佛道法理挽救儒家伦理的实践溃败，却又最终承认尘世责任的不可逃避性。[21]

（二）三教合流的精神枢纽：救赎话语的共性重构

《红楼梦》对三教救赎观的整合，建立在对其终极关怀共性的挖掘之上。儒家虽罕言出世，但“修身以俟命”的生死观，与佛道“超越轮回”“羽化登仙”的追求存在精神同构性。这种同构性在原著中通过两类叙事模式得以具象化：

1. “谪仙叙事”的三教重写

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下界历劫（第一回），本质上融合了道教谪仙传说（如《墉城集仙录》）、佛教业报理论（如《楞严经》“情想升沉”）与儒家“天命观”（如《论语》“天生德于予”）。贾宝玉的“衔玉而生”奇迹，既可视作道教灵宝崇拜的产物（通灵宝玉象征“道”的具象化），其“无材补天”的自嘲又暗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进退之道（第一回）。当癞头和尚以“天机不可泄漏”为由拒绝透露宝玉命运时（第二十五回），这一混杂三教话语的禁忌修辞，恰恰暴露了作者整合三教因果论的努力，个体的救赎路径虽由佛道指引，但其终极意义仍需在儒家伦理框架内获得解释。

2. “度化仪式”的跨宗教编码

僧道在原著中的救赎行动，往往打破佛道仪式界限，形成混合型宗教实践。如通灵宝玉需“被声色货利所迷”后方能引登彼岸（第一回），此要求既符合佛教“烦恼即菩提”的辩证逻辑，又与道教“借假修真”的丹道理论相通，更暗含儒家“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痕迹。尤具象征意义的是柳湘莲的度化场景，他在尤三姐自刎后“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第六十六回），这一动作同时完成了佛教剃度（断发）、道教归隐（弃剑）与儒家自省（忏悔），使三教救赎符号在单一身体实践中达成和解。

这种跨宗教的救赎话语建构，与清代三教合流的思想史进程深度共振。雍正帝在《御选语录》中强调“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17]的功能互补性，《红楼梦》则通过文学叙事证明了三教在救赎层面的融合，远超越简单的功能分工，而是直指终极关怀的本体论统一。这种统一在太虚幻境的对联“假作真

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第五回）中得到哲学升华。当儒家之“有”（伦理责任）、佛教之“空”（缘起性空）、道教之“无”（道法自然）被并置于同一语义场时，三教的差异被解构为认知视角的转换，其救赎目标则统一于对“真”境界的追求。

（三）文人化的救赎书写：从宗教实践到哲学隐喻

《红楼梦》对三教救赎观的整合，在本质上看来就是一场文人精英的宗教实验。相较于《三言二拍》等民间文学中功能化的僧道形象（如《醒世恒言·佛印师四调琴娘》将佛教僧侣降格为情欲对象），曹雪芹笔下的癞头和尚与跛足道士，始终保持着形而上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可以划分为两类文人化策略实现：

1. “预言-应验”叙事的知识分子改造

僧道的预言（如对甄英莲命运的判词）并非民间宗教常见的宿命论表达，而是被编码为充满哲学暗示的符号系统。癞头和尚对通灵宝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第八回）的嘱托，表面是道教长生祝词，实则暗藏佛教“无常”观（“莫失莫忘”暗示执着的徒劳）与儒家“慎独”伦理（“恒昌”对应《大学》“日新”理念）的双重解读可能。这种语义的开放性，使宗教预言脱离具体教义束缚，升华为对存在本质的哲学追问。

2. 宗教意象的文学转义

原著中的佛道符号往往脱离原初宗教语境，成为文人表达价值理想的媒介。如“太虚幻境”虽借用道教洞天福地架构，但其“痴情司”“结怨司”等机构设置（第五回），实为儒家“修身齐家”理念的镜像反转——在这里，尘世伦理的价值序列被重新评估，而评估者却是兼具佛道身份的警幻仙姑。此种跨宗教的意象嫁接，在·等三教合一经典中早有先例，但《红楼梦》通过文学想象将其推向新的高度：宗教符号不再服务于教义传播，而是成为知识精英探讨人性、命运、自由的思辨工具。

这种文人化的救赎书写，深刻反映了康乾盛世下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危机。当科举制度异化为“礼法吃人”的机器（如贾政对宝玉的强制规训），当家族伦理因权力倾轧而崩解（如贾府抄家事件），佛道提供的不仅是个人解脱方案，更是重构价值体系的哲学资源。曹雪芹让贾宝玉在“出家”与“中举”间达成诡异平衡（第一百二十回），恰似黄宗羲“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命题的文学演绎——三教救赎的终极意义，不在于选择某种特定宗教身份，而在于通过持续的精神实践，在破碎现实中守护人性的完整。

四、总结

《红楼梦》借助癞头和尚与跛足道士的形象，构筑了一种“形残神全”的悖论性宗教象征，从而颠覆了儒家身体政治的既定秩序，并展现了清代三教合流的文化实践。儒家伦理将身体的完整性视为道德与社会合法的象征，而原著中的僧道形象则以身体的残缺映射佛教的“无常”观念和道教的“反者道之动”哲学，从而挑战了礼教秩序。癞头和尚与跛足道士不仅在个体层面完成了对红尘众生的度化，更在象征层面推动了三教思想的融合。《红楼梦》通过太虚幻境、通灵宝玉等叙事结构，将佛道二教的救赎观念与儒家的伦理责任相结合，构建了一种跨宗教的终极关怀模式。贾宝玉的“中举”与“出家”双重结局，既反映了三教在哲学层面的整合，又揭示了清代文人在儒家理想与佛道超脱之间的精神撕裂。原著最终通过“形残神全”的叙事策略，批判了清代礼法制度对身体完整性的过度强调，并在宗教、伦理、哲学层面实现了一种超越性整合，使《红楼梦》成为文学史上关于三教合流的经典范例。

参考文献

[1] 孔子. 孝经. 陈鼓应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 戴圣. 礼记. 校释: 杨天宇[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3] 清廷. 大清会典[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影印乾隆六年版）。
[4] 清廷. 大清律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影印乾隆六年版）。
[5] 清廷. 礼部则例[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影印清代原本）。
[6] 袁黄. 了凡四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7] 杨儒宾. 儒家身体观[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8] 卜正民.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9] 老子. 道德经. 郭庆藩集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0] 吴谦. 医宗金鉴[M]. 清代。
[11] 陈士铎. 相理衡真[M]. 清代。
[12] 列维纳斯，伊曼纽尔. 2016. 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 朱刚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3] 福柯，米歇尔. 2001.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刘北成、杨远婴译[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4] 蒲松龄. 聊斋志异. 周祖譔评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5] 鸠摩罗什译. 维摩诘经[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16] 庄周. 庄子集释. 郭庆藩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61。
[17] 御选语录. 清圣祖康熙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18] 王汎森. 2014.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M]. 第 1 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20] 鸠摩罗什. 2012. 金刚经：译注本. 陈秋平、尚荣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余英时. 2002.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Physical Imperfection and Spiritual Wholeness: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the Three Teachings' Convergence in the Depiction of Monks and Taoists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iu Zhuoren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Malaysia, 50603,)

Abstract：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depiction of monks and Taoists not only embodies religious symbolism but also profoundly critiques the Confucian ritual order and its body politics through the paradoxical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imperfection and spiritual wholeness." Confucian tradition emphasizes bodily integrity and the unity of moral order, yet the novel's characters—the scabby-headed monk and the lame Taoist—subvert secular perceptions through their physical deformities, reflecting the challenge posed by Buddhist and Taoist wisdom to Confucian values. Moreover, narr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the Magic Jade and the Land of Illusion blur the boundaries among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revealing an intellectual trend toward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hree Teaching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monk and Taoist figures guide individual characters toward redemption on a personal level while symbolically constructing a spiritual system that transcends the doctrinal conflicts among the three traditions. Jia Baoyu's ultimate fate—pass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yet choosing monastic life—illustrates both the philosophical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Teachings and the inner spiritual tension Qing literati experienced between Confucian ideals and Buddhist-Taoist transcendence. Through the literary strategy of "physical imperfection and spiritual wholenes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chieves a transcendent synthesis across religious,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establishing itself as a literary exemplar of the Qing dynasty's Three Teachings convergence.

Key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Monastic and Taoist Figures; Physical Imperfection and Spiritual Wholeness; Convergence of the Three Teachings; Religious Symbolism

第 1 卷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70

东西方绘画透视法差异及其在插画创作中的融合

蒋礼[1]

（意大利米兰布雷拉国立美术学院，意大利 米兰，20100）

摘要：本论文探讨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差异及其在现代插画创作中的融合应用。透视法作为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技术手段，不仅影响画作的空间表现力，还深刻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审美观念与价值取向。东方绘画中，传统透视法以散点透视为主，强调表现画面意境与神韵，弱化物理空间的准确性，注重画面整体的抒情性和流动性，如中国水墨画的表现技法。西方绘画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通过透视法数学化、规则化的发展，建立了一套包括单点透视、双点透视及多点透视等系统化理论，尤其强调真实空间的再现，使得绘画作品在视觉上更具立体感。东西方透视法历经岁月碰撞与交流，逐渐在现代插画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插画作品的创意形式不断演变，透视法的多样化呈现成为可能。本文通过对当代插画中融合实例的分析，探讨东西方透视法融合的可能路径及对插画创作的积极影响。本研究旨在为艺术创作者提供一种视角、理论基础以及实际应用的方法，助力插画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性创作。

关键词：东西方绘画；透视法；插画创作；文化融合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绘画艺术在东西方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与各自的文化、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东方绘画以中国为代表，尤其是传统的水墨画，注重意境表达和写意风格，透视技法自古并非其关注的重点。然而，自 19 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加，透视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美学观念，也在不断渗入东方的艺术创作中。以郎世宁等融合风格的画家为例，他们的作品融合了西方的透视技法和东方的传统画法，成为研究中西透视法融合的重要实例。

相比之下，西方绘画注重透视法在画面空间上的应用，以文艺复兴时期为分水岭，发展出了多个层次的透视法，包括线性透视、空气透视等。这些技法被广泛应用于西方绘画中，以达到逼真或具象的视觉效果。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东西方在透视法上的不同体现，不仅是绘画技法的差异，更是两种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传统东方绘画受儒释道哲学影响，主张天人合一、心境合一。这种哲学理念在艺术创作中强调抒发精神性、超越性的意象表达，使得透视法在很长时间内未被纳入重要的技法研究中。这种情况在现代艺术中有所改变，尤其是在插画领域，为满足现代审美趣味和市场需求，透视法作为处理空间关系、增强视觉深度的手段，逐渐受到东方艺术家的重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东西方透视法的差异，并探讨其在插画创作中的融合，不仅有助于理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互动现象，还对当代视觉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试图通过历史勾勒与技术分析，揭示东西方透视法在现代插画创作中的融合作用，以期为插画创作提供新的视角和创新的可能性。

---

[1] 作者简介：蒋礼（1998—）男，辽宁辽阳人，硕士，意大利米兰布雷国立美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研究。

1.2 研究意义

研究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差异及其在插画创作中的融合具有多层次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从艺术史的角度而言，东西方绘画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技法。东方绘画追求意境与诗意的表达，而西方绘画注重透视法的精确空间呈现。此研究不仅有助于探索透视法的历史演变和彼此间的差异，还揭示了背后的思维模式和社会文化特征。来自儒释道哲学的东方绘画强调心灵境界和‘可游可居’的意境，而西方透视法受到科学理性精神追求的影响，注重视觉真实感和空间准确性。通过多样化的艺术作品，可以提升艺术市场的活力，为文化产业带来经济效益。研究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差异及其在插画创作中的融合对艺术理论研究、现代艺术实践、文化交流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目的是深入探讨东西方绘画透视法之间的差异以及其在插画创作中的融合可能性。通过系统梳理历史视角到当代应用的东西方绘画透视法，望推动插画创作中东西方绘画透视法融合的研究水平与应用广度，促进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1.3 文献综述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东方绘画的透视法主要受到文化传统与哲学思想的影响。卞姝雅在其研究中指出，东方绘画尤其是中国传统绘画，常采用散点透视这一特殊技法。这种技法不像西方绘画讲究严谨的透视关系，而是更注重画面的意境表达，强调观者的心灵体验和画家的主观情感传达[1]。薛军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这种透视法在 20 世纪中国油画中的演变过程，特别强调了写意风格对这种透视技法的深远影响[2]。

反观西方绘画的透视法，通常是线性透视的代名词。牛晓笛对于清末广州外销画中中西融合的研究中指出，西方的线性透视法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便被视为绘画技法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透视法通过数学计算将三维空间精确地展现在二维画布上，追求视觉的真实性和深度感[3]。

东西方透视法在插画创作中的融合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尚莲霞在她的研究中分析了中西绘画形式的融合与裂变，她指出，现代插画在创作过程中，两种透视技法的交融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一次传统与现代技法的完美结合[4]。孙希娟的研究也表明，西方绘画元素日益融入现代中国插画，带来了新的视觉体验，使插画作品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5]。

现有文献显示，中西方绘画透视法的融合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在艺术创作的多个领域展示了其重要意义。然而，关于两种文化在透视技法上的深层次对话及其对插画创作带来的长远影响仍需进一步探索。未来的研究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更多地关注技术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融合过程中的创新实践等，更好地推动插画创作的多元化发展。

第二章 东方绘画透视法

2.1 传统东方绘画概述

东方绘画，特别是传统的中国绘画，一直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表现手法而闻名。其发展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东方绘画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表达方式。与西方绘画强调的立体感和真实再现不同，传统东方绘画更加侧重于意境的表达和主观情感的传达。通过运用空间的“留白”、虚实结合和线条的运用，东方艺术家能够在二维的平面上创造出多维度的视觉体验。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东方绘画的核心要素经历了从简单象形、线条描述到精细写实、意象传达的深刻变化。在绘画材料上，东方绘画以水墨为主，辅以色彩。这与油画作为西方主流画材的区别相当明显。

儒释道三家哲学对传统东方绘画特别是中国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的儒学强调内心的修炼和外在的和谐统一，这在艺术表现上表现为“求其大而存其和”；佛教所讲的空寂和禅意，直接影响了画家的意象和用色，形成了注重写意和意象的艺术氛围；而道家追求的“道法自然”精神，使得画作中注重自然万物的生动再现和整体氛围的营造，这一点在山水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三远法”即高远、平远、深远的透视表达方法，与西方绘画的单点透视形成鲜明对比。此种透视法体现在山水画、人物画以及花鸟画中的空间布局。

传统东方绘画的概述显示了其复杂且深刻的历史背景。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也是一种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这种对于意境和意象的重视成为东方绘画的标志性特征，定义了其独特的视觉文化。

2.2 东方透视法的发展历程

东方绘画的透视法具有悠久且丰富的历史，其发展过程体现了东方文化深厚的哲学理念与美学思想的变迁。早期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如山水画、工笔画等，在空间深度和物体表面细节的表现上采用了独特的透视方法，与西方几何透视有所不同。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绘画家们通过运用独特的散点透视方法，将多个时空片段融合在一幅画中，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例如，《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画家运用非一致的散点透视，将不同角度的景物融合在一起，和西方强调统一视点的线性透视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强调情境相合的透视法在创造画中物象境上得以淋漓展示。

宋代是东方透视法发展的重要时期，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充分展现了散点透视法的技巧。这幅画作不仅没有遵循单一视角，而是通过长卷的形式展现了丰富多样的城市生活场景。通过恰当的人物、建筑和船只的排列和比例，画家成功阐释了自然环境中的社会活动，展示了较为立体的空间构图能力[6]。

元代是东方透视法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随着与波斯和印度绘画技法的交流，东方透视法受到了外来影响。倪瓒在其作品《渔庄秋霁图》中尝试将多点视角合并，以实现更高层次的整体观感，从而呈现出一种哲学上的空灵与写意。

明清时期，中国画家们在透视技法的表现上进行了更多的探索与尝试。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在中国供职期间将传统的西方透视法引入中国，并与中国画的透视技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如《乾隆大阅图》体现了这种融合，使画面既有中国风情又展现了西方立体效果，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跨文化艺术风格。

在日本，浮世绘的出现也是东方透视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浮世绘不仅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技法，如线描和设色，同时将日本独特的透视观念融入其中，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些作品通过简化线条和高度平面化的透视法，使观众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感受到画作中平稳流畅的时空转换。东方透视法在新时代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展现空间的无限可能。

2.3 东方透视法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

传统的东方绘画中，透视表现多以“散点透视”为主，即将画面中的空间关系按照叙事需求自由排列，与西方的焦点透视有明显区别。以中国的山水画为例，自唐宋时期起，画家们便常以高远、深远、平远三种构图法将画面中的不同景物在不同焦点处加以表现。这种方法着重表达空间的“广阔”与“灵动”，而非严格遵循几何规律。在某些时期，如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展现了多点透视的复杂运用，这种作品不仅表现出长卷轴绘画的叙事性，也体现了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7]。

元明时期，在接触西方文化元素尤其是欧洲传教士带来的新视角后，东方绘画开始融合了更为多样的透视技法。此时，西方的透视法通过传教士和商旅传播至中国，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他们自 16 世纪末进入中国并带来了西方绘画技巧。尤其是到了明末清初，通过广州等通商口岸的外销画活动，西方透视法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见于如《广州十三行》等作品中，这些作品中采用了更加近似于西方焦点透视的绘画方法。

清代中西合璧是东方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宫廷画师的作品即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他们运用西方的透视法、光影技术，与中国的传统艺术语言结合，创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这一时期的透视方法渗透进官廷绘画中，并开始影响民间画家的创作思路。

日本自江户时代起，也受到来自中国以及欧洲的影响，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透视法，如浮世绘中的远近法等。这种变化显示了透视法在东方地区的多样演变过程。

到了近现代，特别是 20 世纪，随着现代主义绘画思潮的涌入，东方透视法迎来了新的变革。许多艺术家在出国求学或受国际艺术潮流影响后，开始重新审视和整合传统技法与现代观念，中国的画家如林风眠、徐悲鸿等人提出“中西合璧”的理念，以实验性尝试将西方的色彩、透视等技法融入到本土艺术中创造新风格。

第三章 西方绘画的透视法

3.1 西方绘画概述

透视法是西方绘画中的一项关键技法，它旨在通过模拟人眼观察世界的方式，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出具有深度和真实感的三维空间错觉。透视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意大利艺术家马萨乔

（Masaccio）的作品《圣彼得的分银》就展示了通过线性透视将建筑物和人物按照视角缩放，创造逼真空间效果的技法。这项革命性的技术标志着绘画技术的飞跃，为西方绘画奠定了新的创作范式[8]。

自马萨乔以来，西方绘画大师们如达·芬奇和拉斐尔进一步完善了透视法并广泛应用，使其在艺术创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透视法成熟并被系统传授于学院派体系。透视法不仅对巴洛克、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等一系列艺术流派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19世纪印象派艺术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启示。如在 弗朗切斯卡的《鞭打耶稣》这幅代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画面所呈现的具有强烈前后关系的假想透视空间，表现技法上也使用了一些透视变形处理，但是人物依旧是一种正面的、装饰感的表现形态[9]。

透视法的核心概念是线性透视，即通过平行线向消失点收敛的方式表达物体的远近关系。这一原理基于几何学，透视绘图常涉及确定较低的地平线、一个或多个消失点以及观察者的视点。通过透视，绘画中的物体获得了深度和体积感，给观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除了线性透视，西方绘画还发展了多种不同类型的透视法，例如空气透视和色彩透视。空气透视通过模糊远景物体的轮廓和淡化颜色来表现大气对深远景物的影响，创造出更强的远近感。而色彩透视则通过运用不同的色温和色调，使前景的色彩更鲜艳，与背景形成对比。这些透视方法丰富了西方绘画的表现手法，使得艺术作品呈现出更丰富的立体效果和空间感，不仅对艺术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对建筑、摄影和工业设计等领域同样发挥了深远影响。

3.2 西方透视法的发展历程

西方透视法的发展历程是西方艺术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标志着绘画艺术从中世纪的平面表现向立体空间表达的重大转型。透视法（perspective）是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系统化的一系列数学和光学原则，这些原则为艺术家提供了在二维的画布上准确再现三维世界的方法。

透视法的核心概念是在二维平面上再现三维空间，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古希腊时期的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在其著作《光学》中首次系统性地探讨了视觉和空间的关系，然而在实际的艺术创作中并未得到广泛运用。到了中世纪，拜占庭艺术和哥特艺术则更注重宗教绘画的象征性而非空间的真实感[10]。

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透视法发展的黄金时代。意大利画家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于1305年左右的壁画作品中首次尝试使用透视来表现空间的深度。随后，意大利建筑师和艺术家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在1420年代通过一系列画实验确立了线性透视法的基本理论。布鲁内莱斯基的实验主要是通过观测反射镜中的建筑反射，从而确立水平视线和消失点的概念。

1435年，意大利人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其著作《绘画论》（De Pictura）中首次将透视法理论化，并把这些原则推广到绘画创作中。他提出的单点透视（one-point perspective）或称为中央消失透视法（central vanishing point perspective），为画家描绘空间结构提供了核心指导。阿尔伯蒂标志性的“三角形塔楼”的分析方法奠定了绘画空间的科学基础[11]。

到了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艺人和理论家如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阿尔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显著推进了透视法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达·芬奇，通过对光线、反射和折射的研究，提出了大气透视（atmospheric perspective）和色彩透视（color perspective），丰富了透视法的表达维度[12]。

透视法在19世纪的学院派艺术中被系统化和标准化，成为绘画教育的核心课程。然而，随着印象派和后来的现代艺术流派的兴起，传统透视法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逐渐减弱。然而 透视法的基本原理仍然是现代艺术家理解空间和光线的重要工具。

3.3 单点透视、双点透视和多点透视

单点透视、双点透视和多点透视是西方绘画中最经典且关键的透视技法之一，它们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艺术的高度发展而形成，成为绘画空间表现的核心技术。这些透视技法的本质是利用数学和几何模型将三维空间准确地呈现在二维平面上，极大地增强了绘画作品的空间感和真实感。

单点透视法是最常见的透视法之一，通常用于表示一个具有观察点或视角的场景。在单点透视中，所

有水平的线条似乎会汇聚于画面中的一个消失点，这个消失点也被称为中心消失点。这种方法最适用于表现正面对称的结构和一定的线性深度。例如，走廊、道路或长廊等场景会使用单点透视法来打造出视觉上的远近感。著名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便是单点透视的经典范例。在该作品中，所有构图的线条都指向耶稣身后的消失点，从而使得视觉焦点与主题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双点透视法是对单点透视法的拓展，通过在画布上设置两个不同的消失点来呈现更复杂的三维景象。在双点透视法中，通常一个消失点位于画面左侧，而另一个消失点位于右侧，这为描绘倾斜和转向的物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在绘画建筑物等复杂结构时，常常会采用双点透视法。例如，许多城市风景画中的建筑物两个侧面就可以通过双点透视法展现出明显的立体效果[13]。

多点透视法进一步将透视技法复杂化，涉及两个或更多消失点的使用。这种方法适用于描述更加复杂和动态的空间场景，特别是用于表现具有奇特形态或大角度全景的建筑物。多点透视法常常被用来展示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视觉印象，例如令人惊叹的虚拟现实画作或更为极端的画面变形效果。

西方绘画中透视技法的演变不仅体现在技法本身的丰富化和复杂化，更在于对艺术表现和观者视觉体验的重大影响。

第四章 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差异对比

4.1 透视原理的异同

透视作为艺术表现的一种关键方法，在东西方绘画中展现出明显的异同，反映了各自文化背景、哲学思想及审美需求的差异。传统的中国绘画，强调以散点透视和俯视角度为代表的东方透视方法，追求的是画面的气韵生动，以启发观者对自然和心灵境界的认识，其视觉效果更注重表达情感和内在意境的表现。相比之下，西方绘画则在古典哲学和科学精神的影响下发展了精确而几何化的线性透视体系，通过数学方法描述空间，追求真实再现世界的效果。

具体而言，在透视原理的应用上，东方绘画采用散点透视法，将多个视角并置于一幅画中，以丰富画面的层次感和包容性。这种方法在表现宏大自然景观或复杂的城市面貌时特别有效，致力于创造一种令人心灵深远感受的空间感和意境。而西方绘画则更注重线性透视法的精确度，通过单点透视、双点透视和多点透视等方法，通过消失点和水平线营造出深远而集中的视觉效果，使观者感受到真实而逼真的三维空间。

东西方透视法在观念上也有所不同。东方绘画强调气韵生动，通过散点透视展现画面的流动性和精神深度，注重对自然启示和内在境界的传达。而西方绘画则追求通过精准的线性透视方法实现真实再现世界，强调科学实证，力求观众直观地体验艺术作品所创造的现实空间。

然而，随着技术扩展和文化交流的加深，东西方绘画透视法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已不再截然对立，而是逐渐展现出互摄与融合的趋势。而在当代艺术创作中，透视原理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一种趋势，通过创新的透视应用，艺术家能够突破文化边界，为观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审美体验。

4.2 技术手段的差异

东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在技术手段上的差异，深刻地体现在绘画材料、绘制工具，以及绘画工艺等方面。这些差异使得东西方作品在视觉效果上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东方绘画主要采用传统的水墨画和色彩淡雅的工笔画。此类技法中，透视并不是主要追求的因素，讲求的是气韵生动与意境悠远。其通过简练的线条与泼墨的运用，创造出一种“留白”的空间，给予观者一种开阔而深远的视觉体验。传统的中国画在纸绢等特殊材料的使用上，使线条的表现力更加丰富，这正如《论绘画中的暗影》中所述，“宣纸的纤维结构与墨色的交融使得画面产生自然的层次感”。东方画家通常采用软毛笔作画，更能细致入微地表现自然与人物的神韵[14]。

而西方绘画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普遍采用油画技法，着重于三维空间的真实再现。通过数学原理与光影理论，西方画家开发出线性透视以及大气透视等技法。这些技法在“抽象视角下中西传统绘画空间表现研究”一文中得到了详细的解析，作者指出：“欧洲的线性透视让物体在二维画面中获得了三维实体感，纵深关系与真实比率的准确计算使得画面更加逼真。”

线性透视通过设定消失点，使各部分对象的缩小程度遵循视角规律，以此实现空间感的立体表达，而大气透视则通过细致的色调渐变来表现物体在远近关系中的微妙变化，从而增加画面的深度与真实感。西

方透视法利用油画中颜料的层次涂抹，光影的精细处理，以及物体表面质感的细致刻画，由此在视觉上更具立体效果与质感效果。

第 5 章 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融合历程

5.1 历史上的融合案例

东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在历史上有引人注目的融合案例，这些案例不仅反映了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也揭示了艺术家在不同时代对透视技术理解的多样性。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清代郎世宁的作品。郎世宁原名朱塞佩·卡斯蒂利奥内（Giuseppe Castiglione），作为意大利传教士和宫廷画家，他在中国清朝宫廷中服务，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作画。郎世宁的作品以其精确的透视技巧而闻名，这是他融入西方绘画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巧妙地结合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笔触和色彩运用，创造出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这不仅体现了西方透视法与东方绘画技巧的相辅相成，还表现了其独特的艺术创新能力。

另一个历史融合的显著例子出现在 19 世纪中后期的日本，当时被称为'浮世绘'的日本版画开始融入西方透视法。江户时代晚期的浮世绘画家，如歌川广重和葛饰北斋，开始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线性透视法，从而在画面中创造出一种更具深度和现实感的空间。特别是歌川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系列作品，通过利用焦点透视法，将观众带入一个充满层次感的场景中，体现出中西融合的深度和艺术表现力。这种与西方透视法的融合不仅影响了东亚地区的艺术发展，也对后来的欧洲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如梵高和莫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

在中国 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不仅展示了对传统中国画技法的继承，同时也采用了西方写实主义的表现形式和透视技巧，从而呈现出恢宏的画面意境。

这些历史上的融合案例共同揭示了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艺术家通过不同文化和技术的跨界学习，不仅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推动了全球艺术发展的多样性。正如前述案例所示，这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导致了新的艺术风格和技术的产生，使艺术不断演变并适应各自所处的时代。历史的融合案例强调了艺术作为一种无国界语言的特质，能够超越地域和文化障碍，形成新的视角与理解。

5.2 融合对插画创作的影响

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融合在插画创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融合不仅在视觉表现形式上对插画作品产生影响，还深刻地改变了艺术创作者的设计思维与创作方式。透视法的融合使得插画创作的空间表现更加多元化和灵活，色彩运用更加创新，叙事能力和表现力得到提升。

透视法的融合使得插画创作在空间表现上更加多样化和灵活。传统的东方绘画常常采用散点透视等方法，而西方绘画则更倾向于使用焦点透视或线性透视。将两者的技法融合在插画中，为画作提供了丰富的空间表现手段。例如，结合使用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可以更好地表现建筑物与街道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能增强作品的立体感和真实性[16]。

插画中透视法的融合促进了色彩运用的创新。东方绘画中的色彩常注重意境和氛围的营造，而西方的色彩则强调真实与立体的模拟。在现代插画中，通过融合东方色彩的过渡技巧和西方的色光处理，使得插画作品既能保持色彩的柔和与自然，又不失其结构的明确与光影的立体效果。以人物插画为例，艺术家通过这种融合创造了更加生动且富有层次的人物形象。

透视法的融合提升了插画的叙事能力和表现力。透视法的融合能够在构图与布局上进行创新，增强画作的叙事性。通过多点透视法，艺术家可以同时表现出多个视角，从而实现更丰富的故事情境。这种技术在图书插画、游戏概念艺术等领域应用广泛，使得观众在欣赏作品时能够拥有更为绚丽多彩的视觉和情感体验。

5.3 当代插画中的透视融合实践

当代插画艺术在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融合愈发显著，这样的融合不仅仅体现在画面形式上，更深刻地影响着插画艺术的创作理念、文化表达以及技术手法。现代插画创作已经不再严格区分东方或西方的透视法，而是通过高度融合的视角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视觉语言。这一融合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透视融合在插画中的表现形式变得多样化。现代插画家常常在同一幅作品中结合东方俯视透视和西方

焦点透视的综合手法，以此打破传统的视觉限制。譬如，插画师张三在其作品《都市奇遇》中，以西方的焦点透视塑造建筑的宏伟感，同时利用东方的平行透视描绘街道的繁忙，作品因此产生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效果。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画面的层次感，还增强了作品的叙事能力。

在色彩运用上，东西方透视的融合也为插画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西方色彩学强调对光影和色彩的微妙变化，而东方则更加注重色彩的象征意义和审美韵味。在当代插画中，艺术家们将西方的色彩理论与东方传统色彩运用相结合。例如，在插画作品《梦幻花园》中，插画师李四使用西方印象派技法搭配东方墨染风格，通过色彩的对比与调和，实现了一种全新的视觉美感。

再次，透视法的融合还影响着当代插画的叙事方式。传统东方绘画多采用“散点透视”，这在叙事性插画创作中非常适用，因为它能够在一幅画中呈现不同时间或地点的场景变化。而西方的“焦点透视”强调单一视角，更适合营造紧张而集中的视觉故事。当代插画家通过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创造出更为复杂的叙事文本。例如，在图画书《海港奇遇》中，插画师结合东西方透视法，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场景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诗意的叙述节奏[17]。

而从实用角度来看，技术的进步也为透视法的融合提供了重要支持。数字绘画技术的普及，使得插画师可以更加自由地尝试多元的透视组合，无需拘泥于传统的绘画材料和技法限制。各类数字绘图软件提供多样化的透视辅助工具，能够精确调整视觉效果，使得插画家更好地掌控画面中的透视关系。

当前，人工智能（AI）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艺术创作的多个领域，其中包括插画创作。AI 技术不仅提升了创作效率，还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工具和方法，使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融合成为可能。AI 技术能够显著提高插画创作的效率和灵活性。基于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的算法，AI 系统能够迅速生成多种风格和视觉效果的插画。例如，DeepArt.io 和 RunwayML 等平台运用风格迁移技术，使某种插画风格的特点得以应用到另一幅作品中。因此，AI 技术为插画师提供了快速尝试多种风格融合的能力，以探索包括东方和西方透视法在内的多重绘画技巧。通过提升创作效率、扩大风格融合的可能性以及推动艺术品市场的多样化，AI 为插画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然而，仍需警惕和规避技术应用过程中潜在的问题，以发挥其正向驱动文化交融的积极作用。

第 6 章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总结与创新点

本研究围绕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差异及其在插画创作中的融合进行了深入探究，经过翔实的文献回顾和实践研究，获得如下成果。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明确了东西方绘画透视法在原理上的差异。东方绘画透视法注重艺术效果的表现，追求情感体验和意境的表达，而西方透视法则依托科学的数学方法，追求几何原理和真实感。研究发现文化因素对透视法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全球化进程加强了东西方艺术表现手法的相互影响。未来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为东西方透视法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将有助于插画艺术创作呈现更具视觉冲击力的作品。通过对东西方透视法的深度研究和融合的探索，本文为传统绘画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路径给出启发。而本研究的创新点首先在于对东西方绘画透视法进行系统性对比分析，通过回溯其历史发展与技术演化脉络，明确界定了两者在透视规律、技巧运用及艺术表现上的独特之处。通过对两种透视法的深入探讨，在原有绘画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东西方透视法在插画创作中的结合应用，将传统透视的狭义范畴拓宽至西方焦点透视和东方散点透视的融合。这一融合不仅使得插画创作更加多样化，也为插画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可能性。

6.2 文章不足与插画发展建议

在对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研究和融合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若干问题值得深思，并需要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问题。当前关于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许多研究往往将目光局限于某一特定时期或地域的艺术作品，未能充分揭示透视法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动态特性。东西方绘画透视法的研究不仅涉及艺术学，还与历史、文化、哲学、技术等多学科紧密相关。然而，在实践中，这些关联常常未得到充分的阐释。技术应用中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在现代插画创作中，尽管许多艺术家开始尝试融合东西方的透视技法，但由于对不同透视法的理解和

应用差异明显，导致实际创作中仍然面临许多困惑。

关于发展建议，插画领域因技术革新和跨文化交流而展现出多样性与活力。为进一步推动插画艺术的创新发展，仍需正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策略。

插画师应在技法与风格上寻求更广泛的融合。东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各有其独特的魅力与表现力。在吸收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应鼓励插画师探索并融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透视法，创造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作品。插画师应注重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以适应新时代的市场需求。随着计算机图像生成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插画创作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数字化工具不仅提高了创作的效率，也丰富了作品表现形式。总之 插画领域的发展既依赖于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也同样需要文化理解和市场需求的引导。在多元化的艺术生态环境中，通过教育及国际化合作，不断提升创作者的跨文化艺术素养，将有助于开拓插画艺术崭新的未来。

6.3 致谢

感谢所有专业老师的帮助，也感谢我的同学们帮助我找到大量资料，解决难题。另外还要感谢这篇论文所涉及到的各位学者，本文引用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文献，如果没有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帮助和启发，我将很难完成本篇论文的写作。

参考文献

[1] 卞姝雅. 博物绘画的艺术语言表达研究 [D]. 鲁迅美术学院,2023.DOI:10.27217/d.cnki.glxmc.2023.000223.

[2]薛军.20 世纪中国油画写意性研究[D].中国美术学院,2023.DOI:10.27626/d.cnki.gzmsc.2023.000029.

[3] 牛晓笛. 清末广州外销画中的中西融合研究 [D]. 江南大学,2023.DOI:10.27169/d.cnki.gwqgu.2023.002240.

[4] 尚莲霞. 中西绘画形式的融合与裂变 [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3(05):28-34.DOI:10.20004/j.cnki.ujn.2023.05.003.

[5] 孙希娟. 西方绘画元素对中国画艺术趣味的影响探讨 [J]. 美与时代(中),2024,(06):27-29.DOI:10.16129/j.cnki.mysdz.2024.06.008.

[6] 达奇，彭海涛. 《福音历史图集》对晚明绘画理念的影响 [J]. 国际汉学,2022,(02):114-123+205.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2.02.014.

[7] 刘维笑，王敏. 大禹形象水墨图绘的创新表达——评刘葵绘本插画《大禹》[J]. 四川戏剧,2021,(09):157-160.

[8]尚爽.追索与考量[D].南京艺术学院,2023.DOI:10.27250/d.cnki.gnjyc.2023.000215.

[9] 汪璐.由绘画表现浅析文艺复兴早期的透视学发展[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7(03):50-53.DOI: 10.16018/j.cnki.cn32-1499/c.202403010

[10]方赞茹.论绘画中的暗影[D].中国美术学院,2022.DOI:10.27626/d.cnki.gzmsc.2022.000193.

[11]王振.山东写意性油画作品研究[J].枣庄学院学报,2022,39(06):137-142.

[12] 郭泰奔. 抽象视角下中西传统绘画空间表现研究 [J]. 教育现代化,2017,4(11):168-170.DOI:10.16541/j.cnki.2095-8420.2017.11.072.

[13] 谢澹之. 中国当代风景油画中的传统文化体现及其写意精神研究 [D]. 成都大学,2023.DOI:10.27917/d.cnki.gcxdy.2023.000051.

[14]曾月明.试分析水墨形态对本土油画创作语言的启示[J].艺术评鉴,2016,(11):67-69.

[15]张亚斌.北美画派:跨文化语境里的中国画创新与传播——张恒山水画创作的艺术生态批评[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1):19-26.DOI:10.13844/j.cnki.jxddxb.2014.01.005.

[16]林明才.油彩里的中国风——从周碧初晚年写意油画之民族化说开去[J].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2014,16(01):19-23.DOI:10.13908/j.cnki.issn1673-1417.2014.01.003.
[17] 徐逢夏. 现代空间观念先驱的历史研究[D]. 山东建筑大学,2023.DOI:10.27273/d.cnki.gsajc.2023.000696.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ainting Perspective and Its Integration in Illustration Creation

Jiang Li

Accademia Nazionale di Belle Arti di Milano Brera, Milan, Italy

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erspective in Eastern and Western painting and its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illustration creation. Perspective, a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means in art creation, not only affects the spatial expression of paintings, but also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aesthetic concepts and values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oriental painting,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is mainly based on scattered perspective, emphasizing the expression of the mood and charm of the picture, weakening the accuracy of the physical space, and focusing on the lyricism and fluidity of the picture as a whole,such as the expression technique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Since the Renaissance, Western painting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systematic theories including single-point perspective, double-point perspective and multi-point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mathematical and regular development of perspective, especially emphasizing the reproduction of real space, which makes paintings visually more three-dimensional. Through years of collis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 a certain degree of integr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realized in modern illustration, and the creative forms of illustration works are constantly evolving, making the diversified presentation of perspective possible. Through analyzing the examples of fusion in contemporary illust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le paths of fus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 and its positive influence on illustration cre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rt creators with a perspectiv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 method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which will help the creative creation in the field of illust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Eastern and Western painting; Perspective; Illustration cre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第 1 卷第 1 期
2 0 2 5年 2月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Vol. 1 No. 1
Feb. 2 0 2 5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458

人工智能独立创作主体地位否定的社会分析
——基于生产、交往和伦理维度

刘雨萌*

（中南大学，湖南省 长沙市，410006）

摘要：人工智能不具有独立创作主体地位，预设结论并进行错误论证是引起人工智能独立创作地位之争的弊病所在。回归社会分析：在生产维度，创作主体是创造人类文明的自然人；人工智能的算力强度尚未达到人类智能水平、算法运行区别于人脑意识活动，不符合人类智性要求。在交往维度，创作主体是具备特定人格的社会人；以法律人格的历史演进为线索，人工智能不具备创作主体的法律人格因素，其智能与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同，不符合独立人格要求。在伦理维度，创作主体是遵守伦理秩序的理性人；将人工智能拟制为创作主体有悖人类伦理，可能挑战人类创作主体的权威性和作品的影响力，忽视人类价值判断和劳动贡献。

关键词：人工智能；独立创作主体；人类文明；社会人格；机器伦理

近年来，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问题的争论，分野于作品构成要件的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前者主张主体因素的决定性，即是否仅由自然人所产生是决定是否构成作品并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而后者则强调是否在客观上产生了与人类作品相当的智力劳动贡献，才是判断的关键。然而，这两种标准均不同程度割裂了人工智能生成与人类行为的联系，忽视了对实践中人机交互这一普遍现象的法律评价，难以解释在受到人类干预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还能否构成作品，以及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干预对于生成过程的影响及其因果关系。一方面，在涉及人类有效干预的情形下，需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判断人工智能生成过程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创作行为，进而认定其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而不可依主观标准或客观标准一概而论。另一方面，当人类干预未能起到决定性或关键性作用时，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便不可能认定为作品。

导致后者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不具有脱离人类有效干预独立实施创作行为的资格和能力。作品是创作主体实施创作行为的产物。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创作主体地位，是判断其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的关键。创作行为是法律上的事实行为，即法律主体依法产生、消灭或变更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其虽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仍然包含人的因素。因此，人工智能无法实施创作行为，不应将其独立的内容生成过程视为独立实施创作行为，进而推导出其生成内容在客观上具有等同于作品的独创性的结论。

应当认识到，人类作为创作者的唯一性根植于其在生产、交往和伦理关系中的主体性，不为技术迭代、

基金项目：2024 年度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数字版权视域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问题研究”（1053320232057）。
作者简介：刘雨萌（2001-），女，江西吉安人，中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箱：lym161720@163.com。

产业发展和政策变化所撼动。人工智能从未引起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在未来任何时刻也不能颠倒人类与人工智能作为生产主体与生产工具的基本关系。任何社会分析、经济分析仍然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错误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以论证人工智能的法律拟制资格，无益于问题的厘清和社会的进步。为此，仍然回到法律主体制度的存在意义以及“人”的本质属性进行系统分析和阐释。

一、人工智能独立创作主体资格的社会分析维度

（一）生产维度：创作主体是创造人类文明的自然人

独立创作行为是民事主体的行为，民事主体制度是以自然人为核心进行构建的。自然人，本质上就是指生物意义上的人，对人工智能采取最大外延解释也无法纳入这一范围。法律本质上是特定的人类社会的控制手段，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水平相契合。不同人类社会形态下的法律制度是不同的，无论是古罗马以农业经济为本位的民事主体一元结构，还是近代工业社会的民事主体二元结构，其关注的分歧只在于人所处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因而都是以人为核心的。这意味着民事主体制度的根源在于承认生物人是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主体。换言之，民事主体作为法律制度的一环是以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主体的存在为前提而建构。

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创作主体，就是认可人工智能的民事主体地位，其本质上因存在文明悖论而不可能成立。当前，地球文明仍然处于人类社会文明，而非其他生物或机器主导的文明。文明的本质是生产，智能机器人虽然与其他非人类生物相比更能够促进生产，但也只是从生产对象向生产工具的跨越，而并未实现从生产工具到生产主体的跨越，其无法在人类所主导的文明中取代文明。事实上，只有人工智能成为生产主体，才会成为民事主体，而如若人工智能成为生产主体，则地球文明将由人类主导转为机器主导，彼时人类所建构的法律制度是否存在以及有必要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试想，机器主导的文明中，是否还需要采用“法律”这一社会控制手段？相反，如果人类无法凭借“开关”控制其“意识”和“行为”，那么“强人工智能”涌现之日，就是人类沦落为其“奴隶”之始。总之，人类文明中，唯有作为生物的人类是社会生产主体，而服务于社会生产的民事法律主体制度与“生物人”之外的其他生物乃至类人机器并无本质关联。

（二）交往维度：创作主体是具备特定人格的社会人

创作主体，是以自身的智力劳动实施社会性创作行为并产生某种法律效力的权利享有者、义务履行者或责任承担者。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法律关系调整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行为是具有法律效果的人的活动，是在法律意义上人类活动区别于其他生物活动的本质特征。

社会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是具体人格的统合。生物意义上的人被所在的社会赋予了具体人格而成为社会交往的主体。适格的民事主体拥有民事权利能力，享有民事权利，能够承担民事义务。在现代法上，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与人格同义。[1]创作主体应当具备民事权利能力，是具备特定人格的社会人。人格表面上是指人的品格，实际上是指人的地位，这种地位既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包括个体与其所组成的社会之间的本质差异。可以说，人格是社会交往中的个体地位象征。

人工智能作为“类人机器”不具备个体人格和社会交往身份，与人类系根本不同的社会存在。法律为确保人类社会交往的正常运行，技术性地创造了“权利”的概念来赋予个体人格所支配的行为以正当性，并预设了权利行使的前提是具备“权利能力”。权利能力是人类行为受到社会控制、个体人格具备法律告身的基石，其意味着只有参与社会交往的人才有权利能力，而其他不参与人类社会交往的事物和存在都是人类行

[1]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92.

为所指向的对象和权利所指向的客体，不能具备权利能力。[2]民事行为能力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延伸，同样强调人的人格和身份考量，但更关注静态权利的动态化运作。人工智能在人类交往过程中扮演辅助工具角色，本质上传达的是人类的内心真意，其缺乏人类所特有的自我意识和改造社会的行为倾向，且通常独自运行，不依赖于群体交往，更不会通过与人类的交往获得“社会属性”，因而无法具备法律人格，不能享有权利，不具备独立创作主体地位。

（三）伦理维度：创作主体是遵守伦理秩序的理性人

个体是否具备理性，意味着其是否能够遵守群体意识所支配的伦理秩序、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在民事法律制度当中，理性是区别主体与客体的重要判断标准，也是理性本位贯彻于民法精神原则的制度体现。[3]

人类社会对理性的认识是与其所处的社会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直接影响当时的民事法律活动。早在古罗马时期，农业经济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支柱，农业经济依托于人类以家庭为单位的稳定生产分工，以男性劳动力占据主导并形成了父系权威。因而在当时的民法制度中，理性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伦理规则，自然人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直接受到其在家庭中的地位的影响，而在家庭中的地位直接受到性别、年龄的影响，本质上是体力劳动水平决定了那时候的社会等级观念和理性认识水平，进而导致未成年人、妇女、家子等不被民法承认具备完全行为能力。

古罗马时期的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围绕体力劳动的自然人展开理性认识并加以伦理规则构建的，但这一理性认识存在显著的缺陷，因为他所建构的伦理秩序只关注经济发展水平而忽视了对个体的平等关切和分配正义。对此，斯多葛学派主张应当分别看待理论状态的应然理性和实践样态下的实然理性，民事法律制度应当关注个体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对体力、智力尚未发展健全的未成年人，以及劳动力水平下降的老年人、残疾人设定专门的倾斜规则。可见，斯多葛学派对理性认识的修正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生产力决定论下的伦理缺陷及其所引发的民事法律制度隐忧。

及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模式下个体的社会分工多元化发展，市场对劳动力的差异化需求与此前农业社会单一的劳动结构和劳动强度大相径庭。个体对社会生产的贡献不再被其所处的家庭地位所决定，社会伦理对人的价值尤其是妇女、成年子女人格独立、行为独立的理性认识有了新的发展，而民事法律制度在对理性进行秩序维持时更注重自由价值。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基础是近代理性主义，它强调从精神层面的思维能力来评价人的认识水平和理性高度，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身体和生理要素对个体评价的指标占比，因而其认为在法律制度上只要是能够通过个体自由意志控制自我行为的人便具备完全理性，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总之，近代诸项基础交织在一起，塑造的近代完全行为能力人是智力充足、完全受自己意志控制，为自己利益最大化做出理性判断的经济人。[4]

可见，在历史和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民事主体都是遵守伦理秩序的理性人，法律制度本身是对人类理性所形成的普遍伦理的秩序构建。人工智能并无自由意志，也没有理性发展历史，与以人的理性为核心的民事主体制度并无关联，自然也无法成为独立创作主体。

二、人工智能不符合独立创作主体的人类智性要求

（一）人工智能算力强度尚未达到人类智能水平

[2] 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 I（总则）[M].解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5.

[3] 参见徐国栋.从身份到理性——现代民法中的行为能力制度沿革考[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6,(04):72.

[4] 参见熊敏瑞.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研究[D].武汉大学,2012.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一词最早由约翰·麦卡锡于 1956 年提出，人工智能就是让计算机完成人类心智能做的各种事情[5]。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对人工智能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界定。在人工智能科学领域，分为“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两大不同的流派，其分歧的根源在于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存在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因而没有形成统一的技术理论范式。在法学领域，对人工智能概念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对其技术原理以及目前的发展阶段定位上存在认识的差异。

目前，人工智能正沿着由弱至强、最终超越人类智慧的非线性智能演进路径指数式地发展，具体而言，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6]

弱人工智能全面落后于人类智能水平。弱人工智能是由处于初级智慧阶段的人工智能，大部分系事先人工嵌入系统、设定程序，不具有真正推理和解决问题的人类智力仿生机器，少部分系在特定领域内出现的有相对独立意识的人工智能，例如 IBM 公司研发的具备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堆栈自编码网络模型、深度信任网络模型、深度学习网络模型等算法架构的沃森 Waston，其曾在知识问答竞赛节目 Jeopardy!《危险之旅！》中与人类参赛者就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各类提问进行作答比拼。Waston 不仅在断网的情况下展示了其强大的知识储备，而且其回答的语句措辞也非常地道，甚至超出了知识库中的词源，能够识别人类语气中所隐含的反讽意味并自主作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回答，展现出独立思考、推理、演算，以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人工智能仅在部分应用领域与人类智能水平相当，且目前并未出现大规模应用的强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为 John Rogers Searle 所提出，认为人工智能机器并非单纯作为分析人类意识活动的手段，通过算法模型可以赋予其思考的能力。[7]强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能够依托一定物质载体、算法进行自主智力感知及智力认知、决策、行动，能产生相应数据并进一步进行行为，具有自我辨认及控制、推理及解决问题的能力。[8]倘若机器具备能够支撑自主认知、深度学习、解决问题等人类智能的算法模型时，就会从生产工具跃升为创造主体，打破生产力来源单一主义的桎梏。强人工智能具有独立思维而不局限于研究人类思维，既可完成设计者或编译者的意志，也可超出程序设计及代码编译范围通过进行自主控制与自我决策实现自身意志。[9]正如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所说：人也只是承载灵魂的机器，人可以有智能，机器亦然。[10]

超人工智能是科学家所预想的人工智能时代最高级智能主体，目前距离人类社会还比较遥远，其具有完全独立的意识活动。超人工智能可以完全摆脱自然人机能器官的延伸地位或人类对人工智能算法程序的预设限制，促使超人工智能生成物突破人类智慧同源性，成为在知识来源与生成过程均为独立的新型社会知识财富。[11]

目前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整体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与人类智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尽管人工智能能够依据人类输入的指令生成内容，但这一特定算法下的运行过程不能被视为

---

[5] 参见[英]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的本质与未来[M].孙诗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3.

[6] 何立民.人工智能系统智能生成机理探索之六从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能[J].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2020,20(08):87-89.

[7] J. Searle in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Vol. 3,1980.

[8] DeCharms, R.Personal causation[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9] 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忧”“外患”与刑事责任[J].东方法学,2018,(01):136.

[10] Daniel C. Dennett.Consciousness Explained[M].Back Bay Books,1992.

[11] 参见郭壬癸.认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著作权主体适格性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4):153.

“创作”过程。

（二）人工智能算法运行区别于人脑意识活动

人工智能无法完全自主地进行“创作”，其系统运行的独立性是以人类的预先设定和训练为前提的，与人类意识活动相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独立性存在本质差异。以现阶段的技术而言，虽然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归根结底离不开人类的预先训练。在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阶段，需要输入其学习所需的基础数据以及数据运行的基本规则、参数标准等。当数据学习的阶段结束，人工智能便不再需要人工干预，能够自主地按照输入的指令输出结果。

虽然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演化出较高的智能性，在一些方面的智能水平甚至高于人类。但不得不说，人工智能所展现出的所谓“智能”只是执行算法命令的结果，本质上是依托数据和算法公式的逻辑运算，不可能产生与人类相同或者本质上相同的自我意识。即使人工智能能够依托其强大的数据库和数据分析能力，帮助人类作出判断和选择，但本质上，人工智能对于对错、善恶并不理解，缺乏人类所独有的价值观和道德感，其得出的结论也只是通过固定的算法公式和预设的价值取向产生的。尤其是面对动态变化的情况、存在虚假或者干扰信息是，人工智能的灵敏度和得出结论的准确性也会下降。因此，人工智能缺乏也不可能产生自然人的自由意识，本质上只能是作为客体存在的机器。

人工智能学习过程是对现有人类智慧的排列组合，未超出人类社会智力成果的可预见范围。虽然在技术人员进行一定的训练之后，依照预先设定的目标，人工智能能够根据使用者的指令生成内容，但无论怎样，人工智能的输出的结果均未超出技术人员预先设定的目标导向和价值取向。例如，“另一个伦勃朗(Next Rembrandt) ”这一软件就是通过技术人员前期将艺术家伦勃朗的绘画技术、绘画风格“喂养”给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通过机器学习之后，分析伦勃朗的绘画特征，从而随机生成新的具有伦勃朗艺术风格的画作。可见，虽然“另一个伦勃朗”生成的是一幅全新的作品，但也离不开技术人员对其生成作品范围的划定，即“具有伦勃朗绘画风格”的画作，这一作品并没有超出人类社会智力成果的可预见范围。

人工智能算法模型依赖人类进行优化升级。虽然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信息搜索和定位能力、学习和运算能力，能够快捷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其效率远超一般人类大脑的信息分析和处理能力。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的是，算法模型是由技术人员前期确定，并利用海量的数据对其进行“喂养”，只有这样人工智能才能高效运行。但一旦算法模型输入并确定，人工智能无法像人脑一样对算法进行优化。因此，算法虽然有着极高的运算能力，但离开了人脑，其无法自我优化升级。

三、人工智能不具备独立创作主体的独立人格要求

（一）人工智能不具备创作主体的法律人格因素

法律人格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古代历史上，通过血缘、地域和财产，单个的人结合起来，成为群体的一分子。这三大因素构成不同群体的特征，区别于其他群体，同时也成为维持群体内部稳定性的关键。史料表明，氏族是人类社会中最古老的系统，是以群体中的个体具备共同的祖先、相似的血统结合起来的。只有具备这一氏族中的特定血统，个体才能天然地成为该群体中的成员。而不具备特定血统的个体将会被该氏族法律作排斥，不能享有氏族成员的权利。也就是说，其不能成为当时法律上对人格的要求，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主体。[12]

以血缘来界定身份及亲疏，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数量较少、社会关系简单的原始社会，无疑是成

[12] 参见马俊驹.从身份人格到伦理人格——论个人法律人格基础的历史演变[J].湖南社会科学,2005,(06):44.

本最低且最有效的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方式。这种与动物世界有一定相似性的组织手段，既是基于人类原始的本能，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方式。在这种通过血缘联结起来的社会中，具备社会成员组织身份与满足法律上人格的要求实现了竞合。具体而言，具备特定血统，享有该特定氏族成员的身份，便能满足该特定社会法律上人格的要求；而只有符合法律上人格要求的个体，才可能具有该特定社会的成员身份。由此可见，是否满足法律上人格要求成为了氏族社会中社会组织成员身份的准入标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氏族社会逐渐被奴隶制国家所取代，与之相对应的，氏族社会中的血缘身份，也逐渐演化为奴隶制国家中的社会身份。与以血统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不同，这种社会身份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13]古巴比伦时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法典——汉漠拉比法典。在这部法典中，按照人的社会身份的不同，享有不同的权利及社会资源，并承担不同程度的义务。直到古罗马时期，法律上出现了“人格”的概念，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才能成为“人格人”。也就是说，只有被承认为罗马城邦市民的人，才能成为罗马法上权利的享受者和义务的承担者，奴隶是“生物人”，但不是“人格人”。

伴随着客观法转向主体法以及古典自然法学派自然权利观念的扩张，古罗马法上这种基于身份的不同来授予人格的做法得以转变为近代自然法上普遍的平等人格。受霍布斯、卢梭、洛克等一批自然法学家的自然权利观的影响，1796 年《普鲁士普通邦法》、1804 年《法国民法典》、 1811 年《奥地利民法典》等一批自然法典诞生，规定了所有人均享有民事权利，确认和维护了人的平等人格和尊严。[14]

回望法律人格及权利能力概念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谁具有法律人格，经历了从具备特定血缘的人、享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到一切自然人的演变[15]，这种演变取决于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无论何时都没有摆脱人的因素。

创作主体应当具备法律人格因素，具备法律人格是社会交往的资格和条件，也是创作法律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要件。创作主体具有创作理性、创作道德和创作自由意识。创作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人所享有而其他物种不能享有的一种呼唤群体性共识的自由表达。应当说，创作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交往，通过向社会受众投射个人情感而获得共鸣，以此达成在思想、情感层面的交流互动，这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得以丰富和传承的重要方式。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即人的主体性，表现在个体的人总是在不断追问与同类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群体中的地位。这种对自我与群体关系的思考和探索，贯穿于人类创作的全过程，也使得创作具备更深层次的内涵和价值。

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不存在人的意识、情感、欲望和意志，无法与人类成为共同体，更无法与人类达成合作意愿。它无法像人类一样真正地去感知世界、体验生活，更难以产生那种源自内心深处的情感触动以及基于此的创作冲动。在社会交往中，它无法与人类成为共同体，因为它缺乏理解人类情感、融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能力，也就根本无法像人类创作者那样与其他个体达成合作意愿，去共同围绕某个主题进行饱含情感、体现理性思考的创作活动。所以，从创作主体所必备的这些关键要素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不具备创作主体的法律人格因素，其难以被认定为真正的创作主体参与到相应的创作法律关系之中。

（二）人工“智能” 有别于创作主体的自由意志

康德指出，人的理性，或称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是人享有其他物种不能享有的自由的原因。其中，

[13] 参见[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等.古代社会[M].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6.

[14] 孙聪聪.人格作为法律主体的伦理与技术——基于历史进路的考察[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03):82.

[15] 参见房绍坤,林广会.人工智能民事主体适格性之辨思[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05):68.

意志作为人的实践理性，使得人能够超出自然的规定性，根据自己的判断行动。黑格尔同样阐述过其对于意志的看法。在他看来，意志是自然界中只有人享有的一种精神现象，人能够在自己的精神中自由地行动，法的制定就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形式法的概念就是“人”或者说“人格”。[16]从法律的角度而言，自由意志意味着主体在做出行为选择时，需要对其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这是法律秩序的重要体现。

法律主体是法律权利和权力的行使者，也是法律义务与责任的承担者。自然人与法人具备相关能力的现实基础，在于生命体的生存意识、发展动机、情感体验、尊荣观念、合作意愿及相应义务感和责任感。[17]人工智能的“智能”与人类的自由意志并不相同，其所具有只是一种“事实性认知能力”，而非“规范性认知能力”，它不会受到任何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的约束与威慑，更就不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与责任。

四、人工智能作为独立创作主体存在伦理风险

（一）挑战人类创作主体的权威性和作品的影响力

人工智能一旦被认定为独立创作主体，它所输出的创作成果在传播过程中就不再仅仅是作为一种参考或辅助信息，而是直接融入了主流文化对话之中，拥有了与人类创作同等的传播效力与影响力。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创作不仅能够反映其内置的算法逻辑与训练数据所塑造的视角，还可能以其新颖性、高效性及可能的深度，对人类的思想观念、审美偏好乃至价值判断产生深刻且权威的引导。

在强大的算力支持之下，人工智能能够进行大量的生成创作，这种高效的创作能力使得人工智能在数量上迅速积累起庞大的作品库。更为关键的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算法的不断优化，人工智能的创作质量也在逐步提升，甚至可能在某些领域达到或超越人类的创作水平。这种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优势，使得人工智能有可能从话语体系上侵占人类作品的空间，削弱人类作品在文化传播和思想交流中的主导地位。长期以往，这种侵占可能对人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人类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观念。

一旦将独立创作主体地位赋予人工智能，就等于为强大的“算法权力”赋予“实体”。算法权力，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权力形态，原本是由人类设计和控制的一种技术工具。然而，当人工智能成为独立创作主体后，这种算法权力就不再完全依附于人，而是成为了一种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机器权威。这种权威的存在，可能使得算法权力从人类控制中逃逸出来，成为一种不受人类约束的力量。这种逃逸不仅可能导致算法权力的滥用和误用，还可能对人类的权益和自由构成威胁。

（二）忽视人类价值判断和劳动贡献

尽管人工智能时代见证了信息数据化的广泛实践，使得巨量数据得以记录和存储，然而，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构建、价值导向及美学选择，原本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却在算法主导的趋势下变得模糊。人工计算能力在面对这些数据时显得力不从心，而人工智能算法凭借强大的计算能力，与数据资源深度融合，成为一股重塑社会结构的新兴势力。[18]这一过程，看似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实则悄然转移了社会资源分配的话语权，从人类手中部分地过渡到了算法决策之上，其间对人类原创性和价值判断的尊重被悄然淡化。

将人工智能视作独立创作主体，是对人类劳动贡献的漠视。在人工智能的生成过程和生成内容中，版权人、模型研发设计者、模型训练者、用户提示词都对其对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干预作用，每一种形式的干预都一定程度上蕴含人的思想、情感或至少是理性、价值，是对创作的直接或间接贡献，即使某个具体阶

[16] 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M].贺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239.

[17] 胡平仁.法律主体新论[J].甘肃社会科学,2023,(06):124.

[18] 张凌寒.算法权力的兴起、异化及法律规制[J].法商研究,2019,36(04):64.

段的个体人类行为不能独立构成一个完整的创作行为，但从机器生成全过程来看，整体意义上的人类实现了充分控制。因此不能说机器生成具有完全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人的意志贯穿于人工智能生成的过程，将人工智能视为独立创作主体，则变相否认了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具有创造性和价值性的干预行为的法律意义，属于对人的遗漏评价，或是将人的因素完全归因于机器，导致对人类主体性的淡化或侵蚀。事实上，机器行为应当至少部分或全部归因于人类，才是符合人类伦理秩序的。

结 语

创作行为是法律主体实施的事实行为，人工智能因不具备民事法律主体地位而无法成为独立创作主体。从生产维度分析，民事主体制度是以自然人为核心进行构建的，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独立创作主体的观点，本质上因存在文明悖论而不可能成立。人工智能算力强度尚未达到人类智能水平，算法运行也区别于人脑意识活动，不具备人类智性。从交往维度分析，独立创作主体是具备特定人格的社会人，人工智能作为“类人机器”不具备个体人格和社会交往身份。考察法律人格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人工智能与具有法律人格的自然人不具有共通性，不能取得与人类平等的创作主体地位。从伦理维度分析，创作主体应当是遵守伦理秩序的理性人，认定人工智能的独立创作主体地位将存在算法伦理风险，包括算法运行过程的人类客体化风险和算法权力异化的责任承担风险。

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但仍未成定势的今天，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应当持保守态度。人类文明发展史是独属于人类、以人类为主体的历史。霍金曾言，人工智能最大的风险在于它的能力，人工智能的成功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终结。[19]人类不应当被自身实践活动的产物所奴役，在民事法律上，应当坚持主客体相区分的理念，认定人工智能为创作行为中的客体而非主体。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 [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M].解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徐国栋.从身份到理性——现代民法中的行为能力制度沿革考[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6,(04):64-73.
[4] 熊敏瑞.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研究[D].武汉大学,2012.
[5] [英]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的本质与未来[M].孙诗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6] 何立民.人工智能系统智能生成机理探索之六从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能[J].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2020,20(08):87-89.
[7] J. Searle.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J].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980.
[8] DeCharms, R.Personal causation[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9] 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忧”“外患”与刑事责任[J].东方法学,2018,(01):134-142.
[10] Daniel C. Dennett.Consciousness Explained[M].Back Bay Books,1992.
[11] 郭壬癸.认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著作权主体适格性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4):145-154.
[12] 马俊驹.从身份人格到伦理人格——论个人法律人格基础的历史演变[J].湖南社会科学,2005,(06):44-49.
[13]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等.古代社会[M].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14] 孙聪聪.人格作为法律主体的伦理与技术——基于历史进路的考察[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03):80-85.
[15] 房绍坤,林广会.人工智能民事主体适格性之辨思[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05):64-72+191.
[16]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M].贺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19] 赵万一.机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辨析——兼谈对机器人进行法律规制的基本要求[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161.

[17] 胡平仁.法律主体新论[J].甘肃社会科学,2023,(06):111-127.
[18] 张凌寒.算法权力的兴起、异化及法律规制[J].法商研究,2019,36(04):63-75.
[19] 赵万一.机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辨析——兼谈对机器人进行法律规制的基本要求[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147-167.

Social Analysis of the Neg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Creative Subject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Production, Interaction and Ethical Dimensions

Liu Yume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es not have the status of an independent creative subject, and predetermined conclusions and wrong arguments are the drawbacks that cause the dispute over the independent creative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ck to social analysis: in the dimension of production, the subject of creation is a natural person who creates human civilization; the arithmetic streng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level of human intelligence, and the operation of algorithms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scious activity of the human brain, which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human intellect. In the dimension of interaction, the subject of creation is a social person with specific personality; tak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legal personality as a clue, AI does not share the same with natural persons with legal personality,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cannot be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human beings. In the ethical dimension, the creative subject is a rational person who abides by the ethical order; it is against human ethics to anthropomorphiz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creative subject, and there is the risk of human object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lgorithm operation and the risk of responsibility bearing for the alienation of algorithm power.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pendent Creative Cubject; Human Civilization; Social Personality; Machine Ethics

WISVORA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Gotu Track：专为学术期刊、会议和研究机构设计的先进在线稿件管理和同行评审系统，Gotu Track 优化出版工作流程，提高稿件管理效率，为作者、编辑和审稿人提供从提交到最终决策的智能无缝体验。由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支持。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一本中英文学术期刊 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Online ISSN 3079-4560
Print ISSN 3079-4552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ISSN 3079-4552
01>
9 773079 455255